

发稿之前：

这部自传小说，是《一个大童话》的续篇。原名《童话中的一地书》，于 2010 年 3 月，在“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全书 482 页，书里配有照片。

作者于 2013 年加写了一万九千字，改名为《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在国内的“共识网”连载到 2016 年 8 月，直到该网站被封闭为止。

现交给“绿野出版社”发表，以及另外的两本书：《一个大童话 我在中国的四十年 1946-1986》和《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

在此，对“绿野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遇罗锦

2016.11.22

于德国 Passau

自传小说

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

《一个大童话》续篇

遇罗锦 著

66 封信目录

1. 在开往东德的火车上
2. 真地到达西德了？
3. 我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4. 第一次过狂欢节
5. 小松鼠是怎么结的婚
6. 十万马克的亏空？！
7. 和兰博士见面
8. 画作才标五十美元
9. 使馆官员的话 / / 菊花的家
10. 花狸的日记 / / 在黑天鹅的父母家
11. 怎么会有流不完的眼泪
12. 这也是世界知名的汉学家？ / / 小松鼠气得脸都变紫了
13. 再见了，小松鼠，黑天鹅！
14. 这一晚我睡得踏实极了
15. 铁当当的证据足有几百页
16. 申请书在《中央日报》全文发表
17. 胡耀邦的话我简直难以相信
18. 阿西汽车的玻璃被砸 / / 惊险的一夜 / / 我叫奇奇
19. 完全是因为孤独而想在一起
20. 他们失望的到底是什么？

21. “念心儿” / / 认识阿玲
22. 我们很难越过那道高高的门槛
23. 竟无一个中国人? / / 疤老弟的小疤
24. 我的墓地在读者的心里 / / 与大鳄鱼笔战
25. 四好的奇特神经
26. 把霸头的门砸得坑坑凹凹
27. 就象古代的奴隶市场上叫卖着奴隶
28. 《爱的呼唤》出版 / / 生日聚会
29. 长颈鹿的情人 / / 搬家
30. 突然出现的大侦探福尔摩斯
31. 停发生活费 / / 做了经济担保又撤保
32. 红的故事（一）
33. 红的故事（二）
34. 中国饭店的“三只大老虎”
35. 忽然象看见了《卡门》的场面 / / 女教师索亚
36. 瓦玛命丧黄泉
37. 绿旋风的来访
38. 《爱的呼唤》停印 / / 89 六四 / / 泪水象河
39. 只想往下陷 / / 德国《百家姓》 / / 大熊被锁在卫生间
40. 意外的签证 / / 政治庇护潮 / / 在干枣树家
41. 毕业 / / 疤老弟的异常举止 / / 黑猩猩朝我奔了过来
42. “快离开这里!” / / 《投奔怒海》的故事

43. 安其的直白 / / 夜晚来客 / / 圣诞聚餐
44. 全德最大的游乐厅公司 / / 东西德合并
45. “五月之树” / / 相遇海曼
46. 努太太下了咒语 / / 与 PIPi 同居 / / 辞职
47. 我逃下了山 / / 老曲的气恼
48. 婆婆去世 / / 第三次离婚 / / 看饭店
49. PIPi 成了 007 / / 无法把牢底坐穿
50. 与老倔见面 / / 逃离 PIPi
51. 在老倔家的新滋味儿
52. 又一种养老院 / / PIPi 差点儿去报警
53. 第四次结婚 / / 莲变成了德国祥林嫂
54. 大象谎话一箩筐 / / 看望 PIPi 的母亲
55. 我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 / / 对 PA 市一见钟情
56. 半年全白干了 / / 每一个字, 都是父母的血肉之躯
57. PIPi 的特殊本事 / / 二厨之死
58. 锅碗瓢盆交响曲 / / PIPi 的三次《半夜鸡叫》
59. 「爱老人」的三种爱 / / 428 政策
60. 去加拿大和美国 / / 帮罗文办绿卡 / / 与蝈蝈去威尼斯
61. 罗勉和女儿来了 / / 荷兰的洋真实
62. 她若死了, 你会疯吗?
63. 范军去世, 被称赞为: “真中国人”
64. 《一个大童话》的新书发布会

65. 打字练习《奇奇的一天》

66. 哥哥找到了我

作者注：

原著《童话中的一地书》于2010年3月，由台北市「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字数是17万多字，书内配有几十张照片。

为将它翻译为外文版，作者改书名为《给外星人的66封信》，并加写了一万九千字；又将原著中我家人的人名，尽量与《一个大童话》一致，作为它的续篇，特此注明。

2013.3.24定稿

1 在开往东德的火车上

外星人：

一九八六年二月初，我踏上了开往德国的直达列车。范军和罗文在车门下望着我——丈夫和大弟弟的眼神，象无底的海；那海中，是太深的期待和关切，是太重的爱和企盼。他们不知道我会如何，不知道我是否会回来，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的眼神让我的心紧缩，一直到今天都没展开；他们的眼神让我的心疼痛，哪怕已过了二十三年……

从北京到达东柏林要一周时间。我坐的是一人一个包厢的软卧——在国内由于发表了一些作品，得了不少稿费，经济上比以前富裕得多。出国前换了些美元，还给元元（范军的小名）留下一笔存款。我的脸紧贴着车窗，盯着他们直到再也望不见……却没想到，竟是和我心爱的丈夫的永诀。

火车开了，我担心会不会有便衣警察在车上，是否会把我抓回去？在中国，恶梦做的时间太长了，一旦要离开它，总是担心、担心，仿佛好事总会被恶魔们破坏。我插上包厢的门，静静地坐着，倾听着外面的动静，混合着车轮的隆隆声，甚至不相信会顺利地到达西德。

我给元元写信，告诉他火车上的见闻：告诉他坐软卧车厢的旅客竟是这样少；告诉他我认识了两个去西柏林大学陪读的年轻的妻子小王和大李，告诉他我都吃了什么，又如何冲了个小小的淋浴。然后我拿出《一个大童话》的手稿继续写作……我请大李帮忙，给我摄影，留下一个坐在软卧车厢里写作的侧面照片。每当这时，就想起母亲——都是她毕生对照片的爱好，使我们也爱以照像作为事事留念。

蒙古人民共和国到了。火车已进入境内，我那害怕有人追捕的担忧，才总算放下了不少悬疑。从车窗里一眼望去，首都乌兰巴托竟如此荒凉！车停下时，几个年老的蒙古妇女站在窗下，利用那仅有的几分钟，急急忙忙地出售她们自做的食物和手工品。直到进入苏联边境，我才觉得不会有中国警察追捕我了……我值得国安追捕吗？我不去琢磨。我只觉得，当人们离开那深受其害的土地时，人人都会有这难缠的恶梦般的幻觉。

在莫斯科倒车。还有很多时间，我们提着、拉着自己的箱子，出了地铁火车站。

莫斯科——就是这副景象吗？这就是我们从小在学校听了千百遍的莫斯科吗？这就是我们儿时和少年时，唱过无数遍的苏联歌曲的莫斯科吗？这就是我们从很多难忘感人的苏联文学作品中，多次读过的莫斯科吗？这就是孕育了无数天才和伟人的莫斯科吗？这就是中共称为“老大哥”后来又称它为“修正主义”的莫斯科吗？凌冽的寒风中，我们站在火车站前的空场上，我想从它的整个外貌去体会它给我的所有的感受。遗憾的是，我见到的只是冰冷庞大的石头楼房建筑和石头铺面的大广场，以及穿戴得厚实整洁的匆忙赶路、目光直视、毫无表情的苏联人。我体会不到一丝一毫的绿色与温暖。尽管是严冬，但街上总该有绿色的松树或常青灌木啊。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上初中时，我的两位苏联女友，与我交换着信件、照片与风景和花卉的明信片，那时，我们都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多么珍贵难忘的友谊啊！塔姬亚娜给我邮寄过一盒香甜可口的巧克力！留塔给我写过多少可爱的幻想连篇的信，配上她亲手画的小画！每当有苏联朋友的来信，同学们都带到学校里，让全班传看。整个女十二中与莫斯科的女十二中是友谊学校。

但随着两国的交恶，可贵的友谊一下子断送了.....我目送着一位毫不相识的苏联妇女，幻想着：如果塔姬亚娜也在我眼前匆匆走过，我是否能认出她，我们会说什么？如果她们读过我的《一个大童话》，她们能否相信我是为了逃离中国才站在这里？

红场很近，可我们怕时间来不及，不敢走远。几个新认识的同伴互相关照着行李。冷风刺骨。望着大街那些高大死板的石头建筑，感到无情的寒风和这国家的脉搏一样，似乎一百年也不会变动。但衣帽整齐的行人们，他们生气勃勃的步伐，以及宽大明亮、花纹十分漂亮的地铁大理石建筑，又象比中国饱含着许多生气；仿佛在不变中，蕴涵着变的萌动.....

万没想到在进站时，无比拥挤、毫无秩序，许多非洲人和苏联人挤成一锅粥。我为有这么多非洲人感到惊讶。大李说，他们几乎都是大学生，现在正放寒假。我们既要护着自己的行李，又怕失去同伴。混在这一锅粥中竭力挣扎，无法形容是怎么上的车。幸亏大件行李已经托运。而我们事先定的包厢和座位，竟全被人占了。小王提醒说，得给列车员小费。这种事在国内还从未体会过，但我相信或许会有效果；一定是她每年回国的丈夫告诉过她。我给了那老胖子苏联列车员十美元，急切地比划了半天，他才带我挤进一个四人的硬卧厢；上铺已经坐了两个年轻的非洲人，他们伸下来的长腿，直垂到我和对面苏联老太太的头上。

老太太是去巴黎看她的女儿，但她的俄语谁也听不懂，她高兴地展示着手里的相片，比比划划地“告诉”我们一切。她带了不少好吃的点心，送给每人一块。我们品尝着可口的夹馅点心，老太太指指自己的心口和点心，是说她自己烤制的。我边小口地吃着，边欣赏着这点心，奇怪它怎么会烤制

得这么漂亮、这么棒？然而，我学过的俄语早已快忘光，就算没忘，也全是歌颂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标语口号。彼此语言的陌生，使我们难于更多地交流，心里是那么遗憾。

污浊的空气，人体的汗臭气，太短太窄又脏的硬铺。隆隆隆的车轮节奏，慢慢腾腾、极不情愿地送别着漫长的黑夜.....

进入欧洲了！欧洲！文明、自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建在山上的欧亚分界之高塔，令人人精神一振！几个人都从昏睡中惊醒，不约而同地探身朝窗外望去。欧洲——人们久已向往的、民主自由富饶的圣土！一下子，人人好象年轻了二十岁，突然光彩焕发，博爱幻想的风吹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2 真地到达西德了？

外星人：

那在中国的最后的一夜，我下定决心不再回国了——哪怕给人擦厕所，哪怕当清洁工为生，我也要立住脚。我没想过发财或找有钱人再婚，连一闪的念头都没有。钱够生活就行了，那就是很好的日子。我会把穷日子过得比

不穷的日子还象样，无论是家里家外——这都是那已在天堂的姥姥，她的勤劳勤俭之风，她的会过日子，给予我的耳濡目染，给予我的物价之宝。我爱元元，我一旦立住脚，定把他尽快接出来。

初中我只学过三年俄文，还当过俄语课代表。但长时间所学非所用，颠沛流离的生活，几乎全忘光了。上「工艺美术学校」的四年，没有外语课。每当这时，我就时常想起哥哥罗克；他活着时，哪怕当着农民工和各种临时工，都坚持不懈地每天学习外语——俄语和英语，又和父亲学习日语，每天早起背诵外语单词之后才骑车去上班。

我的毅力和生活目标远不如他。英文德文我连字母都没学过，说话我就四十岁了。要说梦，就只有一个：象普普通通的人那样，和元元在德国生活。我不愿他太担心，这决心只用一句表达就再也没多说。因为他不置可否，只说：“奇奇，能回来就回来”；因为他没有半句话说希望我别回来、也能把他接去德国。他比我大十一岁，我总感到他有些观念比我陈旧；就象比我小十一岁的人，我与他们之间可能也如此。为了出国前的安宁，我不可能和他去商议，因为对德国，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我的决心如此之大，还因为我深知，一生的出国机会，也唯有这一次。德文版《冬天的童话》出版人小松鼠，是印尼华侨。他在BO市不仅开了一家中国饭店，一家杂货店，还新开了家出版社，以此书打头阵。我在国内因《春天的童话》的禁销和“反精神污染”运动受到报刊的批判，被迫在家停职反省，工资也停发，不知今后如何生活，正在骂海中游泳，洋人却一个个找上门来，要翻译《冬》和《春》，我乐得有如见到救生圈。而能邀请我出国的，不是法国人，不是日本人，不是英国人，不是芬兰人，却只有小松鼠

先生这一位。

我要出版《一个大童话》，这是我出国的最重要的动机。出国前，广西一家大出版社，已经对它很感兴趣。但我深知，他们会删去我最不想删去的文字。就算主编一再对我表示，宁肯愿为此丢掉乌纱帽，坚决不删减，他只想一生中出版一本他最喜欢的书，觉得死了才值。他那真切的心情，正和我只想用生命写一本书一样。然而出于《春》被禁销的经验——广州《花城》编辑部全体三个月的检查，主编和副主编的被撤职，作品与主编的职务一起消亡——国内这样的事实是明摆着的，难道我乐于见到主编失业或一落千丈？

假如没有这本书，人在哪儿不能象普通人一样生活呢！但假如没有这本书，也就没有了我的灵魂，庸庸碌碌地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可以说，我就是为《一个大童话》才出国的——我要把我的写作之屋挪到西半球去，只有在那里才能自由地写作与出版。

终于到达东德了！骨架都要坐散了！人人出了口长长的闷气，都慢慢地站了起来，伸伸那麻木的胳膊腿脚。天色漆黑，稀稀拉拉的出站者，显得站台格外空旷。我暗自奇怪：来德国的人怎么会这么少？小王和大李的丈夫早已等在站台上；两对夫妻都已三年未见，相聚之欢快自不必说。

如果没有他们，我简直无法想象怎样通过层层哨卡的地下通道。戒备如此森严——先过东德关卡，再过西德关卡；每一关卡都是双层哨卡，严格仔细地一道道检查。如果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那些冰冷的命令句都是什么意思。当旅客都聚集在地道里时，见到身后竟排了一长队，耐心地等候着检查护照，慢慢地往前挪动着。

在坚固又迂回的水泥地道中,又走了不短的路,绕来绕去,当终于钻出地道,站在空无一人的西德火车站站台上时,浑身的那种放松,是无法言喻的!那是摆脱了长久专制、摆脱了暴政的土地、呼吸到第一口自由空气的放松!那是四十岁才象刚刚诞生的放松!那是自由世界就在你脚下,你可以自由去创造新生活的放松!尽管心里没底,正象那神秘莫测的黑夜一样.....

电话亭不远,他们帮我打通了电话。小松鼠说,由于太远,今晚能否住在他们的大学宿舍,明天他和太太一定会到.....

进入大学生宿舍,我好奇地东张西望,第一次见到德国的大学生宿舍远比国内的好:一人一屋,宽敞明亮——单人床、书桌、椅子、书架、冰箱;室外的楼道里,有公共淋浴和厨房设备。我和元元就住在「北京钢铁学院」(注:现为「北京科技大学」)里的教职员宿舍,见过大学生宿舍是六人一屋,屋子很拥挤,上下铺双人床,缺少设备,楼里也无公共淋浴和厨房。洗澡一周只一次,要去很远的另一处;也无法自己做饭,一律吃大食堂的大锅饭。

我们简单地煮了面条,小王和大李又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父母亲做的好吃的,两位丈夫乐得合不拢嘴;我给他们拍了照.....

3 我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外星人：

我和小松鼠夫妇在北京已经认识。一是通过译书出书的事；二是当时国内邓小平的“猫论”刚时兴，人人向“钱”看。俩弟弟罗文罗勉最先“下海”，觉得在单位挣那点工资没前途，又不被领导重视，于是自动离职，千方百计筹资搞企业。

当时父母对私人企业没有好预感，生怕弟弟们重蹈自己的复辙，无奈俩弟弟不听，认为中共不会再象以前那样出尔反尔。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都想着怎么捞钱，就更使他俩想独立单干。罗文为筹资金的事东跑西颠，方知自立不易；几经曲折失败，最后遇到一位肯出资金的老板，付给他俩每月很不错的工资，又给了办公室及齐全的设备，让他俩搞产品设计。

我有个“万事能”老干妈，因已去世的丈夫算得上高干，她上与高干夫人天天打麻将，下与三教九流们混得透透熟；无论你要买什么，只要你有钱，上至高楼大厦，下至进口家用电器和化妆品，老干妈全有。小松鼠认准了她能通天的关系，也象海外越来越多的华侨那样，趁国内房地产还便宜，便想在国内买个房子，希望我介绍和老干妈认识，甚至打算在北京与人合资开饭店。

小松鼠的外表不象个老板，倒象个大学生。他太太叫黑天鹅——她是没有一样不黑，兴许这是典型的德国做派——身穿黑皮短夹克、黑皮短裙、黑长袜、黑尖皮鞋、背黑皮包、染黑指甲、抹黑唇膏、黑眼圈、瘦瘦高高，

比小松鼠高出一头；外加蓬蓬松松，张牙舞爪的一头黑短发；只有那小脸儿煞白。

小松鼠请我们在「北京饭店」吃饭。饭桌上，老干妈满应满许地说给他买座好房。但连一般给华侨住的单元房也得二百万，小松鼠意外地没吱声。至于合资开饭店，老干妈说，马上带我们去那家饭店看看。在「北京饭店」的门口，TAX 象条长龙。车门一开，黑天鹅正要进去，老干妈却老有经验地用胳膊一拦，说先问清价钱；司机白她一眼，无奈地说了个数；小松鼠急忙掏钱；老干妈又一拦说：“我给他人民币，把你的美元给我。”.....半小时后，我们随着干妈进了饭店厨房，小松鼠环视四周，说德国厨房小得很，却很够用；而这个厨房面积太大、又脏又乱、大而不当，挑了一堆毛病，最后不了了之.....

这是在西德的第一夜。我和小王大李挤睡在一小间学生宿舍内，打了地铺。要是没有我，这两对夫妇今夜该是多么幸福。次早小松鼠又来电话，说开车正在半路上，还得六七个小时才能到达。他委托他们把我送到西柏林市中心的「欧洲中心」购物大厦，那里有家「亚洲饭店」，老板是他的熟人，让我在那里等他们，说才万无一失。

出国时我带了些美元，那是以一比十五跟私人换的。元元很精明地把钱藏在了一个热水瓶套与瓶胆之间的空层里，这样才能多带些钱出国。

饭店老板还没到，一位跑堂正灌酱油等佐料小瓶，说道：还早呢，他建议我在大厦里转转。

这大厦实在美啊，北京还没有这么漂亮的购物中心，看得我心旷神怡，有如身在神仙世界。因是早晨，大厦里顾客还不多，而面积却老大。卫生间幽香敞亮，干净得令人叹息。我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既不知那水笼头怎么开，也不知洗手池上方的设备是烘干湿手用的。水猛不丁一出，吓了我一跳，又不知怎么关上，无人可问。面对着大镜子，我在毛衣外罩了件蜡染无袖外衣，它是在北京「工艺美术服务部」买的，若在国内，说什么我也不敢穿。而此时，我是想穿什么穿什么，不怕谁来议论，尽管处处都是那么新鲜和陌生。

太美了，这环境！我坐在咖啡座的靠背椅上，那里能俯视整个大厅。喷泉和真真假假的花草树丛，布置得美伦美焕。那高高的圆形黄色玻璃厅顶，在阳光下，闪烁着五彩的光芒！我仰头望着它，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我要了杯咖啡，用手比划着，请那位意大利跑堂为我照了张相。

我一边品着咖啡，环顾四周，一边回想着：为了能顺利出国，我是对小松鼠说了谎话的，说我的三个月签证到期后，一定会按时回国的。但我并不为这谎话担心，因为自己的双脚，已踏在了自由美好、有法制的土地上。我要在这里创造生活、新的生活！

4 第一次过狂欢节

外星人：

当我坐在他们的旧汽车里，才知路途之遥远。小松鼠夫妇象我一样不擅辞令，他尽量找些话说，而黑天鹅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发一语；二人轮换着开车。

夜里快十一点了，车停在高速公路的加油站。加油时，小松鼠笑着说，他们买不起新车，这“老爷车”是六百马克买的二手货。车身上贴了许多巧克力和糖果纸的儿童粘贴画，犹如一个花哩哐哨的老旧玩具车。灌完汽油，他们说要去吃点东西，便走进近边的公路饭店。座客稀稀拉拉。他们让我点菜，菜单上的德文字我一个不识。小松鼠好心地替我点了咖啡和面条，黑天鹅点了煎小牛肉，半生不熟还带着血。我看着有点惊讶，小松鼠说吃的就是这半生劲儿。他点的炸猪排，一大块猪肉浇了汁，盘边上有两片生菜叶。喝咖啡时，我撕开那小圆包装的牛奶，竟溅了一手，他二人相视而笑，似早知如此。小松鼠笑道：“你还算好的呢，凡是刚从中国来的，溅了一脸的都有！”随即二人又相视而笑。我想，为何不事先指点？或许他们只想找机会乐乐？还是觉得自己比国人优越，国人的傻相令他们开心？

平坦坦的，丝绸般的高速公路，是我所未曾见过的；明晰又周详的兰色白字公路牌，倾服得令人折倒。出入公路的出入口，设计得如此科学，深感德国的管理是多么完美和有秩序，一切都是为了方便百姓。整个高速公路的设计，有如绝妙精湛的国家艺术品。

深夜中，似乎只有这一辆汽车在奔驰—— 奔驰在无边的公路上，奔驰

在说不清的前景中，奔驰在黑黝黝的森林和田野的上空.....

我虽然很累,可又不想放过黑夜中的一切景象，眯一眯眼便又睁开，只想把最初的所有的印象永久地刻印在脑海里.....

到达 BO 市时,已近黎明。进了这几层高的居民楼，上电梯。

当开了门之后，只见约六十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单元房，带阳台；一只黑猫翘起尾巴，喵呜一声迎了上来，直蹭黑天鹅的腿。她心爱地抱起它，亲吻它，用德语轻声对它叨咕着，就象母亲见到了心爱的孩子。

“你就住她的屋子吧，”小松鼠说：“我们俩睡这屋。明天可以晚点起。饭店十一点半才开门，我们天天睡到十点半或十一点，有时候睡到中午一点呢。淋浴卫生间在这儿,你可以洗洗。”

这一夜，我说不清做了什么梦。六点钟我就习惯地醒了，再也睡不着。我尽量轻手轻脚地去了卫生间，又轻手轻脚地回来，开了台灯坐在桌边。我只想给元元写信，报告平安。我想跟他说的话有那么多。我告诉他，他们夫妇对我有多么热诚；我告诉他这儿的居住条件有多么好.....

外星人,一切就这样开始了，我饿了就去那饭店吃饭——步行，过道石桥，就是他的饭店。他夫妇整天呆在饭店里，不做体力活，因为这城市有足够的大学生来干；每人的工资是当天个人收入的百分之五，小费归自己。听一大学生说，别的饭店提成是百分之七。

黑天鹅与德国姑娘野鸽子是好友——一位失业、打扮得象大学生似的短发姑娘。她俩整天在一间开着门的小屋里聊天和吸烟，顺便看顾着店里的情况。野鸽子的耳廓穿着十来个环型银耳环，嘴角上也挂了一个。大厨

是从香港请来的。小松鼠说，他净工资二千六百马克，报足税，就三千八了，还管住；但他还嫌少，说别人都净挣三千五，他老想跳槽。厨房确实很小，却一应俱全，将将够大厨二厨转得开身。大厨的年轻妻子花狸也是香港人，在小松鼠的杂货店当售货员，净工资一千五百马克，报足税。花狸下了班来这里闲坐，两只大眼睛只管一眨不眨地盯住和我们闲聊的小松鼠——好象她大胆无畏的目光中饱含着天真无邪，大胆无畏中又满含着探索和专情。这倾心深邃的目光，黑天鹅连千分之一也没有。小松鼠问花狸渴不渴、饿不饿；她不语，却更加“天真无邪”、“莫测高深”地摇摇头。我问小松鼠饭店生意是否可以，他说还行，但得补贴不赚钱的杂货店和出版社。

两本德文的《冬天的童话》，就摆在饭店一进门的小桌上，薄薄一本书价竟是二十六马克。小松鼠说才卖了三本。又说十月份有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他定了摊位，说我可以去签字售书；说三个月的签证可以再延续半年，书展一过就可回北京；又说汉学家哈宾教授来了电话，下周来家拜访，要为我安排三十多个大学的讲座……

次日就是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我们在杂货店里进进出出地看街上的游行。有生以来，我头一次见识这么庞大、隆盛、五彩缤纷和数不清的队伍……每一支队伍的服装和音乐都各异，更甭说无数的彩车和模型。我高兴得象个儿童，甚至跑进乐队中，抱住那吹号的人的后背，叫小松鼠赶紧照相……

店里的几个人，瞅着我那忘乎所以的乐劲儿，一个个都笑得合不拢嘴，似乎头一回见到一个中国怪物，且又被这怪物感染；以至大家不是去看队

伍，却只是看着我笑。

“怎么，”我也奇怪道：“队伍不好看？你们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我来德国头一年也是挺新鲜的，”小松鼠说：“看得多了，就没感觉了。”

“怎么会呢？”我不相信：“赵大夫，你怎么显得这么不高兴啊？”

赵大夫是被小松鼠请来的国内针灸医生，也象我一样以旅游名义签证三个月。他连店门也不跨出一步，心事重重地坐在一个高凳上，望着街上的热闹，却满脸阴云；好象他把国内所有的霉晦气都带了出来，浓得化也化不开。

“你是蛮适合溶入德国社会的……”他心事重重地说。

“确实，”花狸也不由得笑望着我：“象她这样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怪了，我心想，国人怎就这样放不开呢？德国人都知道这一天什么愁事也不要想，都要在这一天大笑大喊大叫大跳，把一年的闷气撒出去，可中国人连这一天也没有。当你有了并身临其境时，却又说：“这节日不是我们的！”然而，这一天大家都是人，还分什么你们我们？偏要把霉晦气拿出来展示？还是国人已和开心无缘了？

我在队伍里进进出出、蹦蹦跳跳，他们担心我会被那些高大强壮的马匹踩伤。我把礼品架上的两个小布人儿摘下来，挂在耳朵上，叫花狸帮我照象……小松鼠、黑天鹅和野鸽子，不住地看着我笑……

当晚，小松鼠建议去「贝多芬音乐厅」过狂欢晚会，问谁去；黑天鹅、野鸽子都没兴趣。赵大夫早已回他的住处睡觉去了——原来小松鼠还买了一栋旧楼，约有十来间屋，他邀请的客人及他的员工都住在那里，厨房淋浴公用。我这才知，因视我为贵客，才让我破例住在他家里。最后花狸说想去，

我们三个一起便来到了「贝多芬音乐厅」。

白天的欢乐还没有过去，又一次更大的欢乐来临。那建筑考究，极大的两层楼大厅，音乐声四起，欢笑声不绝，人们打扮得怪形怪异，可着心地尽情欢乐这一年一回的狂放。一下子，人人回到了童年，人人变成了四五岁，人人都成了好朋友！我拉着一对可爱的母女俩就照了象。

拍照片的小松鼠乐得合不拢嘴，说他从来没有过这么快乐的狂欢节。花狸也象受了感染，眼睛东瞅西望，也不注视着小松鼠“专情”了。小松鼠不但买了三个兔帽，又去买彩油，我们仨戴上兔帽，互相用彩油抹脸，照出种种淘气的姿势，笑个没完……

已夜里一点，回家时坐在车里，花狸体贴地问他花了多少钱，小松鼠一笔笔算来，似颇有些心疼，却又笑笑说：“一生也就这一回”……

回到饭店时，黑天鹅和野鸽子却说什么也不想回家睡觉，非要去一家酒馆不可，去凑热闹。而我也不能、又好奇，我们就开车去了。没想到那里人多得挤不进去——烟酒热气云山雾罩，简直难于呼吸；可那扰人震耳的音乐和热烈的气氛，又象个巨大的磁石，把人人吸进去，身不由己地往里挤呀挤，就那么唱呵、跳呵、聊呵、抽呵、喝呵、笑呵；人人都不再是自己……我不会跳，也跟着瞎跳。

也不知几点，当人们实在乏了，陆续地往外走时，才发现小松鼠和黑天鹅不在眼前。我和花狸站在酒馆外等他俩，只隐约听见酒馆里有吵嚷声。我想进去看个究竟，花狸拽住我并小声说：“不用进去。是他和一个德国人在吵。”

“你是说，小松鼠？为什么？”

“那德国人是老板娘的情人。”

“情人?”

“他每次一见到老板娘,就说:‘你为什么要和那个亚洲人结婚?’,今天老板是想教训教训他。”

次日中午,吃完饭步行回“家”,必须走过莱因河上的桥。我站在桥中心腰高的围栏边,向远眺望.....眼泪,竟一串串地流了下来.....四周太美了,莱因河就在脚下,泌泌地流淌。音乐的故乡,我最爱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我竟站在你书中的画面里了!在美术学校时偷偷撕下的那张小画,我真地站在画中了!书中描写的空气,我真地在呼吸着了!雪白的海鸥在翩飞,游船货轮静静地穿行;四十岁能实现这个梦,是多么难得呵!我为德国的优美、安宁、整洁和有秩序而流泪;我为她的地广人稀、为她清澈的河流、为她无尽的森林和繁茂的花朵而流泪;为中国人体会不到这样的生活而流泪;为有多少人在梦想着出国而流泪.....

他们夫妇整天在饭店,归来时已夜里一点,每次我已关门睡了,早起的习惯又改不了。于是他们为我买了水果、甜点和方便面之类,说要是懒得去饭店或来不及,也可在家吃。又因有几家国内外的报刊约稿,写都写不过来。

我第一次见到电烧水杯,第一次见到电炉子。小松鼠说绝大多数德国家庭都用电炉子,他们教给我怎么用,又一再嘱咐用完马上拔插头,生怕我

会引起火灾。家里有座机电话,小松鼠说,在国内打不太贵,往国外打可就贵了;我不住地点头。当时中国有电话的尚不多。我仅记他说的别人给我们打就不付钱的德国规定。

中午我正要去吃饭,接到小王的电话,原来她一直在柏林找饭店工,很想挣钱。她让我问小松鼠能否给她安排做水巴的工作?做熟了以后,她还打算做跑堂。去吃饭时,我把她的原话告诉了小松鼠。

“柏林有那么多饭店,”他笑道:“还用上这儿来打工?好几个想做水巴和跑堂的呢!德语不行,跑堂也没法做呵。再说还得安排住处,这儿的大学

生都不用我安排住处。”

一席话,又让我上了一课。

下午,一著名台湾女作家叫九重天的,从瑞士打来电话。她说她是慕名打给我的。她说现在是在她瑞士的家中,因为她和瑞士人结了婚,说她先生是位教授;她一再嘱咐我在国外千万谨言慎行,说国外情况相当复杂,说写文章和投稿尤其要注意;说党派太多,多听听小松鼠的意见,他毕竟在德国待了二十多年;又说汉学家哈宾教授的话也不会错,他俩都不会害你.....

小松鼠的杂货店有一架书和报刊出售,昨天我翻了翻九重天的书,实在没劲,无聊得让人看不下去。

5 小松鼠是怎么结的婚

外星人：

次日上午十一点，小松鼠去饭店上班，黑天鹅似乎还在熟睡，我正在自己屋里写作。我的屋门半开着，忽见一年轻德国男子，开了锁着的单元门，直奔黑天鹅的屋里。他目不斜视，连一眼也不看我，似乎我和其他东西都是空气。如此之熟悉不见外，一定是黑天鹅的亲弟弟了？此后他天天这时来，一如既往；回回那间屋门一关，便无一丁点声响。直到中午一点我去饭店吃饭时，小松鼠问我黑天鹅是否起床了，我说还没有，说她弟弟又来了。小松鼠只是苦笑了笑，不做声。

当我回来时，又站在桥上留恋地远眺……一走进家中，又一一如既往——那两人已消失般地离去。

这天是周六。按理，饭店人很多，生意极忙，小松鼠却八点钟就回了家。他的眼神有一丝怪怪的，心神不定似的。

“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都安排好了。”他有点不大自然：“她今晚不回来，和她男朋友去度周末。”

“男朋友？”

“那不是她弟弟呀，是追了她三年的男朋友。”

我意外地看着他。他去厨房冲了两杯茶，并从提袋里拿出两个包好的盒

饭；说我爱吃大虾，他特意让大师傅炒的。我们对面地坐在桌边，慢慢地吃着喝着。他象憋了一肚子的气，嗓子不时地吭吭，一脸的欲语还休的不安神情。

“知道我们怎么结的婚吗？”他两眼贼亮地看着我，话就从这儿开始了——原来，他的父亲及爷爷，都是大陆华人，在湖北省一农村有很多田地，全家生活富足。因受不了中共的斗杀地主，爷爷奶奶去世后，父亲带领全家人去了印尼。为了居留，他父亲与他母亲离婚，与一印尼女子结婚，和两个大儿子拼命打工挣钱，终于开了一个养鸡厂，又买了房子，有了余钱。他十九岁就来德国「MO市大学」读哲学系和经济系，苦读了十五年，终于获得了双博士学位。一毕业，他赶紧找工作，寄出了四百二十八封信，封封如石沉大海。

“光打字之后的拷贝钱，”他说：“再加邮票钱，我就花老啦！”

“四百二十八封？”我实在惊讶：“封封石沉大海？”

“这就是德国。”他感叹道：“时间长了你就了解了；民主，民主，德国排外是不露声色的。有多少博士得去开饭店，所学非所用！”

“那你为什么不回印尼呢？”

“那里排华排得厉害，几年排一回，搞得华侨倾家荡产，还出人命。”

“留在德国就得靠结婚？”

“要么结婚，要么政治庇护。除去这两种，在西方你没有办法留下来。”

“靠打工呢？”

“德国不是美国，规定很严。旅行和探亲，都不许做工。大学生做工，也是有季节性的，老板也不敢要黑工，否则会罚大款。”他喝了口茶，认真地看

着我：“没有劳动局的做工许可，是不可以打工的。”

“这么严？那，工作许可又是怎么来的呢？”

“没有居留，就没有住处，就没有工作许可。”

“一环套一环？”

“不错。从非共产国家来的人，甚至连政治庇护的资格都没有。”

“哦！”我有如上上了一堂大课，要把每个字、每句话都牢记在心里，并慢慢地咀嚼。待我缓了缓神儿，又好奇地问道：“那，你是怎么结的婚呢？”

似乎他早就期待着我问这句话，淡然地微微一笑：“她和我一个大学。她学的是中文系。她父亲是 MO 市有名的律师。她全家都反对她学中文，但拧不过她。一九七九年她去了一趟中国，一回来，感到自己一下子就完了——无精打采、灰心丧气，她觉得自己全白学了。”

“为什么？”

“她原先想得太好了，对中国的幻想太高了。”他苦笑道：“回来就象泻了气的皮球。她家人当初就反对她学中文，就更加怪她。她从此消沉，再也打不起精神了，连学过的中文都忘光了。”

我心想：怪不得，怪不得她连一句汉语的“你好”都不曾说呢。

“那……你们是自由恋爱结的婚？”

“一半是吧。”他把我的茶杯斟满了开水：“在大学，我们还算谈得来。我写过一本诗集送给她。”

我不语地看着他。心想：大概就连德国人，也没人写诗集送给她，这一定深深打动了黑天鹅吧。

“她说愿意帮我留下来，但结婚前她要求写结婚合约。”他顿了顿，有些

踌躇地、难于启齿地说：“她要在婚后保持她的自由……”

我无言地点点头。有几秒钟我们都没说话。

“嗯……你说天天来的那个人，追她三年了？”

“是。他失业好多年了。”

“那么年轻就失业？”

“德国人里懒汉才多哪，失业的绝大多数是德国人哪。”

“德国有那么多失业的？”

“有二百多万吧。”

“二百多万?!”

“好多年轻人就是不想工作。”

“他们怎么活呢？”

“德国是福利制国家，有失业金、救济金、生育费、住房补贴，多啦。”

“她爱一个失业的？”

“说不清……”他现出一丝蔑视的苦笑。

“那……你们感情好吗？”

“一直是一人一屋嘛。说实话，自你来了，我们的感情好多了。”

我暗自惊讶——怎么，因我来了倒好多了？这“好”，就是床上关系？难道我没来时，她“弟弟”就天天直奔那屋，哪怕小松鼠还在另一间屋的床上睡着？

他站起来，把桌子收拾干净；我也帮他去厨房收拾好，然后就进了自己的屋，继续写那尚未写完的约稿。我听见他进了卫生间，冲淋浴冲了很长时间。然后又开着卫生间的门，用烘发机烘啊烘头发；之后，他索性站在两屋

门前的过道里，用喷式香水，沙沙沙地从头到脚地喷啊喷……我不由悄悄地关紧了门，提前二小时极轻地把屋门锁上了……直到第二天，我又是六点半起了床，一直锁着屋门写东西；而他十点半才起，只听见他去了卫生间又出来。

“假正经！”他朝我的屋门生气地骂道，就扬长而去。

6 十万马克的亏空？！

外星人：

这天中午，我没去饭店吃饭，而是在家煮的方便面。饭店开门是十一点半。早点一直是在家吃——面包干，面汤，水果，饿了就吃。

中午三点，杨贵妃突然来串门。她是在小松鼠饭店打了多年工的本市大学生，长得很漂亮；此时正是饭店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

“你怎么来了？”

“老板让我问你怎么没去吃饭？”

“写稿子呀，”我掩饰道：“反正这里有吃的，饿不着啊。”

“哈，有吃的？”她高兴地进了小厨房，抓出一网袋甜桔子，就吃起来。

这桔子还是前天黑天鹅买的。

“你上大学多久了？”我问。

“八年了。”

“八年？”我问道：“怎么你们一上大学就那么长时间？”

“八年十年算什么，上二十五年、三十年的都有呢。”

“啊？！”简直象是神话。

“反正德国大学又不交学费。”她满不在乎地道：“每学期注个册，打工挣钱，上去呗。都是且玩儿且上。”她坐在桌边，大口地不停地吃着，剥了一个接着马上又剥下一个；桔子本来不太大，又没核，她两三口就一个。

“我.....我想问问你.....”她满口嚼着，突然吞吞吐吐地说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什么？”

“你说我该不该回国？还是留在德国？”

“你喜欢德国吗？”

“当然喜欢，所以我才矛盾啊。说话就八年了.....有个德国人，他想跟我结婚.....你说，我该怎么办？”她剥的桔子皮，都堆在了桌子上。

“你爱他吗？”

“我也说不清.....反正他挺爱我。大学里也有中国人追我。可我.....”

我想说：为了居留？而中国人没有居留？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可我.....矛盾极了。我已经习惯了德国的生活，可又怕在德国找不到好工作.....”

她矛盾重重的话来回说。那一网袋二十几个桔子只剩下三个。她这回

可算逮着了机会好好补充维生素 C 。

她似无意地告诉我：饭店是当初三个大学生合伙掏钱办的，店主是黑天鹅；因为学生居留不准开店。又说黑天鹅没钱入股又过于清高，不屑管钱，管钱的是小松鼠；而饭店的账号上一直是亏空十万马克。

“十万马克亏空?! ”

“凡在那儿打工的都知道。”她说：“他让她好离不成婚，谁都佩服他高招儿呢。”

我说不出来。

“那.....这种老亏钱的店，德国允许吗?”

她又剥了最后的三个桔子：“老板用‘还能周转’可以搪塞嘛。”

“你说黑天鹅头上顶着十万马克的亏空，她就不生气、不害怕?”

“她怕什么?想想看，她一分没交，有吃有喝有住有零花钱，有人养着她。象她那样的‘庞克’，谁要她工作? 她还能充当老板娘!”

“‘庞克’? 什么叫‘庞克’?”

“是呵，中国还没有，德国可有；一般都是有钱人家子弟。他们只喜欢黑色，全是一色黑。要么打扮得怪哩怪气，比如头发都竖起来，染成五颜六色；他们对社会有看法，又不溶于社会；一般都挺消沉。”

“假如.....万一有一天，她为这十万马克吃了大亏呢?”

“你说怕她真背黑锅?”

“怎么不可能?”

“她爸爸是有名的德国律师，还怕这帮子中国人?她家一直就反对她和小松鼠结婚。”

“噢!”

她嚼着，又说：“上午可热闹了，两个合伙人从荷兰来，要入股的钱，小松鼠说没钱，说你们可以在这儿打工。人家都是饭店老板，谁能上他这儿打工？两个人不走，想从我们手里要现金；小松鼠急了，说你们再闹，我马上给警察打电话！争了半天，他们才走了；他们来了不是一回了……”

临走她又去厨房搜索了一遍，拿走了半袋面包干和几小包方便面。

7 和兰博士见面

外星人：

小松鼠让一位会开车的大学生，去柏林把我的三只箱子从火车站取了出来。我带的衣服鞋子很少，满满的全是要送朋友们的礼品，以及我的书稿和个人资料。当我把送给他们的礼品一件件摆在这对夫妇面前时，二人直笑，说这屋里要开杂货店呵？说比他们店里的工艺美术品还丰富，正好拿去卖……他们最喜欢的，是两方“鸡血石”刻有他们中德名字的印章——那是我北京的朋友、一位有名的篆刻家为他们刻的。

“假正经”的一夜过去之后，我装做毫无感觉，该怎样还怎样；小松鼠可能在生气的同时，又不得不畏然起敬。世上的事就是这么怪：当一个人熟知了你的身体后，他(她)反而不敬你了。而我又一直奇怪：世上的人为什么把爱和熟知身体总是等同起来—— 当你对于一个人并不真地了解时，却热衷于动物式的需求？把那原有的对一个人的好奇心，却由于自己那动物式的冲动，将那好奇心和幻想全部破坏？

似乎，人们不需要幻想，只需要需求，他们认为值。

傍晚，一位也在他饭店做过工、和德国人结了婚的菊花打来电话聊天，无意中在花狸是小松鼠的情人，无人不晓。

仿佛我掉进了一个情人窝！

朝小松鼠要钱的合伙人之一兰博士，在北京与我有过两面之交。我和元元住在大学教职员宿舍，仗他二十五年的“大学工程师”的工龄，出国前一年，刚分到了一套五十五平米，二居室的单元房。旁边住的邻居，是一位留过德的教授，当年他和兰博士同过学，所以兰博士一来北京，就住在他家。

在大学里上班的教职员，一般都悠哉闲哉。元元最大的乐趣，就是利用一切闲暇，去找别人聊天，往往一聊聊到夜里一点才归乃是常事，北京人俗话叫“侃大山”。他就这样认识了兰博士，并邀他来我家吃过点心。

钱没要成，兰博士住在一位朋友家还没走。他知道我住在小松鼠家，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告诉小松鼠，约我出去吃饭。好在主人早出晚归，一顿

饭的工夫他们也不会知道。

这是我第一次走到陌生的街上，和一个并不太熟的人约见。我简直不知道怎样去找他说的那个地址。当我独自四下观望，不知是往东还是往南，既不会用语言打听，又不识街道上的牌子时，想想我出国前下的决心，是多么异想天开，是多么不现实！而我已经四十岁，就要在这陌生的国土上，偏要立住脚吗？街上人来车往，好象自己陷进了沼泽地中，就要没顶，心都慌了起来。幸好他告诉了我那家饭店的名称，我想饭店的名称总不会都一样，而在B O市老城，饭店一家接一家。我问正在里出外进、向店外一片座位上忙着端菜饭的跑堂，虽都是中国人，却人人爱搭不理；问了一大圈儿，足足折腾了四十多分钟，才知那家饭店就在我眼皮底下。

兰博士的一大杯啤酒喝得精光，早已等得不耐烦。我不好意思实说，只抱歉说出来晚了。于是每人点了个菜，他又要了大杯啤酒，我要了一小壶茉莉花茶。

在北京时他是红光满面、春风得意、令人人羡慕；而此时却一脸的阴沉，象换了个人。他看也不看我，侧身靠墙坐着，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说这菜炒得太难吃，说这米饭也太次太硬，说这样的饭店在荷兰绝对做不下去.....

“你还打算回去吗？”问时，他认真地看着我。

“不想。”

“小松鼠知道吗？”

“不知道。”

“你想离婚？”

“不想。我还想把他接出来呢。”

他又满脸地乌云了，沉默地不做声。

“出了国的都不想回去，”他象自言自语似地说：“因为出回国不容易。可是在国外，远比在国内生存艰难……你也只有政治庇护……你先生事先知道吗？”

“不知道。”

“你不能告诉小松鼠，他很亲共的。”他又认真地看着我：“他经常去大使馆，和他们关系很近的。”

“真的？”

“我很了解他。”

8 画作才标五十美元

外星人：

汉学家哈宾教授与他太太和十岁的儿子同来了，是在中午饭店休息时，小松鼠和黑天鹅都在家恭候。

在北京我正挨批判时，这对夫妇就去过我家。他太太虽也是兰眼睛高鼻

子，中文和汉语却比他还好，反倒给这位洋教授当翻译。哈宾教授很有名，不仅出书出文章，且是社科院、研究所、讨论会……年年北京的座上宾，德中两头他都是红人。

“你家好漂亮啊！”哈宾夫妇望着四周，礼节性地夸赞道。

“全是人家不要的捡来的，”小松鼠自嘲地笑笑：“原来的旧家具都是深色，我们不过涂了浅绿油漆罢了。”

“蛮漂亮嘛！”哈宾太太又好奇地各屋看看；小儿子也坐不住，一下子跑到阳台上去了。

多瑙河上的海鸥，又以为有人要在阳台上向它们扔面包霄，闪电似的飞来掠去，翅膀几乎擦着了阳台的围栏……

“妈妈！妈妈！”小儿子高兴地嚷着叫着，哈宾太太也乐得去了阳台。

哈宾教授用嗑嗑吧吧的汉语，两手比划着，说给我安排了三十七家大学讲座；又说每次讲座都有报酬；还说他下周去美国半个月，回来我们就开始；说反正我的签证期还早呢。小松鼠说：“她过了十月才走呢。”

教授的时间都是金子，寒暄了一刻钟，他们便告辞。

出国前，有两位好友拜托我办事：一位是国画家，一位是篆刻家。二人的杰作，在国内是万人难求。他们交给我一些原作和国内出版的个人画册，希望我通过小松鼠或更有能力的人，不仅把他们的原作卖了大钱，更希望有要人和相关单位，邀请他们出国办画展和篆刻作品展。

小松鼠夫妇全部看完后，不吭一声。

“德国人不认,”小松鼠说。

“不认?”我简直不信:“艺术是无国界的,怎么会不认?”

黑天鹅用德语和他低声说着什么。小松鼠翻译道:“她说,画得不错,也相信篆刻家的会是好东西,但我们只能摆在杂货店的橱窗里一二张,看看有没有人买;要是老没人买,我们还得撤掉。”

“在北京,卖得可贵呢!”其实我真想说:什么?就这么降了级跑杂货店的橱窗里去了?在北京「荣宝斋」,都得把他们的作品摆在很显眼的地方呢!

小松鼠沉思道:“先标五十美元吧,能卖了就不错呢。”

才五十美元?就算兑换率一比十五,也比北京卖的便宜好几倍了呀!可我毕竟不了解德国,又生怕一个子儿也卖不出去白白带来,只好同意。

我的文章在一家大报上发表了,占去小半版;一张照片竟是狂欢节那天,在杂货店里耳朵上挂了两个小布人儿的。小松鼠和黑天鹅看着我那傻相直乐。标题是:《一切为了爱》。我都说不明白自己要说的和写了什么。这家报纸,是小松鼠推荐我投寄的;很久以后我才知,它是亲共的。

“为什么没有稿费?”二周过去,我问小松鼠。

“一般都没有。”他说:“海外报刊都是私人办的,好多报纸都赔钱哪!”

“那.....出书呢?出书总该有钱吧?”我心想,自己那《冬》和《春》,中外版本六种,共十二版本,怎么就该分文没有呢?

“出书?”小松鼠说道:“多少人得交钱出书呢!象你那<冬>,我光印刷费就七百马克,才卖了五本,连本钱都收不回来。”

“为什么你不做广告呢?”

“怎么没做?在<侨报>上一直在做,我交了一年的广告费呢!”他见我说不出来,象是笑土老冒儿似地道:“这可不是在中国呀!”

又给我上了一课。我才回味过来,他为什么要做这赔钱的买卖——上了十五年大学的他,或许还没失去文人的理想,他不甘把自己定位在饭店和杂货店店主的位置上,而黑天鹅也一样.....

9 使馆官员的话 / / 菊花的家

外星人:

他们带我去参加大学生的“春节联欢晚会”。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晚会。晚会的参加者,除了两三个德国人以外,一色全是大陆中国人。人并不多,大礼堂显得空荡荡。有家的,都带来了自做的吃食,摆在一个拼起来的大桌上,供人们自取。小松鼠让花狸帮忙托着,带来的是炸春卷和炒面,满满的两个方形大托盘,还付带了一次性使用的纸盘纸巾,及朔料的小勺小叉。但他俩的表情并不高兴——似乎年年必须搭钱搭物,还得耗费时间,象是有苦说不出;比起进「贝多芬音乐厅」,

完全是另一种神态和心境，连走路的步伐都象是无奈和提不起精神。

我们进来时，驻德使馆的中共官员刚刚讲完了话，正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走下讲台。迪斯科音乐声咚咚地响起，男女大学生们开始找伴跳舞。然而却有一半人不跳，走着围着坐着吃着观看。

小松鼠带我走近一人——他四十多岁，秃顶、和蔼可亲、带付眼镜。小松鼠为我们互相做了介绍，这位使馆官员握住我的手关切地说道：“你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委屈。”

我一愣，这话太让我吃惊和感动！怎么他什么都知道？似乎这话我早就想听到，可是在国内从没人说，偏偏是在德国的土地上！难道高官们私下里都这般地有人情味儿？难道，我不出国，到死都听不到这么温暖人心的话语？可是，人们更希望的，是那土地上不再出现新的冤案啊。尽管我非常感动，却只淡淡地一笑，算是回答。

直到他走开，我还沉浸在感动里，胡乱地猜测着：或许，他是大使馆中的异己份子？

官员又和小松鼠及别人寒暄了几句，便与大家招招手，离开了会场。

音乐刚停，就有个男大学生，大声地建议，要不要杨贵妃上台唱只歌，几个男生鼓掌叫好。杨贵妃却笑着故意推辞，又扭不过“粉丝”们的热情，于是只好上台献唱。尽管嗓子走调，大家也只好耐心地听，唱的仍是人人不想再听的中共老歌.....

花狸走近小松鼠，半撒娇地嘟哝着她要回家，说这里太没劲。两人暗递秋波，眼神里似乎有着什么默契。小松鼠转脸对我说，他现在得开车送她回家，半小时后就会回来，让我不要走，一定要等他返回。

我无所事事地东瞧西逛，在大厅里闲步。人越来越少了，稀稀拉拉地都回了家。忽听到一声招呼，原来是新认识的菊花，她正被一位年轻的德国人追着，偏要对她问东问西；那热乎劲儿，竟使她摆脱不开。她一见了我，就象见到救星一般，立马离开了他，高兴地走过来，手里还握着半杯可乐。

“真是的，”她轻声地埋怨道：“明明知道我结了婚，还老想上我家去。”

“你长得这么漂亮，谁见谁爱。”

“别逗了。哎，真的，哪天你去我家，咱们包饺子？”

“你先生爱吃饺子吗？”

“我做的饭他都爱吃。他现在在美国因公出差，半个月才能回来，咱们乐得清静。”

“好哇，你给我打电话。”

那尾随她不放的德国人又来缠她，两手比划着说东道西，我只好去和别人搭讪。

晚会已近尾声，开始收摊儿，几个大学生已在打扫垃圾、摆放桌椅。

空旷的大厅里，人只剩下两三个了，而小松鼠却还没回来……

这是我眼中的第二个“中德之家”。菊花住在一条幽静的小街角。一听吃饺子，杨贵妃说什么也要来。由她带领着，免去了我寻找地址的恐慌。这是一栋私人房子的第一层，房主是个德国老太太，整天在楼上不露面。菊花满脸含笑地开了门。

租的单元房是两间屋，不大，却布置得简朴舒适。菊花说房暖租是五百

马克。我惊讶这么贵，她却说实在一般，甚至算便宜。又说她已和好了面，弄好了馅儿，只为了大家能先聊聊天儿。

她沏了茶，又拿出糖果。我才知，她和她丈夫是在美国上大学时认识的。在大学，她学经济，他学物理。现她正学德语。由于有英文基础，已能应付生活之用。她不甘只当家庭妇女，有份教英文的私人家教，每天四点半就得起床，倒三次车……教完课，然后再去学德文。

“你丈夫有工作吗？”

“现在挂在一个研究所里见习，只挣见习生的工资。”

“有转正希望吗？”

“得一个教授退了休，他才有位置。”

“为什么？”

“德国对公务员是不能解雇的，教授也属于公务员。”

“退休一个才能补上一个？”

“就是。”

她拿出二三本大相册，尤其希望我们看看结婚照。她一面慢慢地翻着相册，一面沉浸般地解说道：“看，这是我结婚那天，眼睛都哭红了……这是他，这是他父母。那天我只想穿浅粉色的衣服，我最爱浅粉色……看，我的样子有多难看。第二天就举行婚礼了，头天我整整哭了一夜……”

“结婚是高兴的事，你为什么哭呢？”我实在不懂。

“我能理解，”杨贵妃眼睛也不看我，却接过了话茬。

“为什么？”我看着她。

“还是让她说吧，”仍盯着像册的杨贵妃说。

我又看着菊花。

“唉——!”她轻叹道:“是哭我的命——结果是和一个德国人结婚.....”

我有些意外,却又无话可说。暗想:象她这样漂亮聪明温存的人,定不乏追求者;而她结婚前却悲痛欲绝,定是割舍那没有居留的中国人.....然而,照片上的德国丈夫,那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看也看不够的神情,可是多么爱她呀!假如他知道.....?那么,她一定会对他说,她是因为太幸福才哭吧?

一边瞎聊一边包饺子,三人吃得热热闹闹。洗碗时,杨贵妃不愿伸手,她留在客厅听音乐唱片。我和菊花在小厨房里干活,她对我说,她先生一回来,她就得去住医院。

“什么?你病了?”

“子宫瘤。”她悄声道:“有八个小瘤子,刚查出来的。”

“真的?疼吗?”

“不疼。还好,是良性的。医生说,要么开刀,要么烤电。我得等我先生回来.....恐怕会影响生孩子.....”

“你先生知道了?”

“知道了。他说会赶回来,可怎么也得十天以后。”

我不知怎样安慰她。一边擦碗碟,一边乱想:是否因洋人的性欲太高所至?而中国女人就不能拒绝吗?就非得那么温顺不可吗?如果她的丈夫是国人,也会如此吗?

临走前,杨贵妃要带走剩饺子:“我们大学生难得吃一回饺子呀!”

菊花仍满脸含笑,未见一丝不快地、把三十多个所有的剩饺子全给她包好。

晚上，我给元元写信，仍是告诉他这里是多么好，新认识的朋友多么让我愉快——但真的那么好吗？我不是在说谎吗？

十点半，我准时上床睡觉。那对夫妇一点多才会回来。望着窗外点点的繁星，心里万分感触——如果说《冬天的童话》是为了户口不得不去结婚的话；如果说北京城的姑娘当时象我那样的是凤毛麟角的话；那么现在呢？多少年过去了，为了户口结婚的，整个搬到海外来了。她(他)们不敢去政治庇护，她(他)们从心里不恨中共。 她(他)们只是想脚踩两只船，而我和她(他)们完全不是一码事。我要先解决自己的居留，然后把元元接出来。没有居留，就谈不到自己的人格独立。我深深吃过没有户口的大亏，而他们却刚刚在尝试。

他(她)们在上演着一出出《冬天的童话》的悲剧。而《童话》的主人公，反倒在海外怜悯地观望着她(他)们。

10 花狸的日记 / / 在黑天鹅的父母家

外星人：

第二天黑天鹅不在家时，小松鼠说，有两个东西我可以看—— 一大本

是花狸的日记，一篇是他写的文章。

“她的日记？”我不相信地直盯着他：“日记可是私人的东西呀！”

“她放在我这儿的。黑天鹅反正看不懂。花狸说我们俩都可以看。”

“真的？”

“那还有假？”

“她干嘛要放在你这儿呢？”

“她怕她先生看见。她想写就拿去，写完了就给我。”说罢他把那两个东西放在他屋里的写字台上，就去饭店了。

既然如此，出于好奇，我就看看吧。我先翻日记；花狸不是天天写，而是想写才记——

“猪”，她写道：“猪！他又赌光了。夜里四点才回来。猪！狗男人！……”

再往下：“……在香港，我姐夫迷上了我，怎么我老摆脱不开男人呵……”

又一篇：“……其实他很可怜，我理解他的苦处……我们靠墙站在街角，他紧紧搂住我，我浑身都酥了……他滑润的舌尖触抚着我的舌尖，有如一股电流使我瘫软……”

原来，小松鼠是想让我受受性教育的！或者，他是想炫耀花狸是多么爱他？我摇摇头。一个男人非要显示自己还是个动物，爱才能高尚完满？一个女人也必须如此，否则就不叫女人？人类在比赛着什么呢？！浅薄得要命！也不想再往下看，便放下日记，去看他用手写的那十来页的文章。

他写的是：他如何看不起他邀请的那些人——那些住在他那栋旧楼里的大陆中国人。他看不起的，是所有的人节俭得过于吝啬——天天吃方便面，把每一分钱，都用来买彩色电视机带回国，用来买几大件；仅仅因为国内

难于买到而又免海关税。他还讨厌所有他邀请过的人——因为无一例外的都对他拍马献媚，他讨厌他们的口是心非；甚至他邀请过的几位名作家。

然而，凡他邀请的都是有头有脸、或许他用得着的人呵。

“他们只关心实际的物质利益，”他写道：“他们的虚假令我厌恶，他们心里还有什么？可怜又可叹……”

我叹了口气，不会有兴趣再看第二遍。但他为什么却让我看？只因我不对他拍马献媚？他希望我了解他、尊敬他、认识他的清高？我把文章放回他的写字台上。

次日一早，小松鼠夫妇就起床了。

“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我问道。

黑天鹅笑笑，头一次生疏地朝我说道：“深日，深日。”

“今天是她爸爸生日，”小松鼠含笑道：“六十大寿。请我们去呢。路可远了，得住几天。你和我们一起去，他们都想见你呢。”

“我总该送给她爸爸一点礼物吧。”

“你什么也不用送。”他说：“你看我们，什么也没买呵。每年去我们都不买。”

“总不太好吧。我送我的。”我返回屋里就去開箱子，拿了两件工艺美术品，还有一个漂亮的胸针，是想送给她的妈妈。或许他俩有些自相惭愧，二人嘀咕了好一阵儿，决定把窗台上一盆半死不活、不会开花、叶尖都锈了的植物带去。

黑天鹅的密友野鸽子也一起去。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从北一直向南开去，将穿过大半个德国。这是我第二次坐汽车远行——第一次是在夜间，这次是在白天。虽不能穿村过市，看的都是远景，但那蔚蓝的天空，一片片墨绿的森林，广袤的田野，起伏的丘陵，迷人的远山，清澈的河流，整洁的房舍，精致的房前露天花园，使我目不转睛、欣赏不已。无论哪里，都见不到一块翻开的干枯的土地，每一块土，都被绿色覆盖——尽管还是冬末。处处没有墙，整个国家是个没有墙的大花园。无论是工厂、仓库、学校、房舍，都没有墙；都只是高矮不等的绿色植物或花草围成齐腰高的“墙”。就算有篱笆，也是空隙很大、一目了然地能见到房前的一切。好象谁也没有秘密，好象谁都不怕谁看见；恰恰相反，人人在向过路人自豪地展示：看哪，看我的花园多美！哪怕正在盖房修路，零乱的面积也小得不能再小；使你奇怪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办什么事怎都那么整洁有序、一丝不苟？办什么事怎都以美为起点、以开放为骄傲？我心中实在感叹：就光这些，中国人若能做到象德国人这样，至少得二百年！德国的人文素质、生活习惯、对美的追求，是长期的人文教育和潜移默化的结果啊！

中途，休息了好几次，小松鼠说他那个老爷车，不多休息不行，否则摩托就会坏。身为两个店的老板，竟买不起一辆质量好的新汽车？终于来到那世界有名的大城 MO 市，又不知拐了多少道弯儿，总算停在一座三层楼、十分别致的私人房舍前——小花园里的冬花冬草在阳光下各展风姿，似乎迎接着即将到来的初春。

黑天鹅的母亲、弟弟、妹妹和哥哥，热情地站在门外迎接我们。他们

互相拥抱、亲吻，说着我听不懂的问候德语。他们的骨肉之情，让我感到那么自然和真挚。仿佛，不管黑天鹅是否是“庞克”抑或是“庞克”打扮，但在他们眼中却永远可爱。可是对于小松鼠，那亲情就明显地少多了，完全象在勉强应付他；反不如象对待野鸽子和我这个生人亲切。德语我一句不懂，小松鼠便成了我的翻译。

“她父亲还在上班，”他说：“傍晚才到家。”

进了屋，见到家里的面貌——过厅；老大的客厅里陈设着老式德国家具，客厅中央是一个长桌，四周是舒服的两套沙发和椅子。桌子和墙上摆着和挂着一些装饰品。

我们拿出送给他们的礼物，她母亲又一次地拥抱我们，说着高兴和感谢的话，尤其对我的礼物格外高兴；也不等她父亲回来，就将那两件细竹廉山水画挂在了墙上。黑天鹅的小妹妹一把抢去了胸针，为了它红水石的花朵，去特意换了件绿色的上衣，并带上自己的红水石耳环，配上这胸针，绿衬红，对比色鲜明又漂亮。再加上她人长得美，姿色倍增。她无比高兴地左转身右转身地给大家看，象服装模特那样让我们欣赏她的打扮。

黑天鹅的母亲带我们上楼，去看每人的房间。我们尾随着她，登上既窄又陡的木楼梯。她给人人都预备了舒适的小床，预备了干干净净的大小毛巾，并指给我哪里是可以洗澡的卫生间。

稍做休息，吃了些点心和咖啡，黑天鹅姊妹提议去散步。我们一行人，散散漫漫地向离家不远的森林走去……

“这是有名的黑森林，”小松鼠说：“可你看，松树全病了。”

大家都仰头望着一棵棵松树，低声地说着什么，那神情似乎十分惋惜。

“为什么叶子这么少,叶子一半都枯黄了?”我问小松鼠。

“空气污染、酸雨、气候异常。”他说:“全德国的森林都有病,没办法。”

“真的?太可惜了!”

傍晚五点,黑天鹅的父亲西装革履地回来了,自然又是一番拥抱、亲吻和问候。他精气神儿十足,红光满面;只是那半白的头发标志着他六十岁的年龄。

晚饭订在德国饭店。一大间安静整洁的雅室,长桌上早已摆好了鲜花、刀叉、餐巾、冰镇红酒,一应俱全。一道道的前餐、正餐,然后是饭后甜点。吃得太丰富,可胃又太小。而那沙拉和煎猪排,我虽也吃着,却总觉得吃不惯。在座的都是自家人,只有一位是在他家工作过三十年的保姆,五个孩子都是她带大的;她已七十五岁,虽早已退休,却成了这家庭里不可分割的一员,人人对她的爱和尊敬令人感动。家庭的每位成员,都一一举起酒杯,为父亲祝福。在一片低声絮语的聊天中,在舒缓的轻音乐那温暖迷人的气氛里,全家共度着天伦之乐……

晚间睡前,去宽大的卫生间,冲完热水淋浴,才发现地面造得有多讲究——且不说地砖舒服的颜色、造型和不会打滑的质感;那整个地面,光脚踩上去竟是温暖的!

次日,丰盛的德式早餐之后,她父亲要去上班。临走前,特意与我握手拥抱,并说了些我一句也不懂的话。大家看着我的傻样直笑。小松鼠笑道:“他说希望你再来。”

黑天鹅的姐姐和母亲，在厨房里忙东忙西，我想插手帮忙，却说什么也不让我做。我只好回到客厅，只见她的弟弟、哥哥、妹妹，正与小松鼠辩论——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半社会主义？看他们辩论的神情，简直是三个人在向小松鼠围攻；似乎一年才见这小子一次，总不能便宜了他。黑天鹅与野鸽子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望着天花板吐烟圈，仿佛默许他们的围攻。尤其是黑天鹅的表情，好象特别希望家人教训教训他。我坐在长桌边望着他们，忽然他们的视线转向了我。

小松鼠有些尴尬地翻译道：“他们想问问你的看法。”

“你们怎么说的？”

“我认为是农业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是半社会主义，你认为呢？”

“既不是农业社会主义，也不是半社会主义，”我说：“而是封建专制主义。”

小松鼠无奈地只好翻译；除了他，全体的眼神竟是意外和欣慰！

11 怎么会有流不完的眼泪

外星人：

临别时，黑天鹅的妈妈送给我一枚胸针。小松鼠翻译道：“她说这种花纹能带给你幸运。”

胸针是旧的，象个又鼓又大的钮扣，花纹是螺旋形。我用学来的第一句德语说道：“当克,当克!” (Danke 德语：谢谢) 我心想，按中国人习惯，送礼物都送新的，难道德国人专爱送自己用过的？

汽车行驶在公路上。小松鼠的安排是：出趟远门不容易，这儿离著名的「古堡大学」不远。他已联系好，那大学请我去讲讲《冬天的童话》，又能卖些书，当晚可以住在一个熟人陈姐家。然后去看看他们的母校「MO 大学」，在黑天鹅的弟弟家住一夜。

陈姐是台湾人，她约三、四十岁，刚开了一家「亚洲杂货店」。我们到时，她正在店里忙得走不开，地上到处堆积着还没打开的纸货箱。一见面，小松鼠便不见外地说：“我们饿了，想煮点面条吃。”陈姐急忙抱来几包方便面和半棵大白菜，并指给我们小小厨房和一简陋的极小的卫生间。处处脏乱、杂物遍地。我们在黑天鹅家吃得虽多，却吃不舒服；二人可象逮着了好吃的，一人一大碗面条白菜丝。黑天鹅说不饿，她看着我们那饿样直好笑，不屑一理地一支接一支吸她的烟。

陈姐说她家的住处只有两间屋，她的德国男友要保持自己睡一屋；说小松鼠夫妇可以住在客厅，我和她就睡在店里的杂物间。

当晚，她送走他们，又带来了被褥，我们就草草搭了两个能睡觉的“床”，好歹躺下了。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我告诉她元元的爸爸还在台北，父亲和母亲已有四十年没见面了，就连通信也不能。他母亲住在山东济南市，

三十元的教师工资，万分艰难地把他和她妹妹拉扯大。陈姐说现在蒋经国刚刚允许“三通”，解除了报禁，两地刚开始通邮.....她很直爽，说她丈夫也是台北人，二人一起来德国，他上大学，她陪读。毕业后他找不到工作回了台北。她却想留下来，认识了一位德国人，现与他是同居关系。

“你离婚了吗?”

“没有。”

“想离吗?”

“难哪.....还没想。”

“有孩子吗?”

“没有。谢天谢地。”

“同居就可以留下来?”

“他出面证明我是他的未婚妻，而我正在与丈夫分居。”

“台湾人可以政治庇护吗?”

“很难哪，因为是非共产党国家呵。”

“台湾人也都想留在西欧或是美国吗?”

“很多吔! 因为没有安全感哪!”.....

次日上午,与陈姐道别,我们去了“古堡”大学。这是世界有名、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学。当我走进那苍松蔽日、宁静温馨、古朴高雅、书香气浓郁的校园时，心里充满了羡慕和遗憾！由于“出身”，由于我家的种种“政治问题”，我和哥哥、弟弟们谁也没进过大学；何况是海外的、自由国土上的大学呢！

文学组将讲座设在一间教室内，参加者有三十多位德、中大学生。一位女大学生做翻译。先有人对我做了介绍，然后由我朗诵中文的《冬天的童话》里的一大段。小松鼠事先替我找的段落我不喜欢，我找了自己喜欢的那段《放排去》，用纯正的普通话，有声有色地朗诵了起来……然后是大家提问。让我最难忘的一个问题，竟是黑天鹅兄妹向小松鼠围攻的问题：“你认为中国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

“先由你们在座的说说，”我提议。

小松鼠又一次争先发言，坚持他的“农业社会主义”，他那望着我的神情，似乎暗示我别说话过头。

明显看出大陆和台湾的大学生意见分歧：有的说是“社会主义”，那边说是“一党专制”。最后我说：“我认为，是封建专制主义。”

会后，在售书时，一位台湾大学生对我说：“从来没有人敢象你这么讲。我们听过好几次大陆作家来这儿讲，可他们谁也不敢象你这么讲。你的话让我们很痛快。”

我心想：人家回去还得生存，谁敢？我是因为不想回去呀！

三位德国大学生带我们去校外的咖啡店里喝咖啡、吃蛋糕，并给了我一纸二百七十马克的支票——没想到才讲了一个半小时竟给了这么多！我只要了杯红茶，并要了牛奶和柠檬。我放了糖、牛奶，又放进那一厚片柠檬。

“怎么，”我奇怪道：“怎么牛奶都变成了混末末？”

“牛奶和柠檬是不能放在一起的，”中文说得很不错的那位德国青年看着我，轻轻地告诉道。

黑天鹅的弟弟与一个男友住在一起——六十平米、很空的单元房。小松鼠说是八百马克房租，在 MO 市已算极便宜了。没有家具，处处不干净；只有两个旧破桌，两把破椅子，三个破床垫，堆着一些不整洁的被子。四壁空空，只贴着一张大大的招贴画——一只大睁着的兰眼睛占去全部画面。她弟弟交代完就走了，同他男友去他父母家住。黑天鹅打开冰箱看了看——又脏又空。他们将一个床垫给我安排在另一间屋，说他们三个今晚只有挤着睡……

在他们的母校大学，二人百逛不厌。在一道道的走廊里、楼梯上、教室前、宿舍中，他们向我一一介绍着，无比深情地回味着……十九年哪，这里有他俩太多的故事！我从他俩那每一道留恋的眼神里，从他俩面对每一个教室的门，说出的竟是有生命的话语中，深切感动地体会出大学生对母校的真切深情。我为自己从未去看过母校无比的伤心——哥哥也是，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我是中专)；我们由于出身，被打入地狱——无颜去见母校。而这一切，我又无法向他俩和野鸽子叙说。

离了大学，黑天鹅要去买音乐唱片，我们来到一家唱片专卖店。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庞大、如此丰富、如此方便顾客的专卖店。唱片分门别类，有几十个耳机，你可以买前听听这片子是否令你满意……

“你也挑两张，”小松鼠对我说。

我挑了两张梦幻味道的轻音乐。

黑天鹅和野鸽子挑的是最时兴的又吵又闹的时髦歌手新片。

然后去电影院，看正开始上映的美国故事片《远离非洲》。虽然我一句不懂，却完全能看明白。我感动得泪流不止——我被男女主角深挚的爱感动，被他们能如此自由地去创造生活而感动，为我们从没有过这样的爱和生活而悲伤。电影散场，我的眼泪仍流个没完；我想止住，却止不住它。走在大街上，无论怎样克制，眼泪还是流；这眼泪包涵着我的半生，包涵着我在小松鼠家所见到的一切……

三人起初以为我是因为电影，笑我太感情用事。我勉强笑笑算是回答。可那眼泪偏是止不住，我只好不管，随它流吧，爱谁奇怪谁奇怪，自己流自己的泪，痛快痛快也好。如果我心里积存得太多，倒真希望把它全流干净。

黑天鹅和野鸽子在前面紧挨着走，悄声说着什么，野鸽子不住地点头……一定是在说我吧，说我们中国人有多少受罪的历史？她们以为我是因此流泪？小松鼠默默不语地跟在我后面，离我有二三米远。他的表情迷惑而沉闷，他不敢和我并肩走——象黑天鹅和野鸽子那样；为什么你不能走过来，和我并肩地走呢？为什么你不问我是因为什么呢？……我的泪水又多流了几串。哪怕我什么也不回答，却会因你的关心，不是心里会舒服很多吗？

直到到达了一家饭店门前，我的泪水才勉强止住。原来约好是去饭店吃饭。她弟弟带来了女友——黑衣服、黑唇膏、黑眼圈、黑指甲、漆黑的假长发、从头到脚戴着许多银饰——打造得很美的额饰、鼻饰、唇饰、耳饰、手饰、胸饰、脚饰，里里拉拉挂了那么多，犹如黑色世界降临的黑银仙女！

她和我拥抱，我真心地说：“你真漂亮！”

当小松鼠翻译我的赞叹时，黑仙女开心地笑了。

.....回去的路上,我坐在汽车里,不知为什么,眼泪继续流淌,仍是止不住。野鸽子从身后两三次地递过来纸手绢.....开着车的小松鼠神情黯然,似乎种种不快在困扰着他——因无论是在黑天鹅家、还是大学讲座上、或售书的数量上都不尽人意?或是才出来三天,花销却不小,实在是“劳民伤财”的远行?或是我的眼泪以及别的什么让他不安?

12 这也是世界知名的汉学家? / / 小松鼠气得脸都变紫了

外星人:

当晚到了家,黑天鹅说她先去饭店看看,就立刻走了。

我正要进自己的屋,忽然小松鼠对我说:“这是五百马克,给你的,就算是书的稿费吧。”他又自嘲地一笑:“你也知道,印书的本钱都收不回来的。”

我颇意外,只好接过了钱,说了句“谢谢你”,就再也没说别的。他也要去饭店看顾一下,就走了。

我有些发愣:难道,他是这样理解我的眼泪的?

周五，汉学家哈宾教授从美国回来了。下午他一个人来时，只有我在家。他那汉语虽不标准，却也能听懂；他兴冲冲地简短地述说了他在美国的成功和重要，然后就拿出他的打字表格，展示他为我安排的三十七个大学的文学讲座，说下周一就可开始。当他问到我回中国的具体时间时，我说道：“我不想回去了。”

“什么？”他象没听懂。

“我不想回中国了。”

“你——不想会(回)？”他生硬地、楞楞地盯住我。

“是，不想回。”

“你——想怎么样？政治鼻(庇)护吗？”他气得脸色变了样，噌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一手按住桌边，隔着桌子，俯视地盯住我；这桌子，似乎是欧亚大陆横在我和他之间。

“是。政治庇护，”我清清楚楚地说。

他死死地盯着我的眼中冲满了怒火，我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他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蹦出那走调的汉语：

“告、诉、你，你入国(如果)政治鼻(庇)护，”他擂起拳头“咚咚”地捶着桌子，脸变得红涨涨，大声吼道：“我、我，三十七个打(大)穴(学)，我都对你关——闭!!”

我也愣愣地瞅着他——这也是讲自由民主的德国人？这也是世界知名的汉学家??

周六上午，菊花接我去她家住两天，因她先生不能提前回来，她一个人觉得太孤单。她说，每到周末和节日，除了饭店和娱乐场所照旧忙之外，家家休闲；大多都开车出去找乐儿，连在家呆着的都少。

“德国有多少节假日呢？”我问。

“多啦。公假大概有二十二天吧。”

“二十二天？”我惊讶。想想中国的公假，才屈指可数的几天！

“还不算工作人员每年的一个月度假——老板必须给，这一个月有工资。如果你不度假，老板付双月工资。”

“这就五十天假啦！”

“还有圣诞节呢，如果工作一年以上，老板付圣诞月份的双工资。”

“这么好？”

“这还年年罢工呢。”

“二十二天假，都是以什么名义呢？”

“百分之九十九的假，都是和耶稣、玛丽亚有关。”

“耶稣、玛丽亚？”

“西欧、美国，都是教会国家呵。你信教吗？”

“不信。你呢？”

“说真的，我也不信。从中国来的有几个信的？可我先生信，他全家都是天主教徒。”

“那你也得信了？”

“星期天都去教堂，我也不能不去呵。”

“那明天呢?”

“你要是好奇,我带你去教堂看看。”

我摇摇头:“上星期天我去了一次,老唱歌,没劲。我信的上帝,这里没有,我和他们信的全不一样。”

“你信什么?”

我真心诚意地告诉她:

“我信外星人。我相信外星人创造了我们。”

“就是那些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里的外星人?”

“人类总是丑化外星人。人类自己爱打仗,也老认为外星人爱打仗。我心的外星人,没有相貌,没有人形,就是新鲜空气。如果地球上一个极为高尚、极无私心、象我哥哥那样的人死了,所谓‘升天’,其实他就是变成了新鲜空气,变成了风;比如象曹雪芹,象安徒生那样的人。这种人很少,可他们灵魂不死,他们和别的外星人溶和在一起。他们能创造一切、能看见一切、也能倾听一切。他们就是我心的神。我用不着去教堂唱歌,因为我的上帝,比他们的强多了;因为我死了,也会变成风。”

“简直象听小说,”她笑道。

“你知道外星人的语言是什么吗?”

她笑着摇摇头。

“是音乐。不是那种又吵又叫、让人难受死的歌和音乐——那根本不配唱歌和音乐;而是非常美的音乐旋律。如果你能哼出让自己、也让别人感动、很美很动人的音乐旋律,外星人就会爱你,他会知道你心的语言,他甚至还会保佑你。”我还想说:文学、诗歌、绘画、舞蹈里也蕴涵着这种旋律

啊！

“越说越神了！”她笑道。

她以为我在编童话，其实我非常认真。可是象我一样想的人，我还没遇到过，也不想去说服谁非得象我一样。

于是我们喝着茉莉花茶，含着糖果，聊着各自的父母、兄弟姐妹和自己，无所不谈；原来，她的家庭也受过种种政治运动的折磨……

次日上午，小松鼠来电话，说想约我谈谈。

“谈什么？”

“我不想在饭店，也不想在我家，我们要找个地方。”

“在哪儿？”

“你说。”

“我说？”我莫名其妙地看着菊花。她轻轻地说：“麦克多那。”

“麦克多那。”

“哪一个麦克多那？”

我又懵了。菊花两手比划着，极轻地又说：“我家前面十字路口的那一家。”

我和小松鼠对面坐着，他要了两小杯可乐。

“明天我就回去了，为什么非要来这儿谈呢？”

“这里清静。”他嗽嗽嗓子，似乎在克制着心里的不平静：“我想问你，你想不想回中国？”

“不想。”

“那你打算怎么办？”他竭力克制着情绪，哈宾教授一定告诉他了。

“政治庇护。”

“你考没考虑后果呢？”

“什么后果？”

“你德语连字母都不会，你四十岁了；在西欧和德国，什么都看学业文凭，你能做什么？你想做清洁工？”

“做清洁工无所谓。”

“你图个什么？放着好好的作家你不当？”

“我算什么作家，我真正想写的，都会被删去。我想做个能自由写作的人，哪怕是个清洁工；而不想当绞刑架下的作家。”

我的坚决，让他气得脸色煞白。

“你想得太容易！”他嚷道：“德国是个什么社会你并不知道！一个作家，他离开了自己的土壤，他还能写出什么？！”

“到处是生活，到处可以写。”

“可德国不是你的故乡，是你不了解的！”他高声地嚷，惊动了周围的顾客，人们不由得扭头瞅我们；可我俩却全不在乎。

“会由不了解到了解。”

“可那代价是相当大的！”

“写的就是那代价。”

“你应当写中国，继续写中国！”

“就因为想写中国，我才出来的。”

“一个作家离不开他的故乡，他的土壤！”

“那四十年的生活够我写的。我首先是人，而不是作家。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你全是幻想！国内和国外对作家完全不同！你在国内有份好工作、有地位、还有稿费，可你在国外什么也没有，完全是自生自灭！”

“当清洁工都无所谓，怎么会饿死呢？”我希望能更详尽地解释：“我只是一本书主义者，写一本不被出版人删改的书；但这在国内是做不到的。没有这本书，就没有我的灵魂。它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你到底想写什么？”他吼道。

“写我在中国的四十年。”

“你在国内也可以写，我可以帮你在国外出版！”

“太难。再说，我也想下半生能体会西欧的生活。”

“可我不同意！你是通过我才来的！你回去，我会再邀请你！”

“我不相信。”

“<冬天的童话>已经给你开出了路，你只应当这样走下去！中国读者有多少！中国的文学市场有多大！在国外，谁买你的书？！”

“书的好坏，全在质量，不在卖出多少。好书自会有人买，好书自会流传。再说，我对以前发表过、出版过的，全不满意，那不是我真真正想写的东西。”

“<冬天的童话>你也不喜欢？”他气得脸都变紫了。

“不喜欢。那篇东西是一个大错误。”

“全是异想天开！你想的，全不现实！你是不撞南墙不死心！我会告诉大使馆，让他们做你的工作！”

“什么？你去大使馆告密？”

“我不但要去大使馆，你的德文版<冬天的童话>，也不再出售，也不再印刷！”

他气得脸通红，我气得流下了眼泪。

13 再见了，小松鼠，黑天鹅！

外星人：

我从快餐店走向菊花的家，还好没有迷路。我惊慌地告诉她一切。

“求你帮帮我。今晚上我就得离开他家。”

“你真想政治庇护？”

“是。何况他要给我告到大使馆呢！”

“我支持你。你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谢谢你。”

趁小松鼠夫妇夜里一点才归，还有六个小时够用。我们约好，由她叫辆

TAX,八点整她在楼下等我。

用去一小时她送我到小松鼠楼前,她又返回家。五个小时足够用了。我仰头朝第三层的窗子望望,漆黑;真好,没人在家,他不会料到我当机立断的决定。我走出电梯,镇定地开了房门,黑猫“喵呜”一声,竖起尾巴,疑惑地盯住我——谢天谢地,你不是人。

我麻利地收拾好所有的东西,还富余四个小时。不行,我得赶紧走——万一这时他或黑天鹅回家,岂不麻烦?

我急忙给菊花打电话,告之全收拾好了,赶紧叫车。她说这就叫,半小时内准到。半小时,还有半小时,我总得给小松鼠夫妇留个言,以免他们乱找我。

我匆忙找出笔和一张纸条,写道:“我走了。谢谢你把我从中国救了出来。”

我用一个茶杯,把它压在我屋里的桌子上。将三只箱子立在屋门口,只等着按门铃声。一分一秒,过得是多么慢啊!时间是多么不慌不急啊!我紧张地又一次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拉下;没有。我背上背包,关了灯,开了我屋子那唯一的临街的窗子,探身朝街上望去……呵,终于,一辆 TAX 由那头开了过来,速度减缓,真的停在楼下,我的心都跳了!保佑,是她吧!

“铃——”我慌忙去按开门电钮,同时问道:“谁?是你吗?”

“是我,”菊花答道:“我上去帮你提箱子。”

“不用,你在下面等着,有电梯。”

我匆匆地关上窗子,开了灯,将单元房门大开,将箱子一只只提到电梯前。这楼里一向很少见到人,而电梯就在房门近边。单元门还大开着,我深深呼吸一口气站在门边;黑猫仍老实地趴在沙发上。我把房门钥匙压在我写的字条上,又环视了屋里一眼——只要我一关灯,再把房门关住,就再

也进不来了，一切都成为历史了——再见了，小松鼠，黑天鹅!.....

“我都安排好了，”在开着的 TAX 里，菊花说道：“过几天我就得住院去，你又是一句德语不会，我总得给你安排一个能帮你、又可靠的人。刚才我给阿青打过电话了，她和我是在德语班认识的，人很好，是台湾人，她是来陪读的。她丈夫阿西也是台湾人，在本市上了八年大学了，正攻读法律博士。两口子都是正派的好人。我托他们帮你，两口子一口答应。你今晚上就住他们家，明后天他们带你去交申请书。何况.....”她欲言又止，有些吞吐地道：“他们又和中国没有任何牵连，不象我们.....”

“明白了。”我说：“你对我的帮助已经很大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放心，我不会说出你帮过我的事，以免你回中国会有麻烦。”

“你能这么理解我，让我很高兴。”

14 这一晚我睡得踏实极了

外星人：

阿西夫妇帮我把三只箱子提进电梯，阿青温和地含笑地说道：“我们住的是属于低收入的房子。”

我们仨挤在电梯里。他俩的温和亲切令我倍生好感。二人的相貌有如姐弟俩或兄妹俩——五官都那么正派、光明、诚恳，言谈举止十分平易近人；好象我们不是初次相识，倒是老朋友一般。

BO 市这个区离市中心很远。附近有许多居民高楼，私人房舍几乎看不到。当菊花送我到楼前，向阿西夫妇交代完毕后，就坐 TAX 回家了。阿西住家在第五层，是三居室带小阳台足有八十平米的单元房。

“家具都是旧的，人家送的，”阿西谦逊地含笑说。

阿青也笑道：“凑合着住吧，早晚我们还得回台湾。”

虽是这么说，家里却一应俱全。我心想，大学生能这么生活，也实在够舒服了。

“两口人住这么大的房子？”

“三口。”阿青笑道：“小儿子南南刚睡了，他自己有间小屋。你就睡在这客厅的长沙发上吧。”

“好。”我又担心地问道：“他们会来这儿闹，抓我回去吗？”

“谁？”

“小松鼠他们？”

“你放心，”阿西笑道：“德国是法制国家。谁敢去别人家闹，甚至在街上闹，他准先进监狱。”

这一晚我睡得踏实极了。第一次感到是在一个真正的朋友家里——能保护我的朋友的家；我象是他们羽翼之下的一只小鸟。

四岁的南南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阿青把他带了来认识德国。他们的家乡台南市，还有个九岁的女儿，和奶奶爷爷住在一起。

早点一如往常——白面包片、黄油、人造黄油、牛奶、茶、咖啡、可可粉、果酱、香肠、乳烙、蜂蜜，摆了一桌子。

“这是家家吃的早点，”阿青温和地道：“我们也不拿你当外人，什么也没特殊预备。你尝尝这个，你吃得惯德国香肠和乳烙吗？”

“吃不太惯。他们放的佐料和中国人的不一样。你们吃得惯吗？”

“我们还行。这些东西台湾都有。德国人专爱吃的黑面包，酸酸的，又硬，我们就吃不惯。”她给南南冲了一杯牛奶可可，说他只爱喝这个。

“在北京你们吃什么？”阿西好奇地问。

“一般的就是头天的剩馒头切成片儿，在火上烤烤，喝些茶；我们多少年就吃这个，然后去上学。有三年全国吃不上饭，全国挨饿的时候，连这都没有呢，一天三顿全是白菜帮子咸粥。后来我上中专，住校四年，不挨饿了，也只是稀粥、咸菜、玉米面窝头，或馒头。听说南方人爱吃米饭，剩饭泡茶就咸菜，是很一般的早点。到我出国前，城市居民没有粮票制了，基本上人人都有份工作，吃的比以前好多了；也能买到新鲜面包、奶粉或鲜牛奶、黄油了；但不是家家能买。条件好的天天去买豆浆油条，芝麻烧饼炒肝儿，坐在店里吃。可是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尤其有很多穷地方的农民，他们早点吃什么，就不清楚了，反正不会比城里人好。”我心想，如果告诉他们我们当过十年农民的生活，天天早上吃什么，那话可就太长了。

“大陆城乡差别还是很大呀,”阿西说道:“可台湾就没这差别,无论是农村或城市,吃的可丰盛了。”

“台湾的小吃店,”阿青说:“又丰富又便宜,比自己做还划算。哪天你去台湾看看就知道了。”

“哪——”阿西问道:“大陆人说我们吃什么呢?”

“我们对台湾一无所知。中共的报刊、电台,都是一样——从我们小时候起就知道,台湾人没的吃,天天捡西瓜皮吃。”

“捡西瓜皮……”二人笑得前仰后合。

15 铁当当的证据足有几百页

外星人:

早晨,阿西开着旧汽车去了大学,阿青步行送南南去幼儿园。我开始写《政治庇护申请书》。

他们有一份拷贝的《如何写政治庇护申请书》——是台湾人根据《国际难民法十六条》写的参考资料,用来帮助大陆人的。昨晚他们再三问过我:是否考虑周全了——在外国生活是不容易的。听了我的陈述,见我决心铁

定，才拿出这份参考资料。全文主要是说：应写个人所受的政治迫害，而非集体的；且应有证据。

我的个人证据可太多了——我那牛皮纸袋里，四开大的报刊剪报，都是中共批判我、污蔑我的铁当当的证据，足有几百页。当时阿西说：“有这么豆付大一块报纸，就不得了了，何况你有这么多！”

参考文提示应简明扼要、清楚精炼。我一条条写下去，竟写了好几页。心想：要是我的不会被批准，全世界就没有第二个人了！

阿青买了一包冻鱼片回来，说今天吃鱼肉饺子。我把写完的申请书让她看。她认真看完，感叹道：“理由实在够充分的。怎么，凡是大陆人一跟咱们聊起来，人人都有一箩筐的苦难史？！”

“没有苦难史，就都想往外跑了？”

我从箱子里拿出几件国内的工艺美术品送给她。她高兴地接受了，说道：“象你这样懂人情的大陆人很少。”

我暗想：这就叫“懂人情”？头回听说。也许是吧，或许是从小母亲和姥姥给我们的感染吧，北京人称为“懂事”。不过是为了双方高兴罢了——送人礼物，送人东西，人家愿意接受，也是一种愉快呵。

我们象姐妹俩，边聊天边包饺子。我还从没包过鱼肉馅的饺子，真是又学了一招儿。

“和你聊天儿很痛快，”她说：“你不象别的大陆人——他们老是吞吞吐吐，老想保留着什么，老让你觉得别扭。”

我心想，有几个象我这样没心没肺、毫无牵挂的呢。

鱼肉饺子真好吃。午饭后，阿西决定明天上午带我递交申请书。

“我想去考贝两份儿,”我对他们说:“一份儿自己留底,一份儿打算投给台北的<中央日报>。”

“你想公开发表?”他俩惊讶地看着我。

“是。公开申请书的全文。”

他俩意外又有些惊喜地对视了一眼。

“为什么你要公开呢?”阿西道:“别人申请,都生怕人知道的。”

“我要公开和中共决裂,而不是偷偷摸摸。申请书是呐喊,应该让全世界听见。要是连这么一个中国人也没有,大陆人也太窝囊了!”

“佩服你!我赞成,”阿西真心地说道。

“会不会给你先生带来麻烦?”阿青问道。

“不会。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要是胆小,也不会和我结婚。”

16 申请书在《中央日报》全文发表

外星人：

阿西带着我，帮我办好了递交申请书的手续。从「外国人管理局」又去「社会局」，公务员把我安排在市中心的德国人开的旅馆，然后给我开了条子，让我自己去找那个地址；每天三十五马克的住房费由「社会局」付，并给了当月的食品费支票，要我必须开个银行账户；又开了一个地址条，说可以去那里免费学习德文；说若看病，也有医疗保险。那公务员一边看我的入境资料一边说：“你的经济担保人(小松鼠)已经撤去了经济担保。如果你不来申请，警察也会很快去你的住处，命令你立即回国的。”

这话令我和阿西都吃了一惊。

这是一九八六年三月，过几天我就四十岁生日了。我第一次在德国有了一个自己的住处。万没想到，这家私人旅馆，就在小松鼠杂货店的斜对面——热闹的市中心。

我一个人住一屋。旅馆里除了我，没有第二个“难民”，连旅客也不多。回想从递交申请书到进入自己的房间，总共没超过三个小时，哪个国家办事能如此地神速啊！哪个国家对待外国人能如此地平等啊！没有任何敌意和歧视，没有任何令你不舒服的话语，没有任何令你觉得多余的提问和麻烦，你就有了自己的居住权，有了生活的一切保障，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

店主是一对和善的中年德国夫妇，他们告诉我(阿西站在一旁翻译)，不可以炒菜做饭，但可以用自己的大烧水杯煮方便面。他们愿为旅客做饭，但要付钱，也有食谱菜单。又告诉我哪里是公用淋浴间、如何保持卫生等等。又说晚十点半不归，就不开大门了。不要大声喧哗等等。阿西一一翻译了，

又希望他们放心,说我是作家,很安静,会让他们满意的。

阿西和我就回去取我的行李和箱子。阿青送给我一个新买的不锈钢的烧水杯;它既能烧水、又能煮面条。他俩又帮我在银行立了户头,将支票取出现金,建议我买一个本市地图;又教给我在地图上寻找街道的方法.....我再也不能是他们羽翼下的小鸟,我要自己学着飞了。

外星人,每迈出一步我都是那么胆怯。首先我得熟悉周围的店铺——哪里卖面包、食品、青菜;一次比一次地往远些的地方走。我迫不及待地需要字典。花了一百马克,在小松鼠的店里买了《德汉》和《汉德》两本大字典。正好小松鼠夫妇不在,花狸好奇地问我怎么样;我说好得不能再好,再也没有比一个人不依赖别人生存更好。并给了她我的住址,告诉她可以去串门。

然而走在街上,我总是提防地四顾——是否出现可疑的人跟踪我?要知道,小松鼠报告了大使馆哪!

德国很少晴天,不是多云、就是下雨。那天我去买面包,发现一个四十多岁,胖胖的打着雨伞的“洋”人,总是远远地跟踪着我,着实让我吃惊——若他是被中共收买的德国特务呢?当我见到阿西夫妇时,惊惊慌慌地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我的叙说后,并不以为然,说那位不会是特务,说特务不会那么容易地让你看到,说你还不够盯梢的级别呢。

阿西又冷静地低头沉思,摇摇头说虽然不大可能,但也不能不小心。他给我写了几个小纸条,是德中两面文字;说在紧急情况之下会有用的。如:“救命!”,“请帮帮我!”,“我的住址是.....我找不到家了!”,“我朋友

的电话是……请帮我打一下电话，谢谢！”他让我随身带上这几个纸条。当我接过它们时，突然感到自己变成了两周岁！猛丁想起我对小松鼠说的“写的就是这代价”——而这才是第一步、是婴儿学步呵！但那心境绝对不是无所谓，却是深深地无奈和隐隐的悲哀。语言，是多么重要啊！

阿西夫妇怕我孤单，天天与我联系，几乎每天去他们家，一呆就是大半天，让我享受一顿方便面和干面包以外的好吃的家常饭。通过聊天，我们对彼此的经历和生活，有了更多的认识，觉得比以前更为融洽了。

那天又去他们家，刚一坐下，阿青便拿出她学过的德语书，就来教我。她让我先识字母，阿西在旁边当“助教”，让我学“我”、“你”、“他”……至于社会局给的免费学习地址，阿西认为倒不忙着去；一是社会局说，在这旅馆只住一个月，就会分配到别的地方去；二是我应当先熟悉环境：认路、找家、熟识店铺。

我的《政治庇护申请书》全文，在台北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占满了第一版！那全身照片，竟是我在狂欢节那天，在小松鼠的杂货店里，耳朵上挂了两个小布人儿的！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照片，只为一张照片就得去买一卷胶卷，还得全部照完才能冲洗，不但浪费钱，时间上也来不及。我和阿青阿西看着直笑——与这严肃的文风，是否太不相配了？可也生米成熟饭了。

“这是你的风格，”阿西阿青都高兴地称赞。

我高兴地把报纸展示给旅馆主人看，自己也是百看不厌，一边看，一边

心里乐滋滋的——谁有我这胆量呢？谁有我这心胸呢？除我之外，不是没有第二个人吗？

文章又被香港、台湾、美国一些报刊与电台转载和广播……

我将文章拷贝，迫不及待地给元元寄去，又写长信、又付新照片，大信封鼓鼓的，邮资是六马克；他全部收到。迟迟的来信又是金口玉言般只一句话：“C.C. 你是在大闹天宫呵！”他信里付上的剪报，又是哪个庄、哪个人，做“傻子瓜子”发了大财；哪个村、哪条小胡同，又出了百万元爆发户名人……

他连给我起的小名“奇奇”都要省略为“C.C.”，回回信上只两三句话，而附上的发财剪报却那么多。我去五封或十封长信，他才金口难开的回上一封。而我走后他都是怎么过的日子，我最想知道的，他却只字不提。

驻维也那的台湾著名记者章先生，风尘仆仆地来旅馆采访。

为了庆贺我的生日，兼为了给即将回驻地的章先生送行，又为了祝贺我的申请书在报纸上全文发表，阿青买了大活虾、活鱼、肉和多种青菜，以及啤酒和红酒，由我来掌勺。又请了一对台湾人夫妇，他们送给我一个手工制做的、藕荷色的丝绳打结项练，十分漂亮典雅，我立即带上了。

后来章先生发表文章又配上照片，记述这次“宴会”，大赞我的烹调手艺，说大家吃得是那么开心！

我不由不感叹——假如我没有这些台湾朋友，我的处境又当如何？他们给了我多少温暖、愉快和支持啊！他们的单纯和开放心态，和大陆人是

多么不同啊！哪怕是华侨们，象小松鼠那样的，只要一粘上“大陆”的阴影，就全变了形。

小时候，从一懂事起，就看惯了蒋介石的秃头漫画——太阳穴上贴块狗皮膏药，膏药上还画了叉。凡一提起台湾，似乎人人都是蒋介石，人人都是特务，人人都藏有电台，人人都是天天干阴暗的、见不得人的政治勾当。

如果我不来德国，不申请政治庇护，我就无从了解台湾人。我感到他们个个都象个孩子，天真而诚实；而大陆人却个个象病入膏肓的老年人——那是一种什么病，我也说不清。

饭后回旅馆时，店主太太连比划带说，把一个包好的东西交给我。打开一看，是一个圆形中空的德式蛋糕。一张纸条是小松鼠的手迹：“今天是你生日。蛋糕是黑天鹅和野鸽子做的——是个兔子窝。她们说希望你丈夫也能住进这个兔子窝里来。”既无称呼又无签名。其实这后一句，是他的调侃与讽刺，因为我说过给元元起的另一外号叫“老眯兔”。这种蛋糕，到处可见；也根本不相信那两个整天抽烟聊天的女人，会有工夫有兴趣去烤蛋糕，而且做的与卖的一模一样。但她俩对我的感情，要比小松鼠厚道得多。

17 胡耀邦的话我简直难以相信

外星人：

来日方长，暂时没心思去学德文。一有空闲，就继续写那未完稿的《一个大童话》。

除了去阿西家，除了在旅馆里写东西，每天都要出去走走。

越熟悉老城，越觉得德国是多么美。那“美”里包含着太多的东西——从远古柏拉图文化开始的、每个居民深深浸透的文化与修养。从它的整洁、宁静、有秩序、一尘不染、一砖一石一瓦一木，都带有艺术性；以及它的法制与居民的守法，令你会联想许多——为什么一来就“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却没有这些？

我不是哥哥那样的思想者，没有社会学者们丰富的学识，我只凭直感去认识事物，否则我会写出一大本厚书来阐述我的所思与感受……

去看「贝多芬故居」，站在「贝多芬广场」上久久地流连……想想一个月前，还看不见在眼皮底下的那家饭店、傻傻地找了四十分钟；仅一个月之后，不仅“救命”的条子不必带，也不相信有人会跟纵我了。何况，驻德使馆的一等秘书，也无影无踪、去政治庇护了，新闻登在了大报上。阿青笑道：“都受了你的影响呢！”可我却想：那位一等秘书，不会是那个握着我的手说“你受了不少委屈”的人吧？

在旅馆住了二十五天，就收到一封“社会局”的信，说一周后应去 WU 市某街某号报道，并付了一张简易地图。

社会局的人说过，从递交申请书到长久居留批下来，不会超过一年；若被批准后要服从分配，不一定去哪个城市生活。但过后人人有迁徙自由。

小松鼠和中共一起，各自发表文章，一个讽刺道“去做你那快乐的难民吧！”；另一个说得有鼻有眼，说我正在大街上流浪，有如无家可归的“妓女”。一位认识我的国内女电影明星，也忙着表态：“外国的黄油面包就那么好吃？”一在香港定居的元元的老友大河，来信指责说：“你一再说小松鼠夫妇对你那么好，却突然政治庇护，不仅对不起经济担保人，也对不起范军，你将他置于何地？”；又一位从北京去新西兰“定居”的女友情居居，信中指出道：“你干嘛非要政治庇护？你完全可以用找情人、和情人同居的办法也能留下来。我们必须断绝关系，否则我回国会受到影响……”

怎么一粘上中共，人人准变形？如果他(她)们都是正常人，是否我最不正常？或我是外星人？

但也有例外——与我在一个杂志社工作过多年的同事蝓蝓，竟在《海南纪实》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纪实文章，回忆她对我的了解和印象，把我写得那么好，还登了一张我住在德国私人旅馆里的照片。我感动万分，实在佩服她的胆量。可又担心——就算这家月刊是“山高皇帝远”，但如此大胆的文章，中共会饶过他(她)们吗？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蝓蝓和那家杂志社都做了检查。

尤其阿西的话更令我震动：“听说，胡耀邦发表了看法。他说：‘中共确实对不住遇罗克一家人’。”我简直难以相信——当政当红的胡耀邦会这么说？我公开在《中央日报》的《政治庇护申请书》竟能引起他这样的话？是

他不想当官儿了，还是时代真地变了？

18 阿西汽车的玻璃被砸 / / 惊险的一夜 / / 我叫奇奇

外星人：

阿西夫妇带上南南和我，向二百多公里的 WU 市驶去。一路上，他又一次放上磁带唱片——我们都喜欢的台湾作曲家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那向上、进取、欢快、纯洁的歌，鼓动着我们的心。南南和阿青跟着合唱，阿西也加入着哼哼；汽车向着蔚蓝的天空飞去……

我们找到了报道地点。城市不大，报道处是在小城中心，一座三层的老旧楼房里。楼前有十来个闲散的黑头发、黄褐色皮肤的外国人在抽烟、聊天、散步。阿西把车停在离楼十米远的街侧，正好是两栋私人房舍的前面。阿西说，德国没有“贫民区”，不管是穷富都混着住。一下车，都有点儿渴。阿西打开车箱门，取出带着的矿泉水，细心的阿青每次都带上纸杯。南南只想喝橙汁，还有点心，阿青问谁想吃，都摇摇头。

一进楼，只见各种亚洲国籍的男男女女，惟独不见中国人。大人小孩你出我进，上楼下楼乱轰轰杂吵吵；有的在煮饭，有的正在洗衣，有的在看公

共电视，有的出楼进楼地散步聊天。才知这里是个没有墙、没人“管”、出入自由的难民营。

报道窗口是在一层对着大门处。阿西为我做翻译。办完各纸签字手续，由那大窗口里递给我新被褥、新枕头、新被单、肥皂和毛巾，还有一周的食品费支票。再由这位发物品兼管理员——一位又高又胖、约五十岁的跛腿德国人，带上一大串钥匙，呼哧带喘地引我们上楼，开了一大间空空荡荡、摆满了老旧的上下双人木板床的屋子。他咕咕噜噜地两手一摊：表示愿意睡哪张床都可以。

这环境与私人旅馆真是天壤之别。阿西告诉我要在这里住一周，然后就分配到别的城市去，此处不过是个中转站。

“分到别的城市还会再分配吗？”我问。

“他说不会，一直等到居留下来，最晚不超过一年。”

不舒服的环境谁也坐不住，南南早就烦了。阿青说去把我那三只箱子提上来。当我们来到汽车前，全愣住了：汽车后面的大玻璃不知被谁用石块打碎了。

懊恼的阿西夫妇用德语问东问西，一直在楼外散步闲站的几个外国人，只是似懂非懂地摇摇头、耸耸肩、继续抽着烟，似乎就算知道他们也不肯说。汽车旁边那两座私人房里的人，大人孩子全不出来，只是隔着窗帘一眨不眨地观注着我们。阿西去报告楼里的管理员，他说只有报警。阿西忙着给警察局打电话，等了十五分钟，一位警察开车前来备了案。

幸好在德国人人都必须做汽车保险。趁天没黑，阿西必须赶紧找到一家汽车修理部。慌忙中，好心周到的阿青不忘频频嘱咐我：离开屋子时别忘锁

门，出楼一直走不拐弯前面那家就是食品超市……

虽然每屋都有钥匙，可那糟旧的屋门，似不知被翘坏过多少回，防君子不防小人罢了；而门里面的小门叉，也松松垮垮不经一击，似乎被弄坏过不知多少次。

当晚躺在脏硬的床上，心里万分不过意——自阿西夫妇照顾我起，他们搭了多少钱和精力呵！吃、用、汽油、时间……又加上这大块玻璃……唉！我怎么报答得完呢！我至死也不会忘记他们啊！

次日上午，阿青就打来电话，说还算幸运，没开多远就有家修理部，马上安了玻璃，天刚黑时就到家了；又关切地问我一切是否如意……

二三天过去之后，也不大觉得人们杂乱了。原来大多都是有家口的，一家人住一屋。每天都有大汽车送来新人、带走旧人。人人住这里不超过一周；几乎都是阿富汗和斯里兰卡的战争难民，竟无一位中国人。要说过去离婚我“先进”，难道报难民我也“先进”？自己想想都哭笑不得。怎么，中国人就一点儿难也没有？都活得很幸福、很爱国？幸亏，还有位“同道人”使馆秘书，现在他在哪儿呢？

胖管理员住在他的发货间，有张单人床。一天他在窗口招呼我进去，让我进了他的“仓库”——一个个的木架上，分门别类地堆满了女人男人的旧皮鞋和旧衣服。那些样式，加上落满了的尘土，似乎都是二三十年前没人要的历史垃圾了。我竟突发连想：犹太人被毒气毒死之前，是否也堆满了这样的衣服和鞋子？

他好心地连比划带说,要我挑捡,可我对这些毫无兴趣,只好含笑地一个劲儿地摇头;见他过分热情,我忙摆摆手再见,离开了那里。

夜里约十二点多,楼里都安静下来,人们都进入了睡乡。我突然听见,伴着一大串钥匙的哗啦啦声,大胖子气喘嘘嘘地上了楼,竟停在我的门前。

“开门! 开门!” 他粗鲁地肆无忌惮地喊道,并使劲地咚咚地敲着我的屋门:“开门! 开门!”

我虽不懂德语,但知道他嚷的就是这句话! 天! 我蹭地下了床、开了灯,拼命地拉拽着离门最进的那个双人床,让它顶住门;又费劲地拉拽第二个、第三个……

我想找到一根木棍,只要他一进来,就劈头盖脑地抡他,可连根棍子毛儿也不见。我听着他那喝醉了般的叫嚷,气得心脏扑扑直跳! 难道这也是德国人? 他也配在这里工作?! 那翘坏了多次的门,难道都是他干的? 欺负我们无依无靠? 欺负我们不懂德语? 败类!

楼里居然显得更寂静了,只有他粗野的叫喊声响彻全楼,但谁能睡着呢? 可能睡着吗? !

他足足喊了半个多钟头,才哗啦啦地带着钥匙咕咚着离去了。我关了灯,和衣躺在床上,尽量使自己平息下来……同时幻想着,假如是一个没有把门顶住的女人会怎样? 假如他进来了又会怎样? 假如他受了伤或女人受了辱,更会怎样? 在这虽有法制,可却没有人做人证物证、谁也不敢得罪他、而我们又一句不会德语的情况下?…… 我并不难过;我只是认识了德国人中的败类。

次日我迟迟地起了床,拉开一个个双人床——空隙刚刚够我这瘦子钻

出门去；因为晚上我还要把它们回归原位，必须这样住到最后一夜。

我去那肮脏的公用卫生间洗漱完毕，又去公用厨房煮面条。最为奇怪的是：身边来往的邻居们见到我，竟无一丝一毫的异样表情；就算大家说的是自己的家乡话，却也没人用手比划问问我昨夜的事——无论是大人和孩子。仿佛夜里谁也没听说过任何响动，仿佛他(她)们都是从天国里来的——哪怕昨夜发生过凶杀案。

我吃完自煮的青菜面条，刷了牙、锁上屋门，走下楼想出去散步。大家都是无聊地干住着、干等着、什么事也没得做。屋里连个小桌和椅子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想写。下楼经过那发货窗口，我连头也不偏一分一厘，连一瞥也不去看他，紧绷着脸就走了过去。

他也颇有自知，一眼也不看我；好极了。

天蓝得可爱，万里无云。我站在大门口那宽大的台阶上，深深呼吸着新鲜空气。当我返身打量这座楼时，才断定它以前一定是个学校。现在它却成了难民营，对这小城的居民来说，从心理上能接受吗？又想起被打碎的汽车玻璃，难道会是难民干的？他们在等待期间，谁敢犯法，且在光天化日有人看见的情况下？也只有可能是恨难民的当地人，且是不够十八岁的“孩子”干的，甚至是家长默许的——他们见到开小汽车来的“难民”，更加难以承受吧？

因怕洗衣服不好干、又没地方晾，我已经三天没换外衣。德国的四月天在阳光的照耀下，足有二十度。我穿着从北京带来的黑白方格刚过膝的连衣

裙，浅棕色连裤袜，黑平底带绊皮鞋；齐肩的长发，围了条不宽的同样布料的发带；斜挎黑色小皮包，走向大自然，想让自己轻松一天。

连衣裙是我自己设计和缝制的，带白色透花领，学生味儿十足。在商店里总遇不到自己喜欢的衣服，但却能见到喜欢的布料。在北京买了个脚踏缝纫机，也给元元做过三条非常合身的长裤。我还从来没在脸上化过妆，不过是用浅淡的唇膏涂涂唇而已。

楼外有片小树林，一位约三十来岁、瘦高的外国青年，两手插在裤袋里，闲站在树阴下，无所事事地观望着来往的人们。

他见了我友好地一笑，迎上来两步。

“哈喽！”他说。

“哈喽！”我也回答。我正要走过去，他却偏要和我说话。

他似乎问我是否会英语，我摇摇头；他似乎又问我是哪国人，我不知怎样回答他；他急忙摸上衣口袋找笔和纸头，我们就比比画画、写写说说地终于明白了彼此的国籍——他是阿富汗人，二十八岁。他又写了些字母，点着自己的胸口，又点点那几个象汉语拼音似的字母，再点点自己的胸口。我探头仔细地看——“Ganzaoshu”。

“甘糟叔？”

他欣慰地直点头，又点点自己。

“干、枣、树？”

他更加肯定和高兴地点着头。随即他把那纸和笔伸过来，让我写自己的名字。

或许全无意识，或许这意识早已悠久而长远，我既心安又理得地写下一

— “Chi Chi”。

“Chi Chi? ”

我欣慰地点点头，也点点自己的胸口：“奇奇。”

他还想聊，我却摆摆手与他道别，径自走去。

呵，名字，名字啊！从这天起，我的姓名是“奇奇”了！连我住在阿西家，都没想过在德国我是否应有个新名。我那沉重的名字啊，遇，罗，锦！你可算跟我永别了！我在国内沉重了四十年，都因为你呀！在《一个大童话》里我详细地解释过对自己名字的预感；也在那书里详细地写了哥哥和俩弟弟对自己名字的满意，他们解释得多么好，每一个字都是他们的骄傲——我不想在这里再说明了。而我从小就幻想有个简单的姓名，如果我叫张丽丽或王媛媛的话，那命运一定是另一样。而今，我离开了那沉重的黄土地，来到这全新的绿色之乡，我想切断那过去的一切，一定要有个简单和清新的名字——就是元元给我起的小名“奇奇”。尽管我的护照还不能改，但我从今天起就叫“奇奇”了！

我会对别人说：“这样叫是为了简单，好叫”，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那真实名字的沉重故事！他们哪里知道我对元元的爱！

我要用这新的名字，重新开始我的一切。

四月的初春，一片嫩绿。杨柳吐絮，新芽绽初；雪白粉红的樱桃花，梨花，野樱花，白的和紫的玉兰树花，透嫩黄黄的迎春花，街上和院子里，到处都是，正娇滴滴地含苞欲放；家家园里的的小树上，挂着许多彩蛋，摆上小兔

装饰，欢送着刚刚过去的复活节；玻璃窗干净得一尘不染，式样不一的雪白的窗帘，屋里窗台上的各种盆花，以及巧思艺术的窗饰，美得让我驻足不前；墨绿粗直的参天松树，鹅黄放绿的杂树果树，起伏如画碧波无边的丘陵和田野，一群群褐色、白色、黑色的奶牛、绵羊在远处静静安详地吃草；银闪闪的小河，欢快地伸向远方；排成人字形的大雁，骄傲地从云天里飞过……人人皆在画中。每走一步，身边各家的露天花园，淡紫深紫，浅黄青蓝，银粉绯红——形状不一、五彩鲜活的小花们在雪褥下睡了一冬，欣喜地从土里钻了出来，比赛着争奇斗艳。许多说不出名称的鸟儿们，在树上，在云霄中，唱着奇妙动听的歌，呼唤着伴侣……远处的森林漫无边际，与飘渺的青莲色的群山连成广阔的奇景……多美的国土啊！

我不相信有哪个国家比她更美。但让我更感动的，是她的处处整洁、安宁和有秩序；从中透出和显示了深厚的人文素质和教养。中国，得几百年才能家家达到这种水平和整个国家的面貌呵！

WU 市很小，才一个小时就全逛遍了——甚至大半时间是用来欣赏家家的露天花园。走着走着，不知何时竟来到一座公路桥上，我紧贴桥边走；因不懂路上的任何标志，不知是禁止在桥上步行的，还奇怪怎么没有行人。

看看手表，是中午两点。时而有辆小汽车从身边飞驰而过。突然一辆小汽车停在了我前面几米远的地方——一位约二十多岁、象大学生模样的金发青年，开着红色敞棚速车，示意让我上车。我摇摇头，依旧往前走。不一会儿他又停下，又一次请我上车；我又一次摇摇头。他遗憾地只好开去，却开得很慢。我索性返身，朝来时的路走回去……

谁也不相信我已四十岁。拒绝他们总使我暗暗遗憾——如果我才二十岁可有多好！可我不愿冒年令的险，那不但让我感到累和焦心，也深知不会有好结果。我不是一个只想玩玩的女人。我只想过一个正派女人的平常的生活。

19 完全是因为孤独而想在一起

外星人：

一周后，我已经被分配到二十五万人口的大工业城 HA 市了。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单元房——客厅兼卧室共一大间、小厨房、小卫生间，共约四十七平米。社会局派人来丈量两个大玻璃窗的尺寸，以及墙的面积；付每户难民一千六百马克的家具费，包括窗帘和壁纸。在超市一下子就买齐了所有的家具和用物，还管送到家并安装。又有二百六十马克的服装费，可去商场购买自己喜欢的新衣或鞋子。

社会局把房租直接寄给房主；每月的食品费按时寄到个人的帐号上。并给了免费学习德语的地址，以及和全国人一样的医疗保险。

由于离 BO 市太远，阿西把我托付给了台湾人大齐。他在本市攻读博士学位，三年留职停薪；原在台北某大学是硕士，任经济系讲师。离我家不远，他租了一层私人家的阁楼，还有辆德国人视为“垃圾”的“老爷车”。

当我把家里收拾停当之后，周末，炒了六大盘菜，做了汤和米饭，请阿西夫妇和大齐来吃饭。

阿西夫妇带着南南同来，还送我一筒台湾有名的“冻顶乌龙茶”。他们欣喜地观赏各个角落，为我布置得简洁漂亮和舒服而高兴。

大齐带了一瓶在「亚洲店」买的荔枝酒。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起，到他带我去社会局报到、去银行立新户头、又三番五次地才找到房、还周末开车让我睇览全城；然后买家具、买衣服、买用品.....哪一次不是与他同行！

我对他们的感激，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们吃得高高兴兴，南南竟也又笑又跳。饭后我们去市中心的老城步行区散步。天公做美，春风怡人，暖暖的阳光抚摸着人们的心。大片的咖啡座上几乎坐满了人。阿西执意要请我们喝咖啡、吃冰激凌.....

离开咖啡座，送走阿西一家之后，我和大齐步行回家。

“阿奇，咱们天天一起吃饭，你还特意准备什么！”

似乎台湾人称呼熟人和家人都爱用“阿”开头，于是他称呼我也就成了“阿奇”了。回到家里，品着“冻顶”茶，我俩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我

们坐在新买的沙发上，看着新买的二十四吋彩色电视正播送着新闻。由于我的《一个大童话》被台北的《联合报》节选刊登，他们给了很不错的稿费，不但用此款买了电视机、录音收音机、磁带音乐片、大衣柜、自行车、吸尘器、缝纫机、衬衣和大衣、皮鞋..... 还给元元汇了九百马克。

晚八点的当日新闻，美丽的播音小姐说的德语，在我听来都是连成一片，连她说的是句还是词，都听不出来。

“光听就得两年呢，”大齐说：“一开始我也象你一样。”

“这位播音小姐真美呵。”

“她都四十五岁啦，”大齐说。

“四十五？怎么显得这么年轻漂亮？”

“要不是年轻漂亮，她就老占住这个位置啦？”

“她说的什么？”

“‘今天上午，柏林有一千零五十二名来自非洲的旅客，一下旅游客车就直奔外国人管理局，申请了政治庇护.....’”

“天天是几百，”我惊叹：“今天竟一千多？”

大齐感叹的是：大陆人、非洲人、共产党国家的人，就能轻易地留在德国，享受着德国的福利，由两手空空马上就变出一个象样的家，而台湾人就不能。

“你都成富婆啦，”他环顾地看着周围的新家具，笑道：“这家，比我那小阁楼强多啦。”

“你想过来住吗？”

“你同意吗？”他征询地看着我。

“你要是想来你就来，”我无所谓地说：“两个新床垫，一人一个。”

基本的家具都有了，就是没买床。为了让屋里的面积显得更大，一个新床垫是给元元留的；而我的每晚铺在新地毯上，次早就立在过道一边，与另一个并在一起，既不碍事，又不碍瞻观。

“阿奇，那我真来。”

“那就来吧，有什么不好意思。”

“我得带上两件换洗衣服。”

“行。”

我们之间没有爱情，只有姐弟之情；可又不是真正的姐弟。他的相貌并不动人，人品不错却才能一般。如果我是二十岁——一个纯洁的姑娘，他肯定会爱上我，尽管我也许不爱他。而我比他大十二岁，结过三次婚，经历又如此波折；他深知我一心要把元元接出来。我们，完全是因为孤独而想在一起。

当晚，两个床垫之间有二米远的距离。我们各自穿着睡衣，半躺在被子里。虽关了灯，就着银辉般的月光，还想聊天；似乎只有这样拉进距离，才能聊出更深的东西。

“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

“我……不好说呀……”

“有什么不好说呢？”

“我……和一般人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我那个.....很小。”

“很小?”

“女人不会对我有兴趣的。”

“能让我看看吗?”

“可你不许笑。”

“我要是笑,”我郑重地说:“我就成了王八蛋。”

“你保证不许笑。”

“当然。”

他掀开被子一角,让我看了看,又赶忙合上了。

“并不象你说的那么邪唬呀。”

“真的?”

“真的。”我认真地看着他:“有的女人,可能还喜欢小的呢。小的人聪明。”

“我母亲也这么说,”他显然为我的话心里舒服。

“不见得个个女人都喜欢驴呀!”

他欣慰地笑了,随即反驳道:“可世上的宣传,都说女人最喜欢驴呀。”

“那你就找不爱驴的女人去。”

“难找哇。可遇不可求呵。”

“没碰到,一个人也蛮好,起码心里清静。”想了想我又说:“我猜,外星人聪明得连那东西都没有了,那星球上很可能没有两性关系。”

他笑道:“胡猜!那怎么生孩子呀?”

“象蜜蜂那样,有一个造人工厂,专造智商高的孩子。笨的、太动物式

的，都被淘汰了。孩子们不需要真正的父母。他们受的是集体的、高明的教育。没有私有观念。人人有自己的兴趣和追求。社会鼓励的，是对宇宙的探索。”

“阿奇，你又在编童话呵。”

“可我不认为是童话啊！这社会糟就糟在你的我的私有观念上！假如地球从一开始就象我说的那样，我们现在也象外星人，早就有了各种宇宙飞船，载着人们在银河旅行了。”

“你就会编童话！”

时间不早，我们躺好，打算睡觉。

“你想和我躺在一起吗？”我扭脸看着他。

我们仍穿着各自的睡衣，搂抱着。我象大姐姐抱着小弟弟。我只想抱他，让他知道自己是可爱的，而不是让女人们遗弃的。我们轻轻地亲吻彼此的额头、脸颊、鼻尖、下巴，唯独没有象热恋中的那种亲吻。当我真地抱住他时，当我真地抚摸他时，我才感到他的身体是多么丰满结实，他的呼吸是多么有热度。我隔着睡衣抚摸他，可并不想碰那块禁区——那我连自己的三位丈夫我也不愿碰的禁区。他的手却触到了我的；我不动声色地把他的手拉开，放到我的腰后。

“你不喜欢？”

“不喜欢。”

“为什么？”

“就这样蛮好了。”

他没有动物式的冲动，我也没有。我很高兴他没有——不必人人都得是

一个模式。我们互相给予的，只是拥抱和温存。可我们谁也不讲在外国的感受——我们陷进了莫名其妙的孤独的大海。而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他还有回头路，我却是没有的。拥抱和温暖，能使我们忘却孤独——在这异乡的孤独的土地上。可他不知道在我的潜意识里，并不以为在抱住他一个，而是抱住了台湾所有的兄弟姐妹。

20 他们失望的到底是什么？

外星人：

大齐并不是每天来。每周五下午到周日傍晚，他都要去他的学姐家——很远的一个美丽的名城。他学姐的丈夫也是台湾人，二人都在该城工作。而每天下午他从大学回来，也必要去他的阁楼苦读，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我不过是做好晚饭等他来吃罢了。我每天上午骑车，去一个天主教会办的德语学习班学习四个小时。中午好歹吃点面条，晚上做一顿象样的饭。他非要付一半饭费不可，我也同意了。

由于《一个大童话》被台北《联合报》节选刊载，报社来信说：“全书篇幅太长。如果您同意删去一半，则我们打算出书，并给您最高稿酬。”

删去一半？什么道理呢？只因为书太厚成本高，不好卖？可作者并非为书好不好卖才决定书的字数呵！写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四十年才一本书，还嫌厚？正经来说，写这么厚的两本才是应当的。而他们要删的，必是有关哥哥的，以及他们认为写儿童时代的那些部分；留下的，准是有关我恋爱、婚姻的部分——似乎人们只认这个！他们不知道这本书的灵魂——没有哥哥是不行的！

回想出国前，广西一家大出版社的主编向我约稿，他说，他宁肯丢掉乌纱帽，只想出本好书。我邮寄去《一个大童话》的未定稿第三稿。他看后欣喜异常，说希望我快快定稿，他一定出书。但我把它带了出来：一是不希望它与主编的职务一起消亡；二是以为海外更会重视作者的写作自由，更会有人文理想。可是，从到德国的第一天起，失望者却是我。

我当然不同意。正不知书稿给谁寄去，这时有位台湾女作家，来信说想和我认识，并寄赠她的书——原来她也是从大陆辗转逃往泰国，历经波折，后去台湾并结婚定居。我对海外出版界一无所知，求她帮忙，她一口答应，就给了台北的一家很有名气的出版社。主编一口气看完，说：“我们出书一字不删，但无分文稿费”；我同意。自此天天盼望的，就是能见到我的书。我迫不及待地给元元写信，兴奋地告诉他这好消息。信中我提到大齐对我如何帮助，但不会傻到去提别的；没有任何人比元元在我心中的位置更重要。

这天忽然收到日本学者山郎的信。看完竟楞住了——他说，他从北京回

去之后，带着我给他的关于我的许多资料，打算在日本东京「现代文学研究所」出版一本以我姓名为书名的评论集。这一套六位大陆作家的书已在印刷中，却得知了我政治庇护的消息。“给我们的打击太大了，太令人失望了！”——这位日本中国通用中文写道。

我不懂的是：我的政治庇护和我个人的价值，到底有什么关系？难道我一政治庇护，就不是作家了？就不是中国人了？就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就彻底地完蛋了？他们失望的到底是什么？

不止一位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从共产国家跑出来象我一样，难道，他们的价值是因为他们得了诺奖？否则，“成是英雄败是贼”，凡没得诺奖的都是贼？凡没得诺奖的政治庇护作家都是臭狗屎？这些学者和教授到底是何种心态？还是他们由于我的抉择，去中国不好交代？山郎可是日本人，难道也甘心受、必须受中共的制约？正象那哈宾教授一样？怎么只要一粘上中共，甭管哪国人，准得变形？

外星人，正当我想骂一句“真他奶奶的”时候，打开另一包东西，不由让我平静了许多——邮件也是从东京来的，是二十本书。这家出版社出版了日文的《冬天的童话》和《春天的童话》，还有老板的亲笔中文信。他说他是华侨，在法国住过多年，一直未失去理想，哪怕赔钱出书。

夜里临睡之前，脑海里来回比较着这两位日本人，渐渐进入了梦乡……

21 “念心儿” / / 认识阿玲

外星人：

我和大齐的缘份总共也就两个半月——再有一周，他三年到期，就该回去了。

博士论文没有通过，他显得很难过。他最后一次拜访了学姐回来，说道：“我学姐说，都是你的事绊住了我，否则我一定会通过的。”

“你真这么认为？”

“嗯……有关系吧。”

或许，他学姐甚至认为我“勾引”了他吧？如果她知道我们有时晚上相拥睡觉的话？我不想说什么，我以为大齐把博士论文的通过看得太简单——假如你德文底子并不深厚，假如你的知识积累也不渊博，假如你没把所有的时间，甚至两天周末都搭进去，你怎么就知道三年一定通得过？看看周围，哪个外国人不是苦读七年八年，甚至十年十多年才通过的？

如果没有自己的主见，女朋友是难于找到的。

这晚，我说，临走前你要做很多事，为了你这几天休息好，不用把床垫子放在一起了。

想想他三年没有工资，学位又一场空，着实让他懊丧。临睡前我说道：“大齐，明天上午，咱俩一起去趟老城。我在橱窗里看见一件非常漂亮的男毛

衣,又象夹克;是机器和手工制做的那种,特艺术味儿,六百马克;我要买了送给你。”

“六百马克一件毛衣?!”

“一分钱一分货。买好的,只心疼一次,可是一辈子满意;图便宜,满意一回,一辈子难受;哪个值?”

“傻阿奇,就听你的。”

“准合身又漂亮。”

“阿奇,我走了你可怎么办?”

“照样儿活。”

.....最后那天分手时,他穿着那漂亮的毛衣望着我,眼里含着泪花。不知为什么,我却没感到心酸,仅仅是怅惘——也许会再见,也许再也不会见。

大齐回去后,来了信,报告平安。他说,在台湾工作日益难找的情况下,大学还守信用地给他留着职位。其实,他在台湾会过得很舒服。我祝愿他能遇到自己喜欢、也喜欢他的生活伴侣。

不久,阿青打来电话,说阿西的法学博士论文通过了,半个月后他们就全家回台湾了。

“这么快?”

“八年了,还快呀?你来不来?有的东西你可能需要,想送给你。”

“我一定去。后天。”

“我们去接你?”

“不。我坐火车。我会自己找到你家。”

当我真地站在楼下按门铃时，才感到，自己再也不是他们羽翼下的小鸟，而是出窝能飞了。

我们又高兴地相聚了。似乎不是分别了三个月，倒象有三年。家里乱糟糟，这儿一堆、那儿几箱。长沙发已被别的留学生抬走，几个柜子也都有了去处；想当初，他们也是如此这般才成了家的。

阿青想送我两个大碗，是铁心浇磁的。她说，她天天做饭离不开这俩碗，特别好用；给我，是为了留个“念心儿”。我高兴地接受了。

我们一起吃着简单的午饭。我说道：“我这次来，主要是想给阿西买套西服，买好些的；一辈子留个纪念。希望咱们一起去本市最好的男装店。”

二人竭力推辞。我坚持道：“因为有了报社给的稿费，我又不想攒钱。实打实的说：以六百马克左右为准。这说不上好；真好的，一千多马克呢。你们对我的帮助，我也只有这点心意。要是你们不去，我去买了又不合身，岂不麻烦？”

我的诚恳让他们高兴地接受了。

阿青看了一眼丈夫，含笑说道：“要是六百马克在台湾，买料子去裁缝铺定身做，能做两套西服呢。”阿西不语。

“我相信你说的，”我说道：“可我只想买件现成的，做为一件礼物送给阿西——这也是‘念心儿’呀。”

于是我们去老城的一家名店，挑了半天，阿西总算找到了他满意的衣服。

德国的火车站都在老城的市中心。阿青的碗我也带着，便说道：“就想

上火车回家了，你们一大堆杂事忙不完，不想再回去给你们添乱了。”

夫妇俩带着南南，一起送我上火车。站台上，三个大活人竟语塞，不知说什么才能道出自己的心境……

他们对我的关心，有如接力棒——知道大陆人都不敢接近我。阿西夫妇走前，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一位叫阿玲的台湾女留学生，愿意接下“照顾”我的“接力棒”。

为什么海外一些大陆人（尤其一些名人）不敢接近我呢？一句话，他们在文章里风言风语，认为我太“反动”，太给中国人“丢脸”——竟公开发表了政治庇护申请书，竟然发在了他们不愿意接近的台湾、那国民党的党报上！甚至耳朵上还挂了俩小布人儿，象什么样？！总之，那从小就深刻在国内人脑髓里的、蒋介石太阳穴上的狗皮膏药，还在散发着怪味儿呢！

当我第一次给阿玲打电话时，就被她那沉稳、有磁性的声音吸引住了。

“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年轻，”她说。

“可你的声音，我觉得更好听。”

“真的吗？”

“真的。我今年四十岁。你呢？能告诉我吗？”

她沉吟了一下：“比你小四岁。”

“才比我小四岁？”我十分意外：“阿西说你是留学生呵。”

“那是八年前了。我在大学毕业后就工作了，一直在【德国之音】电台台语部工作。”

“你成家了吗？”

“没有。就我自己。”

她约我周末去，说可以住到周日上午。我买了来回火车票，带上两件工艺美术品做为礼物，就出发了，有三百多公里远呢。

约好在站台上见面。我事先告诉了她我会穿什么衣服。下车的中国人本来不多，我们一眼就认出了彼此。

我不喜欢以貌取人，我欣赏的是一个人的气质；人的涵养和知识水平全在气质中。而阿玲的气质，除了透出教养，似比她的年龄大了十岁。她身材娇好，黑直的长发；一身臧兰却面料讲究的小礼服；未化妆；五官不美，但气质的美，让你觉得她并不难看。我们握了手，彼此含喧地走向站外。

她的新轿车是上等的。她沉稳地开着车穿过热闹的市区。当又进入一个区时，她说道：“这是第二区，德国每个大城市都有富人区。”

“你也是富人？”

“我是富人中的穷人，”她笑笑。

果然，这个区不见一座穷人住的多层高楼。汽车在小街里慢慢穿行，座座私人房舍掩映在花园里，隐隐露出房顶或半个窗子；各式各样精巧别致的窗帘和窗饰，真可以办一个“德国窗帘窗饰艺术博物馆”。

车停在一座漂亮的花树半掩的老房子前。她说，房主是位七十多岁的德国老太太，轻易不出房门，但听觉极为敏锐，最怕吵——怕人大声说话，哪怕老远都听得见。我们悄悄地、轻轻地登上木楼梯，开屋门时她朝楼上瞅了

一眼,说道:“楼上还有一家,是个单身德国女教师。”

“三个女人一栋楼?”

她笑笑:“是。”

“真漂亮,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屋子?”当一脚踏进屋里,四下地环顾时,不由得赞道。

“才九十平方米,不算大啊。你随便坐,我去泡茶。”

我好奇的各屋看看,尤其喜欢客厅的大玻璃窗上,挂的一斜串玻璃小天鹅。窗子半开着,微风一过,小天鹅们就叮叮咚咚地晃动。

“你象我一样不买床?”我象发现了新大陆似的。

“你也没买床?”她看着我笑笑:“这套单元是带家具出租的,连电视。就是没有床。有两个床垫就行了;来客人,就一人一个。”

“那,房租多少钱呢?”

“暖租一千一百马克。”

“这么贵!”

“这还算便宜呢,可难找了。”

她泡的是我最喜欢的茉莉花茶。又打开沙发前圆玻璃茶几上的小吃盒盖,让我自取,我捏了两个开心果。

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由不认识到认识,由不了解到彼此慢慢了解。

“我很佩服你能把 <政治庇护申请书>公开在报纸上,”她说。

“真的?”这话真让我高兴:“可大陆人都不敢理我,有的还骂我‘给中国人丢脸’呢。”

“我上大学时,”她也剥了两个开心果,慢慢地嚼着:“也有三、四十个大

陆来的大学生，可他们怕接近我们。我们和他们也聊不来。说真的，你是我的第一个大陆朋友。”

“真的？”

电话铃响，她去接听。

“有人请我们吃饭，”她扭脸对我说：“你也去好吗？他们很想见你呢。”

“都是台湾人吗？”

“都是。几乎都是我的同事。”

22 我们很难越过那道高高的门槛

外星人：

当我坐在火车里返回家时，回忆这两天台湾朋友们的热诚好客，两天中竟有三次饭局；饭桌上她(他)们的聊天，与大陆人聊的内容和语言又是多么不同！而阿玲几乎不做饭——很多吃食都是从台湾邮寄来的现成的，她在德国顶多买一点水果而已。

我第一次感到他们和大陆人生活上的差异——无论是内容、品质、方

式和习惯。我相信自己永远变不成他们，他们也永远变不成我们；就好象我们和德国人一样。

星期一早七点一刻，骑着自行车，准时地去德语学习班。教室是在山上养老院里的一间屋子。在德国，骑自行车上班工作的人少之又少，马路上没有自行车道，也没有关于骑车的交通规则和法律保护条例。马路边上窄窄的人行道，既不适合骑车，又常断道。很多马路的左右两边连窄人行道也没有。所以骑车的人，只有冒着风险，紧贴汽车道的一侧行驶。不但听说出了事故骑车人往往打不赢官司，我自己就亲眼见一辆自行车被汽车碾成麻花状，尚未被交警拾去。学开车？我还没想过。阿玲说，她的德语那么好，还花了四千五百马克才拿到驾照呢。花五、六千才拿到的中国人不在少数。而德国青年一过十八岁去「驾驶学校」学开车，才几百或一千几百马克就拿到驾照了。外加每月的汽车保险、汽油、修理和定期检查的诸项费用，不仅我财力不够，就算够，我也未必去学——孤身一人在德国，德语又不行，出了车祸怎么打官司？坐了轮椅谁来伺候我？

往山上最陡的路段，只能在人行道上推车前行。养老院的牌子，是个大而醒目的天主教教徽。山上几乎没有人家。极宽的无人看管的入口处是一大片花园；花木繁多，果树林立。顺着漂亮的小石子路推车往前走，一座几乎全是玻璃建造的波浪形艺术风格的两层楼房，才是真正的入口处。

每次进这养老院，都给人一种德国的老年人皆在天堂里生活的感觉。且不说那在花园里散步，看起来还蛮健康的德国老人；只说一进那明朗的、一尘不染、花纹大理石铺地、能照映出人影的大厅，四周是用真花真草和人造喷泉，布置得活象一个温室的大花园！身穿一色雪白工作服、白袜白拖鞋的工作人员们，各个安静有序地各司其职、温文尔雅、无一声喧哗和咳嗽。连各屋门也是玻璃的，你一眼就能看见一边的理发室，正坐着一位白发老人，和蔼体贴的理发员，正在一边小声地和她聊着天，一边给她修剪头发。那位坐在轮椅上要进电梯的老人，正被推着，腿上盖着干净暖和的毛毯，一脸的怡然自得。再远些的粼粼光影，似是温水游泳池的反光。听说还有按摩间、桑拿浴、小图书馆和小电影院。每天都有专用大公车，载着想去老城步行区散步的老人们下山往返……

我走到开敞的柜台前，向管理人员出示了“学习证”，她点点头。我穿过几间老人卧室的门前，大多门在开着，服务员们正在整理雪白的被褥，打扫卫生。老人是每人一屋，有的坐在自己的小阳台上，腿上盖着毛毯晒太阳，或是闭着眼做梦，或遥望花园呼吸着新鲜空气……我简直不相信还有比这里更幸福的老人们了。

女教师约三十岁、高个子、灰眼褐发、文静可亲。学习班共十二个人，只我一个中国人；其他的来自波兰、伊朗、罗马尼亚、斯里兰卡、阿富汗和印度。那时我才知道：即使不来自共产党国家，如果你个人受到了政治迫害，只要符合「国际难民法」中的要求，也照样可以申请政治庇护；连台湾人也一样。

今天加入了一位新同学，是来自斯里兰卡的一位中年人。他能说不少德

语，但不能读和写，他说已在本市住了六年。

“六年？”课间休息时，我用自己那有限的德语问他，同时连比划带画：
“你有了居留吗？”

“有。”

“你工作吗？”

他点点头。

“在哪儿工作？”

他一摊手，耸耸肩；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想告诉我（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很多人不工作，却说自己有工作）。

我们又互相问了是否结了婚、有孩子等等。他说，他等了足足六年，才可以接他太太和三个孩子来德国团聚。

“必须六年？”我着实惊讶。

他肯定地点点头，张开手指比划着：“六年。”

“中国人也必须等六年？”

“不知道，”他摇摇头。

第二节课后，是二十分钟的大休息。我又象每次一样，去花园里和其他角落转转。一眼见到女教师站在僻静的廊下闲站着。我走过去，向她笑笑，她也向我笑笑。我有一肚子话想和她聊，想和她做个朋友，可二人竟无话语，就那么擦身而过。也许她无动于衷，认为上课就是上课，休息就是休息，多一句废话都不想讲；可我心里却充满了遗憾——我深感和德国人交朋友是多么困难；由于语言的陌生，彼此深知谈不了什么。那遗憾和失落感是无以

名状的——我们心甘情愿地陷进这莫名其妙的孤独的海洋里，而主人德国人，并不见得喜欢和欢迎我们。他们只是凭着理智和人道去办事；而在私人的情谊上，我们很难越过那道高高的门槛，也许下半辈子都无法越过——也就难怪个个想和家人团聚了。

23 竟无一个中国人？ / / 疤老弟的小疤

外星人：

我几乎每两天就给元元发一封航空信，有时甚至一天一封。自己也不知道怎会有那么多话要说——所有的感受、见闻、所有的废话，一写老长。

我发去十封，他大约回一封，仍是精简的“c.c.”，仍是两句三言，仍是附上三四篇剪报——谁谁成了大名鼎鼎的万元户，谁谁又发了，谁谁富得成了国际名人了……我奇怪这位出于理想和我结婚的人，怎么对“财”和“发”如此地感兴趣，甚至百倍地超过对他老婆？人家发不发和咱们有神马关系？你老咪兔能不能正经八百地写封信哪？？但我所以没太往心里去的原因，是知道他在北京就是天天以“侃大山”为乐、为重要的生活内容，这些报纸，就是他侃的内容啊！他定了二十几种报纸，他不鸚鵡学舌地去侃，

谁能知道他学识渊博？

不能说这是优点和好习惯，但我原谅他，是因为理解他——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被人踩在脚底下，只能烧锅炉；造成了他的幻想非非和不学无术。他不是哥哥遇罗克。我在挨批判时他想和我结婚，我的“实话文学”他给予高度评价，是因为他把他的幻想，全都寄托在我身上。他自己只看闲报不看好书，用侃大山打发时间，却希望我去冲锋陷阵、写出佳作、不怕官方批骂，而他背后给与无懈的精神支持。

当他下一封便条式的信，漫不经心地说他辞了职、一心“搞生意”，不想受天天上班的束缚时，我不由傻眼——他真的有一点儿自知之明吗？一个一点儿奸也不会耍的人，偏偏要进入“无奸不商”的行列？还是他那病入膏肓的乌托邦幻想病，在这人人成了爆发户的热潮中又犯了？——实行他在北京时就告诉过我的：他要“以诚示商”、“以诚经商”地改变人们千年来的旧有观念——“无奸不商”变成“无诚不商”？

只想把鸡蛋往石头上碰的傻蛋！我敢说，他连每月自己那六十元“工程师”的工资也挣不出来，他可吃什么呀？还是他看我给他寄了钱，他心里就来了劲儿、有了底气？这就更没谱了！我在报上的连载文章早就停了，正待出版的自传无一文稿费——那家台北很有名的私人出版社，刚盖起一座七层高楼，装饰华丽的「艺文中心」，却说付不起稿费；连去阿玲那儿串门我都因路费而考虑。他怎就有这么大的底气和牛劲去经商？经的又是什么内容的商？

再一封信又一如既往，他全不管你上封信有多少个问号，一概置之不

理，却煞有介事地问我：这信中附的几个小棉花棍儿（即德国处处有卖，十分便宜、人们用来掏耳朵掏鼻子的），正在中国开始时兴，有台湾厂家在国内生产，你若帮忙推销，会有多少回扣云云……

气得我没工夫理他。想了想，只有尽快地把他办出来——只要我的居留一到，不管费多大力气，也得把他办出来——别在那儿乌托兔了！

递交申请书后第八个月时，从纽伦堡市来了封信：要我去纽伦堡的一个地方，履行必须的程序——德国有关当局派人必须与我面谈，配有翻译；并让我去本市的社会局领取路费和一夜的旅馆费，信中还附了张详细明了的简要地图。

我给阿玲打电话。她说，据她所知，凡申请者都要被面谈一次；谈完之后，就等着居留下来了。她祝我好运。

一路上带着在北京买的《德语会话手册》，又写了几个估计能用到的会话条子，背上不大的背包就上路了。下了慢速火车，再乘 TAX，对司机连说带比划地出示了地址条子。他一定颇有经验，也不多问，便把我带到一家很便宜的客栈，并指给我：一百多米外的那座大楼，就是明天我应报道的地方。

有了房间钥匙，把简单的东西安置好之后，时间才下午，便象散步似的去看那座大楼。特意制作的很大的门牌号和街址牌子，立即清清楚楚地立现在眼前，正和我信上的地址一模一样——仅从这上看，就看出政府对难

民的人道和关心！我蹬上了十几层高的大宽台阶，紧挨着楼站在门前，扒着关得紧紧的玻璃门朝里张望：黑乎乎空洞洞地什么也看不清楚。

这儿，空寂得活象是墓地的地方，就是给我居留的圣地？

次日一早，我比规定的八点钟早到了半小时。天，比起昨天下午那死海般的黑色沉寂，一夜之隔，简直是人山人海！两层楼人全满了，都是亚洲有色人种！拉家带口、孩子哭大人叫、呜噜噜听不懂的说话声，使我象陷入外国迷魂阵！我就在这迷魂阵的海洋里游泳般地来到二楼，去找自己应该进入的办公室。那门还锁着，敲也没人开。一位干瘦的亚裔男人，向我指了指他的手表，摇摇头，表示还早——离八点还差二十分。我想看看有没有象我一样的中国人，楼上楼下地找来找去，在这足有八、九百口子当中，竟无一个！怪不得他们说我给中国人丢脸——除我以外，竟无一个同胞？！个个如此爱国？！

哼，我心想，是真爱呢，还是根本没胆量申请政治庇护？

而这些拉家带口的一堆一伙的，看上去活象农民和普通劳动者的人们，他们真有政治庇护的理由吗？我好奇地问身边一位男子，他象我会说些简单的德语，他自我介绍名叫疤老弟，二十五岁，阿富汗人；他理由十足地指着左腕上的一块小疤说：“警察，警察，这是警察打的！”我象法官似的坚信地点着头。心想，人家这就是理由，人家一点也不惧怕，人家就是要来德国生活，人家知道这是比结婚或找情人好一百倍的出路！人家把小时候爬树时，不小心划破落下的疤，一口咬定是警察打的，而兴许就能通过。可那高喊五千年博大精深文化的中国人，连人家普通农民的智商都没有，更遑

论勇气!

24 我的墓地在读者的心里 / / 与大鳄鱼笔战

外星人:

从纽伦堡回来后,就一心地等待居留被批准。上午学习,下午写写或去老城闲逛,买买东西,把家里弄得更漂亮和舒适些。

离家不远处,有一大片墓地,它紧挨一条马路。而马路那一边,就是我常光顾的很大的超市。我经过这墓地多次,竟不知它是墓地——一是它没有牌子,二是围绕着铁丝绿栅栏的树木稠密高大,看不清里面是什么,还以为一定是仓库或私人的住宅院落。

听说它是墓地,竟在人多热闹的居民区,令我实在好奇——中国的墓地哪有建立在市中心的?也没有绿树环绕啊。这天我见墓地进口的小铁栅门开敞着,就走了进去。四下一望,才使我惊讶万分——这哪里象是死气沉沉的埋死人的地方,明明是目不暇接的老大的花园哪!

石碑的排列,井然有序;每座大理石的石碑,颜色形状不一、造型和装饰各异,个个有如艺术品;碑前,无论空地大小,都种满了时令节气的鲜花

绿草,小松树或长青藤,或瓶里插着鲜花;长明灯的红蜡烛,透过深红色的玻璃,在白天里也幽幽地闪烁着红光——似乎是地下的亲人,分分秒秒地与活人在互通心曲。墓地的四周,是许多高大的树木;有木长凳和木椅石桌、方水池和手提喷壶、扫苔簸箕等用物,供人们休息和使用。

下午的阳光下,园里的人寥寥清清。我用带来的小“傻瓜相机”左照右照,想多冲洗一些,寄给国内的朋友们看看——我不相信还有比德国更美的墓地。

或许此时不是人们来扫墓和悼念的时间,只有远处一位德国男人站在碑前默悼,然后浇那碑前的鲜花。我走过去,希望他能帮我在这“花园”里照张相。

我们闲聊了几句。他说,他是来悼念他父亲的;说他父亲去逝已八年了。我指着问他:这些、这些,都花钱吗?他说:租这小块地为期二十五年,租金是按面积大小算,他付了五千马克;石碑是三千;那边大的租金得一万。带雕塑的大石碑,得上万或几万马克。又说了本市有好几处的墓地……我向他道了谢,然后道别。一路上感慨地想:石碑上没有一个外国人的姓名,我们只能是欣赏者和旁观者。如果我死了呢?我希望灰飞烟灭,我希望自己的墓地,是在喜欢我作品的人们的心里——这样的墓地,比那种花钱租、还得有人照料的墓地,更令人轻松、愉快和自由。

回到家,收到一封信,是一位住在远离五百多公里外的读者红,因她订阅香港政论月刊《畅言》,看了我和大鳄鱼的笔战文章,倾向于我;便向杂志社要了我的地址。她除了热情的问候之外,又附了在家里弹钢琴的照片;

还说邮寄了一包她的旧衣服给我，并希望我哪天能去她家小住几日。她家的一栋小楼共有八间屋子；说她无儿无女，丈夫是地产商；说想把她的经历统统告诉我，希望我写出来。

这么热心的读者，在国内见过不只一位——她(他)们不是寄旧衣服，而是拿着土特产、水果罐头，或大蛋糕找上门来(比如我生日)；有的还在我家住过，有的真成了好朋友。而在海外，这样热情的国内同胞还是第一个。我立即回了信，说如果赶上节日连周末有三四天假的话，一定前往。

至于和大鳄鱼的笔战，纯是自己意料之外的事——在“文革”时，我由于写日记“思想反动”，被判三年“劳动教养”，与他太太小鳄鱼，在一个土炕上，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开会学习同自我检讨，“同学”了三年，我到期出狱。而她和大鳄鱼因是五七年的“右派”，一关无限期。尽管这对夫妇在男队女队，揭发检举别人鼎鼎有名，有的人因为他们的检举而被“无限期劳教”。鳄鱼夫妇如此希望立功赎罪，只想提前解教，但因属于“右派份子”，表现多好也不被照顾，直被关到1979年“拨乱反正”才被释放，整整被关了二十二年！而当初把他们送去劳改的人，在原单位一个个仍旧高高在上、泰山不倒；想回原单位，还必须向他们求爷拜佛，讨好献媚。鳄鱼夫妇没被白关，早已学会了要想翻身的根本——你两面三刀，我比你两面三刀；你踩弱者往上爬，我比你还能踩；你左，我比你左；你坏，我比你坏；你向上拍马屁，我比你还能拍；你假，我比你假；但我们鳄鱼的本事你却没有——能让文章妙笔生花。

仅凭大鳄鱼的假话文学，仅凭小鳄鱼的拍马报道，夫妇二人一步步登天。我出国前，大鳄鱼已是一家大出版社的社长，又兼“作协”付主席；小鳄鱼已是一家大报的副社长；二人还兼任着文化艺术界五花八门的各种头衔。连他们过去受苦受气的女儿，也变成了大名前卫却无佳作的「艺术学院」的“高才生”。

自我 1980 年以“实话文学”登上文坛，鳄鱼夫妇就对我万分戒备和怀恨。利用他们所有的机会，说我的坏话；又用假名，在报刊上对我大肆鞭鞑。只因我知道他们的“回京史”和在教养所的“鳄鱼史”；只因他们的所言所为，全都符合中共的口味；只因有理的人永远没地方讲理。

1986 年二月我出国之后，各单位一切“向钱看”，不少人“下海”，人们手里有了些钱，“性文学”开始兴起。这等于中共变相的鼓励——人们的第一乐趣，就是找情人、养“小蜜”。房地产开始兴起。人们的工资，由几十元变成以百计、以千计。周末人人休息二天，公假也越来越多。中共用给事业单位的公务员高工资，用吃喝嫖赌开始制造“盛世”。

小鳄鱼比大鳄鱼大七岁，早已是体弱多病的老徐娘。大鳄鱼正一步步窜升正当红。文学界盛传：小鳄鱼为了逮住大鳄鱼的情人，不惜呼哧带喘地从北京打到上海去……

住小松鼠家时，我曾透露过与他们的“过节”，而小松鼠偏偏邀请大鳄鱼来德国旅游，住在我睡过的屋里，相信定会激发大鳄鱼的文思；深知大鳄鱼会发表文章攻击污蔑我，他好看笑话。

白吃白住白玩儿，大鳄鱼何乐而不为？就算感恩，他也定会按照小松鼠的话去做。

手术过后已出了院、恢复了健康的菊花打电话告诉我，大鳄鱼来德国的另一目的，是希望女儿来 BO 市的「德国艺术学院」深造，小松鼠答应帮忙。

于是大鳄鱼在《畅言》上发表文章，说我对小松鼠撒谎，说我在出国前一直是个文学界没人理的臭狗屎，是个没有任何报刊向我约稿的人，是个早已过了气的新闻人物，没人拿我当作家。笔锋一转，大赞小松鼠黑天鹅夫妇爱情坚贞——连中国现在都兴起包二奶、找情人、养小蜜，而这对夫妇对此并不认同——那种一生只爱一个人的高尚情操，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又大赞黑天鹅的艺术天份之高之妙，是个金光闪闪、尚未被世界承认的梵高式的绘画天才——他在黑天鹅的父母家时，看到了她儿时的速写大作挂在墙上，立马被倾倒，差点儿钦佩得晕过去……

《畅言》主编将他的大作寄给我，希望我能也写一文。我想，这种严肃的政论刊物，情不情人的事又不能提，也好，那就提提鳄鱼夫妇在教养所里怎样有名吧。

文章发表之后，大鳄鱼没再反驳。小松鼠却发了篇短文，说我看不起中国人；说我对他讲过，我最最看不起的就是中国人；说我一心想找一个有钱的德国人结婚。

我懒得反驳——感到一切是那么无聊。

哈宾教授的太太打来电话，说有个正在学中文的女大学生诺拉，就住在离我家不远，很想和我认识，并希望从此能够多学学中文会话。我一口答

应，自己也正想认识个德国朋友及她的家人。

诺拉登门来访后，我也买了一束鲜花回访。她父母和姐姐都很热情。她家像许多德国人的家那样——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花园、小狗；典型的德国家具、德国味儿的布置和装饰。一切宽敞明亮，还有很大一间放了许多食品的地下室……父亲在本市「社会局」任公务员，母亲在职业学校每周上两个半天班，教学生“插花艺术”；姐姐也在上大学。

“为什么地下室放这么多食品？”我看着一个个摆满了食品的架子。

“二战时饿怕了，”她母亲说道：“万一明天突然发生战争，这里的食物和水，够全家人用半年以上的。”

“储存太多不是就不新鲜了？”

“我们从超市买来的新食品，先放在这边；按日期，先吃老的；食品都是一二年才过期的。”

真是上了一课。我才明白德国人盖房子，为什么一定要有地下室，而且造得大而明亮。

这天，我收到了居留被批准的信——一封四页长的德文信。信中陈述了为什么批准我的申请。附近没有中国人能帮我翻译，全靠诺拉那磕磕吧吧的汉语。

我拿到了最好的难民护照——《国际难民法第十六条》兰皮护照；既能出国，又能开店，具有无限期居留、学习和工作许可。如果上满六年满工时的劳动税，还可申请入德国国籍。是的，我一定要入德国国籍——我愿成为她的子民，愿受这美丽的、有法制的国家的保护。

25 四好的奇特神经

外星人：

这天电话铃响。

“大姐，我是四好啊。”

“四好？你在哪儿打电话呢？”

“我在德国 FA 市呵。”

“我出国前，你不是去了南斯拉夫吗？”

“是呵，呆了两年；那么个穷国，怎么呆？后来半路上、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德国留学生，就跟着她一块儿来了德国，现在我们俩住一块儿了。”

“你的女朋友？”

“就这关系吧。大姐，我想去看看你。”

“行呵，来吧。我在火车站接你。”

我和四好起码有十年没见了；从小到大，总共打过两三次照面，一笑点点头，从未聊过。尽管他母亲与我已去世的父母，是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但在 1950、1952、1957 年的“镇反”、“三反”和“反右”运动中，带头

高喊应当枪毙我父亲的就是他爸爸。“文革”中，他爸爸没再高喊，是因为他家也属于“黑六类”——第六类的“职员”；且他母亲因是教师而“不准革命”。要不是他母亲会明哲保身，早就被红卫兵们毒打并剃了阴阳头了。直到1979年毛魔死了之后，几十年不登我家门的他母亲，满脸含笑、歉然之至地对我妈“大姐”长、“大姐”短地叫着，数落着他爸爸的不是，说她自己那时候一点儿都不知道，说孩子他爸爸现已是肝癌晚期……爱原谅人的母亲，不但被她说得柔情满怀、浑身舒服，过后也让我们原谅他们。

四好比罗文还小两岁，他俩小时候，都是被人称为“俊美”的男孩儿。本来二人想唱京剧学武生，但“阶级斗争”的弦几十年绷得那么紧，连上台折跟斗的愿望都无法实现——全都滚出北京，去穷山沟儿插队。十年苦农民生涯结束，托了不少人情，罗文、罗勉和四好都成了大龄学徒工。在我眼里，他就如同我的亲弟弟一般。

“改革开放”政策使人人都想出国。他母亲使尽了路数，让这开推土机的宝贝儿子去了南斯拉夫，当建筑劳工，以为一出国就会有其他更好的出路。

火车站的见面，使我二人眼里都涌起泪花。他早已失去了小时的俊美，多了中年人的沧桑。我们还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我推着自行车，一路上慢慢地聊着，和他步行到了家。

“你过得这么好？”他意外地打量着屋子：“真出乎意料！”

“好什么，普普通通过日子罢了。”

我们吃着喝着做着饭闲聊，他最关切的话题，就是居留。

“我也以为这是一个人的根本，”我说：“我一到德国，看到那么多靠结婚

取得居留的。何必呢？——象我们这样的家庭？”

我把自己刚得到的批准信和护照，以及工作许可证都拿出来让他看。他虽然看不懂，连德文字母还没学，但却仔细认真地看着，深信着它们的真实。

“你喜欢德国吗？”我问。

“喜欢，当然喜欢。我巴不得一下子有了居留，留在这儿呢。”

“你女朋友有居留吗？”

“她大学生，哪儿有？不过是短期的学生居留。她也为居留发愁呢。”

“没有居留的两个人却又幻想着长久居留。”

“大姐，真就是这样。你能帮忙吗？”

“嗯。你买过电影票吗？”

“电影票？”

“写申请书直到批准，就象买电影票那么容易。”

“大姐，我没有你那么多理由哇！”

“人家小时候上树落了个小疤都能通过。我交上去那么厚的材料，他们根本就没找人翻译。全看你申请书写得是否是那么回事儿；他们觉得象真的，就是真的了。”

“你怎么见得呢？”

“想想看，他们对每个申请人都说：‘我们绝对为你保密’，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去中国问讯和调查，因为他们不可能去问公安局。那么，他们凭什么相信你理由的真假？还不是看你写得是否象真的，以及你个人受过什么伤、得了什么病吗？否则，怎么会每天都有几百上千的被批准呢？”

他点头，沉思……

FA 市离这儿很远，他明天早晨上火车。晚饭后我们看了会儿电视——几乎每周都有的德国歌舞，十点半就铺床睡觉。每人一个床垫各靠着墙。我们都穿着睡衣，半躺在被里，支着头；圆圆的月亮将屋里撒满了光辉。

“你一定要把姐夫接来？”他问。

“当然。”

“你打算怎么给他办？”

“最简单的就是象我一样，以旅游身份出来。”

“得有人做经济担保呵。”

“我会想办法。”

“我那女朋友.....也是犹豫不决；她想留在德国，有时又不想。”

我心想：我早已见识过了。

“那你就更应当去申请了。”我又问道：“她白天上学，你做什么呢？”

“我？我会按摩。我给一个德国人按摩，才半小时，就挣了五十马克。”

我没说什么。他才在德国一星期，我已经一年。一个没有专业文凭的人，又没居留，在这法制严格执行的德国，打黑工近乎天方夜谭。也许，他是给不付钱的同居女友按摩吧。

夜里，他起码撒了十回尿。我虽闭着眼一动不动，他也尽量地不出大声响，可这一间屋子，离卫生间又那么近，吵得我一夜没睡。我们也没喝那么多水，他的尿频是否是病呢？又不好问；只能说谢天谢地，明天他终于走了。

次日早餐后，我送他去火车站。总邮局挨着车站。他说去邮局要给他母

亲汇二十五马克孝敬钱，我正好也想去，给元元汇了五百。

不知为什么，分手时我们又饱含着泪水。也许，因为我们的感受相同——我们都陷进莫名其妙的孤独的海洋中？

才隔了一天，就收到四好的信：“大姐，有关我们商量过的事，你千万别告诉我母亲。千万千万。因为我还得考虑……我女朋友后来知道了你的大名，很为我担心。千万别告诉我母亲……”

变形病！我告诉你妈干嘛呀？就你那虚情假意的妈？她也值得我一告诉？我连想都想不起你妈来，这会儿你倒自作多情起来了！

可我不能把心里话写给他，我只是忍着心里的不快，平静地写了封短信：“放心，我根本不可能告诉你母亲。你要是不提，我连想都想不起她来。假如你真爱德国，还是应尽快决定……”

至于我的“大名”怎么竟引起了她女友的担心，我能想到是为什么——变形人必有变态病，国内外处处皆是；我在信里对此连提也没提。

又隔一日，四好信又来了。看完真乃莫名其妙——仿佛我上封信写的是：“我非告诉你妈不可，我一定告诉你母亲你要政治庇护不可，说不定我还要……”天，他不仅仅是尿频哪。

我只好又耐着性子，给他回了封更短的信：“四好，你是否看懂了我上封信了？我说过我连你母亲的一丝影子都想不起来呢！我告诉她岂不是吃饱了撑的？再说你留不留在德国，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隔了一天信又来了，变形病更加变本加厉——好象我上封信仍写的是

非告诉他妈不可。这回我可是一点儿气也没有了：“四好老弟，十年没见过您，这回才知您病入膏肓；还不仅仅是一夜撒十泡尿的问题，原来还只爱听枕边风，外加政治恐惧失控症。您老弟一而再、再而三地锲而不舍地提及您那虚情假意的妈，让我别忘了告诉她，说您打算申请政治庇护，让她为您高兴，我不仅会照您说的办，并且会写一张大明信片寄往北京，让一路人人皆知，人人为您欢欣鼓舞！”

“你要是敢这么办，我一定报复!!!!你等着瞧!!!!!!.....”——看着这封张牙舞爪的回信，真不知我们的相见到底有何意义。我想起他爸爸当初在台上高举拳头，带头呼喊应当枪毙我父亲的那付凶样。

26 把霸头的门砸得坑坑凹凹

外星人：

正当我后悔与四好相见，白惹了一肚子不快时，又一人打电话要来找我一——好友岩岩的亲表妹小方，来德国旅游已快三个月了，签证说话到期，说什么也要来看看我。

前两个月，岩岩信上提及她，我没太往心里去；一个朋友的亲戚，去亲

友家旅游，岩岩又没说她非要留下不可，关我什么事呢，我又不认识她？

但今天小方说一定要见我，说已经买了火车票，我只好答应。

无论是相貌还是言谈，小方颇有岩岩的影子——一直率热诚，与我一见如故。我和岩岩的交情二十多年了，加上这层关系，就更使我们容易接近。

我才知，邀请她来的亲戚，在老远的大城市开了家餐馆，她白干了三个月，工资分文未得。

“你是旅游身份，怎么可以打工？”

“在厨房里打杂儿呗，检查的一来，就从后门儿溜了。”

“你亲戚胆子也够大的。若查出来，听说罚款不少呢。”

“好多饭店都这么干，和警察关系好，问题不大。问题是，他们觉得我在他们家吃住，就不给我工资了。”

“你想留在德国吗？”

“怎么不想？可我……宁愿通过结婚，不想政治庇护。”

“为什么？”我望着她那一脸的忠厚相，却又一点儿也不美的相貌。

“我父母还在中国，我不想断了后路呵。我还想有一天立住脚，把他们全接出来呢。”

“想发财？”

“反正得挣钱，攒钱，有了钱好开店。”

“可你的签证马上到期啦。”

“他们又帮我延长了三个月。说什么我也得挣足三个月的钱。”

“除了中国饭店，你也没处打工去。”

“大姐，你能帮我找家别的餐馆儿吗？”

“能。现在就找。”我翻开电话本，第一次知道本市已有八家中国饭店了。我一家家打过去，说我表妹如何能干，如何勤快，如何做得让老板满意……打了足有一个小时，才终于与每家老板落实——人手都够了，只有一家老板说：“汉堡她去不去？那边我一个朋友新开张，急着找水巴，她做没做过？”

“当然，她水巴做过三个月呢！”

小方冲我直吐舌头。

“提我就行啦。”那老板的口气，活象个“世界万人求”：“我给你他的电话号码……”

我匆忙记下来。

“大姐，可我没做过水巴呀。”

“又不是造原子弹，不就是倒酒水吗，还不一学就会？老板若耍了你，他还能轰你走？他肯定会教你呀。”

一切落实——管吃管住，自己有个小阁楼单间，一周休息一天，一月净工资一千五百马克。

“大姐，当跑堂的，管吃住，一月两千四，加小费合三千多呢！老板说全是这么攒钱起家的。一学会水巴，我说什么也得当跑堂。”

“我听说当跑堂没居留不行，哪怕学生居留也好。”

她不言声儿，好象无所谓。我根本不相信她说的打黑工的话。哪一个老板也不会傻到希望自己罚款，何况一罚三千多？何况多少有居留的等着来工作？如果她不是以学习居留留下的，那她必定是已经政治庇护了。我听不

只一人讲过：申请之后，社会局巴不得你有个地方能去挣钱，巴不得你自己解决吃和住，以及医疗保险；甚至因自己不领救济金，居留反而能较快地被批准。但她为什么对我纹丝不露呢？谁象我这样公开地与中共决裂呢？绝大多数都是纹丝不露的。他(她)们的政治庇护与反抗中共暴政并没有关系。他(她)们主要是想发财。如果国内暴民蜂起、人头遍地，他(她)们庆幸自己申请对了；如果国内经济比国外还好，他(她)们必定会向中共摇头摆尾又回去的。他们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脚踩两只船。但我不想挑破，只想装糊涂。

小方说她今天特别知足高兴，说她明天就上火车去汉堡。尤其那德国数一的大直辖市赫赫有名，有多少新奇的事物吸引着她！她说她不在乎居不居留，说她幻想比我多得多。

“我自己在中国吃够了没有户口的苦头，”我说：“知道这是一个人立足的根本。而政治庇护不用让你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是不用把自己的立足和另一个人挂在一起的。当你有了居留之后，反过来，有多少人想来和你结婚的，是由你来挑捡的。但这笔小账很多人不会算。中共的暴政，已经把人人变了形，弄得他们只会算糊涂账。鉴于太多的教训，我是不会再劝谁了。甚至反过来想：每天新闻报道第一条，就是几百近千的人政治庇护，难道德国人不头疼，还没够？少一个是一个，让德国人也省点儿心吧。”

她听了不置可否。

夜里两点了，可那住在楼道尽头的霸头还在大声放音乐，全楼都听得

见，谁能睡得着？

“这么吵，”小方翻了个身：“谁这么讨厌哪？”

“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国人，叫霸头的，三十多了，光棍儿一个，又不工作，谁也不敢惹他。他每到周末就大放音乐，和胡朋狗友们喝个通宵，又吵又笑又跳。我们给警察打过电话，连警察都不管。”

“怎么这样？”

“这楼里住的二十家，就三家象酒鬼似的单身德国人。全楼里没有老人孩子，几乎都是单身。当初找这房子，通过房地产公司才得到的，我交了九百六十马克的押金，是不退的。住进来才知道，这房子臭得出了名，所以警察都不爱来，说什么我还得搬家呀。”

那头的音乐声更大了，夹杂着吼叫、跺脚和怪笑；那些人嚷着谁也听不懂的德国话，似乎在高声叫骂着全楼的外国人都是混蛋。

我噌噌地穿上衣服。

“大姐，你去哪儿？”

我不理她，抄起一根大擀面杖，开了屋门就直奔那边去。

噼噼噼噼噼!!..... 我两手紧握擀面杖，用力朝霸头的门抡去；同时气得用德语大叫道：“你太吵了！你太吵了！”

各家的单身汉都开了门，一个个看着我；霸头开了门怒气冲冲地朝我吼道：“你要干什么！你把我的门都砸成了吭！我要你赔！”

“你太吵了！你太吵了！”我气不打一处来：“几点了，你知不知道？！”

小方急忙赶来，夹在我和霸头之间。霸头圆睁怒目、直瞪着我、气呼呼地撸胳膊挽袖子；小方用两只胳膊使劲顶住他。几个邻居单身汉也发着议

论，似乎是在向着我。我不由对他们大声嚷道：“你们怕他什么?! 你们怕他什么?!”

“我的门你得赔!”霸头大喊大叫。

他的胡朋狗友们只是笑嘻嘻地看热闹。

直到凌晨四点，我和小方才躺下了。

“多危险哪，大姐，他能揍你呀! 你岂不是吃眼前亏?”

“我还真没想过他揍不揍我。”

“要是我不拦住他，他真可能揍你呀!”

“那就只好去法院，他也赢不了。”

“那么多男的都不说，就你说?”

“说什么也得找房，再也不能住这种地方。”

27 就象古代的奴隶市场上叫卖着奴隶

外星人：

第二天小方走了之后，霸头见到我，居然一声不吭。此后又见到我时，

反而客气地打个招呼，说他买了一大张带胶的木纹纸，把那满是坑的门全糊住了；仿佛我很应当领他的情。我看看他什么也没说。

难道是“一物降一物”？他就吃这套？还是正气压了邪气？不管怎么说，这房子不是正经居民住的地方。我求诺拉帮我找房。

想走人，必须头三个月书面通知房主。她帮我写好并寄出了解约信，于是就天天看报纸找房子的出租广告。

诺拉带着几张报纸来到我家，用她那嗑嗑吧吧的汉语，说物色到几个地址，就坐在圆茶几边的沙发上打电话：

“遇太太单身一人，她是作家，人很好，非常安静，也非常干净，也不招人，更不招生人，她是中国人——”电话断了，诺拉朝我耸耸肩，又拨另一个：“.....对，她是中国人，是作家，很安静，会按时交房租——”那边一定又说不出租吧，电话又断。她又拨第三个：“.....她是作家，是我的朋友，她人很和善，很安静，也很干净，保证会按时交房租，目前还在学习.....”

我坐在窗前写字桌旁的椅子上，不发一语地看着她，听她打一个又一个的电话——不想和乱七八糟的人住在一个房子里吗？只想和规规矩矩的德国人住在一起吗？这就是代价——德国人也只想和规规矩矩的德国人住在一起；哪怕德国人中也有骗子和罪犯，哪怕外国人中也有品德优秀的人。而我听着她一遍遍地“叫卖”我，就象古代的奴隶市场上叫卖着奴隶。

她打得口干舌燥，神经质般地脸都涨红了，自己气得一个劲儿摇头。我端过去一杯茶，她喝了两口，又打.....一个半小时过去了。

打完那个电话，她象爬完喜马拉雅山般地松了一口气。

“终于成了一个，也再没有地址了。她是努太太，住在山街。那边我了

解，都是正经的德国人家。三十六平米，一间住屋，有厨房、淋浴；房租是二百九十五马克，很便宜了。要交三个月的押金。约我们明天下午去谈谈。”

诺拉开着她上学用的老旧汽车，我带上自己的护照和现金。为了表示友好，我买了一束鲜花。一路上心想：没钱，连房都找不了。还没工作过的人，无论是德国人外国人，都属于社会局。社会局会给你安排到不用交押金的房子里，但那些房客还不如霸头，尽是酒鬼，几乎和无家可归的人没多大区别；不但吵和乱，连屋门也锁不住，更加乱七八糟。我想离开那儿，才和大齐找到了霸头那栋房子；还不到一年，九百多马克的押金等于白扔。如今又要交九百多，搬家费也得自己全部解决。可假如没有稿费呢？仅靠社会局那每月的三百二十马克房租和二百七十马克的食品费，能剩下什么？别说买不了新家具和衣物，别说搬不了家，就连这束十几马克的鲜花也买不起！然而，社会局又规定每人是不准有其他收入的，假若知道，是立即停发救济金甚至会受罚的；也只能说是朋友资助的。

“就是这条街，”诺拉说。

这是半山坡上一条非常干净整洁的街道。两边的房子一座紧挨一座，没有一座难看的高楼，都是不超过三层的私人房。个个窗帘雪白漂亮，墙壁的颜色柔和，谐调；街道缓缓地通向山上。一层大多是店铺，马路的两侧是林阴步行路，平整宽畅的柏油马路两旁，停着许多居民的小汽车。

努太太约六十来岁，头发已花白，她住在一层。她高兴地把花插进花瓶里，灌上自来水。看了我的证件，问了一些有关的事情，就带我们去看楼上的屋子。

中国人叫它在第三层，然而德国人第一层不算层，说它是第二层。这小单元房干净整洁。努太太说，最后的房客是一位德国女大学生，住了三年。每换新房客，都要换新地毯；墙壁也是新刷的。我问有电视插销吗，她说有。她问我喜不喜欢这房子，我说很喜欢。她问是否会住三年以上，我说会。我们出了屋，她又介绍说，我下面住着一对老年退休夫妇，我右边住着一对中年女伴；我上面住着一对中年夫妇，她丈夫三个月才回家一次，是货船驾驶员。这楼里几乎都是中老年女人；没小孩、没青年、没狗没猫。光洁的水磨石的楼梯，按住户段落划分，每家每周必须湿擦一次。下了楼，又回到她的屋。于是她从抽屉里拿出房租合约，我取出带来的押金。她从老花镜上面盯住我说：“如果你解约，应提前三个月书面告之。一般这押金是不退的。”

“为什么不退？”

“大多数房客走后，我们要花钱搞卫生的，一般住户保持得都不合要求。比如买新地毯，也是从这笔钱里出的。”

我点点头。真怕话一多，万一她不租给我。她说，有三个单身德国女人，还等着她的回话呢。

合约是现成的，她一项项说给我看。诺拉也探身挨着我，沉默不语地看着——水电暖气费另算，垃圾杂费加房租费总共三百二十九马克。我暗暗吃惊——还没住进来，怎么一下子就多了三十马克？但生怕失去这个住处，又没敢多问。

再就是交房租要按签约日期算。我那边也要再交两个月房租。我希望我们的日期能晚两个月算。努太太说不行，否则她会租给别人。诺拉好说歹说，她才象割了心头肉似地说道：“那好，这半个月就不算了，从下月一号起

算好了。你可以下月一号来拿钥匙。”

28 《爱的呼唤》出版 / / 生日聚会

外星人：

收到了台北邮寄来的二十册《爱的呼唤》。出版人不喜欢原名《一个大童话》。为了它能顺利出版，我只好同意。当我把书抱在怀里时，我的高兴和激动是无法形容的——她是我盼望了半生的女儿啊！

我迫不及待地从头看到尾，却不禁很失望——怎么会有这么多错别字？怎么会不该错的字却把文字搞错？比如原稿上明明是“十个工分合八分钱”，却印成“一个工分”；明明是“小孙”，却印成“小孩”……甚至个别页数也印错了。每个有错的地方，我都夹上了小纸条，竟达二百几十处！只因我太相信别人，只因我未能亲自校对？真是想不到！作者亲自校对竟这么重要？！

生米已成熟饭，还能怎么办？

但不管怎么说，在国内不可能出版的书，毕竟在海外出版了！因为毕竟没有删改文字！

又从头看到尾，发现某些文字、某些描写、某些段落，由于急切地想出书，稿件寄去得太匆忙，写得还不尽人意。我把一本夹满了纸条的书——那些一一改了的错，又写了一封信，一起寄给了出版人；说假如有一天再版时，希望没有这些错误，并能做某些文字上的修改。

我迫不及待地给元元写信，告诉他出了书的天大喜讯，并付上好几张我与书的合影。还说，下一步就是想办法找有钱人做经济担保，不仅给他，也许给罗文罗勉两家人一起办出来；我忘不了出国前他们对我的期望。

从小我习惯了“报喜不报忧”，凡是不快的事一概不在信上写；不仅我如此，两个弟弟和元元也如此。

书，不想往北京邮寄，因为怕被公安扣住。元元终于来了信，对出书也未多言，对我要做经济担保的打算也未多表一字，仍象以往一样，信短得象个便条；且又付了几张谁谁发了横财，谁谁变成暴发户的剪报；又说某人正搞一项新发明：用化学镀“金”镀“银”，如何大有前途……似乎他在那人手下工作，却又似是而非，什么也说不清楚！搬完家，说什么也得把他快办出来，别在那儿自以为是地瞎折腾了！

把出书的好消息打电话告诉阿玲，她希望我周末去，我犹豫；她说：“你来吧，你的路费我给你出，实报实销。住三四天再走吧。”

我把一本改了所有错处的书送给了阿玲，她视为珍宝一般。

“你真细心，”她说：“连页数的错你都改了。”

我们喝着茶，嗑着台湾出产的五香瓜子，想什么说什么，想聊哪儿就聊哪儿；这晚她没有饭局。我们做了汤、炒菜、米饭；吃完洗了碗之后又聊。

“怎么大陆人受的苦，都多得一箩筐似的！”她感叹道。

我无法解释得更多，也不想回答她的感叹。那本书里全告诉她了。

我对她说了我的打算，希望全家人都能来德国，一个也不拉。

“能帮我介绍个有钱人，可以为我家人做经济担保，让他们以旅游的名义出来吗？”

“我想想……”她思索着：“我倒有个熟人，也是台湾人。他在德国经商多年了，很有钱；我问问他看。”

当晚我们又聊了很久。她说了一些在电台工作的苦与乐，也讲了同事中的勾心斗角。尤其是个别大陆人，她看不惯他们的两面手法。

有的话想问也不好问，为什么她一直单身生活？她是个那么有自尊的人，我只是从她无意中所说的才体会到：她所以还没有男朋友，是因为她的心很高——无论是相貌、职位、风度，找不到合意的人，她是不屈就的。

“台湾人聚会很多，”她说：“尤其我在电台的职业，认识很多有钱有地位的人。我最讨厌一种人——有些年轻姑娘，特别是那些大学生，每次聚会上打扮得花枝招展，眼睛只盯住目标男人。她们自己什么本事什么才华也没有，只想找个有地位有钱的男人。”

夜里，我们每人一个床垫子，一人一间屋。我不禁感叹：她才比我小四岁，可我们却象从两个世界里出来的。如果我是她，我也可以同样过着“单身贵族”的生活啊。

次日上午，我说想回去，说好多事还要做。阿玲不解：“奇怪你为什么住不下去？急着回去干嘛？”她甚至有点不高兴：“下午还有人请咱们吃饭呢！”

“我要办的事太多了，不可能住三四天呵。”我抱歉地说：“还要收拾东西搬家呢！”

她无奈只好送我去车站.....

生活太优裕的人，是以饭局为乐的。可我生来就是受穷的命——我也习惯不了以饭局为乐。

楼里住着一位伊朗青年长颈鹿和他妹妹。他们也取得了蓝皮护照。每人一个单元住房，也都在学德语。兄妹二人一向和蔼可亲。长颈鹿听说我要搬家，说自己想挣些外快，又会开车，打算同另一位同乡，一起帮我搬家，价钱会比搬家公司便宜一半。

“搬家公司是多少呢？”

“起码四百。我们只要二百：一人一百。”

“行。”

新家具都是装拆式的，下午和晚上的时间，我就把它们细心地拆下来，用搜集来的旧报纸，一件件包好。看着不起眼的家，工作量竟是如此之大。诺拉进屋看到这纷乱的景象，说道：“德国人的谚语：‘搬三次家等于着一把火’。”

我说：“我的体会是：搬一次家就等于扒一层皮。”我那蹩脚的翻译，让她似懂非懂。

“明天我生日，你会来吗？”她问：“在我家，下午五点？我请了十几位同学，还有一对中国人夫妇。”

“祝贺你呀！我当然会去。”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德国人的家庭生日聚会。中午我去超市买了一件浅粉色的棉料短袖汗衫，估计这号码，诺拉穿着一定合身。但这汗衫总象缺点什么。我用铅笔在汗衫的左胸上，轻轻画上艺术体有如花朵般的“诺拉”的德文名字。我找出稍稍深些的浅粉色的绣花线，把它绣了起来。绣完，又用熨斗把它熨得平平。哈，生色多啦，世上独一无二的一件汗衫！

傍晚，带上包装好的汗衫和一束鲜花，换上干净的衣服，步行半小时就到她家了。花园中，五彩缤纷的花朵正遍园盛开。门上，挂着一大束鲜艳夺目的气球。窗子大敞着，传出动听的音乐声。小白狗汪汪叫着跑了过来，诺拉的母亲连呼带笑地出来迎接。

我用仅会的德语向一家人寒暄，和诺拉拥抱。她接过礼物高兴地道谢；又向我一一介绍她的十几位同学和那对北京人大学生夫妇。

看来，诺拉和她的父母是精心准备了一——铺着漂亮桌布的长桌上，摆着好几瓶大家送的鲜花。十来个大方盘里，是个个插了牙签、人人可自取的各种德国小食和水果块。冰镇和未冰的多种酒和果汁，许多干净的玻璃杯及酒杯，摆在一角。诺拉的母亲问我要喝什么，我说想喝橙汁。她忙笑容可掬地递给我；仿佛客人的手里不拿个东西，不喝着品着，就不象过生日一样。随便坐着和站着的大学生们，人人手里握着杯饮料，或是香槟，或是红酒，一堆一伙地低声聊天——就好象北京人在聚会上与合得来的人聊天时，那叽哩咕噜的方言土语，洋人谁也听不懂一样。就连那学了多年德语的北京人夫妇，又和他们是同学，围他们站着，满脸笑容可掬地竟插不进一句话

——没有德国人想去“照顾”他们，没人看他们一眼，任他们尴尬地却又象全懂了似地那么僵笑着.....我靠着墙边，品着橙汁，观赏着这幅图画。

我感到奇妙的是：虽然他二人一句也插不进去，始终是似懂非懂地僵笑着、僵站着，却不肯过来和我搭讪。他们眼角的余光，早就知道有个同胞在看着他们，可他们非要把自己放在那溶不进去的图画里，而不屑于向自己的同胞走过来。

也许，一走过来就显得他们不高雅和没有学问了？

诺拉的父亲祝贺我出版了新书，是诺拉告诉了他。诺拉的母亲问我要不要吃些什么，又对她丈夫说：“遇太太的家里可漂亮了，连诺拉和她姐姐屋里都没那么齐全；她们连自己的电视机还没有呢！”她又说，我送给她的骨项练她天天戴着，指指胸前，说因为这鱼的雕刻，正是她的星座，会带给她吉利。诺拉的父亲似听非听地品着红酒，半低着头沉思。

不见了的诺拉从楼上走下来，大家不由得转过身去，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只见她，脸上红扑扑地化了妆，带了条闪亮的金项练；穿上了我买的粉红色汗衫，姗姗含笑地望着大家，那么幸福和愉快！

大家齐声高兴地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诺拉的母亲赶忙摆上了插着许多蜡烛的大蛋糕，并把蜡烛点燃.....

在人人端个小盘吃蛋糕时，北京人夫妇走过来，男的说道：“早就听说过你。我们就是想认识你才来的。我叫马三，她叫陆七。”

“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心想：原来如此！要不是吃蛋糕堵住了嘴，你们还在那儿僵笑呢，或是一直暗自犹豫呢！

我说要去倒些水喝，将小盘小叉放在那归拢脏盘的大方盘上，用纸餐

巾擦擦嘴和手，就轻声向诺拉和她的父母告辞，说由于要搬家，许多事还等着去做。自以为谁也没注意，正想溜出去，只听身后一声：“遇大姐，等等，我们也正想走，咱们一块儿走吧！”

我只好在过道里等他们。我们出了院子，前面不远有个儿童体育场，有长凳；陆七说有事想问我，能否坐那儿说说。

正和我猜的一样，问的还是居留问题。他们上了七年大学，也结了婚，想留下来，可又幻想着能有德国公司聘请他们工作……虽然我的热情大减，可还是尽我所知的告诉了他们。我心想：七年，你们都没想申请，你们怎么解释对德国的爱？怎么解释这长长的七年为何不申请？你们从来不想想德国如何看待你们七年的犹豫？

29 长颈鹿的情人 / / 搬家

外星人：

没想到二十三岁的长颈鹿和四十五岁的列娜同居了。他说，列娜希望我去她家串门。离搬家还有四天时间，该打点的都打点了，也想让自己轻松一下，便坐上列娜的车和他们欣然前往。

壮实的长颈鹿足有一米八五高；而身材中等苗条，相貌端雅的列娜，倒
不象四十几岁的人。她是法文翻译，单身，住在一栋看上去很不错的楼里。
这单元房共三居室，有阳台。除了列娜年轻时美丽的照片挂在墙上之外，看
不出第二个人居住的痕迹。

长颈鹿自己的住处还保留着。至于他们怎么认识的，我没有好奇心去问。
我看那连被子也没整理的大软床，以及各屋里都有的被子同样不整洁的单
人床，心里划过一道闪电：德语并不好、英语法语也不会的他，和这女人，
难道只是床上关系？同样陷进莫名其妙的孤独大海里的他，只想让自己活
得高兴一点？

“随便坐，”列娜自来熟地招呼道：“想喝点什么？”

我要了水，长颈鹿要了可乐。

列娜向我们说这说那，尽管我们有大半都听不懂，但她毫不在乎，自说
自的，也不将就我们；仿佛唯有如此，才能提高我们的听力和会话水平。电
话铃响，列娜去接电话，满脸的甜蜜和愉快，说着我们根本听不懂的方言土
语式的德语，似乎且说不完.....

“星期六，”长颈鹿低声对我说：“这儿有聚会。”

我点点头，看着他。

他还想解释什么。

“嗯.....”他低了眼皮，想着如何向我解释：“嗯.....你知道吗，是.....SEX
PATY, 知道吗, SEX?”

“SEX?”我不明白地重复着，仍看着他。

“嗯.....”他做了扒衣服的动作：“脱衣服，明白吗，脱衣服？”

我点点头。他注意地看看我，或许我那一脸的无动于衷，使他觉得说得还不清楚：“有十几个人，每周末都有。”

列娜打完一个电话，又打一个。

“你会来吗？”长颈鹿问。

我摇摇头。

他们的聚会过后，星期日是晴天。列娜说要带我们去日光浴。她说有个湖，很美，说我们肯定没去过。

我刚好买了个胶皮船——在超市付了二百八十九马克，附带脚踩打气件和船桨；又买了两个气褥，不仅可在水上玩儿，还可折叠成小沙发状，支在绿草地上休息。又拿了一条大齐留下的毛毯，于是就都带了去。

刚入夏，静谧的湖边美极了。虽不是极大的湖，蓝天白云下，远处却也白帆点点。湖水深不见底，碧波荡漾；水纹在阳光下象跳动的银鱼。波光粼粼，小游鱼和湖底的石子皆清澈可见。周边全是干净密实的绿草地和树林。斑斓的野花盛开，蜜蜂嗡嗡地在花丛间採蜜。

草地上，已有十几个人或躺或坐地晒太阳，都是自带着毛毯被单、饮料和食品；男人们只穿着小三角裤叉，女人们只多了个乳罩。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对别人好奇。人人遥望着树林和天空；有的吸着烟，有的二三人打着扑克，有的不声不响地吃喝着。偶而来了新人加入，都是静悄悄找块与旁人有个距离的地方，不喧哗、安宁地自得其乐；无人大笑或大声讲话，连小孩子也如是。

我不禁想：若在中国能做到这么安静有序吗？能做到互不打扰吗？

列娜脱得与别的女人一样，平平地躺着，两脚互搭，遥望着天空出神地吸烟。她浑身的皮肤细腻光洁，阳光下呈现出淡红的浅咖啡色。或许，她正是想借机来显示她的皮肤和身材吧！她撩了我们一眼，说道：“不脱，多可惜这阳光！”

长颈鹿也脱得和别的男人一样，坐在她身边。

“你不脱？”他问我。

我含笑地摇摇头。他二人也不再看我，似乎都在各想各的心事。

在这片人中，我实在显得很象怪物——我仍穿着长袖连衣裙，不薄的连裤袜和皮鞋；没有第二个人象我一样。我的皮肤也细腻完好，也可以自豪地展示一下；我不脱，是因为不觉得今天有那么热，我生怕会受凉感冒；当然，也还有不习惯。我悄悄看了一眼列娜，她那沉思的表情中似乎有点失望。我猜，她一定希望她每周的聚会中，能有我加入——一个象她这样的虽中年却又显得很年轻的女人，而且是没有儿女丈夫牵绊的中国人，定能给聚会生色不少；尤其绝大多数的参加者，是对中国人不了解又好奇的德国人。

可我不是以性交为乐的女人呵，何况是杂交？不会生病吗？真的是其乐无穷吗？我奇怪长颈鹿为什么要溶入他们，如果他认为自己做得很对，那么他允许他妹妹参加吗？或是他没正事可干，太无聊，只有这样？他不允许他妹妹参加，甚至连说也不会对她说；他永远希望他妹妹是个纯洁的姑娘，而他却可以，因为他是个“大男人”。

我不想问也不想说什么，愣愣地看了会儿天空、白云和树林，就铺开带来的胶皮船，用脚踩那气包，踩了好几百下、近乎上千下（长颈鹿也帮着踩），累得直出汗，才把气充满；然后铺上毛毯，我上了船，就一个人划了开

去.....

当我划到湖心时，才感到波浪涌涌，涌动得让我有些不安。我停了桨，任小船漂流。周围没有其他船只和人影，只有树林、天空、白云和阳光望着我这孤零零的人、孤零零的船。我不感到有多开心。我真的象陷进了莫名其妙的孤独的大海里。我幻想，若元元来了，他是否会与我一起划船，是否会与我一起野餐，是否会与我在树林里散步，是否会习惯德国的一切.....我心里涌起无以名状的悲哀，我感到他不会——他没了“侃大山”的环境，他不喜欢这孤独和寂静。

搬家的那天终于到了。长颈鹿与他年龄相仿的伊朗同乡，开着搬家的大汽车一起来了。花了半天时间，东西都卸进了新家里。我给了每人一百马克，又多加了十块，让他们在外面吃点儿什么，那同乡先道了别。

长颈鹿说，他不饿，愿意帮我把大衣柜安装好。我高兴地又多付了他二十，他很满意；我们有条不紊地把该安装的都安好了。

已是下午三点，我说：“你该去吃饭了，谢谢你帮了大半天。”我站在窗边，擦洗着窗台和玻璃。他走过来，站在我身后，然后有意无意地靠进我；我感到他那东西硬硬地蹭着我，他灼热的呼吸和身上的热流正向我袭来。我赶紧不动声色地握着脏抹布，向厨房走去，哗哗地用水冲着抹布。

“你该去吃饭了。”我站在过道里说道：“拿着，这是汽油费。你把汽油灌满，把车交给搬家汽车公司就行了。”我把屋门开得大大的，含笑地站在门边。

他接了钱，有些不好意思地道了别。

我转身进屋，锁上屋门，继续收拾着屋子。

30 突然出现的大侦探福尔摩斯

外星人：

花了两天工夫，才把新家收拾擦洗和打理好了。又去超市和有名的大商店及画店，买了很漂亮的带白流苏的白色透花窗帘，象德国许多窗子那样把帘的两边拢开一半，让流苏更美的呈现。窗台正中摆上民间复古味儿的手制艺术花瓶，插满象真花一样的迎春花和小白铃花。两幅复制的法国名画家 **CLAUDE MONET** 的风景画，挂在沙发和圆玻璃茶几的上方。茶几上是可放音乐的收音机和茶具。带大镜子的大衣柜对面雪白的墙壁上，正中挂一长轴细竹丝中国古代山水画，左右是两横幅一开纸大，压在全玻璃板画挂里的写意泼墨山水，那是出国前老同学宝珠特意为我画的。又去家具店买了一张写字台和转椅，摆在窗前；沙发斜对面的小柜上，放着二十四吋彩色电视机；机上是一块尺寸正好、颜色协调、带花边的小台布，上面摆着轻巧细致的工艺美术品；地上铺着双层地毯；左墙角下摆了一盆绿叶植物——这间临街的房子，即刻变成了明亮雅致漂亮的客厅兼写作间。

没有书架，我不喜欢摆书。我一向买书不多——《红楼梦》、《古拉格群岛》……过去都是借书看。我带来的书很少，就算有几十本好书和《辞海》、《词典》，我也不喜欢摆在外面，大概很少有人象我这样。

厨房很大。这间屋不临街，窗外是楼的后院，种着几棵丁香树和花草。我也把这大窗子挂上了雪白漂亮的新窗帘。

屋的一角是一平米的半透明拉开门淋浴间，紧挨着洗池柜、自己买的立式电烤炉和洗衣机。还有很大空间放了圆桌和四把椅子。夜里睡觉就把床垫平放，白天就立在门后。看着空空的雪白的墙壁，又去买了几个玻璃画框，因手里有一些从年历上搜集来的民间手工绘画：一月份到十二月份德国人的生活民俗画。这些小画令我爱不释手，百倍地胜过爱客厅的画——春夏秋冬四季，典型的德国人和家庭生活——那庭院的花，那开满花的各种果树，那院里院外的人们在做什么；小街上、田野里、湖泊上、广场上、各个季节人们在忙什么、玩儿什么；以及周末出游、过生日、散步、喝咖啡、家庭派对、农村与果园的收获季节、迷人的圣诞节市场……种种民俗风情以及人们日常的生活，都被那些只以业余绘画为乐的民间画家们，将它们生动地跃然在纸上……我真希望这些小画伴随我一直到死的那天！

我爱这些小画，是因为它们太真实、太质朴——不管是穷人富人，都是这么生活的，而不是少数人的。哪怕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也要散步和喝咖啡，他也有住处和不挨饿，他也要逛周末市场和圣诞市场的；他每天也是走在这画中的，他每天也会看见画中的一切。因为德国本身就是个没有墙、让人人一目了然的大花园。

我永远看不够它们。我幻想，何时中国也会有这些民俗风情小画的年历，

每年摆在银行和药房的门边，让人人不花钱地领取呢？

当我把一切布置完毕，自己欣赏了又欣赏，这才觉得真正有个家了。

无论我住在何处，都把整洁和美视为第一位。屋子是人的第一个朋友、第一个情人；是人的避难所和享受之乡。你为它的整洁和美付出多少，它就给你多少回报。

虽然比起北京的家，这个家小多了，可它足够两个人住的。

大衣柜里，有给元元买的五件新汗衫、三件毛衣、两双袜子、裤叉、背心和三条毛料裤子。

阿玲介绍了一位台商，人称“老侨”；侨太已打来了电话，欢迎我去她家小住几天。下一步，就是要给他们办经济担保了。

傍晚，当想看电视时，才发现什么画面也看不清。我下楼去问努太太，她开了三分之一的门，堵在门边，绷着脸直视着我说道：“因为没有天线。”

“您不是说有吗？”

“我没说有。”她有些不高兴：“天线都是自己买。”

“我该买什么样的天线？要多少钱？”

“不知道。你可以问问你旁边的瓦玛，以前那大学生就是和她公用的。”她似乎不想再多说，我知趣地说了声“谢谢”就上了楼；心想：她不诚实，转脸就不认账了。

当按了瓦玛的门铃之后，瓦玛和她的女友丽莎热诚地请我屋里坐。两人都有四十来岁；寒暄几句之后，瓦玛带我各屋看了看，丽莎仍去厨房准备晚饭。短发、朴素大方的瓦玛比我高出半个头，爽快精炼中有股子男人气。

而丽莎话不多,沉默不语中显得有些忧郁。这单元是二室一厅,德国人把厨房不算“室”,只称为“厨房”。厨房外面还有个阳台,有只小花猫正想进屋。

“它是我们唯一的孩子,”瓦玛笑道。

我用半生不熟的德语对她说了电视的事。

“我去你屋里看看,”瓦玛说道。

她进来眼睛一亮,说没想到我布置得这么好,然后说道:“我有天线,是我弟弟花了一天时间上了房顶帮我安上的,这天线可以两家合用。当初我是花二百马克买的。”

“那我给你一百好吗?也请你弟弟帮我安上?”

“行。把这墙穿个洞,电线捅过去。我弟弟会来的。”

次日中午,诺拉和她母亲,又一次突然袭击式地拜访。刚一进屋,就睁大了眼睛:“好漂亮啊,美极啦!”

“我女儿屋里都没你的好哇!”她母亲又一次地感叹。

我心想:我毕竟不是大学生呵,我是结了婚的有家的人哪。比起有家的人,我这可算什么好呵?不是连你们家的二十分之一也比不了吗?

下午有人敲门,一开门吓我一跳——一位三十来岁瘦削的德国男子,浑身是一身漆黑的打扮:黑裤、黑紧身棉布礼服、黑高帽;那又硬又直又圆的带沿高帽,活象是英国电影里的大侦探福尔摩斯。

“您找谁?”

他满面含笑地用手指指屋里,说着我不大懂的方言德语,偏要挤进来;

我纳闷地看着他熟稔地直奔厨房。他找了把椅子登上洗水池，立即检查安在墙上的那个不大的暖气设施。他用什么家什捅了捅，又用块黑布擦了擦，没两分钟就下来了；又从黑背包里掏出个黑皮本子，打开，写了什么，向我说道：“九十马克。”

“九十马克？”简直令我莫名其妙！

“九十马克。”他用笔点点那本子，似乎我应该立即交钱签字。

我不懂这是什么钱，摇摇头。

“九十马克。”

我还是摇摇头。

“等着，”他说完就出屋下楼。不大工夫，他和努太太一起上来并进了屋。

“遇太太，”努太太认真地盯住我，慢慢地说道：“每年检查一次，每家都要交钱。如果你不交，如果你这暖气坏了的话，你要被罚款九百马克，知道了吗？”

31 停发生活费 / / 做了经济担保又撤保

外星人：

次日我在屋门前，遇到刚从工厂下了班、正上楼梯的瓦玛，问她那黑衣人是怎么回事？她告诉了我，我才明白这黑衣人是德国的通烟囱人，他们都来自南部外省农村，一色的年轻农民，一色的归定样式的黑衣黑帽；他们每年用此来挣外快。她说他们的方言土语，连她这在德国出生的人，也往往听不懂。

我问她是否也交了钱，她忙探身看看楼下，轻声说：“最好去你屋里说。”我们进了屋，各自坐在沙发上。她说她每年要交九十马克；她对努太太很不满意，说交的杂费太多，暖气费算的也太贵；又说每年还涨房租，说这是违反房租合约——因为合约上没写。

“还涨房租？”

“当然，”她冷笑道：“我都住了八年了。每年要涨百分之八。我已经给『房屋管理委员会』写过信，不止一次地反映过；他们给她去了信，但努太太不仅不以为然，还冲我叫嚷：‘你不想住，你可以搬走！’”

“那你为什么不搬呢？”

“问题是，找好的、安静的房子，不容易呀！”

“也会给我涨房租吗？”

“谁知道？住到一年你就知道了。”

我心想，怪不得女大学生三年就走了。

“那……”我问道：“其他两家也涨房租吗？”

“只一家不涨——我们下面这家，沸丝先生。”

“为什么？”

“这老头以前在这条街做了三十五年片警。努太太以前在楼下的店铺卖

香肠，她和沸丝夫妇亲如一家。二战时，这条街的房子都被炸了，很多人家盖不起房子，就由国家付一半，房主付一半；但这样的房子，国家规定不许高房租。沸丝夫妇租了下面整层，定的是死合约。”

“什么叫死合约？”

“就是不许涨房租的合约。甚至还给他家安上了新窗户——是四周带胶皮的双层玻璃；你看我们的窗子都是老的，单层玻璃，不隔音又不隔寒的。”

“所以报纸上我们的租金很便宜，可是住进来就贵了。”

瓦玛笑了：“老奸巨猾呗！”——我猜她说的就是这句话。

她一面说着，头却离我越来越近，态度也越来越亲昵；她的头发几乎蹭着我的头发，我不由往后直直身子；可她还是一边说，一边全神贯注地看着我的眼睛，探身往前凑。那两只大眼睛一眨不眨，就象两湖兰色的池塘，要把我淹进去似的。

“你想喝点儿什么？”我忙站起来，去小过道打开冰箱：“要喝苹果汁吗？”

晚上临睡前，冲了热水淋浴，躺在舒服的床垫上，回想瓦玛那一个劲儿向我凑的神情；再回想她的打扮、说话、作派、肯定她是个同性恋无疑了。那么丽莎是她的女伴了，既然如此，怎么还三心二意？总是感到十分忧郁的丽莎，难道因为这个——因为她见一个爱一个？

我再不敢让瓦玛轻易进我的屋子。次日下午她刚一下班，我猜，在德国饭店做帮厨的丽莎还没回来，她就敲我的房门了。

我把门开了小小一条缝儿，堵在门边。

“什么事?”

“我进去跟你说。”

“不，你就说吧。”

“嗯.....能借我一卷卫生纸吗? 我忘了买了。”

“好。” 我关了门又开了门给她。

“谢谢。”她看着手里的卷纸，似乎因出乎意料和尴尬，却又还想说什么。

“不谢。” 我客气地赶紧把门轻轻关上。

第二天她又来借鸡蛋。我只好说：“我也忘了买鸡蛋了。”

这天接到“社会局”的来信，约我去谈话。

“听说你出版了一本书?”那三十多岁的德国女公务员问。

“是呵。”

“有没有收入?”

“没有。”

“听说你的书有好几种外文版，是吗?”

“是。可是没有分文收入。”

“你要拿出证据来。”

“这样吧，我把它们的出版社地址、电话、写了都交给您，您自己问吧。”

她沉默不语。

“嗯。你德语学了有一年以上了。我们发你的生活费到下月底为止，就

不再发了。你应当自己去找工作。”

“我上哪儿去找?”

“那就不是我们的事了。”她让我在那纸上签了字——我同意不再发我生活费的档案记录。

多年后，我曾经在博克上发表过一篇小文——

十二本书的作者收入

遇罗锦

您看到这张照片了吗？作者美滋滋地与她的十二本书的合影？您以为总该会有些书的稿费或版税吧？让我一本本地告诉您。

1. 1983 年，香港一家「远方出版社」出版了《春天的童话》，托一香港熟人给我捎来两本书。我问来人，怎么没有书的稿费？来说：“在香港出书，都得自己交钱，你不交钱已属万幸，还问稿费？”

当时自己半信半疑，只好不再问；

2. 1985 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冬天的童话》单行本。其中包括了写哥哥遇罗克的报告文学中篇《乾坤特重我头轻》。书正在印刷厂排字时，我于 1986 年 2 月出国，于 3 月份政治庇护。书刚印出来就被禁销了，自然是分文无有，只得了几十本书。出版社和该书编辑还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深刻检查；

3. 德文版《冬天的童话》，因我政治庇护，邀请我出国又亲共的华侨出版人宣布不再出版，并以此和我划清界限绝交。他早先为这书给过我五百马克，

谢天谢地;

4. 英文版《冬天的童话》是由香港沙田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当时作者正在国内受「精神污染」的批判。该大学的白杰明先生(中国通)来找我,让我在合约上签字。我没学过英文,一句也看不懂;再问,他就不耐烦了。没看明白就草草签了字;

几年之后,我在德国,去信给该大学,第一次要版税。去了四封挂号信,一位在出版部负责的中国女士态度十分凶恶地回了信,只邮寄来一张二十五马克的支票,说这就是好几年的版税。我去德国银行,交手续费是十五马克,四封信的邮资超出了十五马克,等于还倒赔。一想那大学都是中共在控制,再也不想要。而直到今天,他们还在网上大做宣传和广告出售这本书,十五美元一本,说这七万字的英文版与 42 万字的《一个大童话》没有区别。他们只希望人们去买中共承认的这英文本《冬天的童话》,千万别买中文的《一个大童话》;

5、6. 法文版《冬》和《春》。外文版都是只有版税没有稿费。住在巴黎的两位译者,一位台湾人因自己有好工作、好收入,从一开始就说不要分文;另一位法国人是常年失业,而我的版税都由出版社汇到他的帐号上,再由他给我。可他来回搬家,找他一回费老牛劲,最后只好放弃、不再伤神;

7. 1986 年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文评论集《遇罗锦》,因我的政治庇护一事,他们连说失望又说受到了中共的巨大压力,书刚印出就宣布不再出版。他们邮寄了二千美元一次性的“道歉费”;

8、9. 1987 年日文版的《冬》和《春》。老板来信说他是赔钱出书的理想主义者..... 我深信不疑。别说提钱,连感谢都来不及;

10. 芬兰版《冬》。不知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他们是按照英文版翻译的，按他们与「香港中文大学」订的合约，必须把作者的版税先寄给该大学，由该大学给我。可「香港中文大学」从来没给过我。我去信，也没人理睬。后来也是不想再伤神了；

11、12. 1987 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了《爱的呼唤》，说可以一字不删，但无分文稿费。我同意，但我并没说不要版税。他们在两年内，卖了三版，是两种封面设计，一共给了我六十本赠书(每版赠二十本)。我去信要版税，没人理睬。1989 年他们在中共的压力下宣布不再出版。二十年之后我做了大量的增删，恢复了原名《一个大童话》。

十二本书全部交代完毕，还有三本书不在这照片里。

到了 2009 年时，作者可真的是进步了——知道在海外不交钱出书等于是“天方夜谭”或“受宠若惊”了(会用英文、外文的写作者除外)。尤其是电脑互连网对出版界的冲击，使报刊杂志书籍等出版业，生存确实艰难。

2009 年 1 月，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了 43 万字的自传小说《一个大童话》，作者是主动而又甘心情愿地交了钱的。为了支持他们，也是主动不要版税，只想要五十本书。

2010 年 3 月，台北「允晨文化」决定出版《童话中的一地书》，以及 2010 年 8 月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了有我的剧本在内的《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作者也是主动不要稿费和版税的。倒不是作者有钱和大方，一是作者在海外真的知道不交钱出书该谢天谢地了；二是作者现在失业，不敢犯“不准有收入”的法了。

二十三年没电脑的作者“出土”之后，一问别的作家，竟与我情况相似的大

有人在。绝大多数海外作家都穷咧咧。这才明白，老共为啥那么容易地能收买海外国人了。

写于2010.9.

还有一个半月，就必须自己去挣钱了。这一个半月我是自由的。我得赶紧去老侨家，把北京那边的经济担保做好啊。

太远了，来回快车火车票就五百马克(若坐慢车，得倒五次车，天黑才能到达)。我打算去住一星期，无论如何得和他们全家搞好关系，希望他们能办成六口人的经济担保。

我一共还有二千五百马克现金。回来之后，还要去看看几次来信催我去的红。我带上一本《爱的呼唤》、一本英文版和两本日文版的《冬天的童话》、《春天的童话》。根据阿玲介绍的老侨的个头，去商场给他买了两件不便宜的汗衫及丝绸领带，以及在北京买的仿蛇皮女式背包、两块苏州锦缎机器绣花台布、两条颜色雅致的丝绸头巾、三条牛角和骨制项练和手镯。侨太在电话里提过，她抱养了一儿一女，现都在上小学，于是又买了两大盒上好的巧克力，及小孩子喜欢的一些小礼物等等。

快车要开六个小时。德国的火车永远不拥挤，干净、整洁、舒适；分吸烟和不吸烟两种车厢。我坐在靠背椅上眯眼休息，琢磨着诺拉的父母，对我这“难民”生活之“好”，心里一直不平衡。在他们看来，我就应该破衣烂衫，家里除了一个破旧床垫之外，什么也不该有才对。或者说，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别人施舍的，而不是自己买的才对。她们当我面是热情洋溢满面春

风，私下里一家人却是另外的语言；否则社会局怎么会了如指掌？按德国人习惯，去人家之前一定要打电话，可这母女俩回回都是突然袭击。下次若再突然袭击，我绝不开门。对，我应该给她们写一个明信片，告诉她们来前应先打电话，其他的话什么也不写。

想想交一个朋友何其之难，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年轻漂亮的侨太，开着她的高级大轿车来火车站接我。外星人，我不想详细说经过的一切了——那热情的相见，那阔气的大别墅，那极大的花园，那讲究昂贵的家具，那很好相处的一家人……总之，他们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阿铃的托付，住到第四天，老侨夫妇自己就提出来了。

“明天我们可以去办担保，”侨太说：“你要办几个人？”

“六个。”

“这么多？”

“办一次也是办。不如把他们都办来了，也省得老惦记他们。”

由于事先便讲好：只要他们一到，就全体住在我家，侨夫妇就撤保，不会再给他们添麻烦。

“哪六个？”侨太准备写在纸上。

“我丈夫吴范军；大弟弟罗文离了婚，他和他七岁的儿子；二弟弟罗勉和他太太，还有个六岁的女儿。”

“北京一个不留？”

“一个不留。他们都想出来，真的。”

“他们一来就会政治庇护？”

“会的，肯定会。”

“是呀，” 侨太说道：“有德国管吃管住管学习、管医疗保险，要是不申请也太傻了。你帮我把这六个人的姓名地址写清楚，明天我们就去律师事务所，办完就用挂号寄出。”

当挂号信寄出之后，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了地！

我心里说：再见了、永别了，中国！希望你们六口人全都象我一样，永远地和中国再见、永别！再也不要留恋它，我们受的罪还不够吗？！

侨太边开着车，边说道：“今天是老侨大女儿生日，他每年必去，两个小的今天也去。就咱俩吃晚饭。天还早，我请你去一家有名的德国馆子，尝尝他们有名的套餐。你吃过吗？”

“没有呵。”

乘着她的高级轿车，来到山上一家装修别具一格的德国餐厅，临窗的座位，俯瞰着全市最美的景色。

“这儿没一个中国人，客人又少，咱俩正好聊天儿，” 她说。

红酒、浓汤、沙拉、烤鱼、土豆泥……菜一道道的上。

我好奇地问道：“为什么你不去他女儿家呢？”

“为什么，” 她说：“她恨我恨得要死哪。”

“就因为老侨为了你和她母亲离了婚？”

“那还用说？我比他女儿才大两岁。我和老侨，在台北一个朋友家的聚会上，一见钟情。他和他太太早就没感情了，能怪我的出现吗？”

“那倒是。感情是无法勉强的。”

“可他女儿不这么想。她认为我破坏了她的家。我和老侨结婚典礼时，她不来，她爸爸怎么求她，她硬是不来。她很少来我们家的。”

“我见她来过呀。”

“那不就是跟她爸爸要钱吗？要完钱，扭脸不就走人了吗？看看她，大学上完了还要念博士，想念到三十几岁？你看她来，理我吗？别说不会叫我‘妈’，理都不理哪！”

“老侨也该说说她嘛。”

“他？他爱她象掌上明珠。一月给她两千马克啊，你以为？一到放假，还得多要——要和德国男朋友出去玩儿了。老侨这点产业不是容易来的，三十多年前，他在德国靠摆地摊起家呀。有了钱，他搞小批量的买卖，越做越大；后来多少人向他借钱开饭店，吃利息，慢慢有了资本嘛。他太太回台北了，不再来德国了。可他女儿恨死我，我怎么办？”

红酒让她脸上泛起了红晕，她要了一杯矿泉水。

“你能怎么办呢？”

“所以我抱养了两个孩子，在台北孤儿院要的。我们去德国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所以不孕，是老侨的问题。他理亏，我坚持要领养孩子，他只好同意。现在他很爱这两个小的，你看他俩和我好亲哦！”

“和亲生的一样。”

“是嘛。可他女儿气死喽！气得有苦说不出噢！”

“财产将来一分为三，不能全归她啦。”

“还不仅是财产。她看那两个小的跟我那么好，她先就要气死了。”

火车飞速地向家驰去.....想着我所体会的一切：老侨比她大三十岁，又胖又丑又没文化——仅上过小学五年。而她在美国大学中文系毕业又是硕士。如果老侨没有钱，她会对他一见钟情？她的一切温柔体贴，她的亲吻和甜言蜜语，她对两个小孩子的操心和抚养，都只为抓住他的心——累不累啊？

回到家，乍一见六天未见的可爱的屋子，舒服地往沙发上一坐，环顾着屋里的一切，感到是那么亲切温暖，犹如坐在亲人的怀抱中。心里沉重的责任感总算解决了！在中国受了大半辈子罪，出来、六口人都一起出来吧！再也不要回去，那让我们受够了罪的黄土地！

回想出国之前，不来我家的父亲和弟弟两家人，突然笑咪咪地全驾到了；那时母亲已去世好几年了。罗勉拿出他已经打成了英文字个人履历，托我为他去大学报名。我也去问过，但他的年龄太大，三十六岁，德国大学不欢迎了，何况学历也不够。除了以旅游身份来，没有别的办法；而且这也是最好最快的解决居留的办法。

到家马上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办理的是多么完满，并一再嘱咐来时千万买些象样的礼品，感谢老侨夫妇。为了万无一失，将担保书的拷贝件，也分别寄给了他们。尤其封封信上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说服范军，一定要和他一起来！

元元从来没说过他不想来，但也从来没说过他想来。正因此，我才一封又一封信地对俩弟弟拜托又拜托，不惜车箍轱话来回说。

为何如此？恰因他们并不喜欢范军，因为范军支持我的“实话文学”。而那两家人最反对、最讨厌的就是我的“实话文学”。他们所以十几年不与

我来往，正因如此。他们认为我挨中共报刊批判，全是自找。他们看不到我作品的一丝一毫的正面意义，相反，他们觉得我只给全家人带来了坏影响。

多封信发出之后，竟如石沉大海。怎么全跟老咪兔一样不吞不吐？盼星星盼月亮，罗文的信终于来了：“姐姐，我已经办好了我和儿子的出国签证。范军不想出来，我问了他。我也没办法。德国大使馆说：如果我和儿子准时回国，罗勉一家才能出来。你需要什么东西？我好带去。”

怎么，这就是我千叮咛万嘱咐的所有的回答？费了老大牛劲，只是给罗文和他那小儿子办的？他们可知道元元在我心里的位置、他的重量、他的重要？罗文和他儿子不可能回去，则罗勉一家也出不来，就连元元也同样出不来。我还有钱和精力再去给谁办吗？我说话就得去饭店打工、去洗碗洗杯子，或削土豆，打杂，不知会做什么；而罗文还带个小孩子，他连个洗碗工都难找——谁给你看孩子，我？我这再不想要孩子、也不想看孩子、也要去打工的人？谁事先问过我呢？我去了那么多信，谁对我说过什么呢？一个字也没有！我所以想把他两家人一起办出来，是想着他兄弟二人在工作上的密切合作，拆开总不好。何况，罗勉的太太送女儿去学校，也就把罗文的儿子一起带去了；而现在计划全打乱了。

再说，他们两家现在是什么样的生活状况？——都买了房、汽车、都有不少存款。国内的工资已不是我出国前的每月几十元，随着物价的普涨，渐渐地向广州、上海市看齐，城市工资由几十、几百变成上千。如今有人给他们出资，每月他们有很不低的工资，还有厂房、大办公室。每月还有奖金及各种名目的这金那金，年底还分红。他二人不忙不累地一心搞新产品设计。

他俩都在电视教学的设计专业毕了业。罗勉有个出奇的大脑袋，他只会想(设计)、不会做；罗文是只会做、不会想；二人合作得天衣无缝。出资的人不出头，却由他俩说了算；中午还有大师傅做饭，下午回家有小保姆伺候。罗勉太太在大剧院办公室工作，她的工资是丈夫的两倍。由于过得开心，她一下班就去跳交谊舞，罗勉一有空就下围棋。罗文每到周末，便去他买下的农村小院享清福。国内开始修建汽车高速公路，他们的节假日也比以前多，经常开车去很远的名胜地区旅游，去了泰国又去海南岛……

原计划是六口全来，我心底仍是希望大家互相合作、互相照顾，一锤子砸定在这里，不再回头；只要团结，总能成功什么。尽管他们的学历，德国不认可；尽管他们的年龄，在这儿上不了大学；尽管我在国内的生活经历，和两个弟弟伤透了心。但只要他们俩在一起也是好的啊！可现在，连这个心愿也完了，等于我楞把他们拆开了——若罗文走了，罗勉也完了，那工厂就得散摊子，罗勉就得失业。

如果他们有其他的能力和志向也是好的——文笔好，书读得多，有独特的见解，能写文章，口才好，能用笔和嘴去揭露虚伪和黑暗，或能写出传世之作，但也没有可能。他们既无这本事，也无此志向。他们不仅自己无此志向，对儿女也不正面启发和教育。和绝大多数父母一样，他们只希望儿女平平安安，长大只去钻研业务，忘记我们过去所受的罪，对过去的事绝口不提。他们两家人都变成了典型的顺民。而对于不想象他们一样的姐姐，他们的表现就是十几年不和我来往。

如今罗文急匆匆地出国，只是想发财，以为西欧遍地是黄金。他顶多给元元打了个电话，根本没劝他，想的只是他自己；连罗勉今后怎么样，他都

不管不顾。

我给侨太打电话，把我以上的想法，都告诉了她。

“这不是过河拆桥吗，”她说：“要是你同意，干脆把保撤了算了。”

“撤了吧。”

一整天我怏怏地打不起精神。想想为这担保，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和钱财，所为何来？

为什么元元不来，还用人劝？！

再想想国内的人，总以为海外遍地是黄金，海外的人们应承担很大的责任——人人报喜不报忧，回回寄的照片都是笑咪咪、显得年轻又漂亮；而困苦、孤独和艰难，谁也看不出也不知道。且回国探亲的人几乎都在胡吹炫耀，中共的宣传又人人不信，造成海外定是天堂的迷信。

没两天，罗文来了封怒气冲冲的信，说给他带来多大的损失；责备道：“为什么你的弟弟就没有你丈夫重要？”

我把弟弟们视为最重要的日子已过去了——那一切都写在了《一个大童话》里。当你们把别人的心伤透，你们还不明所以，那又怪谁呢？

我更加断定他们没去劝元元——当我一封封信拜托他们去劝他时，他们已经生了气，尤其是罗文。

32 红的故事（一）

外星人：

红起码来了四封信盼着我去。尽管我们素不相识，可她对我的热诚和毫无保留，象块磁石一样地吸引着我。

给她打了电话，买了来回火车票，想在她那儿住几天。

到达她住的小镇时，天已擦黑。正象她说的——出火车站往右边的唯一那条街，一直走，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再往左一拐就会看到她家门牌。

小镇寂静异常，街上没有人走动，似乎人人坐在家里舒服地享受着。而我怀着一颗游子的心，想听一个曲折的故事，想交一个朋友才来到这里……

当她应着铃声开了门时，她的第一句话是：“你果然很漂亮！”

“你也很漂亮呵！”

其实，我们不知说什么来作开场白罢了。既然我们通过好几封信，此时见面自来熟，也就理所当然。真地相了见时，我不知她怎么想，起码在我心里，她比起照片上的相貌，可是老多了。

进了客厅，我把带来的小礼物送给她，其中一个是我画的水彩风景画——她电话里特意要的。

“不错嘛，”她说：“我明天就买个画框，挂在客厅里。”

“我多年不画了，手很生。画画儿老得练才行，我早就放弃了。”

“你就写吧， 写比画更有意义。” 她这话让我很舒服。

这是两家合一的半栋三层楼房。家具摆设很朴素、很一般。我们坐在客厅里寒暄了几句，她便去沏茶拿糖果和点心；又带我楼上楼下地各屋参观，都看完了又回到客厅聊天。比起老侨家的明亮和讲究，她家差远了。但比起租房住的人家，她又算强的。我坐在单人沙发上，又一次地仔细环顾四周，总觉得这家里，无论是四壁、家具和摆设，给人的感觉都是阴沉沉的。

“你真的不饿？” 她又一次问我。

“真的。我在火车上吃得很饱了，有好饭明天再吃吧。”

“那你尝块点心吧，这是我烤的蛋糕。”

“那好，倒要尝尝。”

我们舒舒服服地品着茶，吃着点心，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

“你先生呢？”

“去参加他儿子婚礼了，后天才回来。我所以约你今天来，不就为了他不在，咱俩好聊天儿吗！”

“婚礼是大事，你怎么不去？”

“我和他那三个大儿大女一点儿感情都没有，再说他前妻也去，我上那儿干嘛去？”

“倒也是.....”

“蛋糕味道怎么样？我的手艺还行吧？”

“还真不错.....你真希望我把你的事写在书里，或是文章里？”

“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写？”

“我要是能，还希望你写吗？”

“既然你那么想说，我倒很想听听。”

“唉！”她叹口气道：“我这半生，都是小说。”她沉默了片刻，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拽了个软靠枕塞在腰后：“我是南京人，生于一九五二年。父亲五零年时被镇压，无非以前是个国民党小军官，那冤枉就甭提啦。我母亲是工厂的普通工人，为了三个孩子，又结了婚，继父是小学教师，待我们还行。好日子不长，文革一来，他被‘红五类’学生们打得死去活来，我和哥哥姐姐都得去插队。我去了建设兵团，一去十年。那滋味儿你也知道。千方百计的，办病退终于回了城。先是在我妈工厂当临时工，后来国内‘改革开放’，有了旅行社；我会一点儿英语，托人走后门儿，这才进了旅行团当导游，总比在工厂好多了。”

她给我的茶杯斟满了茶，自己也慢慢地品着。

“我给外国人当导游，认识了一个德国人。这个人很有名——他在好多国家都上过报纸，在电视上也常露面。你知道外号叫‘飞腿’的骑自行车大王吗？”

“不知道。”

“是了，正是你出国的第二年，1987年，他才上了中央电视台的。他骑着自行车旅游全世界。由于他是有名的新闻人物，无论到哪儿，他都拿出一堆报纸——和好多电视台及大人物的合影。所以他到哪儿吃哪儿，到哪儿住哪儿，老有人乐意招待他、采访他，他也就越来越有名。”

“采访他，给他钱吗？”

“当然有，还不少呢！”

“他叫什么呢?”

“我也懒得说他名字,就叫他老飞吧。他比我大十岁,身强力壮的。总之,我想出国;他还没结过婚,看上了我。我们同居了两个月,在我父母家。他很满意,办了结婚登记,我就和他来德国了。”

“他住哪儿?”

“是呵,按他说的,他有房有院儿的,应该去他家呀。可他随便地找了一个很便宜的小客栈。那小屋只是两个单人床,连个卫生间都没有。开头两天,他吱吱唔唔,后来说实话了:原来他没家。他说我要家干什么,到哪儿哪儿是我的家;他说以后可以租个房子,成个家还不容易?我生气干嘛跟我说谎呢?他说,难道你是为了房和钱才跟我结婚的?”

“我不明白,”我插话道:“你说你只会一点儿英语,又不会德语;他又不会中文,你们怎么能沟通呢?”

“又不是讨论文学、哲学,怎么也能沟通——不明白就比划,再不明白就画画儿。反正,我虽然生气,也只有忍了吧。天冷了,我没带毛衣,原以为到了德国,他会给我买不少新衣服。我说你给我买件毛衣吧,他楞舍不得,还要天天晚上跟你干那事儿,烦不烦吧!尤其晚上,他得喝两瓶啤酒,满嘴酒气,真烦死我!还有哪,他根本没工作过,就是个失业的。骑车旅行,不过是他的爱好;又没真正学过什么,父母也是穷人;过去吹的全是瞎话。于是,我逃跑了。”

“逃了?”

“不逃,什么时候到头?”

“可你往哪儿逃?”

“反正,我口袋里还有路费。上了火车,就一直往南下了,从北边儿一直到南边儿。到了有名的 MO 市。反正市中心都有中国餐馆,找了家饭店,等着中午,老板跑堂他们吃饭的时候,一进门儿,就给老板跪下了。我哭着说,我是想找口饭吃的,让我干什么都行.....”

“老板留下你了?”

“留下了。先是在厨房里削葱头、打杂、擦厕所、什么都干,工资才四百马克。后来在前面做水巴,由六百慢慢涨到八百。可别的饭店都是一千四、一千五,我只好跳槽。跳了两家饭店,最后成了跑堂,一月两千二了,还有一千的小费;钱也攒下了。”

“可老飞那边呢?”

“他出动警察满处找我,还公开到报纸上,楞说我吭骗钱财!睁眼说瞎话!我这边只好提出离婚。可我离了婚,就得回中国,我并不想回去呀!由于老去邮局发信,就和一个在柜台工作的公务员认识了,一心只想和他交上朋友。就在我们关系有了进展的时候,有一天正是周末,客人很多,忙得不亦乐乎;老板悄悄告诉我:‘看见那边一个人坐着吃饭的、秃了头的人吗?他就是律师。你离婚的事不如问问他,和他说说。’我和汉兹就这么认识了。”

33 红的故事（二）

“我们在一起同居了三个月。我也辞了工作，和那个邮局的自然吹了。汉兹帮我把婚离了。老飞什么便宜也没得着，我也不想跟他较劲儿。这三个月，汉兹相当满意，架不住我天天换着样儿地给他做饭哪，他哪儿享受过这个呀！他和他太太早就离了婚；他那德国太太整天只是打扮跳舞，整天就是花钱。汉兹是房地产商兼律师，就算有钱，他太太那么花，他也心疼；何况他太太又有了外遇！现在她这位丈夫，比汉兹还有钱呢。可当初离婚的时候，他太太少一个子儿也不干——三个儿女她得有抚养权；一座大房子她得要；汉兹得月月付他们生活费。直到她结了婚，她的生活费，汉兹是不付了，可是三个儿女，汉兹要付到他们大学毕业，现在都还上着大学呢。”

“他负担也够重的。”

“哈，你知道他女秘书挣多少？一周五天，一天七个小时，还不算度假和圣诞双工资，还得上各种保险，一个月净工资两千八百马克！”

她取来一袋五香瓜子，说这是她继父新近从南京寄来的。

“嗑瓜子，喝香茶，才好聊天儿。”她给我盛了一小碟：“一个秘书两千八。可我呢，结婚以后，天天要打扫七八间屋子，三个卫生间，买菜做饭，陪他睡觉，周末还得穿上旗袍戴上项练，陪他去饭店吃顿饭，他才好看；种种义务我都尽到，他的清洁工也省了，可我每月什么零花钱也没有。”

“分文没有？”

“分文没有。”

“是吧，你也难以相信吧！”她闲慢地嗑着瓜子，语调是那么平静：“他

每月给我八百马克，包括我们所有的花销。甚至有时候他请人来家里吃饭，让我露一手；我做一桌子菜，也在这八百之内。他每天晚饭，还要喝一瓶从固定小店买的新鲜啤酒，也在这八百之内。一句话：我要不节约，这八百未必够。我的零花由哪儿出？”

“他怎么说呢？”

“他说：你用不着零花钱，你有吃有喝有住。我死了，这房子，我的钱都是你的，你还要什么？我说：你的钱有多少，我既不知道，也取不出来。难道等你死了我才好过些？我每天工作这么多，为什么你的秘书挣那么多，我就该一分没有？他说：难道你只是为了钱才和我结婚？说也说不通，就吵；吵了一次，两次，三次，吵得我也不想做饭，不想买菜，也不收拾屋子，也不和他睡觉。他就去外面吃，僵持了好些天，他一点儿也不自省。我越想越伤心，心想自己的命怎就这么苦，真的不想活了。周末一天下午，没人在家，我在厨房的饭桌上写了一个条子：‘我不想活了，我帐号上有三千马克，是我以前打工挣的，请寄给我南京的侄子。’签了名，写上日期，就着桔汁，吃了一整瓶安眠药……”

“你真自杀啦？！”

“真的。”她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两眼暗淡无光，声音也衰弱了：“真不想活的话，就没别的念头了。我真地死过去了。可巧这天，汉兹把他和一个朋友的约会忘得一干二净——他的朋友来了，按了半天铃，奇怪怎么没人开；扒厨房窗户一看，一眼见我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急忙给汉兹打手机，他才赶回来。”

“叫急救车？”

“是呵，本该叫急救车的，可他不敢。”

“为什么？多耽误事！”

“他在这小镇名声太大，怕传出去。他急忙给一个医生朋友打电话，求他带着仪器来帮忙。医生不在家，他太太又想方设法找到他，这才赶到。”

我深深叹了口气。

“唉！那灌肠的滋味儿，大姐，我如今一想起来头皮都发麻。给我折腾得死去活来呀！迷迷糊糊中，我听见他一边哭，一边说：‘我哪儿做错了？我哪儿做的不好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唉！我哪儿有一点儿力气，哪有一点儿心思去和他争辩？”

“他一直不认为他做得不对？”

她摇摇头：“我整整躺了半个月——不吃、不喝、不说、不动。那半个月，我真觉得不对劲儿了。有天跟我说：‘从下月起，我每月给你三百马克零用钱，你看好吗？’我懒得理他。我琢磨着，谁也指不上，只能靠自己。身体恢复以后，我去了‘人民夜校’教太极拳——在上初中时，跟人学过两下子。正好，汉兹有个朋友是报社老板，常来我家吃饭。我说我从小跟深山老林的和尚学过武术，学过太极；懵他们还不是小菜一碟儿？他一给我吹嘘，再配上我穿着练功服打拳的照片，哈，报名的有四十多个！我租了块便宜的场地，现在一个月净挣两千多！”

“汉兹该高兴了？”

“他？他才担心呢！他看我翅膀硬了，生怕我离婚呢！”

“你会离婚吗？”

“先挣钱攒钱再说。”她挺挺腰板，伸出两臂，做了个打拳的姿势：“报

名的还不断增加。好多人不是这小镇的，方圆几十里外的，架不住慕名而来呀。”

“你总算真的靠自己了。”

“是呵。下一步，我有个计划……”她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什么？”

“我想咱俩都是大陆来的，年纪经历也相仿，你找好工作也未必能有。你不如来我家，把我家里这摊儿工作全都承担起来。楼上有间屋子给你，管吃管住，一月先给你四百。我呢，一心教太极拳。我今天告诉你的故事，你可以把它写成一篇纪实的文章，配上我的照片，让我名气再大、更大些。你要是做得好，我会给你长工资。咱俩象个亲姐妹一样不好吗？”

外星人，这一晚，我睡在她所说的那间“属于我”的屋子里。回想着她的故事，回想着她叫我来的目的，我只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儿。本来我想住一周，看来明天就得走，最好是悄悄地走。假如我向她解释——说谎，反而更糟糕、更别扭。我简直不想看见这座房子。

早八点有一趟快车，趁她还没起床，七点钟我就得离开这里。我写了个条子，用桌上的书压住一角：“红：认识你很高兴。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叫我来。我家里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只好不辞而别了。多保重。”

34 中国饭店的“三只大老虎”

外星人：

此后我和红再也没有联系。我得赶紧去找个工作。诚然不会有好工作，但我要认识社会，认识周围的人和环境，而不是窝在一个住家户的风子里打什么黑工；我有长久居留，我要正正经经地工作。

最快的就是去中国饭店，不仅想去体会，也夹杂着好奇。市中心就好几家，我先去地点最好的「莲花楼」。

我第一次踏进中国饭店找工。那时大约是中午一点，一进饭店，只见客人坐无虚席，都是德国人；杂腾腾的热菜饭味儿和乱糟糟的说话声浑成一片。穿白汗衫黑长裤的三位男跑堂穿梭似地忙碌着，看得我心发慌。我不知去问哪一个。一个跑堂正好空下手来，忙问道：“您要吃饭吗？”

“不，我是来找工的。”

他指了指另间大厅：“老板在那边。”说罢就干别的去了。

我惴惴不安地走去；只见一位四五十岁、穿西服、油头腆肚的华人，站在一片德国客人中，正谦卑地哈着腰与一桌客人说着什么。

他见了我，走过来，刚才的满脸笑意一丝不见，冷眼打量着我。

“您是老板吗？”

“什么事？”他的口音象是南方人。

“我想找工。”

“你有居留吗?”

“有。”我拿出了护照。

他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我跟着。他仔细看看护照。

“你想做什么?”

“做水巴。”

“你做过吗?”

“没做过，但我保证三天之内学会。”

“倒是需要个水巴。现在这个，过几天就要走了。可你没做过嘛，工资只能给你一千二。你有住处吗?”

“有。”

“一千二，管饭。一周歇一天。你可以明天上班。老水巴会教你的。”

“行。”

“饭店十一点半开门，你每天十点半来吧。”

外星人，我学得很快，手脚利索，干净又勤快，和大家相处也不错，老板和员工们都对我很满意。

老板和太太都是从香港来的，在德国已十六年了。他们在别的城市还有一家饭店。听跑堂说：两处的生意每月收入共有十几万马克。老板说他刚来时，生意是现在的两倍；而现在饭店越开越多，生意已大不如前。

三位跑堂和大厨也是香港人，每位跑堂工资是二千四，加上小费一千几，近四千，管吃不管住。大厨三千五，管吃管住。

真做了工才知，老板只给大厨报足税，对其他员工，报得很少。他说，我

头三个月不用报税，算试工期；以后，可报每月三百七十马克按一周二次清洁工的税即可。三百七，老板无税可上；我既无医疗保险，又无失业和退休保险。

听小松鼠和红都说过，报六年满工时的足税，才可申请入德国国籍。照饭店的做法，我如何能入籍？我试着对老板讲，他冷笑道：“报足税谁请得起？你要是想报足税，我只有请你走人，有得是人想来做工。再说，你可以申请住房津贴嘛。”

我只好噤声。

什么叫“住房津贴”？怎么申请？问其他员工，竟人人说不知。尽管三个跑堂都是结了婚的。个个的神情早就告诉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任何人管你的闲事。老板也说得自己去打听，他脸望窗外的白云，似乎没工夫理你。

离饭店不远有家「亚州杂货店」，店面很小，是一对越南夫妇开的。年轻的老板娘会说广东味儿的汉语。中午饭店休息时，借买东西之机问她，才知：她以前也在「莲花楼」做过水巴。她说：“三个月之内老板是不会报税的，你什么津贴也申请不了。”

“我等于是在打黑工？”

“是。以前我也在他那里做水巴，三个月以后，他给我报三百七。你得先去劳动局，他们同意了，然后才能申请住房津贴，那是又一个局了。”

“我真能这边挣着一千几，那边还能拿住房津贴吗？”

“问题是：劳动局会给你介绍满工时的的工作，也许是德国的工厂之类，不见得是中国饭店。如果他给了你工作你不去，也不同意你申请住房津贴；

那三个局都是一体的。”她又问道：“你现在还属于社会局吗？”

“再有半个月就不属于了。”

“你没想关于医疗保险的事吧？”

“没想呵。”

她意料中地笑了笑：“老板报足税，你才有医疗保险。三四百马克的工资是没有的。你得自己付医疗保险。三个月医保一断，就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公司愿意接受你了，你就成了一个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了。”

“哦！那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愿意在中国饭店打工呢？”

“能攒钱嘛，吃的又是中国饭，对胃口。大学生不用讲啦，他们干活就能见到现钱；有居留的，先做水巴、再做跑堂、攒大钱，只为了开饭店。”

“真谢谢你全都告诉我，你不讲，我还真的不知道。”

“没关系啦。出来人生地不熟。我过去也是一本好难念的经噢！”

“你叫什么名字？”

“嗨，我姓刘，叫我小刘好了。你呢？”

“奇奇。”

“大名呢？”

“叫奇奇蛮好啦。”

奇怪的是在这海外，人人都不愿说出真名真姓，更不愿说出自己的经历，人人都想捂着盖着什么，人人都想和别人保持距离；仿佛一说出来就会受到伤害，天就会塌下来——而这种奇妙的感觉，也只到了海外才能体会到。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在美国不是只由老板报税，而员工也主动报，哪怕是还未取得绿卡的黑工。员工们为了自己的退休金和获得绿卡，不会为老板瞒着；员工报了你老板没报，老板要受大罚。这制度定得聪明、简单又合理。不明白德国怎么就想不通这一点？

打工，打工，当我真地变成凭体力吃饭的打工族时，才体会到资本主义的冷酷了——当你象卓别林的《摩登时代》那样变成快快快、好好好、再快再快再快的机器人时；当一大群客人涌入、酒水条子象雪片似地扔过来、你忙得不可开交、老板却轻松地喜笑颜开时；当玻璃杯划破手指、流着血水、可你还得坚持洗杯倒酒水时；当你发现员工之间、老板与员工之间、根本没有友谊时；当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机器人、人人累得灰头土脸、都只是为了钱钱钱、而所得的报酬又是如此微薄时；那时，你才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社会了；也才知道，德国的第二大党 **SPD** 以及工会组织，为何必然诞生、为何如此强大了。

可在中国饭店，你绝口不能提报税，绝口不能提 **SPD**，绝口不能提工会；这是老板最忌讳的三只大老虎。还有老板忌讳的许多小老虎：你最好别提有关政治和党派的任何一个字；你最好不提你的和别人的一切；不要提对中共的喜爱或厌恶；不要提你和家人的经历；不要提看过什么书、看过什么报；更不能提你还写过什么文章；不要显得你有知识；不要提你旅过行、看过什么风景；不要说出你的想法；不要穿得太漂亮太雅致；不要和员工太接近或说什么近乎的话；不要对老板和老板娘的话漫不经心；不要在发工资时露出不满……一句话，你只应当是傻乎乎的、穷咧咧的、话少之又少，永远知足常乐地干着活的无知识的二傻子。

那天在「亚州店」正要走时，「莲花楼」的两个跑堂也进店买东西。两人有气地对小刘和我说道：“明天我们就不干了。”

“为什么？”我问道。

“老板说不需要我们了。”

“你们干了八年哪。”小刘道：“做得又熟又快又好哇。”

“有什么用？我们太贵了，他找着便宜的了。”

另一个跑堂道：“人家才一千八。”

我和小刘都不知如何安慰他们，仿佛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出了店，我心想，有一天他俩当了老板，恐怕也是一样。

小刘的提醒非常重要。我又不想开饭店，在那儿打工有什么意义？我得先去劳动局报到。很多词汇我还不会说，于是查字典，找出我需要的词汇写在纸条上，带着护照就去了。

劳动局和社会局虽都在市中心，但劳动局的气派大多了，不仅那好几层的大楼摩登漂亮；一进去，里面高高的圆形玻璃楼顶设计，以及假山石真花树和小喷泉，活象个温室大花园。

我转了一圈儿，竟未见到一个中国人，只有一两位阿富汗人似的亚州面孔，夹杂在几个淡黄头发的白人中，安静地等着叫号。约有十间屋子，门上的标志按姓氏字母排列；每个关闭的屋门前，靠墙有一排铁孔椅子，都有十来个人坐等。

找到我应去的房间号码，前面五六位谈完了终于轮到我。进了屋，正式

登了记之后，才知，我本应一有了居留就该来登记的。我不想讲已在中国饭店试工，只说希望有个满工时的工作。

公务员给了我二纸“工作介绍”：一个是去一家旅馆打扫客房卫生；一个是去「香脆面包干厂」去做流水线；都是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的满工时。

35 忽然象看见了《卡门》的场面 / / 女教师索亚

外星人：

两相比较之后，我选择了「香脆面包干厂」。

去厂里报到之后，离上班的日子还有三天。被玻璃杯划破的手指，伤口还未愈合。我去和饭店老板结算工钱，想在家休息。老板不高兴地说：“北京人都干不长。”我让他看那发炎的手指，他不屑地摇摇头：“这点小伤算什么！”工资他一分未多给，我也不想告诉他要去工厂的事。

在家正给元元写信，忽听门铃响，我对着呼话器问道：“谁呀？”

“诺拉。”

怪了，我明明已经写了明信片告诉过她们：来前请打电话。看来，这母

女俩只对突然袭击感兴趣，一点也不遵守德国习惯？

她高高兴兴地进了屋。我给她斟了茶，拿出从「亚州店」新买的芝麻糖。

我们吃着喝着简单地聊着，我问她是否收到了我的明信片？她点点头，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竟对此不置可否。我只好说别的。

“我要去做工了。”

“是吗？”她显出欣慰的神色，想了想又说：“其实，你可以去更好的语言学校去学德语。那个学校叫：『德语中心』，八个月毕业，一天学五小时，劳动局付钱。”

“真的吗？”

“你还想学习吗？”

“当然！”

“我可以马上帮你去报名。但起码要等新的学期开始。”

这是个高等的语言学校，故它叫「中心」。劳动局为此特意找我谈了一次话，诺拉在旁边为我翻译：“这中心主要是为波兰移民办的，其他外国难民很少。每期学习八个月。每月德国要为每人付一千六百马克：一千是火车月票和生活费，六百是教学费拨给『中心』。学习期间，劳动局给每人做了各种保险，所以不得随便请假或迟到早退；如有违规，教师有记录，劳动局则勒令退学。正式开学是一个半月以后，这期间你还是应当去『面包干厂』做工。”

「香脆面包干厂」规定试工两个月，我不想提前告诉工厂，否则他们会考虑不用我，那样一来，我还得去找别的工作。

先有人带我们新来的这拨工人各车间参观，我没发现一个中国人。我才第一次知道做面包干的整个程序。我被分配在做面包形的流水线。传送带每分每秒不停地输送着。当机器切好的面团转到了眼前时，必须非常快而准确地用两手将面团拉长，两头的部分尤其不能少一丁点，把它恰到好处地塞进面包模子里。上午四小时，每小时休息十五分钟；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如是。

我学得又快又好，令女组长惊讶。既紧张又累人，两小时一过，俩胳膊酸又胀；这才知流水线工作中是无法去卫生间的，也无法有其他小动作的。这大屋子的另一边，用机器合面的是三个壮年男工；其他车间的重体力活也是男工。而流水作业都是女工——一半是年轻的德国人，一半是土耳其和意大利人。组长都是德国人。四个土耳其人皆已过中年，孩子们都老大了，她们都在这里做了十多年了，净工资都是一千四百马克；工厂自然给工人做了各种保险。

中午休息时，有的去食堂吃饭，有的开车回家吃；三位土耳其人和我在休息间，各找了把椅子，节约省钱地吃着自带的午饭。没有别人在旁，我悄悄地问一土耳其人：“你干了十多年，给你长过工资吗？”

“一次。”她缺了颗门牙，慢慢地嚼着自做的面饼，面中掺了盐和碎菠菜，喝着自带的便宜桔汁：“只长了一次。”

“是全厂普长吗？”

她点点头：“就一次。”

“象我这样的净工资会有多少?”

“你结了婚，丈夫不在德国，也是一号税；一号最高，一半工资没了。你要是有孩子，算三号或四号，扣得少多啦。你净工资，我估计，过了试工期，八百到头啦。”

谁也不愿再多说什么。德语的生疏使我们无法更多地沟通。我想，怪不得都要去中国饭店，不仅是饭菜合胃口，还有同胞能说说话；更重要的是能多攒现钱当老板。在工厂，你的净工资如此之少，而劳动量又如此之大，地位又如此之低，你不去做饭店老板，又去做什么？也就难怪这大工厂里见不到一个中国人了。

她的儿子来找她要钱。令我意外的是：这土耳其女工才四十岁，累得灰头土脸、土得掉渣，活象半世纪前六十岁的农村老太婆；可她二十来岁的儿子，红光焕发、烫着黑油油的过耳卷发、香气扑鼻、西服革履；那作派、那气势，摩登得可与美国电影明星媲美。

午休后上工前，男组长发给每人一张办公室发下来的印单——“您同意每周加班二小时吗？”下面有两种答案：在“同意”或“不”上画叉，然后签名，写上日期。

“在‘不’上画叉，”男组长一一嘱咐我们，女组长也随声附和。他二人直到看着我们一一写完，收拢了去。我暗想：这就是工会的强大？

两班倒，下午班的员工到了。相熟的互相嘻哈笑着打招呼，早五六分钟地就接了老朋友的流水线；越早接，即将下班的人越高兴，仿佛友谊和亲情正从中体现。可我是新来的，老员工冷眼旁观地且不来接我。最后，终有

一位早已穿好了工作服的走近我，示意我离开座位——我这才算下班了。

脱下白工作服，锁在自己的铁柜子里。又去了卫生间。去刷了上下班的时间卡。当我随着许多女工往宽宽的楼梯下走时，忽然象见到了《卡门》的景象：许许多多下了班的男工，站在楼梯下，黑压压一片；一个个仰脸朝上望着，盯着自己熟或不熟悉的女人；那些目光多种多样——亲切、寻觅、熟悉、企盼、渴慕，什么都有，我突然感到这大工厂的另一种生气！

那画面永不能在我心头消去……为什么元元不能混在这片人里，也每天来接我，仰头寻觅着我，然后一起手拉手地回家呢？

外星人，当流水线的工作我已做得非常熟练时，也该去「德语中心」学习了。

全班二十四个人：二十一位是波兰人。原来，他们也分移民和难民两种——这是很久以后知道的，因为人人都说自己是移民。所谓移民，就是二战时，德国占领区发给当地人德国护照，强迫他们学习德语。二战后，德国经济好转，允许德占区的人前来移民。人们受不了共产党的专制和贫穷，想尽一切办法移民德国，包括他们的一代又一代子孙。而不属于德占区的波兰人，自然只能按难民办。但奇怪的是，象中国人一样：人人就是不愿说“难”字。我忽发奇想：干脆说“福民”得了——你没“难”，你干嘛要离开故乡？这儿没好处，你干嘛要来？“难”和“福”恰恰应当倒个个儿——出来的给你们“福民护照”，没出来的才都是难民，省得你们心里老是不舒服。

“哈喽！”当我意外地见到干枣树和疤老弟时，我们竟象老朋友一般。疤老弟手腕上的那块小疤，竟帮他拿到了兰皮护照。这班里唯有我们三个是

亚州人。过去由于我们的德语太差，说不了两句话；现在，能说的内容比先多多了。他们都住在离这学校不远的地方，二人是一个居民楼里的邻居。干枣树回想起我们在 WU 市中转站时的往事，仍是满怀深情；说希望哪天我能去他们的住处串门。

女教师叫索亚，三十五岁，她娇小玲珑、和蔼可亲，一头红褐色长而密的卷发，很象画中人。她是在著名的「MO 市大学」德语系毕业，是硕士。她说这个班，都是学过初级德语的，学习内容和进度，要每个人十分努力才能跟得上.....

每天我早六点起床，吃早点，坐公车，倒火车，再步行十五分钟到校；八点到中午一点，五个小时的学习；回家做午饭，吃完约两点半或三点；做作业，背单词，练语法，背整段书.....四十一岁和二十岁就是大不一样——人家一个单词写五遍就记住了，我得写二十遍往往还没记住。

语言，语言，你太重要了，也太难学了！

我送给了索亚一本德文的《冬天的童话》，尽管我手中只有两本。它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虽然我和索亚仍无法流畅地聊天，但她邀请我和另外两位女生，坐她的汽车去她家喝咖啡、吃点心。

她住在一座私人房的顶层。她说，她的男朋友是她的大学同学，现在很远的汉堡教书，一周回来一次。至于结婚与否，还没考虑。

我们经常有作文，我写了小时候的一些事，也写了元元扔掉了经济担保、不来德国、可我还是相信他会来的事。那天，当我帮索亚在厨房洗杯盘，

两位波兰女生在另间屋子看她的老照片时，在她们听不见的空当，索亚说：“我不认为你丈夫会来。”

我语塞，不知怎么回答她。

“知道咱们学校的慈教授吗？”她问。

“见过。他不教课是吧。”

“对，他是主任。他学过中文，会汉语。他离了婚，两个孩子都上大学了。他还没有固定的女朋友。他知道你，很想认识你呢。”

“那……我请你们吃饭，在我家？我自己做，好吗？”

“下个周末我们一起去？我朋友也去？”

“好哇，一言为定。”

36 瓦玛命丧黄泉

外星人：

我在这学校学习四个月了，仅仅与慈教授在楼梯上打过两次照面；除了客气地点点头，从没讲过话。他约五十来岁，面貌和善，看起来很健康，比我高出半个头。

索亚喜欢我，有意给我们牵线。假如我想去高攀慈教授，摔开元元的话，我就不会请他们一起来。平时在学校有得是机会和他搭讪—— 课间休息时，我经常在楼道里散步，不只一次看见他办公室的门大敞肆开，他一人端坐在写字台边象在看书或写着什么，正面对着我。每次我都赶紧转身躲开，生怕打扰他。如今想来，他竟是有意大开着门的？

教授、医生、律师，海外华人只想高攀这些人；然后是房地产商，公司或什么老板.....

我和元元在一起让我感到自由。我们的婚姻基础是别人所没有的，绝对不是医生、教授、律师的名衔所能给与我的。名声、钱财，对我来说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和他在一起生活，能不能感到平等和自由？而我和元元婚后四年的生活，让我充分感到平等和愉快。我不相信有谁能代替他，我连试也不要试。我请他们一起来，是一视同仁地把他们看作朋友。

再说，自我到德国以来，我所见识的几个家庭，给了我多少反面的教育，难道我还没见够？！

我们约定在星期日的上午。我做了卷春饼。热气腾腾、薄薄的一揭为二的饼，抹上甜面酱、卷入炒芽菜、菠菜、香肠炒鸡蛋、鸡肉丝、葱丝.....三个德国人吃得满开心。然后是喝咖啡，吃甜点。饭后，我送给慈教授一本《爱的呼唤》。

我们去湖边散步。宽阔的林荫道下，散步的行人两两；林荫道的左边是一片大湖，几乎望不到边；波光粼粼，白帆点点，熏风拂面，倍觉爽快。索亚和她的男朋友有意识地走在前边。

“我不知道我的第二个太太是谁，”教授说罢侧脸看看我。

“您最好别有第二个太太。”

他没再说什么。他不理解我只想过得越简单越好。我只想有个伴，象元元那样的简简单单的伴。

索亚和慈教授都有自己的汽车，他们把我送到家门口，没再上楼，我就在车外向他们道了再见。

我刚一上楼，便吃了一惊：只听瓦玛大声喊着：“滚！出去！滚到大街上去！”

随着丽莎呜呜的哭声，从二楼的楼梯上，扔出来的衣服和用物飞得遍地都是。伴着瓦玛的大叫，衣物便从她门里又飞甩出来。我慌忙躲进自己的屋去。

努太太和她的男朋友正在瑞士度假，下月才能回来；楼上的“船太太”和楼下的沸丝夫妇，寂静得象死了一样。两家德国人都劝不了这架，我只会三句半德语，又如何去劝？我相信大家都在屏息静听——那瓦玛犹如火山爆发，而丽莎只会软弱地哭泣。我的屋门连个猫眼窥视镜也没有，坐在沙发上听着，似乎她们屋里还有另一个女人年轻的声音……

难道瓦玛又爱上了一个年轻的，让这半老徐娘滚出去？或是瓦玛嫌丽莎的工资太少，觉得她吃累了自己？可她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哪。难道同性恋的分手，比结了婚的人还残酷、还厉害、还无情、还冷漠？

渐渐地什么也听不到了。我悄悄地开了条门缝往楼梯看——衣物全没了，丽莎一定是捡起来自己走了。

一周后的一天下午，有人在哐哐地敲隔壁的门；这声音是如此地粗暴无礼。旁边没人在家，这人怎么还敲个没完？

我将门开了条缝，那人一眼见到我，竟过来问道：“有个叫瓦玛的住在这儿吗？”

一股烧酒味儿呛得我想捂鼻子。这男人约四十多岁，武大三粗，酒糟鼻子油疙瘩脸；德语夹杂着外国口音。他身后站着个怯生生的中年女人。

我点点头：“她是住在旁边。”

“她是我太太，”他往身后一指：“瓦玛有男朋友吗？”

“男朋友？没见过。”

他得意地用外语向太太唠叨着什么。

“你转告她：她是魔鬼，她勾引我女儿。我女儿有一个月没回家了！我和她没完！”

当晚有人敲我的门。

“谁？”

“瓦玛。”

我把门开了条缝。

“我要跟你说说。”她的脸严肃而又不满：“下午有人找我吗？”

“是呵，有个男的，和他太太。”

“你说我没有男朋友？”

“是呵。”

“你不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

“他给我打过电话,我说你要是来,我男朋友会跟你不答应。我是用‘男朋友’来保护自己。明白吗?”

我点点头:“对不起,我不知道。”

“他要是再来,你最好什么也别跟他说。”

“好的。”

她不大高兴地回了自己的屋。

看来,当那男人敲门时,他女儿是在屋里的?

那一晚我来回想着瓦玛的话,才明白同性恋者心里的脆弱和胆怯。哪怕她外表是那么男子气十足,那么雄纠纠不可侵犯。

隔了一天,又是傍晚。我做完了作业,正给元元写信,忽听有人敲隔壁的门——那声音是安静的,沉缓的;声音不大,却一下一下的,好似敲门者是本楼的邻居一般。

听见隔壁开了门;随后只听一声刺耳的尖叫——那是瓦玛的撕心裂肺的绝叫!

待我惊惶地开了门时,凶手已跑掉——瓦玛的脖子几乎被割断,瞪着吓人的双眼,血淋淋地吐着血水泡沫躺在地上抽搐!她的屋门开着,没有别人出来!

我吓得拼命往楼下跑,使劲敲着楼下的门大叫:“救命啊!沸丝先生!!沸丝太太!!”

“上帝！我的上帝！！” 沸丝夫妇以及楼上的“船太太”，我们肝儿颤着、惊慌地流着泪，匆忙给警察打电话……

一通折腾了多少天啊！——调查，口供，旁证，签字，审问…… 记者上门，将此案登在了本市大报的第一版。

凶手很快就被抓到了，他供认不讳。他是南斯拉夫人，失业多年，整天借酒浇愁。唯一的女儿与瓦玛在一个车间，是刚工作半年的实习工，才二十二岁。父亲恨瓦玛引他女儿走上了“邪路”。他磨快了一把小利刀，想好了躲开门上窥视镜和敲门声的计策……只那狠狠的一刀，就令瓦玛命丧黄泉！

事情已过去很久，可我的心却总不能平静。努太太提前回来了，说她是“罪有应得”…… 房子空了很久，没人敢来住。

我不能平静，是因为我未能很好地保护她——假如我能理解她心里的脆弱和胆怯，假如我能知道“男朋友”一词对她是个保护……

37 绿旋风的来访

外星人：

当绿旋风打电话说要来看我时，我痛快地答应了。

她是与元元一样的大名鼎鼎的 57 年大学生右派。他们虽不在同一个大学，却都是当时的死硬派。元元留校充当反面教员，烧了二十多年的锅炉，直到七九年才被平了反；而绿旋风进了二十年的监狱。中共为了证明自己“反右”正确，留了几个特别有名的大右派不予平反，其中就有绿旋风。

我出国前，偶尔从朋友处见到香港杂志，看到绿旋风给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呼天唤地的想去香港。她果真到了香港，颇为轰动；她说要写书，写她二十年的监狱生活，很快便被瑞士的「东亚研究所」请去，与她定了三年的合约，作为“研究员”。而她第一年就是各国旅行，好在总有单位邀请。不久前，她去台湾大闹了一场——台湾当局赞扬她是“反共义士”，她却说不爱听这恭维，说她要为受苦受穷的国民党老兵伸张正义，指责台湾当局为什么不给他们妥善安置——把她当成贵宾的台湾当局竟弄了个大红脸，甚至请她提前离境。

她一路旋风又去了日本、接着来西欧，刚在德国 BO 市和 MO 市发表了言论；所发的言论，皆是东一郎头，西一棒子；除了表明她是个世界名人级别的大人物之外，我竟看不到一句闪光的语言，连她说的中心意思都闹不清。在国内时，一提起她，我象别人一样地从心里敬佩。怎么一到了国外，见到她是这种水平，心里好生失望。

我还从未见过她，骑上自行车去火车站接她。估摸着她和元元差不多的年纪，起码比我大十一二岁，今年总得五十多岁了。

那就是她吗？——穿的上衣肥大过臀，颜色焦绿焦绿；下身是灰色尼

龙紧身裤。人胖腿细，活象一只倒立的大绿青椒。她过肩的黑色直发，拢了一条白亮亮的发带；那晒得褐色的面庞，看不出女性的美，只有焦躁和不安；桃红色的口红，抹得出了界；淡稀的眉毛描得东一笔、西一笔。

我推着自行车，她随在车的另一边，要步行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家。我希望她能一路上看看本市的风貌。

“啧啧，差远了！啧啧，和瑞士没法儿比！”她品评着房屋、教堂、街道和风景：“差远喽！你去过瑞士吗？”

“还没有。”

“瑞士到处都象个油画，处处美如画！这儿差远喽！嗯，你这自行车倒还是蛮漂亮的。”

这半个小时的步行，我再没听见她说了别的。

终于我们进了屋，她有些意外地环顾着，坐在沙发上。

“不错嘛，蛮不错嘛。嗨，我连沙发和电视都没有呢。”

我真惊讶：“你工资应当不少，怎么会连个电视也不买？”

“出去旅行需要钱哪。”

“可你两个女儿也想看电视吧。”

“顾不上她们哪。你不知道我一天到晚有多忙！”

我端上茶，拿出水果和点心：“待会儿我们去饭店，我请你吃饭。先随便喝点儿茶吧。”

“唉——！”她端起茶杯，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寄给你的书，你看了吗？”

“看了。这就是你一到香港说的，你要写的那本书吗？”

“当然。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好意思说我非常失望。这五十万字的书，完全象她在海外的发言一样，思想极为混乱——二十年的狱中生活只一带而过——既然在监狱里又给她加了一条“想强奸狱警”的罪名，怎么不写清楚？诸如此类，书里处处皆是。全书既无文学性、又无实质的描述；除了表明她爱国之外，绝大部分内容，竟然象是跪着在请求邓小平给她平反。而那反反复复疯了似的要求平反的话，老给我一个幻觉：邓小平会烦得朝她的脸踢去.....

说真的，我觉得她那二十年的监禁生活，定是把她关出精神病了。

我没敢告诉她：看完我就把书扔进垃圾桶了。

“我不明白，”我问道：“平反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怎么，你认为不重要？”

“我觉得，瑞士所以要你，给了你三年合同；你在外边所以这么吃香，不都是因为没给你平反吗？”

这话可不让她高兴，似乎没有道出她个人价值的光辉。

她喝了口茶，眉毛一扬，说道：“我这次来，就是要批评你；你到海外的所有表现我都知道，你很对不起你哥哥呀！”

“你指的什么呢？”

“你竟然在台湾报纸上公开政治庇护，还美滋滋的，那是国民党的党报，你知道吗？耳朵上还戴俩小布人儿，象什么样子？人家骂你给中国人丢脸，你知道吗？你不但对不起你哥哥，也对不起你在北京的右派丈夫老吴，你给他置于何地？我为什么要来见你，就是要跟你说说我的意见！”

这些话完全象小松鼠说的，她确实先去BO市见了她；难道她照单全收？

“政治庇护有什么给人丢脸的呢？”我问：“你没有政治庇护？”

“我不屑于拿那种护照。”

嗯，我想说：难道是“未来伟人护照”？但我不想拌嘴。

“哪，你拿的是什么护照？”

“我的？是特殊的护照。别忘了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是龙的传人。不管我们在哪儿，我们都别忘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可是中国人哪！”

那你怎么不滚回中国去？为什么呼天喊地地非要出国不可呢？你从来解释不清自己——我差点儿说出这些话来。请她吃饭是没心思了，我去厨房做起饭来。她也不问我为什么不去饭店，一个人无聊地看起了电视。我心想：难道与你一起生活的两个女儿，也拿的是“未来伟人护照”？我不想和她抬杠——要么政治庇护，要么结婚，西欧没有别的护照，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常识。如果她拿的明明是政治庇护护照，却还要撒谎，这也是炎黄子孙的作风？更甭说二十年的监狱，到底给了她什么了！

总之，话是不投机了，没有一句投机。我只可怜她那两个才十几岁的女儿——做母亲的整年在外疯跑，钱都扔在路上，既不照顾孩子，又做不出事业，连自己都说不清自己想的是什么。或许她认为，张牙舞爪的东一郎头、西一棒子，就是她的事业了？

“为什么你把你先生留在了香港？”我好奇地问道。

“我和他没感情。”

“可你们是在劳改就业的时候结的婚哪。”

“那时候太孤单了，他喜欢我，是崇拜我。他比我小十几岁。后来，随着年龄，感情慢慢就淡了。给他带到瑞士去很麻烦，会影响我。”

说不定她想再婚，找个既有名又有钱的、比她更能出风头的？我深感国人中，无论男女，有多少人只想振臂一呼，就能立即称王称霸的。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老毛那号的魔。凡是温和、有理智、有修养的人，都会被魔们消灭掉，这才是中国特色呢。

我做了三菜一汤，她说我做的饭菜比饭店还好吃。

这是我们的见面中，唯一让我高兴的一句话。

夜里，我们每人一个床垫，彼此隔着三米远。好几次我刚要睡着，就被她噎噎的大屁惊醒。要是一个人老放响屁，他(她)自己是否也能睡着呢？我们吃了什么呢？—— 米饭，炒虾，炒四季豆，拌粉皮鸡丝，豆付火腿汤，这些饭菜怎么会产生这么多的气体？还是她和我生的闷气都放出来了？噗，噗，噎！也许他那小丈夫早就被她的响屁吵怕了，偏要留在香港，不想给她当毫无分文的男保姆？单身多自由啊，他兴许还能遇见个小美人儿呢！噎，噎，噗！又是三个响屁。不妙，被子一定被她的大屁全熏黄了，明天她一走，就得拆被子……

次日一早，我送她上了火车。我知道这辈子我们再也不会见了。她又去了 BO 市，一定又是去小松鼠家。

隔天，一家亲共的报纸上，就登出了她的发言——说我如何对不起英烈的哥哥遇罗克，说我如何忘记了自己是炎黄子孙。

外星人，我觉得是那么好笑：难道人类非得给自己来个标签吗？——我只能是炎黄，你只能是绿紫，他只能是土红？这地球，有一天，会是一个大村庄，人类觉得哪里好，就在哪里生活，不是吗？

38 《爱的呼唤》停印 / / 89 六四 / / 泪水象河

外星人：

最让人气闷的，就是元元的不清不楚；越问他什么时候来，他是越不回答。你问东，他说西。气得我写了篇文章，发表在香港的月刊《畅言》上，把他种种可气可恼之举，统统道出——等了他两年，竟是杂志上见。连主编加的按语里，都“希望他动若脱兔”。

文章一发，立即拷贝了几份，寄给他和国内的几位朋友，希望她们了解真相，劝劝他。

但老咪兔无动于衷；仍是我去十封信，他回一封便条，附的还是谁谁发财的剪报。我忽然大彻大悟：他定认为我有三头六臂，能在一二年内发大横财——比如，快速地开了三十家中国饭店，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他才能光彩前来；我一给他寄零花钱，出手就是几万；他每年两国来回飞，大山侃得云山雾罩，那才是他最理想的生活，才觉得出人头地.....

他怎么这么象绿旋风啊？他们俩活活是一对双胞胎啊！——我简直象发现了新大陆！难道相差十一二岁，竟是这么大的距离？

如果我不出国，真地感受不到这差距！

由期盼，到不解、到焦虑、到失望。可我还不不想失望啊。

1989年5月下旬，他父亲在台北去世，他去奔丧。

他父母分别四十年不通音信，刚刚允许通邮，父亲竟重病去世。他从台北打来电话——这是我们分别两年多来第一次通电话；因为我一周总要邮寄二三封长信，我这边用不着花很多钱再打电话。而他那边，要是真有的说，还用写便条式的信吗？

“奇奇吗，我在台北呵。现住在伯父家。”

“你办完事，应当从台北直接来了吧？”

“嗯……告诉你件事，你的书他们不出了。我代你签了字。原件我会邮寄给你。”

“什么？我的<爱的呼唤>?! ”

“是。”

“他们什么理由哇？”

“没理由。就是不想出了。也无所谓啦。”

“无所谓？”

“好，就这样啦。”他竟匆忙地挂了电话！

他明明是怕我再多问他什么，他有什么不好回答呢！我实在太失望了——帮我出书没他，不出书他倒办得飞快！好象他巴不得不在台北出书！可是在大陆，我的书能不被删砍？尽管这书里有很多排印错误，但它毕竟是我的命根子啊！说不出就不出？理由是什么？凭什么这样对待作者？他

怎么就不和他们讲道理？就这么痛快地签了字？再说，我根本也不可能回中国了，他没有理由不从台北直接来呀！

六月四日晚上，我开了电视，只见德国新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血淋淋的画面中，在许多坦克和不断的枪声下，慌乱悲哀的大学生们拉着、抬着血淋淋的大学生们震惊着我，我泪流不止！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奇奇吗，我在香港。”

“你在香港？元儿元儿，你怎么在香港？？”

“是呵，我从这儿回去。”

“回北京？！”

“是呵，回北京。那个，那个原件，我给你用挂号件寄去了。”

“你不来德国了？”

“没说不来呀，着什么急呀。”

“你什么时候来？”

“还定不下来呵，我妈还在国内，我总得……好啦，就这样啦。”

电话挂了。我依旧在盯着电视，盯着那血淋淋的画面，泪水涌涌地流淌……这就是他，这就是所有的回答！他不管你孤不孤独、苦不苦、期盼不期盼。他的闷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全明白了：他怕来，他怕来了就回不去中国；他爱他母亲；他爱自己固定的生活方式胜于一切。他懒得改变一切，可他又绝对不讲；因为他还幻想着我能变成百万富翁，让他神气地满天飞。

什么叫夫妻？夫妻不是一方在几千里之外，静静地等着另一方去变成

百万富翁，变成了好来召唤他；夫妻是共同奋斗，共同扶助呵，他懂吗？再说，他明明知道我回不去中国了，难道，他还幻想着我向中共写认错书，再回国？可他什么也不讲，给我的只是一个闷葫芦！或许他觉得自己会变成天马行空的百万富翁？那就更可笑了——他认识自己吗？！

他和绿旋风简直就是双胞胎！

39 只想往下陷 / / 德国《百家姓》 / / 大熊被锁在卫生间

外星人：

我从没这么苦闷过。难道我引以为傲的第三次婚姻仍是一次失败？难道我和他四年的婚后生活，认为双方快乐自由的四年，我却对他并不了解？或是因我的性障碍，我们又无儿女，是他不来的最大原因？我实在解释不清。假如他认为，学德语太难，他根本不想学；假如他认为，在德国没有他的职业，而他又不愿意花老婆挣的钱，那就应当说明白。可他什么也不讲，只给你一个大闷葫芦。但我几次寄钱，他并没拒绝呀；不仅没拒绝，还蛮高兴哩。在北京，我的稿费都作为家用，他不是也没意见吗？夫妻俩的钱，应当分得这么清楚吗？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从台北飞回北京，我知道是没希

望了——苦就苦闷在这里；因为我太爱他，太把他当回事了！

这天收到东京来的信，一位与山郎一起编书的署名清子的学者，用极为秀丽工整的中文笔迹写道：“鉴于中宣部的压力，<遇罗锦>这本评论集我们不能出版了，非常抱歉和遗憾……我们给您寄去了二千美元作为一次性的赔偿费……”

我发呆地坐在沙发上，才明白台北为什么也不出我的书了——全因为中共的压力，甚至他们连道歉信和赔偿费也没有——那家出版社老板的太太，是写浪漫爱情小说的有名的作家。两岸“三通”，台商们纷纷去大陆开工厂、做生意；歌星，作家们也都去国内开拓自己的路子，大陆的市场何其之大、何其吸引人！中宣部自然要把我的书作为条件——给不给你日本人入境签证，给不给你台湾人卖书市场开大门——正象对小松鼠和汉学家哈宾教授一样。尽管谁也不喜欢中共，可又谁都得屈服于中共。然而我也想不到，中共的手竟能伸到台北和东京去。有一天，他们伸到全世界都易如反掌呵！

事业，完了；爱情，也完了。

伴着「六四事件」，我不知自己哭了多少次。

那天星期五，放学后，不知怎么就走进了火车站的酒巴。自来德国之后，除了那第一个狂欢节，我和小松鼠、野鸽子她们进酒巴跳过一次舞之外，就再没进去过任何酒巴（即白天开业的酒馆，也卖简单的汤和饭）。总觉得在酒巴喝酒抽烟的人都没意思，都太无聊。而这德国到处都有、随处可见、我最不想进去的门槛，现在我却踏进去了。我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理——好

象只想往下陷，好象只想虐待和做贱自己。

我一进去，就感到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这儿的一切，对我来说太陌生了。围酒台坐着的三个德国男人也一愣——这地方少有亚洲人来，何况还是个女的！

“一杯可乐，”我谁也不看地说道。

我坐在台边的高凳上，慢慢地喝着。一个抽烟的中年男子凑近我，偏身坐在我旁边的高凳上。

“能认识你吗？我叫沃尔夫，”他伸出右手。

“WOLF？就是狼呵，”我和他握了一下手。

“没错儿，”他笑笑：“就是狼。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奇奇。”

“Chi Chi？”

“是。”

“怎么写？”他掏出元珠笔，拿来酒台的便条。

我给他写上。

“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奇怪的、新奇的、特殊的意思。”

“有意思。好名呵。”

“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是强壮有力的意思。”

“是强壮的狼？”我看看他那干瘦的、并不高、又很普通的模样。

“我不强壮？”他挺了挺胸：“你工作吗？”

“在上学。”

“学德语?”

“是。”

“多大年纪?”

“四十二。”

“不可能，”他打量我的脸：“三十二?”

我才发现他的眼珠是灰绿色的。

“四十二。你呢?”

“四十八。”

他那老气横秋的脸，简直就象五十八的。

“你结婚了吗?”

“我丈夫在北京。”

“有孩子吗?”

“没有。你呢?”

“我正在离婚。有个十七岁的儿子，和他母亲在一起。”

“你做什么工作?”

“技术员；安装面包房用的机器设备。你做过什么职业?”

“以前在杂志社搞封面设计，到了德国打过工，在饭店做过。”

“今天周末你打算怎么过?”

“不知道。”

“去我家好吗?”可能他觉得这里不是聊天的好地方。

“行。”

“那我们走吧，不远，步行就半小时。”

拐来拐去的走进了一座四层居民楼。看得出，都是属于低收入者住的房子，还不如我的环境好呢。

他开了门。

“坐吧，你要喝点什么？”

“水。”

这就是一个德国单身男人的家——一个不富有、正在离婚、一切都象在将就过日子的破家。坐在那把一坐就晃的脏椅子上，环顾着四周，我才发现了自己的能耐：无论我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无论多穷，只要有一间屋，用不了什么钱，我都能立即把它收拾得漂亮和象样。但我既然是想陷进来，自然犯不着说出我的想法。

“家具都是从报纸上人家不要搬来的。”围着破桌子，狼坐在我的对面：“我们有房子，但是她得住，那房子得归她。婚还没离完，我买什么家具？”

“为什么离婚呢？”

“她提出来的，她说性情合不来。儿子也跟着她过。”

“你要付生活费吗？”

“她巴不得我付，可我付不了。我的工资除了个人开销，所剩无几。过去她不用工作，现在她得自己去工作。她现在不想离了，可我倒非离不可了。”

“为什么？”

“我已经出来了，还回去？有什么意思？一个人多自由！”

既不讨论文学，又不讨论哲学——我的德语已够用，尽管远达不到象和同胞聊天那样。我大概地讲了我的经历，也知道了他家的不少事，他拿出一些家庭照片让我看。本来，这是一个多好的家庭！——别墅般的房子，花园，儿子，漂亮的太太，什么全有，说散就散了？或许，他太太另有情人？一旦真地离婚，那情人反而远离她了？我体会过的悲剧，是否到处都是？

“我不懂，”我问道：“你是满工时工作，为什么不能有余钱付给她们？”

“我为这换了新单位，老板只给我报一半税，另一半是黑的。你可要保密噢！”

“明白了。”

“我喜欢你。可以吻你吗？”

“可以。”

我们坐在床边，他抱住我，我也抱住他。他吻我，我却纠正着他应如何吻才吻得更好——那还是《一个大童话》里的旭阳教给我的，哪怕我的心连跳也不跳一下。尽管他根本不知道我只是想往下陷、只想自我堕落、只想陷进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渊中。

“你想和我做爱吗？”他问。

“行。可我们都得先洗干净。”——哪辈子我这么痛快过？

我们先后去冲了淋浴。是下午，光线还很明亮。他拉上窗帘，屋里变得有些昏暗。

我不象以前那么担心——半年前我已经闭经了——证明我的身体内部已经老了。妇科医生说我应当吃药片，还会来；我却说：谢天谢地，我可不再麻烦，可算轻松了！

.....”还要做下去吗?”他不停地动着,有些气喘地问。

“要。”我眯着眼,象死了似的。

直到他做不动了,歪在一边,满意地看看我。我们又一次地去冲了澡,穿上衣服,都感到乏累。

“好久我没这样了,”他点起一支烟。

“真的吗?你在酒吧里,天天能遇到女人呵。”

“可不见得有合适的呀。”

“什么才是你合适的?”

“这难说.....”他耸耸肩:“反正,不容易遇到。”

是呵,太老太丑太放浪的他不喜欢,太美太年轻的他又得不着。我如果不是自己做贱自己,我也不会认识你啊!可我无法对他讲:我都不知自己刚才在做着什么,那里连一丝爱的含意也没有。甚至,万一得了病,我都得认倒霉。

他希望我不要回家,在这儿和他度周末,星期日下午再回去。他高兴地说,老城步行区有游乐场,我们一起去玩玩、吃点儿什么。

他拉着我的手走在大街上,仿佛我真成了他的女朋友。我们步行前往游乐场,他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愉快,似乎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Bär, Bär, 嘿,”一回来,他就给一个姓“熊”的打电话:“嘿,我刚认识一个女朋友,很可爱,很有意思,中国人。你来怎么样,我有两箱啤酒。来吧,你一个人在家多无聊!”他撂下电话对我说:“他是我同事,和我很谈得来的。”

德国人也有《百家姓》，甚至超过百家，姓什么的都有：狼，熊，大蒜，国王，大虾，螃蟹，织布工，鬼必死，鹰，野鸽子，树林子吵……而名字，却远没有姓多，就那么十几个名人人叫；所以到哪儿都得问生日。

一小时后，熊就到了。他约四十来岁，也真象只笨熊——又高又壮、吐字不清、呆头呆脑；或许是大智若愚吧。

当他俩真的一瓶接一瓶地喝着啤酒，咕噜噜地侃起大山时，我才真地想逃跑了一——就象北京人说方言土语，洋人听不懂一样；我一少半也听不懂，却知道他俩都在借酒疯撒气——和老板，和同事，和婚姻，和家人，和兄弟姐妹……怪不得狼说和熊谈得来。难道，每周他们都是这么过的？无聊死了，全都欠揍！

已是夜里两点半，也没火车，清早六点才有。我和衣盖被地歪在床上，眯着眼装睡；就一间屋，躲也躲不开。两只动物舌头都短了，却还在灌迷魂汤；轮着去卫生间撒尿，回来依旧灌个不止。狼歪坐在破旧沙发上，头已然搭拉着昏昏睡去。熊似乎比他清醒，醉熏熏地对我说道：“我也想有你这么个女朋友，你爱不爱我？你爱不爱……”说罢他摇摇晃晃地去了卫生间。我灵机一动，“噌”地下了床；卫生间的门上总插着钥匙，我麻利地把钥匙一拧，将钥匙藏在碗碟柜里，又上床继续歪着。真所谓：一个人放的东西，十个人找不着。

“嘿！嘿！！开门！开门！！”熊咚咚咚咚地敲门，使大劲地敲。

无奈狼睡得死了一般，呼噜打得山响。为了让他睡得更死，我把一条又脏又旧的被子盖在他身上。

“开门！！开门！！WOLF！WOLF！！你们俩使的什么计策？！开门！！开

门!!! WOLF, 我跟你没完!!! 开门!!!”他又踢又敲又砸又踹。

真好，快五点半了。我穿好衣服和鞋子，背上背包。再见，两只动物，两个酒鬼！再见，我的冒险！

40 意外的签证 / / 政治庇护潮 / / 在干枣树家

外星人：

「六四」过后不久，马三从电话簿上找到我的名字，说在大学上了七、八年，甚至十年的大学生们，要集体申请政治庇护。

“集体申请？”我讶异道：“受迫害是强调个人的事，从没听说过拉帮结伙一起去的。”

“大伙儿一块儿去，不是能壮胆儿嘛。”

“噢，一个人没胆量去？”

“大姐，本来我提议请你给我们讲讲，比如申请书应当怎么写，有哪些注意事项，可是就有人反对，说你太反动，说我们和你不一样。”

“呵哈，那你们夫妇呢？”

“我们没忘了你跟我们说过的，我们打算不和他们一块儿去。”

有感而发，当晚我写了一篇文章，想寄给纽约的一家月刊。我不明白的是：若没有「89 六四」，这许多人不是还不想政治庇护吗？他们对中共四十年的罪恶，到底有多少认识呢？国内学校不提中共罪恶，父母也不提？难道谁都没经历过？再说，在德国的中国大学生，许多人比我小不了两三岁，有的甚至是同岁，难道他们的过去都是白痴？全忘了文革和以前的一切？难道只是一个「六四」才把他们唤醒？如此地后知后觉，可不可笑呢？甚至连一个人申请的勇气都没有？

不是他们不敢理我，而是我都不屑于去理他们！

文章发表之后，由于语言太尖锐，很多人觉得太刺耳，听说，又有多少同胞说我给中国人丢脸了——包括在美国那边，年龄比我还大的知名人士。我就更不懂了：他们还想对中共摇头摆尾吗，象绿旋风一样？他们从来也不觉得自己才是给中国人丢脸的。就连他们这么晚的觉醒，似乎全世界的人也得哄着捧着，得好好抚慰他们——似乎他们慷慨激昂地象英勇献身般地去政治庇护，是给了德国和美国多么大的面子一般。更奇怪的是：他们不是高高兴兴地去申请，而是泪流满面象死了爹妈。

研究中国研究得“透透”的哈宾太太，也忽然觉醒了，高举反共大旗，成了一个协会的头头。我猜，她对丈夫的两面脸，大概是烦透了吧。可这一来，哈宾教授肯定是进不去中国境内了，那小小的台湾，他能满意吗？

狼来了电话——从该市总邮局的电话簿上才找到我的号码。他说：“大熊把门劈了个大洞，才钻了出来。他钻出来时，我自己还睡得死死，熊走了

我竟不知道。次日我见了那大洞还莫名其妙。我打电话问熊，熊楞说是我们俩的事先策划，说我是装睡。我怎么解释他也不信，现在竟和我象仇人一般。我还得花一百五十马克买了个门安上。你说我冤不冤？奇奇，你什么时候能和我见见，好好跟他解释一下？——”

还没听完我就挂断了电话。

收到一封从北京来的德国大使馆的信。为这信，周末坐火车去了阿玲家让她看。她说：“是好事呵，大使说，给你先生的入境签证是无限期的。”

“真的？”我高兴极了。

“他还说，他希望<冬天的童话>有个好的结尾。”

“我给他寄过一本英文版的<冬>。”

“看来，”阿玲道：“是这本书起作用了。我听说，因为『六四』，大使主动给了很多人签证。他希望你们能家庭团聚。”

“可是，他怎么知道老咪兔的怪个性！”

我立即去拷贝了两份，不仅给元元用挂号邮寄了原件，又寄了一份拷贝件，求他千万重视这次不可多得的签证……

再有半个月就毕业了。全班都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希望考个好成绩。这天在学校的楼梯上，遇见一同胞。她叫莲，是来自费学习的。

“可贵了，”她说：“半个月得交四百五十马克。”

“所以全校也就你一个。我们都是劳动局付的。”

“我知道。可我先生是工作交流来的。他三年合同，说话就到期了。我很想请你来我家玩儿，我包水饺，你爱吃吗？”

“好哇。”

“明天？”

她的家在山上。时间一长才知，住在山上的人家，一般都不是穷人——为了空气好和安静，也为了远离那种低收入者的居民高楼；又由于都有好汽车，所以不怕上山下山地不方便。

她家中的陈设很象阿西夫妇的家——家具等等都是别人给的。她丈夫叫大象，与她同岁，都三十七了。儿子小象也十五了。

大象在国内搞航天物理，与德国一研究所作为“研究交换”，他三年到期就得回中国。作为“陪读”的母子俩，也得一同回去。

大象高高大大、魁魁武武，儿子也象他；莲却苍白瘦小。但看得出，她做家务是把好手。我到时，她都快把饺子包完了。

“你包得这么快？”我惊讶她麻利熟练的动作。

“大象说我是包饺子专家，”她笑道。

“她干什么都不行，”大象半开玩笑地道：“就是包饺子行。”

“看你把人说的，莲在国内也有自己的工作呵。”

“我来之前，”莲说道：“是办的停薪留职。”

“再有三个月真就走了？”我问。

“才两个半月，”她纠正道，同时利索地把饺子同时下了两个滚开的锅。

“要不怎么请你来呢，”她一边用锅铲在锅里搅动着，一边看着我说道：

“我们三口都不想回去。原以为工作好就会延期合同，后来才知道，德国有严格规定，多一天延期都不给。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热腾腾四大盘饺子端上桌，莲又备了多种沾料。四人围桌，边吃边聊。小象只是闷头吃，不爱多话。

“那还不好办，”我说：“去政治庇护不就得了？”

“真好办吗？”莲问道。

“你们买过电影票吗？”

三口人发愣地看着我。

“就那么容易。”于是一通讲——如何写申请书、注意事项、得了居留的好处……

小象吃完，说要去同学，礼貌地对我说了再见。

“总之，”我说道：“我看到别人为居留费的心机，就感到自己做得完全正确。你正道儿不走走斜道儿，值吗？哪国人象中国人这么犹犹豫豫，这么想不开呢？”

“要真象你说得这么容易、这么好，”莲道：“那我们干嘛又不去申请呢？”

“你知道我在这儿拿多少工资吗？”大象说：“我在国内是高级科研工资，近六千元，在这儿合三千八百马克净工资。”

“所以每个周末我们都开派对，”莲道：“我不是那么喜欢热闹，他喜欢。一到周末，大学生一来二三十口子。又吃又喝又跳舞，一闹闹到大半夜，过后他还得开着车，一拨拨地送；有时候闹到三四点。”

“现在还开？”

“这半年不开了，因为房屋管理员有意见了，”莲道：“说要是再吵，他

去法院上告，这才停了。”

“是，德国人安静惯了。”

“其实我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么热闹。没吃没喝，现在谁都不来了。”

“嗨，”大象驳道：“别老说事后诸葛亮的话。”他望着我又沉思道：“我是没把握——我们一家申请了之后，我所在的研究所，会不会继续用我？”

我们仨互相看着，认真地思索着。

“我想……”我也没把握地说：“你单位对你的工作满意吗？”

“很满意呀，”大象道。

“既然很满意，你有了居留，他们不是该高兴吗？”

他二人也在想着，提不出反面的理由。

这天中午放学时，干枣树对我说：“到我家去好吗？我请你吃午饭。”

“现在就去？”

“现在。我表弟都准备好了。”

“给我一个意外惊喜？”

步行半小时的路上，他又一次地回忆着在 WU 市的「难民中转站」时，第一次见到我，我们都说了什么，以及当时的天气，风景……仿佛对那一天无比的怀念。

他在班上，属于学得快又好的，尽管外国口音很重，不象波兰人那样。在上课时，索亚叫我们谈过自己的学历、家庭和简单的经历。他的父亲是律师。八年之久的阿富汗内战，他从十几岁起就在军队充当炮灰，父亲竟死

于战乱。

每节课四十五分钟休息十五分钟时，他总想和我多聊什么；无奈我老爱一个人散散步，和谁也不太近乎。自那次索亚与慈教授回去之后，我们之间就象从来没有过那回事一般；就算碰见慈教授，也是心静如水。

干枣树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呢？我暗想：他爱上我了？这种爱有多大的意义？在我这一方是不可能的。但既然谁也没说过什么，不过是普普通通一顿饭，那就去吧。再说，阿富汗的饭菜我也从没吃过和见过呢。

这种低收入者的楼房，在这个城市特别多。因为威省是全国最大工业省，工人多，是 SPD 的天下；而此市又是数一数二的工业城。但全省和全国，失业人口却一年比一年多。

一进屋，便闻见了蒸饭的潮热气。正对进门处是一小极了的厨房；左右两边各有一屋。干枣树先去看右屋，我也好奇地跟着——屋里除了一个老旧床垫，一床旧被，什么也没有；又去看左屋，只见一年轻人正和衣躺在单人床上闷睡。干枣树把他推醒，对我说，这是他表弟。他说了些阿语，他表弟无精打彩地去了厨房。看得出，寂寞沉闷的德国生活，好象把他毁了；哪怕蒸饭的工夫，他也要无聊地睡觉。

他表弟一声不吭地在厨房里做菜。我过去问要不要帮忙，他毫无表情地摇了下头；仿佛对他表哥的邀请，他实在无兴趣，似乎一切都是在从命。我忽发奇想：若我是十七岁的阿国姑娘，他一准会兴奋起来吧？

干枣树说我什么也不用管，给我倒了杯苹果水。我坐在那唯一的单人床边，看他在唯一的小方桌上摆了四个人的餐纸和一个饭勺、一把饭叉。

“四个人？”我问。

“疤老弟要来的，他就住在附近。”

“才一个饭勺？一个饭叉？”

“给你的。我们都不用。”

我环顾四周。比起我的家，这屋里可太简单了：一破床、一破桌、二破椅。他就在这简陋的环境里天天用功。这也正是诺拉一家及许多人所认同的摆设——这才应当是难民住处标准的摆设。

门铃响，疤老弟进来了，他带来两把破凳子。我们天天在班上见，连话都没的寒暄。但他对我和干枣树一闪的含蓄含笑的目光中，很有些平日里从未有过的东西——那一瞥的目光令我心里不快，那完全是一种秘而不宣、想看好戏的邪念。

“吃饭吧，”干枣树对我做了个“请入席”的手势。

“就我一个人有勺叉？”我问。

“我们用手用惯了，”干枣树说。

蒸熟的松软的黄米饭，放在一个很大的金属圆盘上，并掺有切碎的羊肉和葡萄干；盘沿的四周，是油炸过后再敦得软软的长茄子和西红柿。米饭堆得高高的象座小山；那么多的茄子，一人得合三四个。一个木勺，插在饭堆上，也用它拿菜。每人一个菜盘，饭菜合用。

他们都洗过手；左手托盘，右手往嘴里送饭菜——菜汁既不往手心手腕上流，又无一粒饭掉下来，动作熟练得象艺术表演。我看得万分钦佩，自己都忘了吃。

两年多前，干枣树和疤老弟都又干又瘦，现却都丰满润泽，好象高高胖胖了一圈。这三个单身汉，难道都没有女朋友？假如有，一定早就约了来，

还是不问为好。有限的德语，让我们无法畅通地交流，这是最让人遗憾的。

吃完饭，我要帮他们涮洗干净，他们说什么也不干，并说，这些留到晚上才洗，竟把厨房门一关，表示结束。疤老弟拉着他表弟就往外走，说还有事去办，他那奇怪的眼神，又一次似笑非笑地向我和干枣树瞟来，似乎那个秘密早已成竹在胸，而干枣树又一次装做毫无感觉。

一下子就剩了我们俩。我们能聊什么呢？我想说，我也该走了；这时他却拉我坐在床边，他还穿着衣服，立刻平平地躺在床上，匆忙解开胸前的两个纽扣；把我的右手拉过去，伸进他的衣服里，让我抚摸他的胸口；同时闭了双眼，竟从鼻腔里发出象小猪般的哼哼声。

“等等。”我说着就离开了他，开了屋门，背起挂在过道里的背包，开了房门扬长而去。

41 毕业 / / 疤老弟的异常举止 / / 黑猩猩朝我奔了过来

外星人：

我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拿到辛勤八个月的毕业证书，看着索亚亲笔写的不错的评语，心里是何等高兴啊！

奇妙的是：全班除了我想工作之外，所有的波兰同学，全想继续上学——哪怕三位年纪比我还大得多的。有的想学门职业，有的说还想学习德语。干枣树和疤老弟去报考了本市大学，先当一年的旁听生，然后根据成绩，也许会成为正式的大学生。

我深感一过四十岁学德语的困难，也不以为总做学生有什么快乐。我要去工作，要给国家报税，要入德籍。

最后一天是大家吃吃喝喝开派对——自觉自愿地拿来食品、买的糖果和饮料。两位波兰女同学烤的大蛋糕尤其出色，比卖的还好吃，新鲜可口又不那么甜。食品饮料丰丰富富地摆满了拼起来的长桌。由于各班都在这天毕业，因此各教室放着音乐，整个楼里象开音乐会；外班本班互相乱串，互相品尝，互相说着祝福的话……

疤老弟当着全班的面，大声地说：他要送给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学，一件包装华丽的礼品。全班都感到诧异，甚至包括那女同学；因为平素他们关系太一般。大家正面面相觑，他忽然又拿出一件小礼物，给了那位极会烤蛋糕的五十多岁的女同学，并心潮起伏地向大家高声激动地宣布道：“她是最崇拜的女性——她温柔、美丽、勤劳、学习努力、是个极好极优秀的家庭妇女，又是个好母亲，是全世界伟大的女性，我向你致敬！”

虽然那女同学高兴得直咧嘴，但大家仍是感到太意外；一是这种场合，没人送什么礼物，又不是圣诞节；二是疤老弟平素与她们从不多话，交往平淡之极，好感从无表现。如今他突然热得烫手、心潮激动、举止异常，就连那两位女同学，都有些不好意思。但这毕竟是他的好意，大家虽然诧异，也只当他有些二百五，或许对女人渴望太久罢了。

干枣树和疤老弟一眼也不看我，一句话也不和我说。只有我明白疤老弟的异常举止——他俩要在这一天，让我知道：他们眼里根本没有我。

自我那天逃跑之后，干枣树一直很沉静，只是和我再没有话。就连这分别之日，他也没话，反而和他的同乡演这一幕戏。直到多年之后，当美国的「9.11」事件震惊全世界，调查好久后，说劫机者竟是在德国的温床上多年生活的亚裔人——在电视上贴出疤老弟的照片时，我虽然惊呆了，却又不觉得特别奇怪。

拿着毕业证书去劳动局报道，公务员当即拷贝，放入我的档案。档案，档案，我没想到自己的档案竟有厚厚的一大本！德国人说：“纸纸纸，纸纸纸，到你死时，有一屋子纸！”

在中国，一提“档案”就人人害怕——从1950年到文革这四十年不停的政治运动，人人被“触及灵魂”，认罪书、检讨书、别人检举你的材料……再加上“黑五类”的出身、父母的成份、个人的表现……全都在那你永远看不见的档案里。就算「改革开放」以后，中共用“吃喝嫖赌”制造盛世，就算物质生活比以前丰富，可是，“政治犯”与“死刑犯”仍是全世界最高的，上访的冤民仍是全世界最多的，那黑档案象黑灵魂似地仍跟着每一个人！

德国没有这些黑材料，但办什么事都用信——“纸”来联系；你若不小心丢了一张纸，你就完了——那麻烦大了去了。

公务员立即给了我两个工作：一个是去德国饭店做帮厨，一个是去游

乐厅当看管员，都是满工时；都是一小时八马克，我想先去德国饭店。

那家饭店在山上，叫「金山克劳斯」。山上陡得骑不了车，只能推着，四十九分钟才到了那里。

是早上十点，离营业时间还有一小时。见了约六十岁的老板克劳斯和他太太；一位长相极丑、还斜一只眼的四十来岁女跑堂玫瑰；以及五十来岁，黑不溜湫五大三粗的洗碗工黑猩猩。

“就这几个人，”沉静温和的老板娘说道。

“我带你整个饭店看一下，”兰眼睛的克劳斯说道。

我跟着他看了一个遍——从地下极大的卫生间到饭店、到仓库、到冷冻室、到他的住房。处处干净极了，处处收拾和装饰得美观大方。十几米长的高高的大玻璃窗，将本市最美的景点全部俯瞰在眼底。

比较德国和中国饭店的装饰，截然不同：中国饭店都是千篇一律的龙凤板、福喜字、笑面佛，陈旧死板又俗气；窗户小，不亮堂，总显得黑咕隆冬；而德国饭店没有一家重样，各个装饰得新鲜、活泼、朴实、大方，各有各的特色。

“这儿装饰得真美呵！”我不由感叹道。

“这里经常办结婚宴席呢，”克劳斯不无骄傲地说，他指指前面：“有结婚或生日宴席的话，把白纱帘一拉，就不妨碍别的顾客了。”

他带我去厨房，交代了我应做的工作：“今天是削土豆，削葱头；你先熟悉一下，先试工二周，然后再定。我动过心脏手术，知道吗，你看——”，他说着扒开他的汗衫，开膛之后又愈合的长长的刀口，令我吃惊。他又问道：“听得见吗？这心瓣膜是塑料的呀，每分每秒喇啦啦的响啊，听得见吗？”

我将头凑进些，屏声静气地点点头。

当晚回家，累得不想动。虽然顾客并不多，和「莲花楼」简直没法比；但就我一个帮厨，一有空还要帮老板娘做蛋糕、削苹果、擦冰箱、擦冷冻房，似乎好长时间没人干的活，都恨不得让我去干。而我又不会说“不”、不会偷懒，只好干完这个干那个。甚至黑猩猩每天只干两个小时，多一分钟也不干，到点就走人——脏杯盘没人洗，还得抓空去用洗碗机洗杯盘刀叉。

做到第四天，克劳斯说，他和他太太对我的工作很满意，说我可以学做各种菜汁了。他说，万一他突然不行了，我就可以代替他。

“那..... 能不能每周发一次工资呢?”

“一月发四回?” 他象从未听说过。

“是呀。”

“不好。我们还从没这么发过，都是每月一号才发。”

“可有的饭店是一周发一次呀。”

“我们没这么发过。不用担心，少不了你的。”

我也只好不说什么。除了老板夫妇，每人一周休息一天，我休息星期四。这天我刚吃完早点，正给元元写信：“大使给的无限期签证，你收到没有？你到底什么时候来？”

忽听门铃响。

“老板?” ——是克劳斯。

“你下来，我们去买货。”

“今天我休息呀。”

“嗨，我没有别人哪。我在汽车里等你，快下来。”

唉！我无奈地只好下了楼。克劳斯让我坐在他旁边，我不好意思表示自己的不满。

“你一个人能有什么事？”他说：“买买东西也不累。买完了，我会把你送回家。”

“去哪儿买东西？”

“你肯定没去过，很远，专门供应老板的大超市。”

他不紧不慢地开着车，一路上谈着他和他的家庭。他说他太太是法国人，是在巴黎和她认识的。他们有个儿子，三十多岁了，但和他们的关系不好，不来往。

“生意很难做呵，”他叹道：“饭店越开越多，生意越来越差。全仗着下午的咖啡和点心才有些收入。”

“您为什么不退休呢？”

“我还不到年龄呵。我才五十二岁呵。”

“那您想过把菜谱改变一下吗？”

“怎么改？”

“比如，添加一些亚洲饭菜？”

“你会做吗？”

“会做一些。”

“那好，明天你就试试。”

“别忘了买一些中国的酱和酱油、佐料。”

买完东西，回到饭店，帮他搬进冷冻室。想着明天要展示自己的手艺，又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到老板开车送我回家时，已是下午四点半了，这一天

等于没有休息。

听说德国大厨每月净工资六千马克。哪怕开始先挣一半也是好的呀。只要老板肯付钱，加班加点也认了。

次日上午，克劳斯嘱我做几个中国菜，别的杂活先不用干。我做了酸甜鱼、葱头爆牛肉、炒鸡丝杂菜、中式沙拉、猪肉白菜小馅饼、香米饭、玉米茸汤。老板的弟弟、弟媳和侄子无意中来访，刚刚摆了一桌子饭菜，我随便地对他们说道：“一起吃吧。”三口人看看老板夫妇，见老板娘微一点头，便有些怯生生地坐了下来。玫瑰在那头招待着刚进来的两位客人，我和黑猩猩依旧在厨房干活。

五个人慢慢地、仔细地品尝。所有的菜没有味精，汤和菜的做法也不一样——这是与中国饭店的不同之处。克劳斯又叫玫瑰也来品尝。六个人的结论是：很不错，很有特色。老板脸上露出喜色：“我们在菜谱上加一页——<新添亚式特色菜>。”

“什么时候开始？”我问。

“我得把菜谱弄好，还得些日子。”

他弟弟一家刚走，他就在厨房里对我说道：“你不该说让他们在这儿吃饭。我们关系不好，我从来没留过他们吃饭。”

这晚下班时，又是十点半了；其实老早就没客人了。玫瑰说，她请我去一家酒吧坐坐、喝喝、乐乐。

“为什么？”

“今天是我生日。”

“噢,真的? 祝贺你啦!”我握握她的手:“就我们两个?”

“还有我男朋友。完后我会开车送你回家。”

她让我把自行车平放在她的后车箱内,一半还露在车外;就来到了一家酒吧——这是我第三次进酒吧。

她的男朋友也到了,一个老实巴交几乎没话的德国人。我们围着酒台,坐在高凳上;玫瑰坐在中间。她为我们要了酒水。那一大杯冰凉的可乐,让我简直发怵。而她俩却咕咚咚地一大杯凉啤酒又一大杯凉可乐,然后又是啤酒.....玫瑰是连喝带笑,笑得东倒西歪,似坐也坐不稳;而那男人却一声不吭,只是闷头喝着。我甚至怀疑他不过是她的邻居罢了。

“我在克劳斯那儿.....哈哈.....做了十九年啦.....哈哈.....”

她笑得那么响、那么奇怪——好象立意要用酒水制造出一串串的笑声,不笑也得笑;仿佛她的半生孤独之苦、种种的不得意,都要用响亮的笑声驱散,把它们驱到远远的天边,让它们再也不要靠近她.....也许,她每年都是这样过生日的?

一周后,当我在每家信箱里塞的免费德文报纸上,看到一个大大的广告时,真惊呆了——「特技大厨奇奇,烹调亚式菜肴,无味精,美味绝伦,敬请光顾『金山克劳斯』」。

天,他怎么也不事先和我说一声?我连个肉毛儿菜毛儿都没切,要是呼啦啦来了十个二十个人,这饭可怎么做?再说,我既然成了大厨,这工资也不能象帮厨一样呵。

我早到了十五分钟,想和老板说说这事。没想到克劳斯生了气:“什么?

我广告都登出来了，你却要拿我一手？”

“这怎么叫拿你一手？”我不解地道：“你登广告之前，总该告诉我呀。第一我什么都没准备；第二，这工资也不能象洗碗工一样呵。这是合理的呀。”

“你这明明是拿我一手！”

“还有一个办法，”我心平气和地说：“不会让你有任何损失：如果我做了中国饭，从当天的收入中，我提取一点提成；没人吃中国饭，我还照旧帮你做德国饭，工资还按帮厨算，你不会有任何损失了。”

“你不要跟我讲条件！”他吼道，脸都气红了：“你只应当快快准备，一会儿客人来了怎么办？”

“你事先连招呼也不打，你自己做去好了。”

“你不做？好，你走人！”他愤怒地摆摆手。

“我走人可以。我干了两周，你把工钱付我。”

“工钱？广告费就六百，给你什么工钱？！”

“你不讲理！”

“你给我造成多大损失？你再嚷，我叫警察！”

“你必须给我工钱！”

他气得脸红涨涨，立即给警察打电话。

玫瑰和黑猩猩高兴地看热闹，老板太太坐在桌边吸烟，不发一语。

有客人进来吃饭，克劳斯对我斥责道：“你赶紧走，否则警察会把你带走！”

“你不给我工钱我就不走，”我索性站在饭厅的水吧台。

又有一对年轻男女进来问道：“我们看了广告，你们有什么好的新鲜的可以提供？”

玫瑰抱着两个菜谱大本子轻声道：“很抱歉，今天还不行……大师傅病了。我们的老菜码也很不错。”

“你必须给我工钱！”我嚷道。

那两位本来想走，一听这话反倒坐下了，玫瑰笑嘻嘻地递上菜谱。

一辆警车停在大门前，两位男警察走进来，问了情况。我们各说各的理。四个顾客津津有味地听着。

“老板让你走，”一位警察说道：“你就得走。”

“我干了两周，他一分不给，就这么走？”

“你的工资付了广告了！”克劳斯叫道。

“是你自己要做，你太不讲理！”我说。

“你立即走人！”另一位警察命令道：“你可以通过律师去告他。但你必须离开这里。”

“你不离开我们要强迫你离开。”两个警察走近前来。

我使劲攥住门把手，嚷道：“你必须付我工资！”

“黑猩猩！”克劳斯朝厨房喊道：“把她架出去！”

黑猩猩奔了过来……那真是一幅绝妙的油画！

42 “快离开这里！” / / 《投奔怒海》的故事

外星人：

当我冤枉万分地推着自行车，往陡峭的山下走时，路过一个长满了蔷薇花的僻静角落，再也走不动，坐在地上就哭起来。四周静极了，一个人也没有，我索性哇哇大哭。我哭自己的孤独无助，哭那让我生够了气的丈夫；哭德国人居然也有这样的老板；哭自己明明被人欺负，却由于语言和地位，没有办法去告谁……

“嘿，哭什么哭？你太吵了！快离开这里！”

循着声音望去，才发现身后高大浓密的树后，隐着一座房子，一位胖胖的中年德国妇女，站在开着的窗边，不满地盯住我。

“太吵了，快离开这里！”

多么相亲相爱的国家啊。安徒生童话中的小女孩必然要被冻死的，恰是冻死在烤鹅人家的窗外。我站起来，推着车走下山去……

我忘不了，刚来德国时出于好奇，第一次走进天主教教堂，想看看什么是做礼拜。我穿得整整齐齐，刚走进去，牧师拦住我，温和地请我站到最后一排去——和不是白皮肤的人站在一起。而前面都是白皮肤、衣冠楚楚的德国人。我原以为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想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

我们随着德国人一起唱呵，念呵，起起坐坐呵…… 礼拜终于做完了，楼下有极大的男女卫生间，我去解小手；刚要进去，迎面一位七八十岁的德

国老太太正出来，我友好地朝她微笑并一点头，而她却象盯怪物似地盯着我，那铁冷的目光竟是分外的反感，硬生生地与我擦身而过。哦，刚才大家还没完没了地唱：“上帝爱小羊，上帝爱你也爱我，爱爱爱……”，这老太太唱了一生吧？

而那位整天想着发财的乌托邦丈夫，是否会想到今天的情景？他如果知道，定会轻巧地说：“你为什么不回来？”不可能呵，我不可能写认错书；我想出版一本不被删改的书呵。不管代价多大，我都只能在这里。

努太太书面告之：由于杂费等等都在涨，住了一年之后的房租，从下月起，涨百分之八。水电费每月是四十六马克，暖气费是每月八十九马克……小刘说，她婆婆四口人，三居室九十平米的费用也就这些，她怀疑努太太暗用了我的水电煤气表——秘密的装置；而那些表安在哪里，我们却谁也看不见。

空了很久的瓦玛的居室，终于租给了一对外省来的德国退休老夫妇。

市中心又开了一家中国饭店。为了赶紧挣钱，又去当了水巴，净工资一千五，三个月后按一千报税。王老板来自香港，王太太是德国人，已和老板有了一对儿女。

再去杂货店不见了小刘。她丈夫说，她怀孕了，由于以前流过产，医生嘱咐，只能卧床不起，才可保胎。他说：“她整天躺着，可烦闷了，你要是有空，最好去看看她。”

一周歇一天，那天吃过早点，就去了她家；买了两件婴儿的小衣服，作

为对她的祝贺并给她解闷儿，还带了一本《爱的呼唤》。

她家不远，步行才二十分钟。小刘收了礼物，很高兴，说这书她尤其想看。她躺着说道：“整天不能走动，都快烦死了。”

“都说你是越南人，”我问道：“你真的是吗？”

“其实我是广东人哪。我先生是南越华侨。他们一家是投奔怒海来的。”

“<投奔怒海>？有这电影吧？”

“真实的，比电影还厉害呢。”她说道：“他家，在南越有三家店，很有产业的。北越一来，都害怕共产党，就跑呗。只能坐船跑。没钱的，跑不了；有钱的，几家凑钱买船。他不愿提那些事呵，一提就难受呵。几十口人挤在一艘船上，在海上，三四十天缺吃少喝；风浪一大，整船翻了死了的不少哇。”

“他全家还算幸运？”

“谈不到幸运。船上生病的、死了的、疯了的、想自杀的，唉，一言难尽！他一家九口，三个死了，只好扔进海里；一个姐姐在船上疯了，到今天还在本市疯人院——这就是幸运的。”

“这样！那，他们又怎样被德国发现的呢？”

“最后，谁还划得动船哪？就任船漂啦。进了德国的海域，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活着的也都快死了。那时候，西方国家都知道很多南越人投奔了怒海，德国的巡逻艇发现了他们，救了他们。”

我沉默地点点头。

“一开始在汉堡登陆，组织他们学习德语呀；后来全国分配，就分到了这儿。早先对他们的待遇，比现在对难民的待遇还好呢。后来难民太多，

慢慢的就差多啦。”

“你们又是怎么结的婚呢?”

“我是以旅游身份来的，有个亲戚给我做的担保。当时我在『莲花楼』做水巴，想留下来。老板给我介绍的他。”

“当时他有工作?”

“一开始他在工厂做了几个月，不习惯。后来他摆地摊卖水果蔬菜。再后来，开了间小杂货店。”

“就是现在的店?”

“是。可是你不知道，这种店很难开的。”

“怎么难开呢?”

“它不象饭店天天能见到现金。杂货店的现金，你得去定购下一拨的货，定少了人家不送；仓库里积存的货物，就是你的钱。你看我们的小店架子上满满当当，那是多少年才成了这个样子。我认识他的时候，觉得他的店空空的，没有什么，就那么几样东西；他说填进去了一万多马克，我还不信呢。”

“你们的婚礼热闹吗?”

“别提啦。我们想结婚，他全家反对，尤其是他母亲。我们私自登记结了婚，在『莲花楼』吃了顿饭，他家一个人也没来。只有『莲花楼』的老板和老板娘同我们一起吃的。”

“他家为什么反对?”

“他母亲认为不门当户对，觉得大陆人太穷；说我看他是老板才想和他结婚的。再加上流了一次产，他母亲闲话更多了。”

“结婚这么多年了，现在总该好些了吧？”

“一直不太好。虽然偶尔也来往、也说话，可你打心里和他们没法太亲，说不上的那种感觉。”

我无言以答。按理，投奔了一次怒海，和阎王爷打了交道，心地总该有所改变——应变得能宽容、能博爱、能想得开才对；但事实和幻想总是大有差距。

43 安其的直白 / / 夜晚来客 / / 圣诞聚餐

外星人：

老板与老板相比，确实有所不同。王老板很小时同父母来到德国，与他太太青梅竹马，同在一个小学和中学读书。他父母很有钱，他太太却家境贫寒。高中毕业后，他不想上大学，又找不到工作，由父母资助，只好开饭店。

王老板相貌丑、窝窝囊囊、不爱说话、心地却厚道；王太身材苗条、褐眼金发、活泼爱说、神采飞扬，是个美人儿。

“你怎么就爱上他了呢？”有一次我问她。

她笑笑：“小时候，他经常送我小礼物呵，都很贵的。后来，他带我去香

港，玩得好痛快哦！我们在香港结的婚哪。”

由于这家饭店的诞生，地点太好，「莲花楼」和其他三家的生意都少了一半。店面很大，三间大厅，周末必须两个人做水巴。四五个跑堂，每人工资二千四。饭店第一个月收入二十五万马克！

“三个月以后，生意一般会下来，”吃中午饭时，跑堂安其说。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侨，约二十六七岁，相貌周正，气质可爱；常因他的好相貌和亲切的笑容，他得的小费总比别人多。其他跑堂都结了婚，独他还没女朋友。

“为什么三个月以后会下来？”我问。

“德国人都是好奇心强，都是一阵风儿；一家饭店新开张，一窝蜂地都去吃。过了三个月，那才是真生意。”

“你说话这么在行，以后你也一定是开饭店喽？”

“那还用说？”他笑笑：“可我的长期居留还没解决呢。阿奇，我不明白，你干活那么快又利索，为什么不去做跑堂，多来钱呵？”

“我四十二岁了，做不动呵。你们一只手托二十多个大瓷盘子，我没那么大力气呀。”

他认真地看着我：“谁也不信你是四十二，说三十二都嫌多了。”

“谢谢你了。”

“听说你结了三次婚？”

“是呀。”

那些写在《一个大童话》里的事，我是懒得跟人说的。但有人看过《爱的呼唤》，一传就都传出去了。

他见我我不想说，也就不问。

每次吃饭时，这里比别的饭店自由——大家各自找地方，用块脏台布在桌边一铺就行了。此时，就我俩坐在一张小桌的对面。

“你先生呢？”

“在北京。我给他办了两次经济担保他都没来，我也不知他什么时候来。”

“我看他不会来了。”

我不语地吃着饭。

吃完饭步行回家，没走多远，忽听身后有人叫道：“阿奇！”

一回头，是安其。

“天气这么好，我们在这儿聊会儿吧。”

饭店门外就是老城步行区，长长的林荫道，树下设有很多绿色的长靠背椅。行人不多，许多椅子空着。

我不想坐下，只是站靠在后椅背上。他也象我一样靠着。

“你要聊什么？”

“我.....我只喜欢结过三次婚的人。”

这突然的直率的道白，使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我沉默了片刻，认真地看着他说道：“安其，你很可爱；要是我只有二十多岁的话。可我比你大太多了。不可能的，安其，谢谢你。”

我往家走去.....想想我在德国，竟有好几个男人对我表示好感——有我愿提和不愿提的，可我都拒绝了。然而我和那千呼万唤也不来的元元仍在生着气，生个没完。安其是可爱的，他希望我离婚，和他结婚，开饭店，开了一家又一家；我老了，他可以找年轻女跑堂、女朋友，有了孩子，他再

和我离婚……不，我只想过简单的生活。我不需要那么多钱——不想为钱太操劳、太紧张、太张罗、太牵绊；我只需要一个能说说话的伴儿。

有闲时，还是常给元元和国内的老友们写信。但在给他的信上，多了一句以前从没有过的话：“你不要鸡飞蛋打几头空”——这句民间俗话原是“两头”，我却改为“几头”——他失去我，失去我们的感情，失去了他的工作，失去了他的所谓生意，失去了德国，失去了游览许多国家的快乐，失去了一切他本来不会失去的——我总有这预感。

至于我的《一个大童话》何时才能再出版，我简直不敢想。再说，就在台北宣布不出版的同时，他们却印了第二版——又一种封面设计，并邮赠我二十本新书。原错依然保留，书名也未改；到底他们印了多少，没人告诉我，反正我是无分文。这样一来，我也就更难去找新的出版社。

一本书主义者，也没那么多书要写，一心一意地体会德国的生活吧。

小刘生了个儿子，刚出满月，就抱着儿子回了广州。她已经五年没见她母亲了。

这天我休息，晚上正准备睡觉，忽听门铃响。

“谁？”

“是我。”

——是小刘的先生？！

“这么晚，十点了，”我说。

“嗯……我有点事。”

我将信将疑，只好开了门。他还从没见过这里。他上了楼，看我的目光有些不大自然；但他一向沉稳持重，不慌不忙地进了屋。

我只把房门虚掩着。

“坐吧。”

他坐在沙发上，有些意外地环视着屋子。我心想：比你们那个又脏又乱的家好看多了吧。

“小刘已经到了中国吗？”我只好没话找话，坐在另一个沙发上。

“呀，到了。”他有些心神不定地看看地毯，又飞快地略我一眼。

“从来没有人这么晚来找过我。”我端坐着，不好意思说：来前也不打电话；德国人习惯一过晚八点，不再打电话也不再串门，难道你不知道？

“呀，来看看。”他又掠了我一眼，又空望望屋顶。

“你要是没什么事，我可要睡觉了。”

“那……好，我走了。”

他刚一出屋，我就把房门锁上了。心里真地生气——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小刘说过，早先他住在南越时，他兄弟们一有了钱，就去夜酒吧找妓女寻开心。如今小刘刚走，他就对别人起歹心，真不明白他们结婚的基础是什么！我只为小刘窝囊。难道，亚州人就是这样理解西方的自由的？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老城中又办起了圣诞市场。阿铃打电话叫我去。但自从有了工作，很少去她那里了——一周才歇一天，也实在没有精力。我自己也买了圣诞小彩灯，挂在客厅大窗的四边；夜里开了彩灯，昏暗中，

那五彩缤纷的柔和的光线，带给我朦胧梦幻的世界.....可爱的屋子，又多了一道魅力.....如果元元和我一起坐在沙发上欣赏，可该多好！他不用去工作，我的工资足够养活他，还有剩余。我们每年都去度假，多美的生活啊！唉！他怎就这么想不开啊？他和绿旋风那无法安静的心态全是病。只有宁静和有保障的生活，才能治疗他们的病.....

每到中午休息时，就爱去逛圣诞市场；那么多奇妙可爱的手工艺品；琳琅满目、精美多彩的圣诞礼品，让人看不够。去邮局给元元寄了五百马克和一个大圣诞卡，让他也体会一下圣诞节的快乐。

努太太送给每个房客一个包装精美的圣诞礼物。打开一看，是一块很贵的味儿极好的香皂。我回赠给她一块丝绸桌布，她很高兴。

圣诞除夕下午，饭店关门。中午，老板让大厨多做几个菜，又拿出几瓶好酒，供大家吃喝。几张饭桌拼在一起，摆满了美味佳肴。厨房的三位员工，也和我们一起吃。大厨和二厨都是马来西亚华侨。二厨喝了不少烧酒，醉熏熏地哭了起来。

“醉了，”大厨道：“这小子醉了。”

二厨每天沉默不语，干活飞快，瘦得象只蚂蚁。他约三十多岁，我从没见过他笑过。

“.....我的命苦，只有找鬼婆啊！”他哭得痛不欲生，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我哥哥的命也苦，找的也是鬼婆啊！.....怎么我们就都该找鬼婆.....那个鬼不死的婆娘.....鬼婆鬼佬啊.....我该你们欠你们的了？我这辈子呵！.....”

到了饭店才知，华人爱把洋人叫“鬼”。

“他怎么了？”我问大厨。

“他和那鬼婆感情不好。”

“她不爱他？”

“是他不爱她。”

“不爱为什么还结婚？”

“为了居留哇。孩子都两个了。”

正说着，一位三十来岁的德国女人进来找他，她长相一般，微胖，却透着朴实；她走过去抚住他的肩膀，弯下身来，说着许多安慰的德语，劝他回家；那哄慰的爱语和耐心，就象哄一个大孩子。二厨趴在桌上还哭，尽管不再骂“鬼婆”……

不久，听说离开这里的二厨离婚了——他已取得了长久居留。两个孩子都由母亲抚养。或许，他的家乡早就有他的意中人？而他钱也攒了，手艺也学了，可以去别的城市开饭店了？

小刘从广州回来了，我自然不会对她说一个字——那晚的事。

在杂货店里买东西时，遇见了二厨的原太太，她正对小刘诉说她的委屈。

“我恨亚州人，”她说：“他们只会利用人。我恨他们！”

44 全德最大的游乐厅公司 / / 东西德合并

外星人：

王太每晚必去山上的 **CASINO** 赌钱。那是个高级赌厅，不穿西服革履和夜礼服，是不让进门的。

每逢老板不在时，王太便朝跑堂要现金，至少三千；带上夜礼服，开着高级轿车就去了——进大门前在车里换了衣服再化妆就行了。

她十回得输九次，一次赢了四千，乐得和人人说。

饭店关门老板结帐时，跑堂给他的总是王太拿了钱的条子。次数一多，老板急了：“她再要钱，谁也不能给她！”

架不住王太与那位好说话的跑堂要钱。老板怒道：“谁再给她，我解雇谁！我才是法人，我才是真正的老板！”

过去夫妇俩没那么多钱，也没这些事。如今就算老板不嚷，王太也去不了了——她怀孕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她每天在饭店里打手机，一打就一二个小时——只要老板不在。她那浑身浸透的幸福感，那说不完的甜言蜜语，人人都看得见、觉得出；安其私下里和别人说：“老板娘有了情人了。”

是在赌场认识的白马王子型的德国人？难道她想找个更迷人更有钱的？

第三个孩子是女儿，相貌与哥哥姐姐都不同，和父母也不一样——皮

肤雪白，红头发，眼珠是天兰色。王老板竟暗中去做了遗传基因化验：孩子不是他的！

他苦闷中对大厨说了，结果饭店的员工全知道了。而王太的变化更是奇特：不仅不再打手机，且一天到晚不见笑容，也不打扮了；衣服拉哩拉塌，象个清洁工，连说话的精神都没有。

甬说，王子不和她玩了；她想来真的，他就躲了。

夫妻俩的裂痕正在无法弥合之际，夜里饭店着起了大火。幸亏消防队来得及时。一边的大厅全部烧毁，另两个厅也被熏黑，饭店只好停业。保险公司一次次地来检查，问那一晚谁是最后一个走的？责任推在一个和老板夫妇不太亲近的跑堂身上。而那跑堂满腹冤屈，气得不干也不能逃脱，只好花钱请律师上诉。

我结束了这份工作，被一家游乐厅安置做为看管员，定了满工时又无试工期的长期合同。

这是以德国人的姓来命名的大公司——「树林子吵」(Waldlaut)。

「树林子吵」老板有三百五十家分店，遍布全德国；是西欧赫赫有名、首屈一指的顶尖公司。它不仅有二十多个工程师和许多技术员，设计和制作电子游乐机并行销全国及全世界；还自己开游乐厅，一层层地往下领导；不仅让人们有更好的消闲场所，自己也有丰厚的收入。公司的画标就是欢笑的树林，贴在每个厅的大玻璃窗和最显眼的地方。

去德国公司找工作，光有工作许可是不行的，「德语中心」的毕业证书是不可缺的——你必须会说和会写。每家分店有一个负责人，连同员工都是女性；再往上，是管几个分店的厅管以及技术员(每天来分店修理游乐机)，

都是男性。而我是这家大公司众多员工中唯一的中国人，其他国籍的员工也非常少。

工作内容非常简单：看管有各种游乐机的大厅，保持正常运做；哪个游乐机里的小灯泡坏了，或是出故障了，要每天详细地写在本子上，以便技术员来修理；每人有一千马克的现金，为了给顾客换硬币；投进硬币，游乐机才能转动。下班前将个人的钱箱锁在固定的屋子里，钱数不许少分文，厅管可随时检查。还有几个其他的本子：食品、咖啡、电话、桌球；在交接班时，都要用这些本子一一地向同事交代清楚帐目。每个人是：三天早班，三天晚班，三天休息；每年有一个月度假；工作一年有圣诞节双工资。

早班八点开始，是一个人盯班。开门时，和清洁女工一起开双锁。晚班是两个人，夜里一点下班时，大门要两人同时上锁。固定的 TAX 司机准时等在门外，送每人到家门口，公司付车费。

为了安全和不打扰顾客，看管员工作的小屋，四面都是厚玻璃围住的，前后有个小小的换钱口。玻璃门关紧时，外面开不开。

领导不希望我们和顾客闲聊。工作服是统一的——白汗衫，青兰色的西服和西服裙。

每月有“信任奖”；每位员工的生日，公司赠予三十马克；上班时可以享用白送给顾客的咖啡和点心。

有清洁工擦卫生间、吸地毯尘和洗大玻璃；但看管员在下班前应把游乐机、烟灰缸、桌球面等等清理干净。

在这城市里也有其他公司的游乐厅，我也进去看过，和看管员也聊过；但无论是对员工的待遇，还是在安全与管理上，都不如我们老板的经营管

理和规模。游乐厅也象旅馆一样有级别：一二星级还没有，是从三星到五星级；唯有「树林子吵公司」是五星级。

这工作，比饭店和面包干厂要轻闲十倍。没顾客时，喝喝咖啡，看看德文报纸，想想闲事，写写家信，甚至设计自己的衣裙，下了班好去买合适的布料。那几年真没少设计和缝制自己的衣服，尤其自己从小就爱穿裙子。HA 市不仅面包干是世界名产，还出产钢铁铸造、电池和布匹印染。大布店里的棉、麻、毛料布匹丰富多彩得令人眼花缭乱。花了四百八十马克买了个电动缝纫机，做出的连衣裙，既合身又漂亮，远赛过商店里卖的。

早晚班的时间，要么上午清闲，要么下午清闲，自由支配，心安理得；老板上了各种税和保险，净工资一千四百马克，每月都有些剩余存入银行。和顾客及同事们相安无事，从没感到这么舒服过。

如果元元来，我们不仅足够生活，还能有富余花在一年一次的度假上，能去许多国家。比起那些老想开饭店的跑堂们，我的净收入远不如他们，他们不屑于来这里工作，更不能比财大气粗的老板们。可我却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非常知足。唯一的缺憾就是和元元生气，自己少了个伴侣，感到孤独。

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合并。科尔总理自豪地宣布：“我们要走进历史！”全世界为之欢欣鼓舞。海外的中文报刊上，都一面倒地认为中共的日子也不长了。我却没这预感，因为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比苏联差得太远了。

东西德合并的直接体会，就是大街上忽然多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以

至夜晚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 十点多还能安全地在大街上散步。犯罪率突然猛增。再就是，报纸上过去老找不到人做的低种工作，一下子都有人做了；东边的都想来西边定居和工作。

电视上说，政府要用多少多少个亿，让东边变得好起来。

难民还在不断地大量涌入，每天新闻报道的第一条，仍是几百近千的数字。随着电子工业的发展，随着全面的自动化，失业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多。各省市都出现大量财政赤字。国会的实况直播，天天是几个党吵来吵去，关于难民的政策达不成一致……

早班。八点差十分，与清洁女工刺头在厅外的门前会齐。我递给她一只钥匙。双锁安在大门的两侧，两人同时将钥匙插进去，一人喊：“一、二、三！”，到“三”时一同拧开，红色的安全小灯亮了，门才能开。

进了厅，她去打扫三个卫生间，然后吸尘，在这儿吃了早点才走。而我开了玻璃室的门，先打电话向总部报道；接着看我钱箱里的现金是否对数。再看上一班的几个本子与仓库的实物都对否。若不对，要马上写明，并给上一班同事或厅管打电话；若对了，就一一签字。

厅里不放音乐，因为不能吵顾客；他们玩也好，为了赢钱也好，都需要安静。因为每台游乐机开起来时，就够“音乐”的了。

早班顾客不多。用咖啡机烧了一壶新鲜咖啡，为顾客，也为我们自己。斑马提着一袋子面包进来了，他是单身汉，快五十岁了；瘦瘦干干、又矮又小，好象从一生下来就发育不良，但人却挺精神。我们高兴地打了招呼，

他递给我一袋新鲜面包。

“有你爱吃的黄油卷，”他说。

他刚下夜班，他说只爱打夜班。他在面包房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是面包师。他坐在玻璃室外的小圆桌边的高凳上，点了支烟，慢慢地吸着。我把一大杯热咖啡端给他，他喝了一口。

“今天味儿够浓，昨天安卡弄得太淡了。”

“我知道你爱喝浓的呀。”

“太清静了！”斑马叹道：“十多年前，这店里从早到晚都老有不少人哪！尤其周末，那叫热闹！”他摇摇头。

我站在玻璃室的桌边，切开三个新鲜小面包，抹上人造黄油，放上瘦肉香肠片和乳酪，放在一个盘子上，又端了一大杯咖啡，招呼刺头来吃早点。典型的德国人都只爱喝黑咖啡，我却象许多外国人一样，要放很多炼乳和一点糖。我坐在玻璃室里，吃着我的早点，玻璃门半开着，否则就觉得对斑马不太礼貌；从一建厅起，斑马就是这儿的老朋友。

刺头三十多岁，她的短发用喷发液，弄得象刺猬似的支支楞楞。她和斑马对面地坐着，瞎侃瞎聊。

“你和你先生怎么样了，真离了吗？”斑马问。

“是我提出来的，”刺头说：“还能不离？昨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女朋友接的，我没好气儿，质问他们周末是怎么对待我俩孩子的，那王八蛋立马就火了，说我对孩子的话偏听偏信……”

“今年你想去哪儿度假？”

“我？去土耳其。”刺头两眼充满了幻想。

“就你一个？还是有伴儿？”

我似听非听地想：这斑马为了讨好我们，天天带来十好几个面包，他的老板就没发现？听说老板是用面的斤数计算面包数的，除非他把每个面包都做得小一些，否则……

老顾客石子太太来了，我礼貌地和她打招呼，她又坐在她那“固定”的老虎机前的椅子上。我端上一杯咖啡，问她要不要点心。

“小饼干，”她点上支烟，递给我一张百元钞票：“二十个。”

她投进去一枚五马克的硬币，“老虎机”便欢快地转了起来。我送过去二十枚五马克的硬币和铺了餐纸的一小碟饼干。

对老顾客，我们都比对别人周到，很少让他们到窗口来换钱。我回到玻璃室，把门关上。

“又一家抢钱的，”斑马看着当天的报纸，抬起头对我们说道：“火车站那家，”他读道：“‘……五十四岁的沙女士上夜班，已经没有了顾客，她正在收拾干净，准备下班，突然两个年轻男子闯了近来，用尖刀逼她把钱交出来。沙女士给了全部的一千马克，但头部仍遭到重击，现在医院昏迷不醒……’”

“那个厅夜班都是一个人，”刺头说：“也没有玻璃室。”

“就算有，”斑马道：“又顶什么？你总不能不出来收拾干净吧？”

“这月有两起了。”

“按理，”我说：“每个同事都有警报器呀，都随身带在身上的。她没按警报器？”

“按了有什么用？”刺头说：“你没见抢银行的？都按了警报器，等警察来了，人早跑了。”

“银行，游乐厅，加油站，抢了这个抢那个，”斑马道：“以前可真没这么多坏事。”

刺头搞完一小时的卫生向我道别，斑马回家睡觉，我把圆桌收拾干净。

又进来四位顾客，两个玩桌球，两个去玩老虎机。

石子太太输得精光，又象往常一样，不发一语，毫无表情地走了。听同事说，她每月退休金三千多马克，孤身一人，没好吃，没好穿，却全扔在老虎机上。我怎么也无法理解他们那上瘾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滋味儿？拿这钱去周游世界可该多好啊。玩老虎机的女人极少，绝大多数是男人，有的一输就是八九百，比石子太太更厉害。无怪乎安卡说：“树林子吵太太，为了买一件喜欢的汗衫，坐着自己的飞机去巴黎。”

一位输了五十马克，叹口气就走了。另一位陌生顾客输了三百，气得他握紧拳头“噔噔”地擂老虎机，好象用拳头砸它，钱就能哗哗地掉出来。

“您别擂游乐机好吗？”每逢这时，我们就得和悦地劝说：“游乐机会坏的呀。”

“他妈的吭人机！”他怒骂道：“两个厅我输了七百！”

“下次会幸运哪，不会老是晦气呀。昨天有人赢了五百呢。”

我在撒谎。要是我们太实，谁都不来，我们吃什么？

他气哼哼地走了。所以他们老是没有女朋友，要么就都离了婚，连孩子也不跟他们过。“你们都太有钱了，”我心想：“为所欲为吧。”我拿了小本子过去一看，果然五个小灯被他擂灭了。技术员下午才来，我记在了本子上。

下午四点差一刻，安卡来接班。新近老板改了措施，为了节约开支，晚班的另一位同事十点才到。

“听说了吗，”她说道：“老板正一厅一厅地出售给私人呢。”

“真的？”我大惑不解。

“昨天傍晚，厅管带了两个人来看店，他们谈了半天。”

“不是收入一直不错吗？”

“厅管告诉我：总帐上，绝大多数的厅都是入不付出。”

“真的？！”

“已经售出好几个了。”——她这话简直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就这么关了？”

“赚钱的还开着，怕也长不了。因为老板说要去波兰、捷克那些便宜国家办厂开店。”

“卖给别人我们还可以接着干吗？”

“谁知道？”

天格外的蓝，少有的大晴天。我不忙着回家，也没心思去布店。路过电影院，看看介绍招牌，也没什么好电影。今天是五月一号，人们都放假，唯有饭店和娱乐场所照常营业。每年这天，各个城市和农村，都要立起“五月树”，以此希望一年的好收成和好年景。老城步行区的教堂前，是立“五月树”的圣地，我得去看看。

45 “五月之树” / / 相遇海曼

外星人：

我去时，树已经立起来了，起码有四五十人围着观看。音乐声起，十几个立了树的男子汉围着树跳民族舞。他们都穿着德国民族服装——白汗衫，皮背心，皮裤，高统棉袜，民族式的翻毛牛皮皮鞋；戴着民族式的毡帽，帽子上有许多装饰；个个身强力壮，人人满面红光。周围的人们，在他们快乐欢欣和美妙音乐的鼓舞下，不由拍起手掌，和着音乐打起了拍子。

我仰头欣赏着“五月之树”。据说，每年选这棵又高又直的松树，就颇费周折；还有关于偷树的种种趣闻。眼前的树，周身环绕着白兰二色旋形的彩带；树身的顶端，挂着一个绿叶和鲜花的美丽花环。再往下，是十二片画在木片上锯出图形的图画，两两对称地固定在树身的两侧——有表示家庭的亲爱和谐的，有展示五谷丰登的，有儿童愉快地去上学的，有表现工人和农民在劳动的……画得那么朴实无华、真实动人。

“嘿，阿奇！”

“哎，安其，你也来看？”

我们站到圈子外面去。

“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他说：“听说你在游乐厅工作？”

“是呀。你呢？”

“我还在王老板那儿做跑堂。游乐厅工资那么少，又危险，谁上那儿

去?”

“可我挺喜欢。火灾的事怎么样了?”

“还是查不出谁的责任。到今天，保险公司还没付钱，且扯皮呢。”

“王太和王老板呢?”

“俩人关系是彻底完了。这边饭店修理好了，王老板盯着。王太又在别处开了一家，各干各的。”

“离婚了?”

“可能。王太有了同居的情人，你猜是谁?”

“谁?”

“大厨。原来的大厨。”

“噢!”

“她把大厨拉走了，那饭店等于是他们俩的了。”

“王老板得气死了?”

“他一提起他们，就骂‘一对狗男女’。他说：‘你和洋人怎么样，我不恼；可你和亚洲人，就不行!’”

“真怪，怎么和洋人就不恼呢?”

安其一摊手，无法回答。我们又说了两句，就分了手。

不远处有个冰激凌店，我去买了一杯，坐在树下的长靠背椅上，用小塑料勺慢慢地吃着，观赏着行人们。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一个年轻的德国人问我，他手里也拿着一杯冰激凌。

“可以，”我说。

他坐了下来，用小勺慢慢地吃着，似乎又在打量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他的声音很温和，很自然，好象天生的好脾气。

我打量他一眼：“奇奇。你呢？”

“我叫海曼，姓韦伯。”

他的名和姓，在德国多了去了。

“你们家世代都是织布的？”——那姓就是织布工的意思。

“有可能。早先德国人就是这样发明了姓氏的。”

要是有人能写一本书，比较中国和德国的姓氏，再阐述它们的来源，那会很有意思的。

“我一翻电话本，怎那么多叫‘海曼’的呀？”

“可我们的姓多呵。”

“姓多管什么用？”

“生日和出生地不一样呵，也不会出错呵。”

倒也是，外国人还真没为此出过错呢。

“你结婚了吗？”他问道。

“结了。我先生在北京。你呢？”

“我单身。”

我不语地吃着，心想，这人的衣服实在该洗了。

“你有孩子吗？”他问。

“没有。你呢？”

“也没有。我不喜欢有孩子。”

这话倒让我又重新看了他一眼。

“我也不想有孩子。你结过婚吗？”

“离过一次婚，结婚两年，没孩子；离婚后她回他的家乡伊朗了。还有过两次女朋友，都吹了。”

“为什么吹？”——我成了调查户口的了。

“一个是土耳其人，本来我们相爱了好几年，她怀了孕，却去荷兰偷偷打掉了；她家里坚决不让她嫁给德国人，后来她和土耳其人结婚了，都三个孩子了；她一家住在很远的 V 市。第二个女朋友是德国人，合不来，分开很久了。”

“你为什么不要孩子呢？”

“我三个妹妹，每人两个孩子，照样都离了婚，所以我就不想要。”

“和我一样。”

“你多大了？”

“四十四。”

“四十四？”

“是。你呢？”

“三十七。”

“比我小七岁？”

“可你不象四十四的。”

“谁都这么说。”我又问道：“你是在这儿出生吗？”

“是。我是在 HA 市出生的。”

“你还有父母亲吗？”

“父亲早就去世了，母亲还在。她和两个妹妹住在南方的柏杨省，一个妹妹住在这城里。”

“为什么她们去了南方？”

“为了工作。她们在那边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就搬家了。”

是啊，哪个国家象中国那样，没有搬迁和户口自由呢？

“你的父母呢？”

“都去世了。北京有两个弟弟，也都结了婚，都有个孩子。”

每当提到去世的父母，我就再也不想多说一个字。那是我心里永远的痛；那种痛含着太多种复杂的感情，深得我连碰都不敢碰它。我知道我死之前、弥留之际，脑海里一定只有哥哥、母亲、父亲和姥姥，也会有元元和两个弟弟……

“你有工作吗？”他问。

“有，在游乐厅。你呢？”

“也有。我是电焊工和钳工。你能给我你的电话吗？”

我写了给他。

“你也给我一个？”

他也写了给我。

回到家不久，就接到他的电话。我喜欢他那温和和有耐心的声音。我们随便地聊了些——就我所能说的。

“明天你下了班，我可以去看你吗？”他问。

“可以。你不是有工作还得上班吗？”

“我正歇病假，受了点轻伤。”

外星人，对于那种五大三粗、高大魁梧、浓眉大眼的男人，我从来都认为那样的相貌有什么可爱。相反，我总认为那样的相貌必定浊气和霸道。

《三国》和《水浒》中，一个个可都是那样的男人。诸葛亮虽然貌似“清心寡欲”，可又心机太多。从小我只爱“小白兔”型的，觉得世上最可爱的动物就是小兔。我只喜欢心机简单、相貌清纯的——这比我小七岁的“洋儿子”，看起来如此。

下午五点，他准时来了。他说没想到我的住处挺漂亮，并问我房租等等的费用，我如实地都告诉了他。

“这种私人房不能住，”他说：“我也住过私人房，和房东生够了气。你属于低收入，最好去住市政府管理的房子，市里有很多这样的房子。”

我向他说了和霸头生气的事。

“那种房子也不能住。那全是单身的，不是正经家庭的房子。”

“怎么去找你说的房子呢？”

“拿着你的收入证明，去房屋管理委员会登记；然后等着，他们会通知你。好几个委员会呢，分片管理房屋；得等三个月到半年。”

当初为什么诺拉没如此介绍过？或许，因为她们属于有私房的等级，不屑于去找别的房子，只认为私人的好？而我一无亲、二无故，没人给我介绍什么，能让我少走弯路。

“你去过中国吗？”我问。

“没有。我对中国不感兴趣。”

“以后也不想去?”

“不想。好多国家我都没去过,干嘛非要去那儿?”

这话可正中我下怀!

46 努太太下了咒语 / / 与 PIPi 同居 / / 辞职

外星人:

又是七月了,明天,努太太又要和男朋友去老地方瑞士度假。她说,三十年来她只去那一个地方,那一家旅馆。

“为什么老是那一个地方?”我实在不解。

“那儿很美呀,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我似解非解地点点头。

“旅馆老板夫妇和我们就象亲戚一样了。我每次去还要带一些德国的小礼物呀。我们就象亲姐妹了。”

我似乎懂了——他们不再寻求新的景物,他们只为友情和换换环境、换换心情而去的。

“我还有话跟你说,”努太太很郑重地,也很严肃地盯住我的眼睛:“最

近常来找你的那个人，可不怎么样；你如果跟他交朋友，告诉你，你会有一天和他流浪到街上去！”她的语气有如铁板钉钉，那双老而尖利的灰眼睛，似乎吸走了我的灵魂，又象万能的巫婆下了咒语。

“您认识他？”我有些心虚地问。

“不认识。但我会看人。我一眼就看出这人没出息，他早晚会流浪到街上去！”

我发愣地瞧着她，什么也没说。

这天我上最后一个晚班——此厅已卖给了一个私人，新老板不喜欢旧的装修，他要把玻璃室全部拆去，也不喜欢那正规的工作服；并希望员工和顾客能多聊天，认为会带来生意——他在火车站对面的街上，也有个厅，就是这样经营的。我们都被「树林子吵公司」解雇了，公司发给了我一张评语优秀的《个人工作鉴定书》。

夜里我躺在床上，老想着努太太的咒语。也许她的眼睛就是厉害，就是看准了洋儿子没出息。我也不认为他有出息——我到他那不整洁、过于简单的家里看过——六十平米两居室的单元房，家不象家，完全象在混日子。房子可以收拾，可是人呢，竟有四年不工作了，只想拿失业金；尽管有医生给他开的长久证明——因动了四次手术，不能干这、不能干那，只能吃和睡再加玩儿。

“在中国，你早就饿死啦！”当时我说。

一个不老的人，就算干不了体力工作，但还能干别的呀，或学些新的专业也好哇；但是他不仅不想去努力，且认为自己这样生活是十分聪明的。

他的失业金，除去他个人的开销，还能有一二百马克的富余，他就攒起来存入银行。他沾沾自喜地说，他已有了一万多马克存款。

“我从十六岁就开始干活，”他蛮有理地说道：“做过好几种工作，挣的钱都得交给我母亲，补助家里。后来学了专业，还是接着干体力活，还得补助家里。干得我动了四次手术——又搬又抬又抻，左右腹膜都破了两次，再破，都没法办了，只能从腿上植皮。现在我抬东西，不能超过五公斤。人为什么活着？现在我是能不干就不干，我得享受生活。”

“可你为什么不能学点别的专业，也许不做体力劳动呢？”

“学专业，我自己没钱付。就算能付，我这大年纪，毕了业也找不到工作。失业大潮来了，劳动局也不付培训费了。象我这把年纪的人，他们也不肯出钱培训，你让我怎么办？”

“你老有理。反正在中国你非饿死不可。”

“所以我对去那儿没兴趣。”

他取出医生诊断证明让我看，只见一条条，他的毛病可真不少！其中一条是：不能打夜班，不能受寒气，否则会小便频频。

“这也算病？”

“那当然。我夜里总得撒几泡尿。”

“怪不得你叫海水漫，你干脆叫 PIPI 得了！”

“PIPI 什么意思？瑞典童话里也有个 PIPI。”

“中国意思就是撒尿——大人哄小孩撒尿就是这话。”

我登记的房子批下来了，我和 PIPI 去看了看外观，还不错。问题是：在

孤独的大海里游泳，为谁而游？为自己，还是为元元？

PIPI 希望我搬他那里去；假如我真搬过去，就成了他的女朋友。

努太太觉得他不配我。我倒是想问努太太：你的儿子是个律师，四十多岁了还是单身，假如我跟他结婚你反不反对？你得闹翻了天，你就不仅是下咒语啦。

而我为什么拒绝了慈教授？拒绝了安其和别的人？我拒绝了，都比 PIPI 努力、有出息、有本事，没有一个懒汉。

为什么著名电影《苏菲的选择》中，聪明美丽的女主角和那样一个“没出息”的男人在一起，最后双双自杀？为什么作家张爱玲在美国，和一个“没地位的穷诗人”在一起，过到最后的时日？

一个女人，经历了太多的波折和苦难之后，她感到钱、地位、职业都不再重要了；她选择生活伴侣时，不是“选”，而是“遇”。她觉得和这人在一起轻松，不那么累，看着他不讨厌，就行了。她不愿意为讨好一个男人，时时得注意提高自己、得改变自己、让自己感到累却非得将就他不可；一切都得为了他。别人看着她(他)穷愁潦倒，那是别人的事；她却只想轻松，愿意在“鸡窝里当凤凰”，不愿在“凤凰窝里当鸡”。

我倒真想趁努太太不在的时候，把家搬空，搬到 PIPI 那里去。

因为，不仅是孤独，也实在受不了她高涨的房租和太高的杂费了。在她眼皮底下搬家是相当难的——她会阻止你、跟你闹、不讲理；甚至把门锁上，你进不去自己的家。而她一回来，我家空了，她干没辙。搬走之后再写解约信不迟。

次日我和 PIPI 说了这主意，他非常赞成。以他从前的经验，他说只有这

么办。努太太一个月后才会回来，不用急；我说道：“我如果成了你的女朋友，你的屋子这么脏，我是不会来的。你起码要花钱把它收拾得干净漂亮些，我才会来。”

他想了想，说道：“花钱找别人装修是很贵的。我一个人又弄不了。我花钱买壁纸、地毯等等所有的东西，可你得帮我挑选，万一你不喜欢我买的颜色和样式呢？都买齐了，我们一起装修好吗？”

“行。”

我比他能干多了。在干活上，我和罗文有着相同的才能。我没学过也没见过装修怎么搞，可我就是知道怎么干得更好。PIPI 只给我打下手，我还老嫌他又笨又慢。

“在中国你就得饿死啦！”我登在梯子上，贴着屋顶的天花板：“我要是老板，第二分钟就把你解雇啦。”

他好脾气地不吭一声，就象听着最迷人的音乐。也许，不能干的人都是这副好脾气？

他有辆旧汽车，他说从十八岁他就开车；别人都花不少钱才得到驾驶执照，而他才花了八百马克就通过了。他说自己从未出过半点车祸；听了这话，我倒不得不佩服地看了他一眼。

当这六十平米的单元房收拾完毕之后，整个换了新相貌，漂亮极了！每间屋子的新式大玻璃窗，都配上雪白的新窗帘，窗台上摆了鲜花；我又拿出自己的钱，买了一套大沙发、德式的厨房角椅和饭桌……

我们商量好：每人的钱是每人的，住房和食品等花销，一人付一半。

PIPI 说他喜欢记账，我欣然同意。

“如果我先生来了，”我说：“这个家都归你。我帮你找一个中国女朋友。我们还是好朋友。”

“那当然，”他痛快地回答。——他这回答、他由衷的同意，不由让我对他顿生尊敬之情；我难于想象中国人能象他这样。

我给元元写信，告诉他这一切，催他快来——“我都有男朋友了，你还不快来？难道你真认为你的父母才是榜样——四十年不见，越不见越爱，赛过电影？你只要来了，我们去找房，成立新家太容易了。我们和海曼、和他女朋友都是好朋友。快来吧，你不要‘鸡飞蛋打几头空’呵！”

他没回信，却是老干妈写的，说他委屈地去和她诉苦，说我竟然有男朋友了。

你有这诉委屈的工夫，为什么不快来呢？四年了，还应该再加十倍？你委屈，我委不委屈呢？这一天还不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再不来，兴许还跟你离婚呢！

蝈蝈来信说，他搞的什么生意，谁都不清楚，也不见象有钱的样子；只知道他常去老干妈家蹭饭。每一次他吃了饭走人，老干妈的大儿大女都很有意见，劝母亲别老招待他。

怎么，他这生意竟做到成了“蹭饭”的了？

蝈蝈又说，现在房地产红火极了，房价一个劲儿地涨，人人都要买房再买汽车。她丈夫离开了什么真话也说不了的报社，不当记者，“下海”了，与自己兄弟一起搞动物饲料，钱哗哗地进。她不但花了四十万元买了八十平米的单元房，买了大钢琴，现正在学开车，还雇用了农村来的小保姆……

我有了一位生活伴侣，再也不会孤独得自言自语了。但我的家务活也比一个人时多了：做饭、洗衣(晾衣)、收拾屋子、缝纫，PIPI 什么也不在行，什么都懒得做。他固然没有不良爱好，脾气又好，可这懒劲儿，也实在够呛。只一样，他把自己的东西管理得井然有序，尤其是将他自己的衣服叠放得整整齐齐，赛过服装店；以及那收支账，记得真是一丝不苟。

我们一人一个单人床，他夜里必去二三趟卫生间小解，冲水声总会让我无法一觉睡到大天亮。

“你的尿怎那么多？”

“我一直这样呵。”

“一句话，你就是不累呀。你要是累，就会睡得象死猪啦。”

我在新找到的游乐厅仍是两班倒地上班。

努太太一连来了三封信，都是以她律师儿子的名义，说从我解租约的日子算起，我应交足三个月的房租，而我只交了两个月的，还差一个月的，我若不交，他将通过法律程序对我起诉。

“好吓人呢，”我对 PIPI 说。

“别理她。哪怕她再来信也别理他们。”

“不理她就会过去？”

“她不可能去告你，因为你的九百押金也没还给你，你又住得那么干净。

若真上法院，她涨房租、暖气费杂费那么高，也是违法的。”

第四封信更加气势汹汹，但自此再无声息了。

我遗憾地想：怎么就见不到一点友谊和爱呢？怎么就只认钱呢？假如努太太不这么写信，而是说：“你虽然还差一个月房租，但念及你在我这里居住时，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时光，我仍希望你有空常来作客……”——哪怕她不必提押金(我知道她不会还给我)，我都会感动极了，而且真地把她当成朋友。唉——！

元元没有再来信，哪怕是便条式的信。我知道他不会来了。尽管，他如果真来，我还会与 **PIPI** 说声再见，马上与他建立新家。

又轮到我休息三天时，我找了个大纸箱，把以前给元元买的许多新衣服，一件件地打理好，用航空件给他邮寄到北京去了。箱子里附了一封长信，回忆了这四年他给我的心情——期望，不解，焦虑，失望。现在是由失望走向绝望。“如果你不希望我绝望，那就快来：如果你还象以前那样闷声不响，我要提出离婚了。”

三个月之后我拿着自己的低收入证明和护照，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提出离婚。我心里没有一丁点轻松和快乐。我只知道假如我不离，他能拖到我们都死了的那一天；以便让全世界歌颂这伟大的爱情，以便给全世界做出榜样。

律师立即备了案，说最终要由法院决定。

“什么时候？”我问。

“大约一年时间。”

爱情事业双完。我不想和谁结婚；我和 PIPI 合则过，不合则不过。我有了他，不过是能说话儿、作伴儿而已。

劳动局给他介绍的工作，他最长的干三天，最短的只干两小时。有一天，才半小时他就回来了。

“我刚一拿起焊枪，有什么东西就进进了我的眼睛。我得赶紧去医生那里急诊。”

而工作合同刚刚签定，他又可以休息三周，老板还得给他发工资，然后才准许解雇他。

“懒蛋！”我骂道：“德国的福利制就是养了你们这些懒蛋！PIPI，你在中国，连要饭都要不来呀！”

“还没人这么骂过我呢，”他不高兴地说。

“既然你不想干，为什么还要去签合同？签了合同又不干？”

“我不去，劳动局就不会给我失业金。”

“你抬不动，你有证明，为什么又不事先跟老板讲？”

“很多老板太坏，你事先讲，他对劳动局说你不工作，你就拿不到失业金。”

“你怎么老有理？”

“你不知道劳动局从来是向着老板的。我得去看医生了。”

真恨得我不知拿他怎么办。人人身上有七个眼儿，怎么他不是这个眼儿痒痒，就是那个眼儿发炎？吃饭可一点儿也不少吃？德国女人倒少有这么

懒的，德国男人却懒得可以编成一百个营，他们全都该进那希特勒给犹太人建造的劳动营里去。

唉，没辙，我懒得去找比他更好的。至今我不后悔拒绝了慈教授；我若真成了他的女友甚至和他结婚，如果他也象哈宾教授那样，在中共和德国人面前老是两个脸，就冲这一条我就受不了；何况还有两个大儿女，你和一个人结了，等于得和三个人结婚；也绝对不会象 **PIPI** 这样，对我不加一丁点指责，老是满意和迁就，哪怕对我那错误百出的德语。固然我口语进步不大，可每分每秒心里是舒服的。

唉！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只看你重视的是什么了。

每到我休息三天的日子，我们就开车出去游玩——去荷兰，去巴黎，去瑞士，去德国的名胜旅游城，去看望他的母亲和妹妹们……在他的介绍之下，我才知道，本市有着全国著名的「天然博物馆」和「童话博物馆」……我们照了多少照片啊！

自我和 **PIPI** 住在一起，我发现阿玲不是很高兴。我能猜到，他和努太太的想法一样，认为我怎么能和这样一个“什么也不行”的人在一起。以她的职业、地位、能力，都找不着合适的，我如何与她相比？我只要不孤单、心情宁静就行了，而她绝对不会象我这种要求。

在班上接到阿玲的电话，说她母亲从台湾来了，现住在她家，她们要在后天一早出发去捷克旅行，希望我也同去。

“我们打算去十天，你能请假吗？”

“这……阿玲，很难请呵，没有人替我盯班哪。再说，我们度假都是半年前定的日子，突然说请十天假，弄不好，工作都会失去的。”

“你那个工作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我母亲好不容易来趟德国，很想见见你呢。”

“可我真请不下假来呵。”我心想：自东德人大量来到西边之后，就这么个工作，都不好找呢。

她又说服我，可我还是原话；她不乐意地挂了电话。

我越想越觉得这事不仅是度假。她说过她在台湾的哥哥，早已离了婚，一直是单身；她又喜欢我，难道，她母亲要先相相我，若中意，再告诉她哥哥？都什么时代了，还得妹妹和母亲相中了，才能轮到那本人？她们也太小心了吧？

这天是周末，我上晚班。「树林子吵」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换钱柜台是半开放式的，晚班是一个人做到夜里一点。

游乐厅正对着总火车站。隔着宽阔的马路，街上人山人海——世界杯足球赛德国赢了第一。青年男女象疯了似的又唱又跳又摔啤酒瓶子，马路上脏得乱七八糟，一辆辆满载了人的小汽车，高举着德国国旗，鸣着喇叭，高喊高唱着飞驰而过。这半天厅里没有一个顾客，人们看完球赛就是上了大街。

离下班还有四十分钟，进来一位工人模样三十多岁的德国人，酒气味儿还很冲，换了五十马克的硬币，对着角落里的一个老虎机，闷闷不乐地玩着；全输光了，又来换了二十元。

还差十五分钟下班，我锁了钱柜，用卫生纸和清洁剂擦每一个有手印

的游乐机。擦到他旁边时，我说道：“还有十分钟，我们就下班了。”话音刚落，他猛地就从身后拦腰抱住了我，把我按在他的怀里；我惊得手里的东西都掉在了地上！

“那门还没关，”我急中生智地慌忙说道：“等我去把门关上！”

“赶紧关上，快去快回！”他刚一松手，我飞也似地跑到了大街上，心猛跳着，掏出上衣口袋里的报警器，急忙地按了一下、又一下。

“怎么回事？”市警察局的值班人问我。

“抢钱的，抢钱的！”我说了个大概，警察说马上会到。

街上的人虽少多了，但还是三三两两地经过厅前；厅门大敞着。我不敢进去，只站在门外等着警察到来，一手紧紧地攥住门的大把手。

突然听到一声：“对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我一回头，天，就是那人，我更紧地攥住门把手，直勾勾地盯着他。

“对不起！”他满脸愧疚地说道：“我喝多了，我女朋友刚和我吹了，心情太坏，我还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对不起！”

“你快走吧，警察就要来了。你不要再来我们厅！”

他赶忙走了。我进去看了一遍，连卫生间——确实没有人，才立即把大门锁上，整理各个本子的记录，而警察还没来到。这时电话铃响起：“怎么回事，听警察局说出事了？”——是总部厅管打来的。

“钱抢走了没有？”厅管问。

“没有。”

“那就好。”厅管又一迟顿：“怎么回事？怎么钱没抢去？”

“我跑到大街上去了，按了报警器，把他吓跑了。”

那人抱住我的事，我可一句也不想提。

“嗯，不错。”他半信半疑地撂了电话。

又足足等了十分钟，警车和两个警察才到达。

我辞职了。难道领导关心的仅仅是钱？难道问的仅仅是钱？难道不问一句：“你受伤了没有？”然后再问钱？难道我的命只值一千马克？更甭说那太迟的警察，怪不得抢银行的个个成功！

我想起那昏迷不醒的老女人，一直是神智不清，而厅管最不高兴我们提起她。我千万别到了那一天，连辞职都来不及了。

PiPi 第一次知道我也有不干的时候，似乎成了他的同道，不仅高兴，反而鼓励：“就应当不干，开三周病假，让他们付工资！”

可我不习惯开没病的病假，也不以为会那么好开；我要去工作。

“凡自己离职的，”他说：“都没有失业金。”

“所以我就更得去工作了。”

「找有爱心有耐心的养老院助理」——看了报纸上的大广告，我立即打电话，和主管约了日期。

47 我逃下了山 / / 老曲的气恼

外星人：

养老院在山上。

骑车骑到郊外，到了山下，陡得蹬不动；路又窄，似乎很少有交通，连辆小汽车和公共汽车也没见到。推着车，满头大汗地找到山上，才发现在茂密的树林里，隐着一座老旧的楼房。

这五层楼黑乎乎的，似乎足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每个不大的窗子垂挂着发灰的、时间过久的窗帘，老得已经分辨不出它原来是否是白色；遮挡着里面谁也看不见的情景。窗外都安了结实的铁条。既没有阳台，也无院落——不过是能停放几辆汽车的一块没有花的空地；更不见一个老人出来走动。

这也是养老院？我诧异自己找错了地方。比起我最初学习德语时所在的那个养老院，这儿简直象个监狱呵。

我和主管坐在办公室谈了也就十分钟，他说：“很遗憾，我无法安置您；因为我们需要口语相当好的，不仅能照顾老人，还能和老人们聊天的助理。”

我们就在办公室里握手道别了。出了屋，我很想借机多看一看，因为这里一般是进不来的。我慢慢地走过一层和二层楼道，左右地张望着。正是早上搞卫生的时间，屋门都开着——一间大屋子里，有八个或四个单人床——好几个老女人竟住在一起？！穿着白工作服白拖鞋的女清洁工，正在拖洗水磨石的地面，有的在整理着床被。一个个老女人，有的歪躺在床上，

有的坐在轮椅上，活象一个个白毛老妖精——脸色灰暗、眼圈发黑、衰朽不堪；好象她们永远出不了这屋子和楼房。整座楼里是一片浓重的阴暗、潮湿和晦气。

我很高兴没在这里工作，象逃也似地一口气溜下了山……

回到家，PIPI 高兴地说他已拿到了两周的病假证明，交给了老板。再骂他也没用。我感慨地告诉了他所见到的一切。

“这是穷人养老院，不准她们出楼。”他说：“就连这，多少人想进还进不去呢。”

“就这鬼地方？”

“毕竟有人照顾呵。我母亲去登记——在她那个城市，也属于穷人的，她都不够条件呢；说她的退休金才一千五，太少；得由我俩妹妹每月从工资里付给养老院六百，她俩不干。我要是工作，我也得付。”

“所以你也不想工作。”

“德国的政策：假如你有工资，你父母没钱或太少，你得每月按时给父母汇钱。我妈的钱足够她生活，可是进不了养老院。”

“哪，我第一次见到的那么高级的养老院，是怎么回事？”

“那是有钱人的。一个人、一个月，得交六、七千马克呀。还不算处处得给小费：理发啦，游泳啦，按摩啦，修指甲啦，看电影啦……得合七、八千哪。一到六十几岁，不用太老，都可以进去啦。你可以想去哪儿去哪儿，又有人做饭，又有医生，又有人照顾，又有公车管送管接，干嘛要自己的家？多轻松省心呵。”

“『有钱能使鬼推磨』呵！”我又问：“如果进不了养老院，那些人到老了可怎么办？”

“有『红十字会』，有『爱老人』协会，都是全国性的，你可以自己挑选，他们都会每天来送饭和照顾你。”

“可是总没有亲人照顾得好呵。”

“也不一定。很多孤寡老人，就算有亲人，都要工作或住得很远，谁来照顾？不过，现在德国为了省开支，号召亲人照顾老人，分四级，由医疗保险公司每月发工资；从四百到一千多马克不等，看病人的情况决定；一般都只能得四百或六百左右。”

只有在中国的电视和报刊里，才总是宣传工作劳累了一天的儿女，照顾一躺几年十几年的老人是多么有道德、多么孝顺、是人人的榜样。因为中国根本没有福利制，把不合理的、不人道的，反而当成人道与合理的来宣传。欧美人想的是：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制度和政策定得合理些？民主与非民主国家的区别是：政府把钱花在什么地方？

但无论是那高级的还是低级的养老院，我没见到一个外国人。德国也没有亚州人的专门养老院。有又怎样呢？谁能达到德国人那种高级的管理水平呢？有几个人能付得起呢？还是死在自己家里好。把家里弄得漂漂亮亮的，你过一天就少一天；直过到你能决定自己死的那一天。

我又去买了两盆鲜花，摆在客厅的窗台上。

一个叫老曲的人，说想来看我。他是在北京社科院工作的哲学研究员，

我们并不认识。但在这海外，能说得来的中国人少得如珍稀之物，他只是听说过我，满怀好意地坐着火车要来，谁能拒绝？

“你这家，”他一进来就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堂！”

我们喝着，吃着，聊着。

“原来你是哈宾请来的？”

“两年期限，”他说：“说话就到期了。”

“他现在还能进得去中国吗？”

“进不去了——自从他太太一搞了民运。对我的邀请还是『六四』之前的，他那会儿在北京还是红人儿嘛。”他喝了口茶：“他现在心情可灰了，说他太太把他前途给断了。”

“哈宾太太搞的『人权协会』，还有谁是核心？”

“马三，陆七，还有几个。”

“马三夫妇取得居留了？”

“听说拿到了。”

“别人呢？那些集体申请的？”

“都是容忍居留。听说德国有二十万容忍居留。”

“这么多？”

“或许还包括其他国家的人吧。”

“说真的，你不想留下来吗？”

“下不了决心哪。”

“我不明白，”我问道：“他是汉学家，为什么请你一个搞哲学的人出来呢？他有什么项目让你做呢？”

“汉学家所以能立住脚，就是要经常发表文章、有著作出版；学术界只认这个。可他的脑袋没那么多东西，国内的人又巴不得出来看看，他就利用邀请来为他做事。他有关汉学的文章加进些哲学的东西，不是更有深度吗？”

“呵，你们就成了智慧劳动力？”

“说不好听的话就是这个。好听的话是‘为了友谊交换出来做研究’。”

“他给你定的项目是什么？”

“有关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他出一些新的题目让我们去想、去写出来。”

“写出来算谁的呢？”

“算他的。”

“也太没道理了！”

他苦笑了笑：“你写完得让他看吧——他在说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他就偷走了。他稍改一下，先用德语发表了。你又不知他在哪儿发表的，反正他发了，成了他的了。你就算知道又怎样呢，你跟他发脾气，不满？他可以让你马上回国，并且给你一个坏鉴定。你只有听话，不说话。”

“那你们毕竟是北京的尖子、知名学者，也太冤了？”

“他说了，你们回去照样可以用中文发表，还是你们的。”

“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有什么办法，都是这么干，哪国都一样，要不人家请你研究什么！”

“这也太没道德了。”

“没道德的事还有哪——现在刚时兴用电脑，我来这儿才学的。有一天，我按错了一个键，一下子全没了。辛辛苦苦、一星期的劳动全没了！哈宾对我大发雷霆，那个凶啊，竟然三个月不发我工资！可我的工资是属于一个

德国基金会的，他们是按月寄给他，由他给我们；一个月一千五百马克，四千五，全让他吭了去了。”

“你要不说，我也不想提，”于是我说了在小松鼠家，他如何与我拍桌子瞪眼、关闭三十七个大学讲座的事。

“这些个王八蛋，”他骂道：“太两面派！”

“可多少人不了解，还捧他吹他呢。”

48 婆婆去世 / / 第三次离婚 / / 看饭店

外星人：

元元来了封短信和数张照片——他心爱的母亲去世了。一向只会写便条的他，这次写满了一页大字潦草的信，可说是我出国以后的第一次长信。也没有再附发财剪报。只说了母亲一病不起，数日后便去世了；又说母亲生前一再地催他前来德国；还说如今心里难过万分。几张照片都是家人拍的隆重地办丧事、他、妹妹、亲友在低头哀悼的情景。婆婆的好人品以及她不一般的性格，我早就了解并深为尊敬，也写在了《一个大童话》里。婆婆在我心底里，永远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既然婆婆已去世，我立即回信说：

“那你就快来吧。如果说我和 PIPi 一起住了，那也是你气出来的结果。你只要说来，我立即给你寄去路费，自己立即去找新房。你人一到，我们住的是自己的新家。”

然而，仍象以前一样，再没有回答了，依然给你一个闷葫芦。

他怕的是什么呢？他担心的是什么呢？却一句也不说。想想他和我结婚前，他那慷慨激昂地支持我离婚的长篇大论，比起他现在的闷葫芦，是多大的反差！

每次给国内的女友们或给老干妈写信，都忍不住提到元元，数落他的不是，仍希望他来。有一次老干妈信上说：“三页信，写的全是他，可见你还爱他。”

一针见血！我不由深深叹了口气，尽管我已经提出了离婚。

老干妈已经八十五岁，却还硬朗，每天和几个高级干部的老夫人打麻将。有个农村来的小保姆做饭打杂。她的大儿大女，一个去了日本，一个去了澳大利亚，都定了居；还有两个嫌外国生活艰难，又回到了北京，与她一起做五花八门的生意。由于我的关系，蝓蝓也和她认识并成了忘年交。

快到一年时，律师来信：本市法院已给了开庭日期。

所谓开庭，其实只有法官、律师和我三人。按程序问过后，女法官说道：“由于你是在中国结的婚，德国无法判离。你又回不去中国，则必须由你丈夫提出离婚，你才能离。他必须通过当地法院，寄给你他的上诉状副本，然后公证；你把这公证件交给你的律师，再等开庭日期，我们才能判离。”

我问道：“也就是说，如果我丈夫永远不离，我也就离不成？”

“是这样。”

“他的上诉状副本如果真寄来，大约多久您才能批准呢？”

“大约一年吧。案子很多，要等嘛。”

外星人，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的律师事先一点儿也不讲，让我白等了一年？他可是专门办理离婚案件的，他的律师事务所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装傻只为了挣钱？因为他知道我的(凡低收入者)离婚费用都得由德国政府来付？

果不其然，不久他就来了封厚信，列举了这一年来找过我谈过几次话，再加上这次开庭，一共近三千马克的开销。

我没想到结果是：如果元元不离，我就离不了。我只好又一次给他写信：要么你来德国，要么你提出离婚。

石沉大海，他又一次再现了他那闷葫芦的本事。

三个月过去了，他可以再拖三年、三十年。他父母给他的榜样是四十年呢。他和绿旋风一样：理不清自己的思路。

我只好求蝈蝈帮忙。她回信了，说愿当我的被委托人，但要我写一个正式的委托书。

又是三个月过去了，蝈蝈来了封长信：“.....我找过他五次，从我家到他家，那么远的路，事先又给他打了电话，但楞是抓不着他；要么他在地，要么他不在家。听说他在台北当教授的伯父给了他二百万美元，托他买房；他信任老干妈，全交给了她.....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事先打了电话，知道他应当在家。可是按了五十多下门铃，他才不情愿地开了门。一见那满地的垃圾，天老爷！奇奇，以前你对我们说，你刚认识他时，第一次去他住的屋

里，垃圾遍地，都没下脚的地方，得用跳芭蕾舞的脚尖，都难于找到立足之地；当时我们边听边笑，却私下以为你说话夸张。直到我这次亲眼见，才知你不但没夸张，且还远未说到家！各色垃圾把地面全铺满了，屋里一股极不新鲜的霉味儿；到处都乱糟糟的无法形容。我只能踩在废报纸和垃圾上说话，甚至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我把你的委托书给他看了，向他摊牌：‘要么马上去德国，要么你自己提出离婚，你总不能老这么不明不白地拖着吧？’最后他说，他会去法院提出离婚……”

我两眼发酸，只想掉泪；不想让 PIPI 看见，匆忙说“我要写家信，别打扰我”，急忙把屋门由里面插上了。我太难过了：为什么我们的婚姻，最后是这个结果？为什么我们不能象别人一样地在德国过日子？他辞了职搞生意，怎么搞得自己成了要饭花子？他上次那一页的“长”信，写的他母亲，是想以那凄哀之情感动我吗？他分得清主次吗？难道来了德国你会死吗？

更不明白的是：他伯父并不了解他能否做生意，就把二百万美元交给了他，而他竟全给了老干妈。为什么他连买个房子也办不成，却把钱交给别人？连他去老干妈家蹭几次饭，她儿女都有意见，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无奈，他对我和我的朋友，不讲实话，整个一个闷葫芦，谁也帮不了他。再说伯父在北京和台北有三个女儿，比元元年纪还大，却偏偏信任他，这伯父岂非有眼无珠？

两个月之后，他的上诉状副本到了。他那不成形的字体，飞舞得道貌岸然：什么分开时间长了，感情就会自然发生变化；什么当时有老母在，作为长子不好出远门……

天老爷，你能说得清你到底想的什么吗？难不成应加上绿旋风的“炎黄子孙”、“中华儿女”和“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就差没写上我“对不起遇罗克”了！

我那难过的心情反而减淡了。

一切又从头开始——定日期，找律师谈话……但只等了半年，法院的判决就下来了：承认我们的夫妻关系结束了。

我看着手里的德文信，感慨万分——结婚证书是中国的，离婚证书是德国的。

六年，我整整和元元生了六年多的闷气。我从没和一个人生过这么长时间的闷气。我不可能高兴，只有无可奈何——我只是不想受一个不愿与我一起生活的人的牵绊，想扔掉那个会越来越大的闷气大包袱。但假如没有自己的长久居留，假如不能象公民一样工作和享受德国的福利制，每个人的独立和个性也就无法展现出来，这正是西欧和北欧公民的特点。

当我写《一个大童话》的结尾——在中国的最后一夜时，我如何能想到会有这个结果！

我只能说，和他结婚四年，我并不真正了解他。我深知他的人品高尚，但他的一些糊涂观念是我无法认同的。

更惊讶的是，一条消息登在了报纸上：正当绿旋风出国旅行时，她的大女儿在瑞士的家里自杀了。

自与游乐厅辞职之后，为了赶紧挣钱，又去了王老板的饭店做水巴。大

火之后的生意远不如先；市里新开的饭店倍增，而顾客反而减少，各个饭店都争相降价，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全部是便宜餐。工资两千四的跑堂几乎绝迹，普遍降了几百马克的工资；跑堂不再叫“跑堂”，叫“帮跑”，因为他(她)还要收捡老板送过菜的脏盘子，又不许收小费。甚至太忙时，水巴也要帮着去送酒水。

德国的一切行业，不是往好里变，而是往下坡溜。

立即有人办了中介公司，专门介绍大陆来的大厨和二厨，为期三年，月净工资才一千五百马克，各饭店很快都换了人。

小刘的小叔子开了家饭店，收入还不错；小刘夫妇再也不想开收入太少的杂货店了，关了店，也去别的城市开了一家。

“谁都开饭店了，”我问 PIPI：“找合适的工作又这么难，我们要不也开一家？”

“德国人最怕开店。要开你开，我不当老板。”

“为什么？”

“我俩妹妹，一个开过咖啡厅，老板是她丈夫，我妹妹分文没得，白白烤了五年蛋糕，最后关了店离婚；另一个和她丈夫开了家水暖安装公司，一年就赔光了老本儿，二十多万马克没了，由她丈夫背着债，到死也难还清，最后离婚。中国人个个想当老板，我可不想当。”

“要是我去看店面，你去不去？”

“我去只是好奇，可我不参加意见。”

本市就有两家要卖饭店，先去看「金锅」。

“少十八万不卖,”老板说:“看,这都是新装修的,花了好几万哪!生意是有的。我们可是老店了,比『莲花楼』都老哇。”

“那为什么卖呢?”

“我们要搞进出口公司,人手不够嘛。”

“进出口什么?”

“鸭子。德国人最爱吃鸭子。我们有便宜门路。”

“能看看你们的水电煤气费用表吗?”

这是以前安其说过的——要想知道有无生意,就看他每月用了多少煤气。

“这个表嘛,税务员拿走了,还没还给我们。你放心就是了,我不会骗你。我告诉你们个密法,一月能省一千三四百马克呢,跟我来。”

我们随他走进厨房。

“你看,凡顾客剩的菜,不要扔掉,把它分类;有的回锅,有的做‘北京汤’,光这一笔,就省下不少。”

一出饭店,PIPI就说道:“这是禁止的,是犯法的,是违反卫生防疫法的,这是禁止的。”

“哎,你小点儿声吧。”

第二家是「玛瑙」。去时,只有一对四十多岁的德国男女在吃饭,那女人的化妆和穿着显得怪怪的。

“看,我花了七万新装修的。”老板带我们仔细地看、各处指点着:“这面积大得赛过两家啦,少二十四万不卖。你也在这儿吃过饭,是吧,当时五个跑堂都不够使唤呢。”

是呵，我心想，那是开张的第一天，那时我还不认识 PiPi；以后我天天路过这里，总要看一眼大玻璃窗，只见顾客越来越少；而德国人的毛病是：人越多越去，越少越不去。现在这饭店寂静得简直有如老大空的墓地了。有一次，我看见两个想吃饭的德国人只一探头，吐吐舌头就吓跑了。

我们上下看了个遍。那对男女正喝得半醉，点了一桌子贵菜，吃个精光；又点饭后甜食，每人要了一大杯冰激凌，上面放了许多奶油，也呼呼吃光了。

那男的抬了抬胳膊；老板过去，问他们是否结账。

“我没有钱，”那男的醉熏熏地半低着头。

那女的托着腮，沉默不语地望着他——因她是被请的，付账似乎不是她的事。

“走吧走吧，”老板不耐烦地摆摆手。

他俩一句不谢，沉沉着着、不慌不忙地走了。

“就这么让他们走了？”我实在不解：“也太便宜他们了吧？”

“嗨，算了。”老板闷闷不乐地道。

一出饭店我叹道：“也太窝囊了！至少也得搥那人嘴巴子呀！”

“我估计那女的是妓女，常常带男人来吃饭。”

“也许.....怪不得不和他们计较。”

“太贵了，二十四万，谁能买？”

“我哪儿有二十四万？我一共才一万六，银行借不借，还不知道呢。”

“他是希望你能砍价。”

“再砍也砍不到一万六哇。饭店太大，其实更难做。”

“报纸上还有一家，明天我们去看看。”

49 PIPI 成了 007 / / 无法把牢底坐穿

外星人：

当从早上开车出发，终于来到这外省的山城时，绕来绕去、问东问西，才知道这家饭店在高高的山顶上。

车道又陡又窄，是尖碎的石子路。甭说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连鸟儿都不知躲在哪里。路过一个公共汽车牌时，细心的 **PIPI** 停了车下来看，见牌子杆都已风晒得花白糟朽、东倒西歪。**PIPI** 仔细看了半天，才发现了立牌子的年月——前二十多年了。

“甭说，”他象侦案似地断定：“以前山上是个好地方，否则不会立公共汽车牌子。”

一个中年德国男人牵着一條大黑狗往山下走，**PIPI** 停车，开窗问他那家旅馆兼饭店在哪里。他酒气冲天，喝得鼻眼通红，含笑地往山上一指：“树林后头就是。”

一座二层楼的旅馆出现在眼前，象模象样的，只是那座楼和周围环境，静寂得象死了似的。

停车场老大，足能停三十多辆大小汽车。旅馆大门开着，我们走了进去。

一进门，是装修一新的中国饭店，还散发着油漆味儿。左面大厅似乎关了不再开，椅子腿朝上都放在了桌子上。再去右厅看，只见一对亚洲人男女，正无所事事地坐在空空的饭厅里喝茶。

几句寒暄过后，才知他们就是老板夫妇，且都来自北京；于是老板带着我们楼上楼下地看。

“您看，上下两层，共三十六间屋子，”他说：“人都住满啦。现在他们有的去城里玩儿，有的去工作啦。单人床位的屋子，我们一天收二十八马克；双人屋收三十六，不管饭。您算算，您一个月能得多少床位钱？还不算他们每天在饭店里吃饭？”

“我们能看看屋里什么样儿吗？”我问道。

“可以。”他用钥匙开了一间屋子，一对面色稍黑的外国青年男女，正用电炉子煮面条，见我们开了门探视，不好意思地一笑。

“怎么还可以做饭？”我问老板。

“偶尔的，”他说着赶紧关了门带我们离去。

“其他各屋呢？”

他又开了一间，除了两个不整洁的单人床之外，简陋得象没人住过。

“其他房间的钥匙，他们白天出门儿都带走啦。这么大楼，才三千马克房租哇，太便宜啦。您每月能净剩至少三、四千哪！”他说：“我这饭店，少二十万不卖。我光装修费花多少钱？不能算啦，都赔了认啦！”

“您为什么不开下去呢？”

“我太太她姐姐那边又开了一家新的，在柏林，毕竟是大城市嘛。她嫌

这山城没那边儿热闹，非要和她姐姐在一块儿不可。”

我们又回到了饭厅。他太太已经走了。我打开厨房的冰箱一看，空空如也。

“谁是大师傅？”

“他妈的跑啦。敲盆儿敲碗儿跟我闹哇，否则我能卖店？”

“也是中介公司介绍来的？”

“当然，都是三年期。他楞把二厨也拐跑了。我没摊上好脾气的；您要是赶上个人品好的，保证有生意。”

“您的煤气费每月是多少，能看看交费表吗？”

“让一个也来看店的人拿走了，他住得很远，说今儿晚上九点才能送来，”他看下表：“一会儿还有人要来看店……”

他连口水也没请我们喝。我们开车往山下走。

“那大师傅不敲盆儿行吗，”PIPI道：“一直没发工资，能不敲盆儿？”

“说住满了人，全是谎话呀。”

“报纸上说，好多旅馆因为没生意，住满了难民，由社会局付钱。可他这地方，没交通，连难民也不来住。”

“哪，牵大狗的人呢？”

“那个酒鬼？肯定是长期不工作、一直由社会局付钱的本地人。”

“那煮面条儿的呢？”

“不就这两口子外国难民吗！”

“PiPi，你成了 007 啦！”

又路过那东倒西歪的公车牌子，我幻想着二十几年前，这山上该是何等热闹.....

总之，看了几家饭店，听了所有的《谎话新编》之后，我才明白：凡是登在报纸上的，都是没人要的“垃圾饭店”。一家饭店如果有钱赚，早就传遍了中国人的耳朵，他们宁可去和亲友借钱，也会花一大笔钱把饭店拿下来。

然而，什么才是自己的出路呢？游乐厅太危险，做水巴洗得手指骨头都痛，到老了，也不会有什么退休金：工资太低，报的税太少。

还是得开店当老板。开个杂货店最容易，本钱小。仔仔细细算了几遍，要是一开始能净剩六百马克，几年之后，只会多不会少，你的新老顾客永远是你的。

决心一下，我对 PIPi 说，我要开杂货店了。

“我也和你一起开，”他说。

“你不是不当老板吗？”

“你成了百万富翁，我还那么穷？”

“你要是老想着成为富翁，你准会失望。”

“那你为什么要开？”

“否则我做什么？”

“我也不喜欢我的工作，要开，一起开。”

“那好，一家出一半本钱，你可不许后悔。”

这二十五万人口的工业城，小刘关了之后，又开了三家；一家开不下

去，关了；饱和了。

于是我们想去那还没有亚洲杂货店的城市，寻找店面，又不想离家太远——先去总邮局看全国电话簿，一本本地翻；最后找到了一个五万人口名叫 Aa 的小工业城兼旅游城。

我心想，和 PiPi 合伙开店也好，否则他也不会热心地东奔西跑；然而两人心气儿不同——他生怕我变成百万富翁拉下他，而我仅仅是为了生存；哪怕净工资只有六百，但自己毕竟是老板。

每人凑了一万二千马克，经过两个月的奔波劳碌，小店终于开张了。地点是在步行区的中心，人人必经之处。房租也不贵，二十五平米才三百四十马克；因为没有卫生间和暖气，只有一个小洗手池。去卫生间要去不远的大超市。

食品和礼品共有五百多种，每样价格都比其他杂货店便宜些。开张时是十月中旬，很快就要到圣诞节了，人人都在留心哪里有又好又便宜的礼品。

这是本城的第一家「亚洲杂货店」，一些德国顾客高兴地说：“我们终于不用往远处跑了。”

顾客还不是太多，但比正对面那家新开的家具店，可强太多了——一个多月了，我没见一个人买他一样东西。人们只是在橱窗外面看看，偶尔进一下就出来；绝大多数是连进都不进。五十多岁的老板是德国人，比我们早开张三个月。那店面九十平米，摆满了德国式样的传统家具——硬木、做工精致、价钱不菲。

我们坐在店里，若无顾客，每分每秒能清楚看见他店里的一切。

“从捷克、波兰来的家具那么便宜，” PiPi 道：“谁还买这么贵的？”

“可这都是德国典型的老式家具，这小城还没有呵。”

“但是想买老式家具的人，又嫌他这里选择性太少，都开车去大城市特大的家具店挑选。” PIPI 道：“我得去超市撒泡尿了。”

其实，他趁着撒尿又该去逛了。

对面那位老板，每天穿戴得整整齐齐、规规矩矩坐在店里，连站起来走动或到门边看一下街上都不。他顶多看看报纸。他那沉得住气的自若神态，真有如“要把牢底坐穿”。

有一天两边店里都没顾客，我实在忍不住，去了他的店里与他聊天。

“我在 MU 市还有家房地产公司，”“要把牢底坐穿”先生说道：“这边没生意不要紧，慢慢就会有的。”

我回来对 PIPI 说了，他说道：“好多老板都这么干，报纸上常有披露，那个店赚了，他们再开一家，那个补贴这个，也省得都上了税，还安置了家里没工作的人。”

“PiPi，你什么都知道呵。”

一位常来买货，每次都要“货比三家”的“三比太太”进店说道：“我要那茶壶，再要四个茶杯和茶碟。”

我高兴地给她一件件包好。

“我跑了三家亚洲店，”她自豪地讲道：“开车到了 DO 市和 HA 市，同样的东西，还是你们便宜。”

我们客气地送她出了门。

“跑了那么远，” PIPI 道：“得多少汽油费呀，能买多少套茶壶茶碗哪。”

“所以呀，你想当百万富翁能那么容易吗？”

PIPI 抖了抖正看的报纸——本市报纸头条消息：《钢丝厂和铁丝厂解雇一千六百位员工》。

“这小城就仗做钢丝铁丝活着哪，” PIPI 道：“这可不是好消息。”

“唉！怎么每个城市都是坏消息！”

“凡有房产、有存款的人都拿不到失业金，”他读着报纸：“劳动局要一个个对失业者进行调查，银行要无条件地协助劳动局和社会局；议会在讨论大学生是否应付学费的问题，大学生上街示威游行……”

外星人，当了老板的感觉没有一样是轻松的，惶论愉快？我发现心情再也闲适不下去了，老是想那个店——每天早起，吃了早点忙着出发，开车一个小时才到；中午在店里煮碗方便面；下午六点关门，还要去大超市购货；到家往往八九点钟，还没吃晚饭。周六回家早些，周日歇一天，还要洗洗擦擦，做些杂事，甚至有时，还要去店里弄弄橱窗或是其他。以前的轻松闲暇，无影无踪。当了老板，才知当员工时的无愁无虑浑身轻的滋味儿！

何况，当几个月过后，收入仍是入不付出时，当你一次又一次得去银行提款时；当你的东西贵一点没人买，便宜了又没钱赚时；当你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不要工资的售货员、是给进出口公司白白干活、还得自己买货付店租时，你要是再想干，那才怪了。

“PiPi，我是绝对不想干了。”

“为什么？生意不错呀！”

“你是说梦话呢还是怎么着？”

“生意不错呀!”

“不错什么呀，咱俩每人连一马克的工资也没有！账归你管，你还不知道？”

“我很知足，因为吃住汽车汽油保险都除了，没欠账呵。”

“没欠账？咱们的本钱都回不来啊！一过圣诞节，全市跟死了一样，难道十一个月没生意，就一个月有生意？下一次买货，还得从银行提钱，你买少了，人家不送；四个月过去，提了三次钱了，这叫什么事呀？不如去给别人打工了，每月还能有余钱啊。”

这时我才想起小刘说的话：那仓房货架上积存的瓶瓶罐罐才是好几年的余钱。

PIPI 又鼓气道：“你看对面家具店老板，多沉得住气！”

“他要把牢底坐穿，他有房地产公司，你有吗？”

“还是当老板好，我不想关。”

“是呀，你整天晃悠晃悠玩儿，是舒服哇。这样吧，你一个人开好啦，你把我的本钱还我，你一个人当老板算了。我干了四个月就算白干，行了吧？”

“你真不干？”

“那还有假？”

讨就讨厌车箍轱话来回说——PIPI 一丁点心事搁不住，却反反复复来回说——“那店今后还是有钱赚的，‘要把牢底坐穿先生’的精神是应当肯定的，开店就得象他那样坚持……”，烦得我抄起了大擀面杖，说道：“你要是再神经，我可要抡你了！”

他吓得一面躲一面说：“打人是犯法的！”

“抡完你，咱就搬家走人啦！”

尽管我从没抡过他，但这在木制品市场上买来的大擀面杖，竟然能治神经质，也是一大发现！

结果是：他也不想干了；尽管他无限怀念当老板的“美好时光”。

50 与老倔见面 / / 逃离 PIPI

外星人：

由于没象别人那样几个月或一二年赖账不交，我们都是立即付清了现金；而食品不能退，有些东西真够我俩吃两三年的了。

通过这次开店，我发现了 PIPI 更多的毛病：发财梦不小，干实事不行，懒入骨髓。

左右为难，还得去游乐厅工作，但必须找两个同事能一起坐班的厅，以防抢钱的危险。还算幸运，这样的大厅竟找到了。由于有极好的《工作鉴定书》，厅管马上录用了我，自己又回到“无愁一身轻”的好时光，这辈子都不想再做老板了。

蝈蝈的邻居兼女友小佳，来德国进修半年，她托小佳带给我两本新畅销小说和茶叶，从她住的 MO 市寄了来。小佳打来几次长长的电话，声音温柔、言语可爱，还没见面，就觉得成了朋友。趁休息三天时，又置周末，我坐火车去看望她，因为她下周就到期回国了。

果然是个聪明可爱的人。我们见面自来熟，无所不聊。住到第二天，我们一起去老城步行区的饭店吃饭，边吃边谈，她问我爱不爱 PIPI，我如实说道：“谈不到怎么爱。不过是能说话儿、做做伴儿罢了。”

“这，总之不怎么样。”她想了想：“我给你介绍一个，你见不见？”

“什么人呢？”

“我们公司总管。”

“离了婚的？”

“五十四岁了，还没结过婚。”

“没结过婚的也尽是有孩子的呀。”

“也没孩子。”

“够绝的。”

“我们都叫他老倔。”

“倔吗？”

“有点儿。他前些日子跟我说，希望我给她介绍个中国人作女朋友。”

“是不是想和你呀。”

“我们夫妇感情可好了，也有了孩子，怎么可能和他？我又比他小十几岁？再说，我一回去，也不会再来德国了。我看你和他倒挺合适，他起码比 PIPI 有本事多啦。”

想了想：谁愿意和一个懒蛋？谁不愿意和一个有本事的人？我们都没孩子，多轻松！年龄也相当。我又是个做家务、照顾人的好手；他主外，我主内，多般配呵。

“行，”我答应道：“那你就给我介绍介绍。”

出了饭店，我们去临近的皇宫花园散步。她就给老倔打手机，通了，她只会说英语；随后把手机递给我：“他想和你聊聊呢。”

声音是沉稳慈祥的。我就用自己那错误百出的德语，和他聊了一会儿。他约我在下个周六的下午，在 HA 市和我见面。

“这人也够体贴的，”小佳说：“他不惜那么老远，跑到你住的城市去和你见面。”

回来之后，我纹丝不露。

这天我对 PIPI 撒谎道：“下了班，我要去看场电影，晚一点回来。”

他不爱看电影，一点也没怀疑。

老倔约我在离家挺远的「双桥旅馆」的大门前见面。我先到了，出出进进地找了一遍，在稀稀拉拉的客人中，没有一位象是也在找我的人，于是就站在大门外的露天花园里等他。

约十分钟，只见从远处走来一位约五十岁的男人向我招手；我向左右看看，附近没有第二个人，他高兴地直望着我，越走越近；我也向他招了招手。

“是奇奇吧？”这位比我高出半个头、红光满面、精神矍铄的德国人说。

“你是老倔?”

我们握了手。他的眼珠是灰绿色的。

“走，到我的房间里去谈。”

“你定了房间?”

“我定完了，去买点水果，这工夫你就来了。”他说话的风度和气度，颇象个领导。我一眼看得出，这是位正人君子；尽管相貌很一般。

这间单人房他只定了一夜，说他来只是为了和我见面，明天上午就回去。我坐在椅子上，他去洗那串刚买的葡萄。

“来，边吃边聊。”

我们聊得很高兴。尽管我的德语半生不熟，他却全能听懂。我们谈各自的家史和工作史——对我结过三次婚的历史，对我和 **PIPI** 的同居，他一点儿也不大惊小怪，更看不出丝毫的反感。他说自己还没吃午饭，问我愿不愿和他一起吃。我们去了餐厅，他点了两份煎牛里脊；这是最贵的菜，一盘二十五马克，又点了沙拉。他吃得津津有味，我却难以下嚥——牛肉又老又不新鲜又难吃。他说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明天晚上走，而明天下午我们可以去湖边散步。

次日我照常上早班。也不想对 **PIPI** 说什么，下了班就直去老倔那里。旅馆就挨着大湖，天然公园大得望不到边；处处是绿树成荫，花丛烂漫。

“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在没人的地方老倔说。

“什么?”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枚金币，放在我手心里。

“金币?”

“它价值六百四十八马克呢。你去银行就能换来。”

我摇摇头还给他：“我要它做什么呢？”

“你不要？”

“我要它没有用。”

“你不收集金币？”

“不。”

他认真地看看我，只好收回。

“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

“当然。我很愿意。”

“我可以常来看你？”

想想还得每次和 **PIPI** 撒谎，就心里别扭，于是问道：“我能不能和你在一起生活呢？”

“你是说，你搬到我那儿去？”

“是呵。”

“你要带很多东西吗？”

“就两个衣服箱子。”

“你可以去住。”

“真的？”

“真的。你什么时候去？”

“尽可能快。去前我会打电话告诉你。”

“可我每天上班，早出晚归，你会很无聊。”

“不会。我可以写作，看书。反正我不会无聊。”

“那好。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既然如此，这天我们就早早地分了手。我们既没亲一次吻也没上一次床，就这么决定了；这反而让我格外高兴，似乎这才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恋爱方式。

回家后就做晚饭。PIPI 丝毫没有怀疑——我说下了班去逛商场了。

于是我就琢磨着，怎样在 PIPI 不知也不见的情况下，能离开这个家。

我以为自己有了个称心如意的男朋友——他勤勉、正派、果断，PIPI 怎么和他比。我只想带两个箱子走，很多我花了钱置办的家具，衣物等等，都不会再属于我；我又一次为了一个“心上人”将扔掉一个完美的家。我已经快四十八岁，上帝保佑，这应当是我一生中的最后一次！

我打算在我度假的一个月安排出走。一个月会给我很充足的时间。假如我真地不再回来，再给厅管写辞职书。度假的日期我没告诉 PIPI。在这前天，我下了班收拾衣服，检出一大包旧衣服，问 PIPI 道：

“明天，DO 市有大旧货市场，你能不能开车去把它们卖了？卖的钱都归你。”

“行，我琢磨着能净剩四五十马克，我去卖。”他说罢又去老城散步了。

我乘机把要带走的衣物，匆忙装进了两个箱子。

次日吃完早点，PIPI 开车走了。我赶忙呼叫一辆 TAX，乘车去火车站。

51 在老倔家的新滋味儿

外星人：

快车飞也似地向老倔的城市开去。

两个省，相距有八百公里。火车上的人不多，我站在窗前，遥望飞驰而过的风景。已是夏天，虽然失业大潮已经开始，但美如画风景，仍显得生气勃勃。我幻想着一种新的生活，和一个我喜欢又佩服他的人在一起，那体会定是另一种滋味儿！

终于到站了。一下车，老倔正站在站台上，笑盈盈地望着我。

坐上他的高级轿车，不一会儿就到了他的家。这小城并不大，但很少见到穷人住的高楼。绿树后面，尽是私人房舍。车停在一栋二层楼前，他说这楼都是私人买的单元房。

正如我所想象的——整洁、简单、讲究；人住的屋子就象他自己。

“你就住这间吧，”他帮我把两只箱子提进那间屋：“这间一直是给客人住的。”

屋子不大，单人床的被褥都很整洁。桌边有个大大的窗子，阳光把屋里照耀得分外明亮。真是会生活、井井有条的人哪。

“你喝点儿什么？”他的眼里透着高兴和慈祥。

“茶。茉莉花茶。”

“我有好几种茶，”他说道：“就是没有茉莉花茶。我也喜欢喝茶。”

“给我来一杯你最爱喝的。我也尝尝它的滋味儿。”

那是深褐色、苦味儿的茶，颜色很象不加糖和牛奶的浓咖啡。他说，每天一大壶黑茶外加黑面包就是他的早点。说罢他带我光顾这一百平米的单元房——南北两边的小阳台、厨房、他的卧室、卫生间、小杂物间；一切物件都是恰够他用；一小件多余的杂物也没有。我问他你怎这么干净，一点点多余的东西也没有呢？他说，一有，他就马上扔掉了，他绝不积攒无用的杂物，连一个多余的小玻璃瓶你也看不见。这话真让我打心底里钦佩——元元和 PIPI，都是垃圾大王啊！我若每次扔掉垃圾，还和我嗷嗷叫啊！

我们坐在客厅的黑皮沙发上，慢慢地品着茶；他说，这房子是花了二十五万马克买的。

我又是一遍地环顾着四周，虽然干净整洁极有秩序，但缺少女人生活的情趣：缺少我家里的鲜花、绿叶植物、美丽的图画、生动的小摆设；更缺少两个人四处快乐游玩的照片。

“没有旅游照片？”

“从来不挂。照片我有。”

他拿出三大本厚照片册。

“照片都是我母亲搞的——从我出生直到现在的。可我五十岁以后，好几年没照相了。”

我小心地捧过来，一页页地、慢慢地仔细翻看。

一个母亲的爱，全部展现在这里，多么精致的手工呵！不仅是照片，还有他母亲在照片旁边写的亲笔手迹——“我可爱的儿子”，“多么甜蜜的小

天使”，“你是我的骄傲”随着他一年年地长大，初中、高中、大学毕业、工作；姐姐结婚，姐姐的孩子；随着他父母一年年地变老，父亲去世、母亲进了养老院——这三大本宝贵的电影式的日记啊！

“我姐姐也有同样的三大本，”他说：“我母亲一开始就弄了两本。”

“真是好母亲！”

“哪天我带你去养老院看她，她准高兴。”

“好呵。”

这三大本照片，实在让我百感交集！我甚至想哭、眼睛发酸、使劲克制着自己——我的母亲，何尝不是这样的母亲！甚至比他的母亲更伟大！《一个大童话》里都写了——母亲对照片的珍视和宝爱、视如命根子，千百倍地胜过他母亲！却都毁于惨无人道的文革中！此时坐在这里，语言的障碍，心情的沉重，使我无法去讲述心里的感触.....

全部看完了，我问道：“你女朋友的照片呢？你没有女朋友？”

“我没有。”

“一个也没有过？”

“十六岁的时候，”他翻到那一页：“看，这儿，她，我们是青梅竹马，后来吹了。再，这儿，我大学同学，她一直跟我来往，至今常来电话。但是她有男朋友，和他住在一起。去年我和她还一起去法国度假呢。”

那个长相很一般的小姑娘，象片飘过的云，便在他的生活里消逝了。而这一位，长得一点也不美却极为朴素的女人，活象他的老大姐。我心里闪过一道疑光：老倔工作如此杰出，人如此正派，为什么会没有女朋友？

“你是同性恋吗？”我问道。

他象不值一驳似地微微一笑：“我不是。”说罢便拿起手边的当天报纸，专心地看起来。

我去自己的屋里打开箱子，取出衣服和用物。我带来一张自己的照片，是和我的十二版本书的合影——其中已有六本绝了版，皆出于被中共压制的政治原因。我想把这四吋大的相片框挂在墙上，也带来了小钉和小铁锤，就咚咚地钉了几下，把照片挂好。

“你做什么？”老倔突然出现在门边，一手还拿着未看完的报纸，一脸的严肃：“这墙是不可以随便钉钉子的！”他不满道：“你怎么也不先问我一声？”

“我不知道呵，对不起；你不喜欢这照片吗？”

他看看照片不语。

“要我再把钉子拔下来吗？”

“算了，但不可以再钉了，”他不大高兴地走了。

晚饭，他和 **PIPI** 的习惯一样，是吃德国冷餐——黑面包、凉香肠、凉乳酪、温嘟嘟的黑茶。**PIPI** 的凉水果，他变成了凉沙拉。他说他特别会做生菜沙拉，分了一半让我品尝；我说不错，全吃光了；但酸硬的黑面包让我吃得勉强强。

“明天是星期六，”他说：“有农贸市场，我带你去买些食品。附近有家亚洲店，你去选一些你想吃的，好吧？”

晚上十点半，他还在看电视新闻，我说想去睡觉了。卫生间只一个，紧邻他的卧室。他从大柜子里取出两块干净的毛巾给我，说一个洗澡，一个洗

脸。我问道：

“你的习惯，是每天早上冲淋浴还是晚上？”

“每天早上。”

“那我也明早再冲吧。”

“晚安，”他说。

“晚安。”

我关了屋门和灯，躺在舒服的床上；就着月光，看着四壁，看着桌子上我的几本书和纸笔，看着我那不准钉钉子的照片。我多希望能和他象兄妹一样，永远友好地住在一起。

早九点，那边还没动静。我穿着睡衣去卫生间。他说每天早六点起床，这时他一定早就醒了。

冲完淋浴，我没忘记他嘱咐过的，用那刮玻璃的大象皮刮，在玻璃似的塑料拉门上把水珠刮去。我穿好衣服刚出卫生间，穿着睡衣的他也正从他的卧室里走出来，发怒地看着我嚷道：“你刮了几下？上帝！我给你数了，你足足刮了九下！上帝！来，进来！看我再一次示范给你！”说着他用胳膊把我拦回卫生间，拿起那刮子，在两片拉门上一下下地刮道：

“一、二、三，看清楚了？三下，只三下，一片门就干净了！再刮这片，一、二、三，只三下，又干净了，多一下都不用刮的！你竟刮了九下，上帝！”

我假装虚心地点着头，心想，这才知道你这老倔物为啥没有女朋友了！

当他拉着我的手出现在农贸市场时，他是那么和蔼可亲，他对每一位熟人点头打着招呼，以他有了女朋友自豪地向人人显示；哪怕这女朋友的

历史一共也许只三天半。

他的手干松而温暖；他对人人说话的气度，就象是大家的领导与好友。他告诉我，他只在一向买东西的摊位买货；他和几位摊主客气地唠些家常——他眼里闪烁着无比慈爱的、关怀的光；那神情，万分地通达与理解对方，让人人感到温暖舒服。仿佛，下一步就是要选举市长，没有一个人不会投他的票。

而我这离过三次婚的女人，拉着他的手，也装成美丽温柔沉默寡言的可爱的傻瓜。

由于买了国产酱油、甜面酱、香油和芽菜，中午做卷春饼。他高兴地吃着，连连说好吃。他的厨具也是简单干净，连个空玻璃瓶想放佐料的也没有。

厨房宽大，靠墙安着洗衣机，却没洗碗机。他说自己中午都在公司食堂吃饭，用不着太多的设备。

我把擦干净的平底锅放进碗柜里。

“又错了！”他生气地走过来并嚷道：“这平底锅绝对不可以放在这儿！要挂起来，挂在这儿，明白吗？”

“可是下面的柜子都空着，放进去没有尘土呵。”

“不行！只能挂在这儿！”

因了我的话他反而更生气。我没再说什么，不明白他的气从哪儿来——是否一个人住独了，变成住毒了呢？是否因别人住在这儿打扰了他，他才有气呢？

“待会儿我们骑自行车去郊外，”吃完饭他说。

“骑自行车？”

“我有两辆，每周我都要骑车远行。”

骑往郊外是一路下坡，这旅游省到处是丘陵。起伏不平的田野，森林，一道道的小河……我本是骑车能手，但到了德国，还是第一次骑这老远的路，真累。就这么在他身后干骑、干骑，也不见他想停下来，并不觉得愉快。好象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安排得一丝不苟、纹丝不乱、雷打不动……

骑回来时，路过树林边一家德国快餐店。店外树阴下，是一大片露天茶座。许多骑车人将车放在空地上，进去歇歇，喝杯可乐或啤酒，欣赏着四周的田园风光。

“我们也进去喝点什么吧？”我骑在他身后大声问道。

“不进！”他头也不回地往前骑。

这一晚睡觉时，我拧开他的房门，问他：“你愿意我和你一起睡吗？”

“来吧，”他高兴地把双人床的一半给了我。

我躺在他身边，我们都穿着薄棉布睡衣，彼此地搂抱着，体温和气息给了我们愉快。他没有德国人惯有的狐臭味儿，一丝也没有，真是个干净人。他抚摸我的全身，我也抚摸他。

“你的这么小呵？”我问。

“你想看看吗？”

“看看。”

他退下半截裤子——又一个大齐。我只是更温存地抱他，亲吻他的脸，他也吻我。难道，女人都只喜欢驴？我不想讲什么，不好讲，也难于讲。我才明白他没有女朋友的一大原因。他也许因此自卑，却又洁身自爱，并没走

同性恋那条路，而是把一切精力放在努力工作上，一步步升为公司总管。我只能说，他没有遇到一个不喜欢驴的女人。可这不喜欢驴的女人就在他身边，又怎样呢？二人能不能一起生活呢？

如果我是个妓女，或非要依赖他生存不可，我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他满足；可我不是，也没那心情，就象和大齐那样。到我们都想睡觉时，他说：“最好还是一人一屋，睡得舒服。”

“我也这么认为。”

我下了床，互道了晚安。

当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时，觉得不会再往那屋去了。多么奇怪，如果没有身体的接近，你就没有全部了解那个人。

傍晚他下班时，我正在用吸尘器吸地毯。他冷眼看着，似乎不认为有什么可吸的。忽听一声大叫：“错啦！错啦！你碰着墙角啦！”

我莫名其妙地抬头看他，只见他气急败坏地脸都红了、猛地拔掉了电插销。

“你把吸尘器碰了墙角！”他继续嚷道：“你看你看！”

我弯腰仔细地看那墙角，由于糊了壁纸，并无明显的痕迹。我不出声地收拾了吸尘器，放到杂物间去。

“我住了十年，一次墙角也没碰过！”

你不需要女朋友，我心想，你只需要一个奴隶。

晚饭我做炒面，他说只要三分之一，因为他还要吃片酸硬的黑面包和他做的沙拉。

“明天我下班早一小时，我们去看我母亲好吗，我有一个多月没去了。”

“好呵。”

白天他去上班，我就去逛美丽整洁的老城区。回来后在家看书看看电视；又写了两小篇记叙文，投给了纽约和香港的两家杂志社。

老倔的阳台和屋里没有一盆花，无一棵草。如果我是这儿的女主人，我肯定不会让阳台如此无生趣。这一百平米的房子，只有一个生命，就是他自己。而我亲手布置的家，有多少生命呵——花、草、每年在我造的小木屋里下崽的林中小野鸟……哪怕是玻璃上的圣诞窗花，哪怕是墙上挂的几张风景画，以及我们四处游玩的照片，它们也都是一个个生命啊！

PIPI 现在是否正否满处找我？让他着着急也好，不爱工作的懒蛋！

老倔一下班，喝了几口茶，我们就去养老院。我坐在驾驶座旁。车开了好一会儿，老倔忽然说道：“糟了，刚才那路口我忘了拐了！还得倒回去。”

但必须有能退回的路标才行，汽车还得往前开，一开老半天。真真想不到，他这堂堂大活人，这盛气凌人的公司总管，竟退回又错、开了再退回、一连错了三次！汽车就这么开来开去！

“糟了，我又错了！”他说：“还得退回去。”

“你可是第四次啦！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的气不打一处来：“你倒是说说，你一个天天开车的人，为什么这么笨？你是不是该上医院检查去啦？”

我真想说：我们家那懒蛋开车可比你强太多啦！

“我每天上班就那一条路，”他辩白道：“从来没错过。这路一个多月没来，就忘了。”

一想也是，他一休闲，就只是骑自行车；一年坐一次飞机去法国。除了上班的路，他还认识哪条路呢？可 **PIPI** 只要开车见过一次，就过目不忘——难道这也是本事？

52 又一种养老院 / / **PIPI** 差点儿去报警

外星人：

足足在高速公路上耽误了两个小时，见他出够了倒退的洋相，终于到达养老院。

这是本市最有钱人进入的养老院了。但在外观和规模上，比 **HA** 市那高级的山上养老院又差多了。大约，**HA** 市因是大工业城，工厂主们很多，所以比这里的人更有钱吧。

老倔在养老院门口买了一束鲜花，他母亲见了他和我，高兴地拥抱我们，并说着想念和问候的话。她把花立即插在花瓶里，灌满了自来水。

母亲已经八十五岁，除了驼背，身体还算硬朗，头脑也清楚。她一人住

在一间统一规格的小屋。老倔在来之前，在电话里向她简单地介绍过我。

母子俩你一言我一语地唠着家常，偶尔也和我说几句。他母亲并不问我个人的事，好象早就与我熟悉一般——这恰如其分的涵养，不仅令我喜欢，也令我感动。或许——突然我脑海里一闪而过——她所以不好奇地问我什么，说不定是老倔领到这儿的女朋友足有一连，她知道一个也成不了。

我环视着这小小的屋子：单人床、洗衣机、电烤炉、冰箱、一桌二椅，把小屋里全占满了。要是在养老院外，这么小的安身之处，就是连领救济金的穷人也不会住。桌上摆着两幅照片——她和丈夫年轻时的结婚照、她和一儿一女的合影。老倔说过，每人的屋子里，不许有多余的挂物、用物和杂物。然而，屋子的生活情趣，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啊！当所有有情趣的东西都没了时，你不觉得生活是如此枯燥无味吗？你不觉得窝在这什么也没有、监狱般的屋子里，不过是一天天地等死吗？无论是多么高级的养老院，也不如自己的家里美好和快乐——因为它的面积、布置和摆设，不象是一个等死站。哪怕你只能躺在家里的床上，但你望着四壁和每一样东西，都会勾起你温暖的回忆，心情是满足和欣慰的。可这些有钱人，想的大概是另一样，他(她)们甘心每月在这里仍掉七千多马克，甘愿窝在这小狗窝里，却不肯用三分之一的钱，去找一个有如亲儿女一样的能整天伺候他(她)、给他(她)更多的爱和温暖的人，直到他(她)安然去世——因他(她)只信任国家，不信任私人。

当我们和她告别时，他母亲拥抱和亲吻我们，并说希望我们常来看她……

“我一到六十五岁退休，”老倔在汽车里说：“就申请进养老院。”

“你真觉得养老院那么舒服?”

“它方便嘛! 不用买东西, 不用做饭, 医生二十四小时值班; 一身轻嘛!”

可它象等死站——我想说, 每天就是议论昨天谁谁死了, 下一个会是谁了。在这种气氛下, 你能活到一百四十岁? 就算能活, 又有什么意思?

第八天的晚饭后, 我们斜对面地坐在沙发上, 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电视, 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

“你想今年十月和我一起去法国度假吗?” 他问: “只一个月?”

“为什么你三十年来, 老是去那一个地方, 老是那一个家庭旅馆呢?”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真真的又一个努太太!

“可是, 假如我不想去那儿, 想去更美的地方呢?”

“我只想去那儿。就那儿好。”

“我不知道。我还没入德国籍。去法国还得办签证, 太麻烦了。”

“不麻烦, 要是你想去的话。”

“我最希望的不是去度假, 而是能和你长久地在一起生活。”

“如果你不回去, 那 PIPI 怎么办?”

“我会给他找一个农村姑娘, 年纪应当比他小几岁, 人长相一般; 勤快、节俭、健康、脾气好, 有没有文化不要紧。这样的姑娘在中国可是太好找了。”

“我也想要这样的,” 他脸看着电视画面, 似乎是脱口而出。

这话让我一愣, 半天没吭声。我才明白, 男人喜欢的只是两类女人: 要

么是美貌动人、无所不能的妓女；要么是无知的娃娃般的姑娘。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有个性，竟然自己提出过离婚的女人。

而我在这八天里，真正地体会到了一点：我在这里永远只是客人，永远不会是主人。我真的是放着鸡窝里不当凤凰，而跑到凤凰窝里当鸡来了。

“我在这儿住了八天了吗？”我转脸看着他：“怎么就象住了八年似的？”

“我也觉得象过了八年。”

“真的吗？”

“真的。”

“要不，我回去吧。”

“再住一两天回去也行。”

“不，今晚就走。”

“说走就走？”

“是。我给 PIPi 马上打电话。”

“可以。不过，他开车到这儿会很晚了吧？”

“顶多十一点半。你每天都是十一二点才睡嘛。”

“要不明天？”

“明天你上班。最好是你在家的時候，才万无一失。”

“也好。”

电话一拨就通了。

“奇奇，你在哪儿呵？你可让我好找哇！我明天都想去警察局报案啦！”

“我在一家中国饭店做跑堂呵，太累，做不动啦。你来接我吧。”

“你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就跑了？”

“PiPi, 因为我和你生气呀, 谁象你这么懒, 老窝在家里呀!”

“奇奇, 我一定去找工作, 可你不能再跑啦!”

“PiPi, 要是你真变勤快了, 我就不会跑了。”

“我马上出发。你住在哪儿呵?”

“我住在老板给员工租的楼里。我会在楼下等你。拿笔记一下, 告诉你怎么走……”

撂下电话, 心情竟是无比的欢欣! 我赶忙去收拾箱子。是的, 我不能让他上楼, 不能让他见到老倔。估计他快到时, 我得提下去两个箱子, 在楼下等他。

老倔已关了电视机, 沉默不语、半低着头、愣愣地呆坐着……或许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否失去了什么, 或许他回忆起过去那一连的女友, 怎么一个也不剩……

其实, 就算有那样一个好姑娘, 他也不会和她结婚。因为他早已算计好了: 65 岁他进养老院, 用自己的退休金和房产, 可以舒舒服服地过到死。他还没有富到象那些大工厂主一样, 可以留给女人一半财产的地步。

我去另一屋收拾自己的箱子。屋里立刻恢复了原貌, 仿佛这屋里从来没住过一个叫奇奇的人。

汽车里, PIPI 高兴得简直语无伦次。而我脑子里, 却还闪现着刚才的画面——老倔站在昏暗的阳台上, 伸出右臂向我摆摆手; PIPI 却没看见, 当时他正打开后盖放箱子。

我编的谎话他毫不怀疑——去那么远的地方找工，就是因为和他生气。再说为他的懒，和他吵也不是一回了。但我自知，他的懒入骨髓是谁也治不好的——从小，父母没给与好教育。

我高兴的是：PIPI 是如此地重视我，而不是可有可无；他把我真地当宝贝，而不是奴隶。我更高兴的是：一进家门，感到自己的家是多么可爱！不比不知道，一比才知家中的每一物竟是如此有魅力、富有人情味儿！

庆幸的是工作并没失去，我的度假还有二十一天。PIPI 说我们应当去柏杨省的巴登湖玩，湖那边是瑞士，沿湖处处是景点；到处都有度假屋，还可以自己做饭。

“谁付钱哪？”我问。

“我付。”

“一家一半儿。”

我要是不付一半儿，他心疼得能睡着觉？

53 第四次结婚 / / 莲变成了德国祥林嫂

外星人：

楼里搬进一家东德来的邻居，西边的一来就说他们就是：“东边儿的。”他们显得很孤独。仿佛柏林墙倒塌时的欢乐，只是快速地一闪，并没能改变原来长久的蔑视和成见。我常想，假如大陆人和台湾人或香港人在一起，成为一国、成为邻居，恐怕也如是。

一家三口立即去找工作，母亲和女儿都去当清洁工，父亲倒在家里做家务活。

许多低种工作已经很不好找了。失业大潮威胁着每一个人。大街上，成群结伙的外国人和白人，无所事事地东游西逛，看得人头痛。劳动局对失业者的办公室，由两个增加到四个、然后六个；每人一来先在自动机前抻号码纸条——九百多号或一千几百号，按号叫人，耐心等着吧。楼道里，坐满站满了垂头丧气、心情恶劣的失业者。

失业金并不好拿，劳动局会给你各种的低种工作，不管你过去职位有多高。一个清洁工或帮厨的职位，会发出几百甚至上千封信让每人去报道。好一点的职位，根本轮不到年过三十的人。你没及时去报道，或在哪一点上不合要求，“记过”三次，你就没失业金了；而社会局也不会给你救济金。何况还有其他的种种要求。个局不沾、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

对于失业者中同居的政策，也改变了：凡在一起同居的，都按结婚的算——一方若有满工时的工资，则应付另一方的生活费；劳动局只作为补差性的付给。分配工作是全国性的。只对结了婚的，劳动局才不会分配一方去外地工作，国家保护的首先是家庭。

“要是结了婚比不结婚有这么多好处，”我说：“那不如结婚了。”

一听我同意结婚，PIPI 乐得手舞足蹈。

还不仅是实际的好处。我以为，最完美最高的形式，就是结了婚的家庭。那时你心里会更踏实，会更顾及这个家；而不是三心二意。尽管我们不想要孩子，可我们愿意有更高更完美的形式，共同走完这人生。

一九九三年八月六日，我们在 HA 市市政府登记结婚。

外星人，我不想详述那一个又一个画面——主婚人，证婚人，照相，去饭店吃饭；然后在半个月的婚假中又远游，玩了十天……假期满了，我依旧回到游乐厅工作。

婚后的大礼物，是我自动出资一半，给 PIPI 买了日本“TOYOTA”新轿车，PIPI 又一次乐得手脚并舞！他爱汽车胜过爱太太。在德国人人皆知：养辆汽车，比养个太太还贵。

我不想学开车，是怕出车祸；有 PiPi 这从未出过车祸的好司机，足矣。

弟弟两家和国内外的朋友们，都学起了电脑，可我和 PIPI 还是没兴趣去买去学。

一天，我忽然想起，与莲久不通音信了，她还好吗？

我找出老电话号码，试着打；一个德国姑娘的声音说道：“莲是我的男朋友的母亲。她刚出去了。这两年她精神很不好。两小时以后她可能回来。”

三个小时后我又打电话，是莲接的，弱弱的声音颤微微的。

“天，”我差异道：“你怎么这样儿了？”

“奇奇，我完了！这两年我真的完了……”她哽咽道：“大象抛了我们娘

儿俩.....”

“明天我休息三天，我去看你行吗？”

“来吧。这么远，反正当天你回不去，就住这儿吧。我去火车站接你.....”

“他叫阿石，”在火车站台上，莲介绍道：“我们同居两年了。”

莲除了有点苍老和虚弱外，没多大变化。比她小六岁的阿石，看上去也蛮热诚厚道。坐上他们的旧汽车，莲是司机，车停在她住的楼前。德国姑娘不在，小象和莲的哥哥在家做好了饭菜等我们。小象已比我高出一头，是个大小伙子了。

这是每月房租五百七十马克的二居室、带厨房的单元房。一进门，客厅里没有沙发，只有四把白色的木椅子、一个白柜子和一个没有被子的窄小单人床，铺了白床单；墙上挂着三大张针灸穴位人体图象。

“这儿象个诊室嘛，”我说。

“就是诊室。”阿石道：“有时候莲在这儿给人针灸。”

“你什么时候学会针灸了？”

“哎，先吃饭，”莲说道：“说来话长了。”

.....“大姐，”阿石含笑道：“还是让我跟你说吧，她连说都说不清楚。”

当小象和她哥哥走了之后、就剩了我们三个人时；当莲说了两三遍我仍听不明白时，阿石便说道：“她是三进三出L市。”

“三进三出？”

“三进三出，这么说，你就明白了。”

莲虚弱地、抱歉地现出一抹苦笑：“让他跟你说吧。”索性一掀门帘，进里屋躺着去了。

“你劝他们政治庇护之后，”阿石有条不紊地道：“这三口人去申请了，结果给他们分配到 L 市。等了将近一年，他们都得到了兰皮护照，租住的就是这单元房，直住到如今。大象得到居留，幻想着回到研究所，觉得在 L 市没有前途。可是他有了长久居留后，研究所反而不要他。劳动局分配的工作，他又觉得太低、又不干。怎么办？儿子还得上学？谁养这个家？莲就离开了 L 市，去大城市大饭店当跑堂，住在那儿，一个月才回来一次，这是一进一出了。”

“是，一进一出。”

“她挣的钱，连小费一月三千马克，全交给大象，三口人生活没问题，还有富裕。干到一年半上，大象说什么也得让她去美国给他找出路，他还幻想着干老本行。于是，莲辞了工，回到 L 市，住了不到一个月，打点上路，去了美国。这是二进二出吧？”

“是。”

“她在美国两年，费劲八拉地结交人情、找了个昏天黑地；还得自己养活自己，还得惦记着那爷儿俩，结果也没给大象找着出路，只好回来了。结果呢，大象和女朋友已经在这家里同居了一年了！她一回来，大象就逼她走，她只好带着小象离开了家，离开了 L 市，又去了原来那家饭店，连打工带住，一住两年，这是三进三出吧？”

“那怎么又回来了呢？”我问：“又住在这儿，就是四进了。”

“是。四进，还没出——是大象出去了，他和那女的搬柏林去了，说那

边热闹，嫌这城市太小了。”

冷丁门帘一掀，莲猝然地靠在门框边，两臂交叉在胸前，直视着我；底气健朗、口齿清晰地说道：“奇奇，都怪你！都是你劝我们去政治庇护，说这好那好，都怪我们听了你的！要说罪魁祸首，就是你！”

我意外地瞧着她。阿石反倒丝毫不奇也不怪，他一定是听过多少遍了；他那漠然置之的表情，就象全然没听见。

“要是你们真的后悔，”我说：“完全可以回国呀。德国政府巴不得你们回去呢，立即还给你们中国护照，还给买飞机票呢。”

“可回去，”莲道：“会找我们麻烦哪。老共还不秋后算帐？”

“也不见得。要是你们真爱中共的话？”

“嗨，”阿石道：“你就别老吃后悔药儿了；不但你们没回去，你哥哥还非出来不可呢。”

“我怎么说他也不信哪，”莲道：“我有什么辙？”

“你哥哥出来多久了？”

“三年多快四年了。”莲叹道：“我怎么说德国不好他也不信。他是中学老师，为了出国，非要改行学烹调，得了个证明，中介公司让他出来当三年大厨，累得象孙子似的，都快累死了。结果老板说没生意，楞是半年没给他工资！”

“那怎么不告他？”

“怎么告？老板是德国人。我们德语又不行，又没那么多钱请律师，怎么告？吃哑巴亏的多啦。”

“回国得了，”我说。

“他就是不想回呀!”莲叹道:“他想让我们几个凑钱,开家饭店呢。”

“他也政治庇护了?”

“不申请怎么办?否则哪儿能开店?”莲道:“阿石也是——他都申请了一年半了,可居留还是没下来。”

“你哥哥呢?”

“他的倒下来了。”

“那你就别怪我是罪魁祸首了。”

“还得怪你。你知道我们娘儿俩受的罪吗?”她变得有些神经质、又声音发颤起来:“我在美国,什么苦没吃?什么罪没受?不打工我吃什么?不都为的大象吗?一边儿打工——去有钱的台湾人家当保姆,一边儿给他找出路,想法儿认识其他的有钱人;整整两年哪!这当儿我儿子来了封信,说:‘妈,您回来吧。’我以为谁病了,坐飞机赶着回来……那天,下着大雪,一进门儿就傻了:过去常来我们家吃喝的一位女大学生,和他同居了一年了!过去,儿子还小,不懂得告诉我;现在他懂事了,实在气不过,这才给我写信。我既然来了,她该走了吧?谁知大象左右为难,那女的大叫大嚷:‘要我还是要她?!你明明爱我,让她走!!’——凶得象个母老虎啊!大象就说:‘你们走吧,娘儿俩都走吧!’天下着鹅毛大雪啊……就这么,把我们娘儿俩硬赶出来了!”她哽咽地流下泪来……

我和阿石都愣愣地听着;阿石也许听过一百遍了,可我们谁也不愿打断这德国祥林嫂。

“我们往哪儿去?什么我们也没拿啊。冒着大雪,我们只好坐火车,去打过工的那家饭店……一进门儿,我们娘儿俩……就给老板跪下了……”

她呜咽地流出两行清泪，阿石递给她两块纸巾。

“唉！大姐，”阿石叹道：“我和她就是在那家饭店认识的。我在厨房帮厨，她做跑堂，可她尽算错账，一天到晚晕呼呼的！”

有一会儿我们都沉默着……

“现在，大象和那女的怎么样了？”

“还是同居，听说老吵架。”

我不问也能明白：大象一定没有工作。

“你们离了婚了？”

“还没呢，”莲无精打采地说。

“还能在一起？”

“不可能了。”

“那又为什么挂着？”

“也没想再结婚，离什么呢？再说，他常来看儿子。”

“每次他来就是要钱，”阿石含笑道。

“他的失业金还不够？”

“那女的把持着。”莲说道：“我出国前，学过三个月的针灸——国内到处都有教的，得了个证明；我只能医治胳膊腿疼，受凉受风之类，别的不治，没想到派上了用场。现在西欧不是越来越中国热吗，想看中医的也越来越多，我把那小证明在德国交了六百马克做了公证，挂在一位骨科医生的名下，按人头收入对半儿分钱。夏天病人多，一月能挣七八千；一年平均月工资能合三千，就仗这活着呀，没钱行吗？小象上大学啦。大象老是没钱，每次来都是要钱借钱，借了也不还；经常连电话费他都交不上。”

“那你为什么非要给他呢？”

“他下次再来我绝不开门了。”

“你说过好几次了。”阿石温和地道：“大姐，还有哪，大象做的生意都砸了锅啦。”

“什么生意？”

“别提了，”莲说道：“他全是想当然。他从中国买了两万六千马克的瓶装酒，一个谁也没听说过的名字，叫什么‘万寿烧’，他想着能卖给每家中国饭店，赚一大笔；结果谁都不认，一瓶儿没卖出去，到今天他地下室里都堆满了。”

“正好留着他自己借酒浇愁，”阿石笑道。

54 大象谎话一箩筐 / / 看望 PIPi 的母亲

外星人：

当我坐在火车上回家时，心情沉甸甸的，想想莲的家就这样四分五裂。况且她对阿石也不信赖。阿石不在眼前时，她对我说：“一是阿石的居留扑朔迷离，连个申请登记的号码也没有，更遑论救济金？二是阿石和国内当

医生的太太也不想离婚，还有个孩子。他在国内是小学教师，出来办的是留职停薪。这次她希望阿石也能凑些钱，大家一起开家饭店；但阿石却说他没钱，都寄回国给他孩子看病住院用了。”

火车飞也似地向前奔去，掠过百看不厌的美丽如画风景……

阿石外表倒是蛮厚道，我想，其实他根本就没去申请政治庇护。他在莲家白吃白住，何必去饭店厨房里累得象个孙子？再说莲生活上也需他。他出国，不过是想来看看、挣些钱，体会一下另一种社会制度的生活，如此而已。他跑了三五个城市，只要没人报案，警察也找不着他、也想不起他来。如果他真爱莲，他太太不主动离婚的话，在德国他连婚也离不成——除非他回国离婚。

可叹的是莲。如果她以后知道了实情，就更会变成祥林嫂了。如此比较，真不如找一个 **PIPI** 那样的德国人，有多简单、少多少啰嗦、少生多少气！一比，才知 **PIPI** 并不太可气。小象和德国姑娘相好，阿莲有些失落；其实，我倒认为这是很好的选择。

中午到了家，做饭，吃饭；**PIPI** 又出去散步。我找出莲给我的大象的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寒暄过后，我说道：“我刚从莲那儿回来。大象，你们真的不能再在一起了吗？”

“奇奇，我怎么跟你说呵，你是女同志，很不好说的，我……和她……是苦不堪言哪！”

“你指的是性生活，对不对？”

“你既然捅破了，我只能说，就是。我有需要，她老没有。我也理解她干活很累，可一月一次也太少了吧。”

“你和你这位女朋友相处得好吗？”

“当然，当然很好。我跟你讲，奇奇，我失业金每月三千七百马克，我们俩花不了的花。我还有其他收入：搞化妆品。每月光这一项，就是四五千。我劝你也搞搞化妆品，很容易的。”

“怎么搞呢？”

“你搞过吗？”

“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这是美国人创造的连锁公司，不用店铺，全靠发展会员，且是双向发展。发展的会员越多，大家提成越多。在德国我是最先搞的，可以说是他的德国方面负责人。如果你想搞，我可以寄给你资料，你一看就明白了。但你必须先买四百五十马克的化妆品，我的资料随同化妆品一起邮寄给你。你有电脑吗？”

“没有。”

“嗯，没关系，没电脑照样可以搞。象你这么聪明的人，奇奇，我敢保证，你会很快发展很多会员。你光从中提成，再加上自己销售的化妆品，每月至少有三千多马克净收入！”

他那胸有成竹、响噹噹的许诺，比热情介绍你加入“发财党”还热情十倍。

我假装说考虑考虑，就挂了电话。

说得天花乱坠，全是谎话。我心里说：一，过去劳动局给你低种工作你不干，只要三次，你就分文没有了；社会局也不会给你，连住房津贴都不会给你；三个局都是一体的。二，不管一个人的原工资多高，失业金不能超过

一千八百马克，这是国家政策。三，失业金只是一二年的事，然后是失业救济金，不准超过一个人的最低生活费一千二百马克左右。你大象可骗谁呢？四，你分文没有，只好自己搞五花八门的生意。你要是真能挣这么多，你女朋友还老跟你吵架？你还老去莲那里伸手要钱、借钱不还？我真担心有一天你流落街头啊。

我踏踏实实去挣游乐厅的低工资，反倒轻松和心安理得啊。

又将到圣诞节，加上周末，我能有一周的假。我们带上一些亚洲土特产，去 PIPI 的母亲家。从北到南，要穿过大半个德国。一路上大雪纷飞，而新汽车里却暖暖盈盈。PIPI 放上一盘钢琴小提琴梦幻奏鸣曲，动人的旋律伴着扑打在窗上的片片雪花，格外富有诗意。

开了七个半小时，才到了那小镇。这里出生过一位诗人，小镇以他的名字命名。镇虽不大，但象别的城市一样五脏俱全。见不到高楼，尽是座座私人宅院。母亲租住一座私人房子的一层。街对面住着她亲姐姐一家，一座有大园子的房子。

八十岁的母亲看上去总是那么硬朗。她做好了匈牙利炖牛肉和土豆沙拉等着我们。母亲的特点就是每分每秒都得说话——当然，别人插得上嘴的时候除外。

我们坐在大厨房里，一边吃着喝着，听着母亲东一锤子西一棒子、又一次地讲着陈谷子烂芝麻——

“……一九四五年那阵儿，苏联红军呼啦啦就来了，到处强奸妇女，可

恨极啦！对我们德占区的，就更凶啦，不由分说，命令我们二十四小时之内，必须离开匈牙利，把我们赶往西德。家里是个小农庄，什么也拿不了，只拿了几件衣服，就这么，被德国政府分配到了这个小镇上。当时我和你们大姨两家人十来口子，按难民似地一家给了一个住处。我们岁数也大了，能做什么？孩子们去上学，我们要么去当清洁工，要么去饭店或旅馆帮厨。你大姨在教堂的停尸房当清洁工，干了二十几年，一直干到退休哇。海曼的爸爸学过电焊，分到了电焊厂。德占区的居民从小就学过德语，好歹我们还能说德语，可是写和读就不行，全忘光啦。他爸爸到死都不得意呀，老觉得农庄的日子舒服哇，一下班就累得唉声叹气。四个孩子又小。那还用说，在农庄不用这么累也能活得挺好呵。德国人干活就是快快快、好好好、工作量太大！什么吃重的活都让外来人干，他哪儿受过这罪？不干又不行。天天借酒浇愁，又爱吃猪肉，顿顿得有肉；又抽烟又喝酒，得，到了得了肠癌，三个月就死了——”

因这故事听过至少二十遍了，我便打断道：“Mutti，为什么荷尔佳老跟您吵架呀？”

“她是个妖魔呀，她的脾气和她爸爸一个样！我生了六个孩子，前夫的两个从德国去了澳大利亚，在那儿定居了。和他爸爸结婚又生了四个。最让我不省心的就是荷尔佳。她硬说她亲生的爸爸不是这个爸爸，她硬说她去医院查了自己的血型了，说和我和她爸爸的全不一样，你说气不气人？她打小就怪癖，和谁也和不来！这回，她又想搬家了，搬家得花大钱，我已经帮了她一回，这回她又找我要钱，我说我也没有，她就火儿喽，又搬出她的爸爸到底是谁的问题来啦——”

大姨突然笑咪咪地走了进来，托着个蛋糕。她从来都不打扮，总穿着在菜园子里干活的旧花布工作服；她的脸就象个干土豆，皱纹密布，瘦瘦小小，牙都掉了一半儿；她老说戴假牙特不舒服，也不爱美，就这么四处漏风地吃饭和讲话。

“大姨！”我们高兴地招呼她。

“知道你们来，我现烤的，”她把蛋糕放在桌上。

“有什么新闻吗？”她坐下问道。

“今天上午，”母亲从来没有无新闻的时候：“荷尔佳打电话来，说她大女儿得去一个医治中心住三个月，专门医治吸毒少年的。”

“我的上帝！”

“她二女儿肾出了问题，也得去住院。”

“噢，上帝！”

“荷尔佳又找我借钱，可上次两千她一直没还；我说我只能给你五百，她就嚷嚷说我偏心，说为什么给吉赛尔八千帮助她买房子？问我到底有多少钱——”

“回回她就是为了钱哪！”大姨的唾沫星子四溅。

“这还不算，丽尼打电话来说，她大女儿小胖找了个黑人做男朋友，搬出去住了——”

“和黑人？”大姨惊道。

“当然——”

“上帝！”

“那黑人是清洁工，他哪个工作也干不长，都换了好几种工作了。为什

么小胖搬出去了？她怀孕了——”

“我的上帝！”

“那黑人叫，叫，叫什么强几，比小胖大五岁，是在迪斯科跳舞认识的——”

“她怎么会爱上他了？”大姨口齿稀稀哗哗。

“他会甜言蜜语呀！说在非洲，小胖肯定过得象个公主呵！一下子把她说迷糊、说晕啦。丽尼当然不同意。小胖傻到——把她妈妈劝她的话全告诉了强几，你猜他怎么说？你猜，你猜——”

“他说什么？”大姨和 PIPI 一起伸着脖子盯着母亲。

“这黑人说：谁想拆散他们，他绝不客气，他会杀了全家——凡姓‘织布工’的都别想活，一个不留！”

“上帝！”大姨惊道。

”啊——？！”PIPI 害怕道：“他要杀了咱们全家？”

“对，他要杀了咱们全家！丽尼去私人警探办公室调查他的品行，才知道他原来有个前妻，也是个黑人，和他一块儿来的德国，俩人没孩子，不知怎么那女的就死了，到了儿也没查出来，说不定他杀人成性，老有经验啦……”

母亲叨叨唠唠、绘声绘色地说着惊险小说。我洗完锅碗，蹲下身，看看碗橱里有没有大擀面杖。嘻嘻，还真找到一个，它是纯德国式的——又粗又平又大又直；两边有扶手把，中空带轴儿，它是德国家庭必备之物，用来烤蛋糕和饼干必不可少的。

“你拿它干嘛？”母亲眼尖，停了讲暗杀小说。

“这东西治神经质,”我头也不回地说了句汉语。

“什么?”母亲没在意,又对他们嘟嘟嘟地讲下去.....

深夜,PIPI一下子从被子里坐起:“奇奇,我梦见强几握着尖刀杀来啦!”

“PiPi,你要是再神经,我可要拿擀面杖去啦。”

“真的,我真地梦见他杀来啦!”

我噌噌地就去了厨房。

“你想睡还是不想睡?”我杵着那根木棍子问道:“要不,把你母亲叫醒?把你们两个全抡一遍?”

55 我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 // 对PA市一见钟情

外星人:

住了四天,当我们开车回家时,PIPI说道:“我最怕听我妈讲话,她一讲什么,我准睡不着。她专门让人人不安静,三个妹妹的婚,全是让我妈拆散了的。我交的女朋友,她都一百个看不上。她希望我们都打光棍儿。”

“为什么呢?”

“她就可以和儿子或女儿一起过了。”

“你们不单身也可以和她一起过呀。”

“谁也不愿和她一起过。就因为她老是没事生事。”

他说得倒也是事实，他母亲确实不是个省油灯；她不是那种安静慈祥、你一看见她就心里踏实的母亲。她和大姨完全相反：她总要每分每秒不停地说话，翻家中每人的历史老账，即兴地编《拍案惊奇》，数落所有人的不是，让人人紧张、互相不满。所以 **PIPI** 的爸爸被早早气死，所以 **PIPI** 和他妹妹们老不团结。尽管母亲说完就完，不往心里去，可她得罪的人一片又一片。当把所有的邻居都得罪完之后，她就搬家。她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搬了几次家，反正她的退休金足够她折腾。每到一地，她就成了讲故事明星，直到人人对她毫无兴趣，她就再搬家。

“可有个母亲毕竟是好呵，”我说：“你看她的年历后面，把我们所有人的生日都写上了，每个人的生日和圣诞节她都给我们寄钱，每次我都挺感动呢。每年她都要寄二十多回，也得花不少钱呢。”

“嗯，就那么点儿钱，不是每个人才得五十马克吗？”

“你还嫌少哇？你没了母亲，谁给你一分钱？她也没什么钱哪，还老惦记着每个人，也不简单了。我们给她什么了？”

PIPI 不说话。好象他母亲无论怎么给予，他们都认为是应当的。中国人的“孝”和“回报”他们是不讲的。似乎一切都有社会管，似乎父母就应当是往下疼，那是天经地义的；哪怕他们都到了九十岁，他母亲也应当如此。

PIPI 老说小时候妹妹们怎么合伙欺负他，仿佛他不是大一岁的哥哥，而是小她们十岁的弟弟(所以我老说错是他的三个姐姐)；他总说他父亲动不

动就给他一巴掌，只有他母亲向着他。父亲早逝，母亲只希望儿女们早早挣钱养家。PIPI 只交家一年工资，就觉得自己冤枉透顶，找房搬了出去。他母亲只好再去超市的饭店整天帮厨。四个孩子都未上过大学。当过饭店跑堂、又结婚生子的丽尼和吉赛尔经高人指点：若再不学些专业将一事无成。于是二人去学习企业管理，那时劳动局还肯出钱培训。三年毕业，她俩都找到了坐办公室工资不低的工作。荷尔佳高中毕业后去学习医护专业，一直是护士，可她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嫌又累又繁琐。三个人都离了婚，都找不到合适的生活伴侣，短期在一起的男朋友都吹了好几个。

他家人只知道我离过三次婚，我的任何作品她们都没读过。小松鼠出版的五百本《冬天的童话》，还没到市面上，就因我要留在德国而绝了版。英文和法文的他们也看不下来，我也不想给他们看。有时在报刊上发表的、中文对于他们更是天书——而对我来说，是越清静越好。所以我在国内外出名的历史，她们是一无所知。

我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满载着我的过去，一个是什么也不知道。中国人都留在那边了，见也见不到；德国人在眼前，天天见；而我夹在两边的中间，对那一边摆摆手说再见，对这一边自由自在地装傻，实在是一种新奇的感受。

又是夏天，又是一个月的度假。我们开车向南，向最美的柏杨省开去。我们穿过「罗漫蒂克街」——从北往南到边境的几百公里的乡村公路。一路上古色古香的小城镇一个接一个；每个城堡、建筑、房屋、景色都不同，

每个地方都让人流连忘返。其实人们不必舍近求远，若你能详细地了解了德国，恐怕你一生都做不到。正象我在中国四十年，很多地方都没去过一样。

晚上我们就住在到处都有的度假屋，只住一夜价格不菲；第二天继续向南开。我们停了汽车又坐马车，到了“童话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新天鹅石堡”——童话般的古堡造型，殿内极其讲究的色彩，无尽的神奇的壁画，精致高雅的古典家具和绝奇的摆设，美幻得令人难以想象的地下童话湖……令人叹为观止、形容不尽、毕生难忘……

可是，一个人住得太豪华太美、太与世隔绝了的国王，竟变成了神经质，变成了疯子。而他留下的八个童话皇宫，却成了德国的瑰宝！

“还去哪儿？”

我们心里没谱，想哪儿就往哪儿开。PIPI 说，他几年前去过 PA 市，那儿很值得一看。

于是又一直向西开去……

“太美了！”当我们到达 PA 市时，已是傍晚；在西下的残阳中，衬着天上泼墨似的浓云，更现出全城童话般的魅力——三条河城：多瑙河，茵河，伊而兹河，在此交汇在一起，变成宽阔的多瑙河向前流去。邻国奥地利近得有如在此城中。这被称为五百年历史古式建筑的大学城，小山上绿林密布的古堡，高耸的大教堂，古老的石子巷，小店和小街……所有的美都集中在一起。不用开车去找景点，你只需步行，左看右看，美景便尽收眼底，人人就在画中。

翻开德国厚厚的旅游书，此城竟被评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而整

本厚书，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城市有这样的评语。

当晚住在旅馆里，从窗子向外遥望，山上的大古堡被灯光映照得神秘诱人，深兰的夜空繁星点点，彩灯闪烁的游船静静地在多瑙河上穿行，真美啊！次日，又到处细细地逛……路过劳动局，我好奇地走进去看，惊讶地发现：才两个失业者坐在一个办公室的门前等着谈话，再没有第三个人了，更不见排号码条子的设备。

“这城市简直是奇了，”我对 **PIPI** 说道：“才两三个失业者？失业大潮整整比别处晚了十年哪。”

“同种工作每小时的工资，也比北边多出五马克呢。”

“连一个工厂的高烟囱也看不见。”

“这儿不是工业城，是旅游城和大学城呵。”

“才五万人口，面积却极大，到处是森林和田园风光，和北边就是不一样！”

“我说过嘛，见过一次你准不忘。”

“太美了！**PiPi**，我要搬到这儿来住。我太喜欢这儿了！我想在这儿住到老，住到死。”

“我也想搬这儿来。”

“那咱们就找房。”

我们去 **PA** 市的「房屋管理委员会」登记，正巧市政府刚刚盖了几栋三层楼房，才竣工，还空着好几个单元房。当我们随着管理员去看房时，且不说一路上赏心悦目的田园风光；只说上了最高的第三层，一进屋，我就惊呆了

——客厅高高的房顶、那通到顶的大玻璃门窗太美了！对面没有房舍，站在屋里或阳台上望去，只见对面的斜坡上，是一片高矮不一、浓密茂盛的树林；苍翠和碧绿的松柏树和榉树，映衬在兰天白云之下。一个漂亮的大热气球，正从林后冉冉升起，气球里的几个人，高兴地正向地上的人摇臂致意。再往后看，南屋的窗外，近处也无房舍，只见丘陵起伏不平的森林、田野，与兰天白云绘成了又一幅图景；也有两个色彩鲜艳的大热气球飘游在兰天上空。

楼房的四周种满了花草树木，花香阵阵飘来，各种鸟儿们比赛似地唱着歌。

“PIPI，我希望在这儿能住到死，那可就太福气了。”

是的，这通到屋顶的大玻璃门窗，配上窗外的景，我会永远看不够，它简直就是一幅画！我们有如天天生活在大自然的花园里啊。

“您想要，就得早定合约，”管理员说道：“这片房子出手得很快。您要是交了这半个月的房租，这钥匙就归您了。”

PIPI 犹豫。

“行，我交，”我当机立断。

“半月房租二百三十马克呢，”PIPI 说：“要不等到下月一号？”

“下月一号就没了。一辈子的事，半月房租算什么？我自己付钱，不用你的。”为了美好的生活，别说付半个月房租，付一个月的我也情愿。他把钱看得太重，太不会算账。我只庆幸自己不在钱上依赖男人，能自己决定大事。我立刻交钱，我们随即签了合约。它不是私人房屋的合约，内容非常清晰合理——十六年之内属于市政府管理，总共涨百分之三的房租；分摊到

每一年涨多少，事先写得清清楚楚。十六年之后，我们相信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搬家，累得扒层皮.....

把一个空空如也的新房布置得情趣横生，是人生的最大享受。雪白的墙壁太没味儿了，又不想糊壁纸，我们刷上了最喜爱的淡粉的暖颜色，又买了新地毯和需要的家具。阳台座北朝南，不大不小，我买了许多盆花，把它们栽移到更大的花盆里。又买了一本关于野鸟的书，造了两个小木屋，等待树林中的小鸟前来睡觉和做窝下崽。

当我们把一切收拾好之后，我忍不住把家中最美的“景点”拍照了很多照片。

这是我一生中的最后一站了——我心里对自己说。我只愿在生前，每分每秒享受我自己创造的生活、享受生活中的美和宁静；直到我弥留之际，我躺在自己舒服的床上，眼里心里看到的就是这幅美丽动人的图画.....

56 半年全白干了 / / 每一个字，都是父母的血肉之躯

外星人：

九六年，香港《畅言》月刊社公开征聘编辑。我与主编神交十六年，一直视他为自己的亲哥哥，一直为他深刻的好文章倾倒又钦佩。所以就去信应聘想去工作，主编说可以和我谈谈。

明年香港回归，怕不会再有不必要签证的自由。我和 **PIPI** 立即打点行装，随旅游团去了香港。

主编请我去吃便饭，谈工作，一切都令人满意；但一听我结了婚，马上说不妥。唉！怎么就不妥呢？**PIPI** 根本不会妨碍我的工作啊。他乐得每年飞来飞去的旅行呢。但主编说得那么死，我们只好把来香港纯粹当作旅游了。

人都说：如果你去过印度，就会觉得自己生活在天堂。但是，当我们看到那高高的居民楼，由于没有阳台，从每家的窗户里挂出正待晾干的衣服或被单时；当那座座高楼，上下左右、从头到脚、密不透风似地披上了随风飘荡的“褴褛外衣”时，那可真是世上一大奇景！对于认识富足繁荣的香港，给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这幅绝妙独特的图画！

但令人无比羡慕的，就是居民生活上的舒适。别看大楼披着“褴褛外衣”，但家家室内布置得一应俱全；更不用说全民与英国人一样的医疗保险和福利制了。

尤其是吃的方面，在德国很难见到的品种丰富的青菜和水果、活鸡活鱼活虾活螃蟹……应有尽有。街头公园里，花木扶疏、绿阴满地；男女老少、各种国籍的人们，天天来这里散步、练太极拳、悠闲地坐在靠背长木椅上看着报纸……我们在公园里，认识了两位年轻姑娘，她们来自菲律宾，在港人家帮佣，一周一天休息，坐在这里会友。**PIPI**用他那不熟练的英语，与她俩聊东问西，我们四人合了影……

维园——当我们来到这里、当我坐在那一片沙滩的长椅上、让PIPI给我照相时，我心里想的，却是每年的六月四日这一天，这里聚集着上万人，人人手里举着小灯，在夜空下，对死难者沉痛地哀悼。也唯有在这里，港人代表着国内的亿万同胞，发出他们的歌声、他们的誓言、他们的心念……

回德国，又去德国饭店帮厨：一小时是十三马克。但老板说，只按临时工的四百马克报税。在北边，帮厨一小时顶多八马克。而中国饭店，不讲小时工资，若是按小时算，也就合三马克，车费还得自理。

从北到南，全德国的四百马克工资不仅禁止不了，且越来越合法化；谁不同意，谁马上走人，反正有得是人要来干。不超过四百，老板几乎无税可报。你若想从四百中得到退休金，得干三百四十年，才能有每月七百马克的基本生活费。

“每年就三个月生意，”二老板钓先生说：“八，九，十，三个月。还一个月就十月底了， 就没旅客了。”

大老板在邻国维也纳，那边还有家大饭店，他半年才回来看一次，所以二老板没事就去钓鱼。如果是中国饭店，绝对没这等悠闲，人人都得干活，连老板都是带头干的劳动力。

工作内容十分简单：做沙拉，做菜汁，做各种菜肴的准备工作。我手快眼快，又不偷懒， 钓老板和大厨十分满意。 客人一来，忽啦啦几十甚至上百人突然驾到，那一通忙！客人不多时，二老板就去前面的多瑙河钓鱼。当晚我回家前，他送给我一条大活鱼，作为奖励。

“他爱上你了，”兰眼睛的大厨开玩笑道：“他可从来没送过我们活鱼呢。”

十月底，天一凉，旅客骤减；沿河的几十家饭店全一样。钓老板希望我明年的八月初一定来，又送了我一条大活鱼。

交给劳动局没有坏评语的老板解雇书，才能领到失业金。而劳动局说：“你和你丈夫的档案一直没收到，所以我们无法发给你们失业金。”

没有档案，不但什么金也没有，劳动局也不肯介绍工作，你等于成了黑人，和哪个局也不沾。当着我的面，那位公务员立即给 HA 市劳动局打电话，那边却说早已寄过来了。

“这叫什么事儿？”PIPI 在家里生气：“我猜，反正有一边是在撒谎。”

“为什么撒谎呢？”

“如果是 HA 市劳动局还没寄的话，就因为我们搬家。”

“搬家又怎么了？”

“你忘了，那公务员一听我们要搬这儿来，脸沉得象个长茄子？”

“是呵，简直象根老黄瓜，心里老大不痛快呢。”

“他生气我们能搬家，搬到了南方旅游城；而他只能在 HA 市天天烦心地干工作。”

“真的？就为这个？”

“就为这个。”

“PiPi，你还是个心理学家哪。”

“那当然。”

“他也可以搬家呀。”

“他怎么搬？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他不在那儿干行吗？”

“咱俩都个局不沾，怎么活呀？”唯有这时，我才想起中国人的好处来了——哪一个中国人丈夫象他这么懒哪？就算和那慈教授结婚，“在凤凰窝里当鸡”，起码不会为他不能做这做那，老不工作发愁呵；就算找个大厨二厨结婚，他还知道象个小驴儿拉磨似地干到死呢。

真想起爸爸老爱说的：“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世上有多少这种夫妻呀？

无奈不是二三十岁，无奈咱的性格是遇着谁是谁；无奈一想起咱的姓名就没好感觉；说什么也没用，还得自己去找工作。

这小城不大，当我一家一店地去问时，才发现工作是如何难找！因为无论是饭店还是其他店，都是每年才三个月的生意！那最好地点的几家店，也都不需要员工。

游乐厅有三家，大玻璃窗上还都贴着「树林子吵公司」的标志，可是早就由私人买下了，贴「树林子吵公司」的标志，不过是购买该公司设计和制做的游乐机罢了。保护员工的玻璃小屋拆得一干二净，每班都只一个人，还要兼做清洁工的工作。

“世道越变越糟呵。离家又远，公车十一点半就没了，夜里一点怎么回家？”

PIPI 一百个反对我去游乐厅，所以也不想开车去接我。他的理由更大的不是抢钱的危险，而是说影响了他的睡眠。

“懒蛋，睡眠睡眠！要是档案一年收不到，我们吃什么？”

“一年不会。要真是一年，我去告劳动局。”

“你就会告告告，又懒又矫情，你在中国早就饿死啦！”

“我们开亚洲店。”

“要开你一个人开，我和你马上离婚。”

“亚洲店怎么了？”

“一年才三个月生意，你开玩笑哪？”

“开家小吃店？”

“你会做什么呢？你又能干什么呢？你不是就会吃和攒钱吗？”

“那你说呢？”

“我只想做不冒风险、没本钱、又能挣钱的工作，够咱们过日子就行了。这样吧，我去夜校教烹调，你管开车吧。”

“去民校？”

“一个小时四十五马克呢，每晚两小时。每个城镇都有民校，不仅教本市，还有附近的城镇。肯定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们中国烹调呢。”

外星人，档案半年后才收到。而那几个月，我们就靠教烹调为生。我们的晚饭就和十几个“妇女学生们”一起吃。辛勤和努力自不必说。只能感谢这偏远的边境地区从来没有人教过中国烹调，只能说奇奇的技术和教学真是不赖。上课时，PIPI 就在一旁瞅着转悠着；吃饭时，他边吃边和“妇女学生们”瞎聊着，他倒也欣欣自在。

然而，一周顶多只有一次，这次数已经打破了全国记录——没有一个民校中国烹调能有一周一次的，都是一月才一次；只因为不是在一个学校教。我们的锅碗瓢盆交响曲，一月收入才三百几十马克，除去汽油费，刚够饭钱，房租由何出？

虽然我们各有自己的一点余钱，都存在银行，可谁也不愿动用老本，再说也动不了：都存了十年不取的。德国银行真怪，你即使不要利息，你也取不出来，早一天也不给你，所以还得找工作。这城里几乎没有工业，PIPI 什么工作也找不到；失业者越来越多，再去劳动局，已不再是两三个人，等着谈话的人好几十名，由原来的一个办公室变成了两个。

当半年后，我们收到失业金时，劳动局竟把我们所挣的钱全部扣除了！

“什么？我们全白干了？”

“全白干了，”PIPI 道：“因为失业者的收入不准多过失业金一欧分。”甚至劳动局认为我还应该继续这样挣下去。可是，由于「民校」统一规定的学费并不便宜，那些小村落的家庭妇女，学了一二次也就够了，她们最爱吃的还是德国饭，所以不会再有新的学员。

随着亚洲货物的进口，随着失业人口的巨增，德国的政策也加快地改变：失业者及领取救济金的人，不准有分文收入；哪怕你买彩卷中了奖，哪怕你母亲因庆贺你生日给你邮寄了五十马克，你都应当及时上报，然后从你的所得中扣除每一分钱。

然而，政策越是缩紧，人们越是拼命地节约和攒钱——谁都担心有一天，德国突然什么钱也发不出了，那时，你分文皆无，拿什么去买面包？

劳动局和社会局，每三个月要检查一次个人银行帐号的开支单。报纸上时有报道：有个傻冒儿，他很久没取出儿童生育费，他以为存放在银行帐号里很保险，结果，就停发了他的儿童生育费——因为你并不需要它，看来你有得是钱；因为你没把所有的这笔钱，用在你的孩子身上。他后悔莫及，却为时已晚。又一老人，他把多年积攒的存款，放进了一个垃圾模样的又旧

又脏的小纸箱里。突然间他去世了。家人一边清除他屋里的垃圾,一边肯定他定有存款。垃圾全都扔掉了,该翻到的都寻找过了,全家人苦心积虑地思索和回忆:他把钱放在哪儿了?小孙女猛丁回忆起,她爷爷好象对她说过:

“别忘了,如果我死了,我把你们会寻找的东西,放进了一个旧脏纸箱”的事。于是全家人一窝蜂似地去公共大垃圾桶,臭哄哄翻了个底儿掉,却始终未找到那脏纸箱!

而无家可归的人也越来越多:不是因为他们懒和穷,恰恰是在他们活着时,发现他们有钱!立即,他不再属于任何局了。

正好又一家中国饭店开张,老板急着要人。我去谈了一次话,要做水巴,但只想做上午半天;老板夫妇立即同意,因为有个国内来的女大学生阿秀只想做晚班。

从早十点半到中午两点半,管午饭,一周休息一天,现金月工资是五百五十马克,只按每周工作一次的一百七十五马克报税。反正全国有几百万人,今后会增加到上千万人,到老了都只能拿“救济退休金”,谁也不在乎老板报多少税了。

工作让人认识生活。有班可上,有活可干,有现金可拿,四小时一晃就过去了,上班的感觉蛮开心。

老板夫妇姓张,一儿一女都在上初中。他们在别的城市赔掉了两个饭店,又来这儿碰运气。两个男跑堂阿曲和小梁,都是他们的远亲。大厨和二厨都是通过中介公司请来的,为期三年的合同工。

这家饭店不在市中心，租金便宜，附近居民很多，老板又总结够了失败的经验，比别家便宜，给的量又足；尤其是烤鸭，这德国人最爱吃的，不象别的饭店买现成的熟鸭肉再炸，而是自己用大电挂炉烤生鸭，鲜味儿十足，故生意很好，但增加了两个厨师极大的工作量。

当我们的档案到了之后，PIPI 又可领失业金时，我们去申请了住房津贴。每月我交给 PIPI 三百马克，两个局的收入都汇到他的帐号上。他管账，那么仔细认真咱只有佩服。除去三十马克的公车月票，我还有二百二十的零花，“不当官无帐号一身轻”，PIPI 的富余钱比我还多些，双方过得满意。因几年来他从未出过车祸，汽车保险费他又少了十马克，PIPI 乐得手舞足蹈，好象刚赢了一栋大房子。

“我得申请入德籍了，”这天我对 PIPI 说：“我工作了十几年，报了六年的足税，够资格啦。”

于是写申请书，按程序进行，又经过德文考试。

对于保不保留中国国籍的问题，听说，若保留，德国籍不易被批准。然而，中国护照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又不想回国当总统、搞政治、被选举？如果中国是个民主开放的国家，它才不管你有几国护照；如果中国不民主开放，我也不可能回去。中共把我全家害得家破人亡，尤其对我，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写作上，中共都是拒绝我的，要人们把我彻底遗忘的。我不会象纽约《中国之春》的王炳章那样，偏不入美国籍，被中共在越南边境抓住，竟无期地关在牢里，美国政府也无法救他。我希望有个国家能保护我，保护我的一切公民权利——每一个人，都需要政府的保护。

当来信让我去领取德国籍护照时，在那间办公室里，必须先交五百马克手续费；又与公务员先生谈了些话之后，隔着办公桌，他亲切、严肃地站了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护照，无比诚恳地看着我说：“衷心祝贺您成为德国公民！”我也站了起来，他双手郑重地递给我，我双手郑重地接过了它；我高兴，感激得涌起泪花……

那天我休息，想在家安安静静地呆一天。我在想，要不要改名？

“遇罗锦”——从小我就不喜欢这名字。到了海外，元元不来、书出版不了、爱情事业双完，我就更想改名了。比如，改叫“维拉(VELA)——“信念”之意？改姓 PIPI 的姓“织布工”(WEBER)？“VELA WEBER”？也好嘛。

领护照时，我已问过公务员先生，他说只需写个申请书，说明为什么想改名，半年就会批下来；改几次都行。

就算我的家姓改为“WEBER”，可是“遇”，仍作为出生姓印在护照上。我希望这三个字的拼音一个都别存在，我不希望在护照上看见它。

当我提笔写改名申请书时，手沉重得竟写不下去。心里的感觉怪怪的——仿佛这三个字，每一字都有千斤重；仿佛它们字字是棵大树，早已生了根、盘根错节、撼也撼不动它。呵，每一个字，都是父母的血肉之躯呵；每一个字，都是父母给我的灵魂呵！当他们给我起名时，含着多大的期望和祝愿！从出生到出国，那四十年的生活，就是土壤；而这棵大树，长在我心里，我的每一条血管，都是它的根；它流动的汁液，就是我的血液。那四十年的历史，不仅是心里的大树，也已经变成了一本书；尽管中共压制它，但它早已象火花一样，在世上流传。

我想忘掉过去，正如我不想做中国人一样办不到。无论我改多少次名字，无论我有几本护照；我的历史，我的未来，永远是遇罗锦的，不可能是别人的。问题是，假如我能象哥哥那样，积极地对待自己的名字，我的灵魂才会新生！

57 PIPI 的特殊本事 / / 二厨之死

外星人：

劳动局给 PIPI 来了通知：必须去参加为时三个月的一年一次的学习班。

每天从早八点到下午四点半，中午休息一小时；不许迟到早退，有事必须事先请假；若请病假，假条上，必须写有几点几分进的门诊室，以察是否睡了懒觉.....

全班共有三十四个人，德国人和外国人混杂。每人桌上有台电脑，学习如何用电脑写个人简历，以便去找工作。第一个月只讲个人简历的写法，然后是两个月的实习课。

“讲得我们头都大了，” PIPI 回家抱怨道：“人人都工作过，我都工作过二十二年了，学习班也不是参加一次了，还不知道怎么写个人简历？光讲

这就一个月？”

“PiPi，你千万留神吧，希望你能好好坚持，别把自己的失业金弄没了。多少家庭为此分居，甚至离婚呢。”

“劳动局就是用这变相折磨人。谁分居，就算单身，他好给你发配外地工作去，外地的分到这儿来，就这么来回闹腾，让你出了错，好没了失业金。什么实习课？就是让我们分文不取地白干俩月的活，还得自己付汽油和月票费。去年的学习班也是这样呵。”

“你实在干不动，就请两天病假。可你不能出错呵，否则就没钱啦。”

“去年上一班三十五个人，就剩下我和一个拄拐的老头儿还能领到失业金，其他的，全完啦。”

“所以说你是滚刀肉哇。谁能赢得过你呢？”

“那当然。”

“PiPi，要我看，最后全德国只剩了一个失业者，那就是你。”

“那当然。其实，中国文革中的学习班，都是中共跟德国学的呢。”

这话有生以来头一次听说！我一愣，却又无法反驳他。因为德国出现过希特勒，也是独一无二的。

“那军训呢？那监狱中的犯人盯子呢？”

“德国早就有了，中国都是向德国学的。”

我不由笑，真不知那些绝招儿的老祖宗是德国！

然而，虽然学习班“破坏”了许多人的失业金或失业救济金，但失业人口仍是一年比一年多；因为人们短期工作了之后，又变成失业。

那天上午，顾客光临的高峰时间还没到时，张太与我聊天道：“我一家人也是被中共害得家破人亡呵！我们温州人，是全国有名的侨乡呵。家家都要出国，有亲戚的，那边能做经济担保，旅游出去；没亲戚的，变着法儿也得出去，好多人都是花了大钱哪。”

“听说温州人都是特有钱哪。”

“是真的，都很有钱。老板他父母头二十几年就出来了，也是拼命打工呵，把他们七个儿女全弄出来了；有的在意大利，有的在法国，有的在荷兰，全开了饭店，早都是百万富翁喽。”

“你是怎么出来的呢？”

“我也是花了大钱哪。先到了法国巴黎，在车衣厂里车衣服，按件算钱。我没日没夜地干，一个月能挣到三千六百法郎哩。可是没居留，黑人哪。后来认识了老板，当时他在德国饭店打工，有难民居留，就跟他过来了。我们都是老乡呵。结了婚，跟他一起打工，开饭店；在两个大城市都开过，都没有运气。”

“大城市的饭店都太多了，是吧？”

”也在运气。过去也是这么开嘛。”

“现在生意这么好，你总该高兴了？”

“阿奇呀，你不了解我们的心理呀。生意若是好了，不过心里有点安慰；生意若是不好，那种滋味儿你是没体会过呀。一谈到另起炉灶大搬家，我就头皮发麻呀。”

我想起他们刚搬到这里时，夫妇俩那累得灰头土脸、憔悴不堪的情景。那不光是累得扒层皮，更渺茫的是对全家生活的孤注一掷——先要填进无

数的精力、无数的钱，还不知到底如何。

他俩都只有初中文化，都是山村的农民；书读得不多，除了钱，什么也不认。对两个孩子也是放任自流；他们既不学中文，德语也差。夫妇俩累得没时间管他们。

听说老板，阿曲和小梁的难民护照，都是假名假姓，在申请时都说护照丢了，这样的人大有人在；为的是脚踩两只船，有一天好回中国去。只是近两年，德国才不那么傻，凡说护照丢了，一律不批准了。

所以从我心里，总觉得和他们这种难民，完全不是一码事。他们不过是为了发财才申请罢了。因此除了工作，我和谁也不想多说什么。

顾客的高峰时间过去，一阵大忙；到了两点，就都饿了；两点半准时开饭。这几天大厨和二厨闹别扭，午饭也懒得做——两盘黑糊糊的剩菜还是前天的。大厨炒菜时，可以往嘴里小填着，早就吃饱；他单吃什么，只要别人看不见，老板也允许；但苦了二厨和外面的。老板全家四口及两个跑堂，一见那黑剩菜，不言不语就都走了；反正，等三点钟人都走光，他们私自开小灶也太平常。

我为了应个景，盛了半碗饭，和二厨坐在桌子对面，慢慢地吃。

大厨是上海人，二厨是山东人；大厨心细、干净有秩序、烹饪技术高、有教养；二厨拉塌、抽烟酗酒、烹饪技术差、只管炸锅和打下手。二人住在老板租的两居室单元房，常因卫生和习惯，大厨看不上二厨，两人互不讲话，也非一日了。

老板为了省钱，不再请帮厨；巨大的工作量，比国内大了三倍，二人只有硬撑地干；对老板的怨言，只有往肚子里咽。对大厨二厨的不团结，老板

不但不去理会，相反，可能生怕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万一罢工呢。由于我早有经验，深知老板最不喜员工之间有友谊，何况两个跑堂就是他们的耳目，所以无法多说什么。为了给他们解闷儿，上周送给了他们两大包闲书，有三四十本：三侠五义啦，抒情小说啦，过期的月刊啦，凡我看了一遍再不想看第二遍的，都给了他们。那天张太一见，立即拿走了一半儿，说自己也喜欢看看闲书。

“累死啦……”二厨嚼着那难以下咽的饭菜，自语自叹：“唉——！”

他是真饿了，不停地扒着米饭和黑剩菜。

他最擅长做馒头、花卷、包子、饺子、面条等面食，以及山东鲁菜，可是在这儿又用不上。他最不爱吃米饭，可这里顿顿都是米饭。老板不发话，自己也不好单做了吃。

“唉——！”他连连长叹，见没人，说道：“拿我们当驴使唤哪！昨儿晚上，离下班还半个多钟头，老板楞让我们把三十只鸭子弄完；弄完少说也得一个半钟头，还叫不叫我们下班哪？我跟他顶了两句，他就发火，说我不干可以走人。走人？我倒真想走啊，可我是背了一身债出来的呀！为了出国挣三年钱，给中介公司付了两万多人民币呀，加上这手续那手续费，连飞机票都得自己出哇，还没挣一个子儿，先背了一身的债！”

“人人都是这么出来的，别的厨师也一样呵，”我只能如此安慰他：“你看『满香楼』那大厨，老板对他满意，干了三年回去，这回又出来了。”

“唉！那边不烤鸭，工作量轻多啦。你不知道这鸭子多累人哪，唉！出国，原以为精神上能快乐，原以为能见见大世面，可真到了这儿，才知道什么也没有——没人跟我们交朋友，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什么人；我们半句德

语不会，是聋子瞎子哑巴子；没人关心我们死活。”

我心想，所以你就借酒浇愁。我为了自己有钱可挣，也不敢和你们太接近。哪个中国老板都不喜欢员工亲近——他为此可以随时解雇你；在这一点上，和德国老板就是不一样。

然而，他如果真有勇气，可以过上比我更好的日子。第一步就是去解决自己的居留。如果他问我：“大姐，无论如何我也想留下来，你能帮我吗？哪怕只给我出出主意？”则我一定会告诉他可行的主意。多少劳工逃离了饭店而跑掉！但许多中国人如此没有勇气，哪怕他长了这么个大个子！

次日一早，我准时十点半到，一进门，愣住了：只见张太头发零乱、脸儿黄黄、也不梳洗，披着件旧衣服，默默地流着泪。老板正紧张地打着电话。两个跑堂，也都神色异常、不知所措。

“怎么了？”

“二厨死了，”小梁轻轻地说。

“二厨？”我惊异得无法相信：“他昨天还和我一起吃饭呢！”

“真就死了。”小梁又道：“每天大厨二厨都是九点到，老板问怎么九点半了还不见二厨来，大厨说他也不知道。老板就开车去了他们的住处。一看，二厨还躺在棉被里睡着，叫他醒醒，去摇晃他，才发现他没气儿了。赶紧给警察局打了电话，闹到现在。”

“皮肤都是一块一块紫的……”阿曲小声道：“床边有好几个空啤酒瓶子。”

“二厨呢？”

“警察照了相，让医院的警车拉走了。”

再嘀咕，老板夫妇也忌讳；大家尽量安静，只有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死了？我的天！我一边干活，一边琢磨着他的死因：皮肤有一块块紫色……我明白了，大厨说过，他睡觉爱打酣；他劳累过度，喝了很多酒，希望自己沉实地睡一觉；打酣的人，往往会自己停住呼吸。报刊上有过文章，说是如果家人能推他醒醒，就等于救了他；若没人推他，没了氧气，他就进入昏迷状态，时间一长，自己就死过去了；所以皮肤的紫色，就是因为缺氧所致。但我不能说，因为老板最不喜欢别人自作聪明，尤其在这时候。

老板还在饭厅的偏僻一角给中介公司打电话。我经过厨房去地下室拿一箱酒水；独自干活的大厨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也意味深长地看着他、摇了摇头——只有我们明白彼此的心理。

这半天大家是怎么过的，简直无法描述……老板娘的泪水涟涟，并非悟出自己苛待了员工，而是觉得自己怎么如此的倒霉，而是希望员工在这时候千万别再生事。

“二厨死啦！”一进家门，我对 **PIPI** 嚷道，眼泪唰地涌了出来。

这 **PIPI** 的奇特，就是从未见他惊奇过，也从未见他哭过，滚刀肉！

“嗯？”

“二厨死啦！累死啦！”眼泪仍是止不住地流。

也真快，次日中午，二厨太太和中介公司的一男一女，就急星火燎地从

国内赶到了。一看那女人，就知道和二厨一样，也是个文化不高的粗人。

老板和他们一起去了医院，及市里的有关部门一一办理了各种手续。医院说尸体不能立即火化，必须解剖，因为怀疑二厨脑袋里有病，得开脑袋。我心想，对这孤苦无依的死人和孤苦无依的他太太来说，医科大学生又可以动手学习、又可白来个免费尸体了。

二厨太又去查看丈夫的住处，不相信她健康的丈夫如此离奇地死去；结果什么蛛丝马迹也没发现。她又煞有介事地怀疑是否有人谋杀——似乎应当是大厨，却找不到也无任何证据。

一行人足足折腾了半天，近两点钟回来吃午饭。二厨太坐不住、不甘心，偏要去厨房里搜索查看。大厨不发一语地在炒菜，二厨太对他发问，搜索、怀疑、专注地盯住他的脸，想从他的脸上发现什么。大厨却一问三不知，连理也不想理她。她审视、急迫地东翻西看了半天，也未发现蛛丝马迹。厅里一大桌菜已经摆好，大家都在干坐着等她，老板呼唤她来吃饭。

我们围坐着大圆桌默默地吃着。一出国就给她三个月的签证，但没人希望她多住一天；住旅馆她又没钱，又半句德语英语也不会。吃完饭，就要与中介公司的人明天一起回国了。她出国，仅仅是：对死者的各种纸张签字必须得由直系亲属，别人不准代替——仅仅成了为这个而来。

二厨太也不哭，或许在家里早都哭够了吧；反而镇定自若、胸有成竹，提出让二厨的大哥来这饭店顶替，说他也有二级厨师证明——甬说，中介公司和张老板，都用这做为许诺，以此让她安安静静地出国和回国吧。因此，老板留下她带来的相关照片和证件拷贝，煞有介事、豪气十足地满应满许。

我吃完饭离了饭桌，因还要为阿秀的晚班做些准备工作，去地下室拿

一箱酒水。只见老板和中介公司的大个子男人，正在一角密谈。

“.....我们没有责任,”老板冷冷地说:“她的路费我不能出.....”

“.....我们为你做了多少工作,你别以为这事就此平息了,”那人在尽量压着气:“.....你要是连路费.....”

58 锅碗瓢盆交响曲 / / PIPi 的三次《半夜鸡叫》

外星人:

多让人憋气呀,二厨太不知道最能帮她的人,其实就是我一——如果她真是我的亲姐妹,如果她真是我的朋友。

两种帮法:一种,你住在我家里,和老板打定了官司,非让他赔大钱不可——就这么虐待员工,死了就完了?

二种,老板赔完了大钱,带她去政治庇护;何必先让你大伯子出来?先管你自己,先让你自己有居留。等你开了饭店,你让十个大伯子出来,把你孩子都接出来,岂不更神气?

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我犯不上去做,我不是鲁智深,我还没忘记莲对我的怨气。现代人去做鲁智深,也得问问那人值不值得我去两肋插刀,问题

就在这里——哪怕我不在张老板那儿工作。

很多人在德国念了很多年书、得了博士、却没有生活出路，只好去开饭店。但不是每个老板都黑心，或者都象小松属。有得是不失去理念、待人宽厚的好老板。但假如我没帮对人，他(她)当了老板之后，不也同样会把别人虐待死吗？

这天阿玲打电话说，自听我告诉了她二厨死了的消息后，他们经常吃饭的那家大饭店，也死了个大厨。她还说：听说，某城一家也有个二厨因急性心脏病死了。她又抱怨我许久不去她家了，还说：自「89 六四」以后，想结交台湾的大陆留学生，忽然多了起来。他们都是趁「六四」申请了难民居留的；仿佛仅仅因为六四，才使他们认清了台湾人应当是自己的朋友了。可她又说：“阿奇，我总觉得他们不是那么单纯。他们心里总是有着某种打算，而不是因为喜欢我们才想认识我们。比如，求我们给他们的家人做经济担保，求我们介绍台湾更高级的政府部门，好去申请什么基金会的基金……”

不久我们都被辞了工，是因为忽然大批的蟑螂出现了。或许是二厨现灵？无论老板怎么喷药，大批蟑螂就是死不光，爬得满酒台都是，爬上了玻璃挂橱！张太喷药不留神，碰翻了玻璃板，百来个玻璃杯稀哗哗全碎！蟑螂们甚至爬到了顾客正吃的菜里和手上，以至顾客的尖叫声让满座皆惊，满厅惶然失色。几个顾客一下子告到了卫生局。卫生局来人检查，不仅是蟑螂太多，许多的地沟大老鼠也从储存室的松土下翻爬出来，在米袋子里一窝窝地下崽儿，给卫生局的人吓得乱窜——立即封门，停业半年。

“奇奇，你吃了多少老鼠屎的米饭哪？”PIPI 幸灾乐祸。

“PIPI，谁和你结婚，不都得吃老鼠屎吗？”

“怎么又成了我的责任了？”

“就算不吃老鼠屎，我自己也快被喷药毒死啦！”

怎么办，又没工作了，离退休还早呢！再说，德国学习美国真是紧步后尘：由六十岁退休，改到了六十五；美国说要延到七十，德国马上说也要延。

PIPI 在学习班坚持到合格毕了业。他骄傲地说：“我又得了一次合格毕业证书。三十多个人全部下马，只有我和一个老太太侥幸还能拿失业救济金。”

我不得不佩服地瞧了瞧他：你不能不说，他如此能过五关、斩六将，也是个奇特的本事！

那些下了马的，一半人往往是因为极小的原因：你交给教师的病假医生证明，劳动局说没收到；你实习中去老板那儿报道，老板说你并没来；你打过电话，可老板说你没打。

至于怎样过一道道的微妙之关，那全看你的心思和办法，是否比劳动局还高出一筹了。

每个大小城市的赤字都没顶了，柏林的赤字大钟，天天显示着光是赤字利息，就是多少亿马克，折合成每位居民，从一出生起就背负着 8 万马克赤字，而且还随着年头看涨.....

我曾经写过一篇劳动局如何折磨失业者的文章，海外哪家报刊也不敢发表。其实，洋人比我们还敢骂政府，公开揭露的问题有多少！然而海外华

人一点儿也不敢龇毛儿，老不忘自己在外国只是温顺的客人。

欧元实行了，人们纷纷去银行换钱。忽然，人们发现，钱一下子少了一半儿！想起小时候，国民党的金元卷改换成共产党的人民币，一下子少了一千倍！才知，只要是改换货币，政府对人民都是公开的、合法的抢劫。

而超市和商店里，一比二的价格，只保持了一二天，便上涨；房租，水电等等，没有一样不涨，人人叫苦不迭，把欧元称为“贵元”。钱，忽然就变毛了。

“为什么非要成立『欧共体』呢？”我问 PIPI。

“为了对抗美国。”

这真让我一惊：“美国？美国有那么可怕？”

“德国人有美国心结，他们在德国国土上作威作福了多少年哪！”

所以他们不恨中国只恨美国，所以德国要带头，要走入历史。我想还不仅仅是为了对抗美国，而是大财团要发更大的跨国横财。

SPD 党的施路德当了总理之后，「H4」政策出笼，几百万名个局不沾的失业者，又可以重新登记，有了自己的失业救济金。

“这回可好了，” PIPI 说：“我们俩的钱够生活了，最好什么也不做，否则你挣的还不如失业金多呢。”

“可我想开店。”

“开店？你还没够哇？”

“不开店，劳动局也不会让我在家呆着。不如自己去挣四百欧元，干自己喜欢干的工作，那样，劳动局也不会支使我了。”

“要开你一个人开。”——这回轮到他说这话了。

“我去给在家里开派对的人做饭，我既是老板又是员工。一个月净剩四百欧元，我知足了。”

“你又不会开车！”

“你开呀！”

“不行，这是违法的，等于我和你一起干。”

“『H4』说了，允许失业者挣不超过四百元的补助收入。你只是送和接，又不要你一起干，汽油费都由我出。要是我真挣了钱，不管多少，都给你一半儿。”

PIPI 这才不言声了——这钱脑袋！他一定想起了我不在家吃午饭却交他三百马克时的好时光。

第一步：先去登记执照。

“交二十五欧元，”公务员马上从抽屉里取出表格：“按全职的执照办。”

“什么？又没店面，”我不解道：“只一个人做，顶多一周才一次，也许还合不到，怎能按全职的办呢？不是有半职的执照吗？”

“早就没有了，”他说道：“全国都一样，早就取消了。”

原来是这样鼓励大家开店的？！全职执照，做账等等都得由昂贵的税务员做，上税也一样！但既然来了，就做做看吧。

店名是：「Party Service——Chinesische Köchin zum Mieten」——「中国女厨师去您家烹调」。

有了营业执照，才能去报社做广告。但报纸的广告价格不菲，只能介绍

精华——如每人十三欧元都包括什么；除了菜肴之外还包括厨师把一切整理干净才算结束——家庭主妇尤其重视这一点。

不能在白送的便宜报纸上刊登，要登在有钱人订阅的大报上：一小块广告，只登一次，就是二百八十欧元！

还要做一页带给顾客的广告信，包括如何付钱，以便到了顾客家广为散发。这可是一门学问：你既要热诚、广告词让人人能接受，还不能让自己吃亏。假如他们全都吃光了才付钱，他说不好吃，或故意把事先准备好的小虫儿放在盘子上，他不但不付你钱，还哈哈笑呢！

于是就和 **PIPI** 苦思苦想，如何写好这广告词.....

半夜，**PIPI** 穿着小裤叉和背心，匆匆忙忙从他那屋跑了过来：“奇奇，我想好了，这些话应当怎么写.....”

“半夜两点，你还叫不叫人睡觉哇！”

他不听，仍是兴奋地说着他的话语发明——竟一连三个晚上！

中国女厨师去您家烹调

您的生日，婚礼，节日以及任何您所需要的日子，都能去您家烹调。不放味精，没有罐头，少油脂，原料新鲜。提供前餐，大餐和后餐；还有一百种以上的家庭独创的菜肴供您选择；烹调包括了饭后的清洗工作。

13 欧元包括以下内容：

1. 绿茶或茉莉花茶；2. 黄瓜蛋花鸡汤；3. 炸春卷(菜馅)；4. 日本寿司；5. 中国沙拉；6. 炸虾片；7. 炸大虾；8. 北京鸭；9. 酸甜鱼；10. 菠萝鸡；11. 豆豉鸡；12. 炒豆付，木耳，冬菇，粉丝和杂菜；13. 香米饭和芝麻酱甜饼；14. 炸香蕉沾蜜；

15.煮红豆馅小元宵.

13 欧元包括以上所有的。 也做纯素的菜肴。

怎样做才是对我们双方最好的:

- 1.先要看您的厨房;用具是否都够用; 2.请您先付一半费用, 以此去购买食品;
- 3.在您聚会这天,开始烹调之前, 请您再付另一半现款。

PIPI 的聪明才智不可小瞧啊——那三次《半夜鸡叫》，真的解决了怎样收款的问题。广告登出之后，有人打电话报名，一切都按所写的一项项进行。

聚会人数最少达十六名，最多的达到过二十八人。或许因为我们没想去买电脑，完全忘记了它是多么重要，故每周合不到一次。尽管主人和客人都满意，主人往往乐意多付二三十元作为酬谢，并一再说要给我多多宣传。

锅碗瓢盆交响曲竟传遍大半个德国。阿玲打电话说，她的女友(又是同事)因说了一句：“为什么我们这儿不建立工会组织？”而刚被老板炒了鱿鱼，阿玲忙向她介绍奇奇的独立自主之店有多么好、多么快乐、多么赚钱，那女友一再托她问我秘诀，也想以此为生。

“你在德国是独一无二的，”阿玲说：“你不介意她也想干吧？”

“我才不介意。阿玲，我正想结束呢。”

“什么？你不是干得热火朝天吗？”

“是热火朝天，可是没钱剩呵。一做广告全光啦，不做又不行。”

“慢慢客户就会越来越多嘛，你着什么急。”阿玲说道：“如果你有了电脑，就花不了太多的广告费了。”

谁都这么说，可我越来越不看好——中国饭店现在便宜得五欧元随便吃了。有的饭店，甚至是周末专做随便吃的便宜餐，以补别的饭店之缺。

失业的越来越多，人们的钱包越来越空，恶性循环的圈子越来越大。要命的是劳动局左一封信右一封信，以为我发了大财，问我一小时合多少钱，寄来的表格一张又一张。好象我除了养活 **PIPI** 和汽车之外，还富余多多。何况，还没提到一年一度的税务员，那至少一千多欧元的做账开销呢！

“看来，”我对 **PIPI** 说：“这店也真没法儿开了。”

“我事先就说过，根本就别开。”

“劳动局三封信我还没回呢。今天我得写回信。”

我找出纸笔就写呀写……

“你写小说哪？”**PIPI** 探身看看：“你写那么长干嘛呀？”

“不写小说不行呵，否则就说不明白。”

“再说，你信上尽是错误语法呀。”

“但是能看懂吗？”

“意思能懂，可语法不对。”

“就这样。这才证明是我亲笔写的，而不是你代替的。劳动局既然那么可爱，让他们看着也得费点儿劲才成。”

亲爱的劳动局，亲爱的 201 室玛雅女士：

您的三封信我都收到了。谢谢您多次寄来的表格。您问我一小时合多少钱，我必须告诉您：每一次派对，我要准备一星期，从购买食品算起。每人十三欧元，除去至少八趟往返汽油费。按一周算，一小时能合五欧分。要知道，这可已经不少了——这年头儿，谁能白给你五欧分呢？我是很满意

的，也很知足的。关键是，每做一次报纸广告至少是二百八十欧元，每周合不到一次聚会。要命的是，中国饭店越来越便宜.....,亲爱的玛雅女士，我这个月的三十号决定去注销执照了.....

59 「爱老人」的三种爱 / / 428 政策

外星人：

我又去劳动局报到了。

每个房间的门上有公务员的姓名和职务。这位公务员先生也姓“织布工”，说话也不是本地方言。南方很少有姓这姓的。或许，他从北边调了来，依然保住了自己的工作？他马上给了我一个工作：下周一早八点开始，去全国性的非赢利单位「爱老人」厨房帮厨，我乖乖地点点头。

“是这样，”织布工先生说：“一碗粥三个人分。不能有的整天在家睡觉，有的整天苦干。所有失业的人，每人干半年、休息半年，失业金还照拿。工作的话，每小时补助一至一点五欧元，公车月票或汽油费自己解决。一周不超过十五小时嘛。”

今天星期五，能好好在家歇两天，不当老板真是一身轻！走到老城公园，

见那一组喷泉高高地喷起，高高低低地变换着花样，随风扬起涿涿的水雾。
忽见久违了的大厨坐在长椅上，也正欣赏着喷泉呢。

“嗨，我以为你早就回上海了呢！”我坐在他旁边。

“下周就走。”他笑笑：“在熟人家住了些日子，搞搞关系，也是为了找工作再能出国嘛。”

“找到了吗？”

他摇摇头：“就算老板想要，也让你在中国等着。”

“你现在住哪儿呢？”

“『满香楼』大厨那儿，他那有地儿。”

“这一闹蟑螂，你少挣了好几个月的钱。张老板又开张了吗？”

“开了。可大厨也有人了。”

“是死了的二厨的哥哥？”

“那可能吗？他太太也不想想，他哥哥来了，还不等于是颗定时炸弹？”

“还是中介公司介绍的？”

“当然。现在他们把持了全德国的饭店。”

“阿秀还做吗？”

“早就跑汉堡去了。”

“那么远？她不在这儿上大学啦？”

“上什么，她是当妓女去了。”

“什么？你说阿秀？她结了婚，国内有丈夫有孩子呵！”

“那又怎么办？要是她出国背了一身债的话。”

“她也背债？”

“是呵，你早班她晚班，你俩谁也见不着谁。她可是什么都跟我说呀。为出国，她父母借了好多钱哪。头俩月她父亲又病了，要住院，没几千上万的现金，你想住院?!”

“一九八六年我出国时，不是这样子呵。”

“大姐，那都是老黄历啦。现在，谁有钱，谁是大爷。大家比着谁过得好、谁更有钱、谁能买车买房、谁家请得起小保姆、谁能送儿女出国留学、谁家有多少存款、谁能出国旅行……钱就是一切呀。”

“嗯……这么说，我们都成了穷得没法儿提的了?”

他从鼻子里轻轻笑了笑，仿佛我还算明白。

“你怎么肯定阿秀就是去当妓女了?”

“我看见她了，在汉堡。我一个熟人住那儿，也是厨师。他闲了，就打电话找个人解解闷儿，专爱找中国人。那种夜酒吧出租亚洲女人的公司，多到满满一大版的报纸版面哪，二十四小时地为顾客上门服务哇。我是亲眼见了她干这一行呵!”

“你们跟她睡了觉?”

“不瞒你说，大姐，过去一起干活的时候，我一休息，也是去找她，也付她些钱的。那时候她挣得少，现在，她一月能净挣近四千了。唉!”他长叹一声，摇摇头：“我简直不认识她了，瘦成一条儿，穿着迷你裙，再又戴了假发。她笑着跟我打招呼，我才惊呆了…… 可怜人哪!”

“天老爷，她在大学读了多少年书哇，还要攻读博士呢!”

我简直不知道还当说什么。她出国之前是大学文学系讲师，她说回国后，还要在该大学任教。就算她还了债，就算她带了一大笔钱回去，就算她买了

房又买了车令人人羡慕，她敢说她在外国都干了什么吗？她如何为人师表呢？就算她不教书，或许当作家，写她的经历，可她敢写出她的一切吗？一个为了钱，出卖自己肉体 and 灵魂的人？万一，她得了爱滋病呢？我简直不敢想。

国内真的是笑贫不笑娼？

周一八点差一刻，我准时来到「爱老人」大厨房。它座落在一个小学校的后面，有一个老大的停车场。

一位年轻的德国大厨是负责人。虽然才试了一天，但他对我非常满意，因为我比那些年轻人干得还好还快。来这里干活的九位年轻人都才二十出头，竟然个个失业！有的说，在职业学校毕了业，连个见习生的位置也找不到，只好拿着「H4」，来这儿干上半年。一到十八岁，他们立即离开父母，搬出去住。如此一比，象 **PIPI** 那样交家一年工资的，还得算大孝子哪！

这是教会资助的非赢利单位，为本市的孤寡老人或行动不便者，做好午饭并送到屋子里，再把他们的脏空饭盒或盘子带回来清洗；也给幼儿园送一次十一点钟的小餐。类似的单位在本市有三家，都属于市属单位。

送饭的有十来个人，都是有汽车的失业者，也是必须干半年的。

一小时虽然补助一点五欧元，但公车月票由过去的二十六马克变成了二十六欧元。属于市办的汽车公司，一直是入不付出，随着食品水电的涨价风潮，房租，月票和汽油竟涨了一倍。

「爱老人」是怎么爱的？一工作才知：虽然每天只做一次午饭，却分为

三等——第一等人数不多，是用烤热的白色瓷盘，盘中有格，以便放菜肴，菜汁和饭。沙拉的质量是最好的，单放小盒里。饭菜都是当天上午做的极为新鲜的，每天换样；专人开着汽车趁热立即送出；

第二等，是饭菜品质稍次一些，种类也少一些，盘子也差一些；趁热立即送出；

第三等人数最多，是没瓷盘子、只是锡纸的封闭盒子。这是食品厂专为全国「爱老人」单位做的现成饭菜。每个锡盒上压制出号码。由公司办公室每天给厨房打电话，告之今天应从多少号码到多少号码，共蒸多少个盒子。盒里的饭菜简直象猪食——不仅在工厂里已经冷冻了数个月，就连在这大厨房里也冷冻了快半年，维生素早就全部冷冻掉了。所以必须有号码，所以必须由办公室每天告诉号码，否则就不能保证全部利用。

拿回来的脏饭盒，很少有人全部吃光；有的剩了一半、一大半，有的连拆也没拆开。而那第一等的，却都吃得干干净净。

人们喂猪，可没把猪分成三等去喂，可是喂人，却要分为三等。

只有给幼儿园送的小餐全都一样，因为他们还没长大。国家希望你们长大以后谁也不要吃第三等饭菜，可你们不努力，那怪谁呢？

甬问也知：第一等的，是自己有足够的退休金付得起的；第二等，是还能付得起的；第三等，是付不起、靠救济退休金为生的——然而，穷人们能吃的就吃两口；不想吃，就不吃，全浪费了。反正他们自有办法饿不死。最大的工作量就是把这许多饭盒和盘子洗干净、垃圾分类，一桶桶的剩饭菜全部倒进院子的大垃圾桶里。

一回家我就感叹地道：“PiPi，如果有一天我们做不动饭，干脆就别活了，

也不要吃那垃圾饭呀。”

“我没问题，我准吃得干干净净。”

“屁！”

大厨房里保持固定的人数：十名。假如这十名个个不偷懒耍滑，大家分摊工作，是不觉得累的。但从负责人到员工，都是必须干半年的失业者，人人没有积极性——脏活累活躲了，或是自己制造个小工伤，一歇二周还没好；工作量加大，耍滑的人就越躲，真正卖力气傻干的，才两、三个人，七、八个都不见了影儿。奇妙的是，外国人只我一个，还是个老太太。再夸我，说我干得好，我心里也有气呀，可我又不能批评谁。负责人都带头儿耍滑，你能说什么？何况你才来几天？

“我得歇病假了。”我对 **PIPI** 说：“实在没法儿跟年轻人生气。”

一听我要歇病假，**PIPI** 一百个支持，那是他最拿手的绝活儿。

过去文革时落下的浮肿病一直就没好，不管我吃多少中西药，后来索性不治了。若是太紧张太累，小腿就发肿；医生立即给我开了一周病假证明。

为了保险，我不仅把证明交给了厨房负责人；又将拷贝件，去送给劳动局的织布工先生。

“我们并非强迫您工作呵，”他看着证明沉思道：“您身体不好，怎么不早说呢？有个 **428** 政策，您知道吗？”

“不知道。”

“这条政策，是随着『**H4**』一起来的，已经实行了快两年了。也就是说，如果过了五十八岁，身体又不是太好的，劳动局不再介绍工作，他们也可以

不必工作。”他从抽屉里拿出两页印满了字的纸递给我：“您可以看看，要是您同意，与劳动局签了 428 合约，我们就不再介绍您工作了，您就可以安静地等到退休了。”

我心想，这么好的事，为什么 PIPi 不知道呢？

“我可以拿回家，让我先生看看吗？明天我再给您回答？”

“可以。”

“这可是好事，” PIPi 看了之后说道：“明天我跟你一起去，还要问问你的退休怎么办理。”

“为什么这政策不公开呢？”

“他们内部掌握，尽量不给太多的人吧。”

当我在 428 合约上签了字之后，又拿着这合约去退休局预约了日期，得到了回信，允许我六十五岁退休，我才真正地感到安静了。我再不必去劳动局每三个月报一次到，也不必去工作了。我的失业金准时地每月汇到 PIPi 的帐号上，可以一直等到退休，每年还有三个月的度假。

「H4」和早先的政策有许多不同，首先是两局合并管理。结了婚的也不混着算，而是每人一份钱。房租由社会局直接寄给房主，而劳动局所汇的钱只是食品费。凡有不动产的，有太贵的或新汽车、首饰、衣物的，则停发失业救济金。凡有存款的，银行必须无条件地协助劳动局，提供每个人十年之内的收支清单，每三个月检查一次个人的收支单据。存款按年龄不能超过一定限额，多余的全部扣除。利息一概算收入，全部扣除。有其他收入的，也要扣发失业金。

由于每人一份钱，所以分居的特别多。一半人的分居不是出于感情上的不和，而是一方不愿意另一方把自己的零用钱花掉。另一半人，是一方嫌另一方太懒，再不想和你生气，死活由你去。

中国加入「世贸」，电子工业突飞猛进，各行各业裁员，亚洲货充斥着德国、充斥着整个西欧和美国。大老板，大财团，都去亚洲开办工厂和企业.....

新的失业大军早已不是兰领，而是白领阶层。家庭悲剧时有发生——分期付款的房子还差很多，突然失业；房子卖不掉，太太带着孩子想分居另找出路，丈夫受不了，开枪杀死全家，再杀死自己.....

我们住处的周围，尽是私人房，由法院押价拍卖的空房一年比一年多。

街上的信箱和电话亭撤掉了很多，邮局和其他行业解雇了大批工资高的员工，换成了不超过挣四百欧元的年青人。银行、工厂、公司，每天的消息就是解雇了多少人。

老城步行区的大小商店，不到一年换一次老板，且老板都是对本地生疏的外省人。三个电影院关了两个。很多人去外国或外地找工作，很多人找不到又回来。此城人口只减未增，旅游人数却减了大半；而中国饭店却翻了一倍，变成了十几家。

几家老字号的中国饭店开不下去，只好关掉，或设法出租给外地不了解本市情况的人。一位老板叨叨着：“一块饼就这么大，大家都要来啃，最后谁也吃不饱。”

难民政策再也不象以前那样松动，申请可以立即驳回，很多人被遣返回国；被遣返者，绝大部分人逃往其他国家。

新闻广播第一条，再也不报告每天的难民数字了。

60 去加拿大和美国 / / 帮罗文办绿卡 / / 与蝥蝥去威尼斯

外星人：

罗文来信并寄来几本书——国内三位学者合编了一本书《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他为自己知道得太晚，只匆忙地写了个小小的《跋》而心中不平——尤其是对《中学文革报》那段生活，他觉得自己功不可没，怎么反倒无人知？

我回信说：这你怪谁呢？书中文章选了别人的和我的（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都是老早就写了或在国内发表了。哥哥就义多少年了，你写过什么呢？不是一个字也没写吗？要怪，只能怪你自己。

自那次没让他来德国之后，很长时间两个弟弟没有来信。后来罗文又有信来，是因为他们的小日子过得不错，觉得要比我这买不起房又失业的日子强得多，所以他又有了好心情。不但寄来他拍的全家度假片，还买了一处单元房、新汽车、以及新买了农村小院——形容有多少棵果树、有条大黄狗、有块菜地、自己又安装了暖气、燕子怎样不怕人地在檐下做窝……

北京人周末休息两天，他每到周末就去农村小院享受清静，令城里的熟人羡慕不已。

象这样的日子，在外国奋斗一生也难于做到。我们都满意自己的生活，这比什么都好。

他说他要写一本书，关于全家，关于文革；我特别高兴，寄去一封又一封长长的鼓励他写作的信。

然而，《遇罗克》一书，刚一出版，就被中共禁销了；血统论还在中国横行，哥哥的名字仍令当权者忌讳。鉴于此，我就更加鼓励他，希望他一定要把书写好。

我托人给他带去自己积攒的两大牛皮纸袋一千页的个人资料、我的书稿、剧本手稿、十二版本书(包括《冬》、《春》、《爱的呼唤》)、手边的所有家庭老照片、二百多张外国明信片等等，让他随使用。他高兴地回信说：“姐姐，太珍贵了！”

他把电脑打字稿寄给我看，让我提意见。虽然整本书的深度不够，很多地方显得幼稚，但做为处女作，也算不错了。

我建议他在香港出版，或许没有稿费，但人家只要不删改能出版就谢天谢地。我拷贝了一份，花了一百欧元挂号邮费寄的快件给了《畅言》；又建议罗文把书名《我家》改为《和<出身论>在一起的日子》，觉得这样一下子就点到了主题，又不平淡。还建议，假如你只想在国内出，也别在北京，应给“天高皇帝远”的广东省或广西省出版社，才不至于刚一出版都没来得及卖就被禁销了。

所有的意见他都不采纳，偏要在北京出版。很久以后我才悟出：为什么

他后来在书中给我无中生有地添了两笔——不仅说我“古怪”、还写我说过“父母是右派，让我们受了罪”，添加得不仅生硬，且没头没脑，不合逻辑——因为他不以为我的主意是为他好，反而以为我不想帮他，或怕他在北京出名。再加上以前没让他来德国，不来个恶作剧，他心里就不舒服。

由于那书名太平淡，他自己又没有想法，所以封面设计者也很难设计。书的封面，简直就象“养花人家话清闲”。先我建议，最好与《遇罗克》一书的封面设计一致，说那设计者鲍昆先生可称为大师，将来我们三个人的书封面统一，有如一套丛书，人们摆在书架上有多好看，他全不以为然。

我感到他一定是飘飘然了。

《我家》刚一出版，没卖几本就被中共禁销了，但他得了三万元稿费。就算在香港没有稿费，却不会被禁销，哪一个值呢？

二周后，忽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

“我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是十分清脆动听的声音：“我叫小刺猬，是阿玲的好朋友，也是台湾人，是《中华日报》的记者。我们报社给您的弟弟罗文发了邀请函，请他来美国二周，因为想要采访他。他让我转告您，他的美国签证都办好了，后天就起飞来华盛顿了，您能来吗？我家有地方，您和和您先生都可以住在我家里。我和我丈夫欢迎你们来住。”

美国，华盛顿，白宫，一辈子要是没见过美国，也真是遗憾的事！

“PiPi，你看家吧，我要去美国见罗文哪。”

“我也去。我也没去过美国呀。”

“那好。我们出钱一家一半儿。”

“行。”

“最好先去加拿大，”他说：“然后再去美国。”

“先去加拿大？”

“我表姐表哥都住在多伦多，以前他们都叫我去住呢。我二十多年前去度假，就住在表姐家，她先生可会做饭了。”

“好，先去加拿大。”

主意已定，去劳动局请了一个月的假，然后买机票，办出国的医疗保险，准备行装。正值暑假，又买得太急，飞机票贵得要命。

怪异的是罗文的小心眼，他这么晚才告诉我，难道是怕我“破坏”他出国？就算我早知道，我也不可能破坏呵。

看来，他是不想回国了。可他对外国一无所知，他有什么谋生的本事？当初我不想给他办出来，深知他在外国只能凭体力劳动吃饭，何况现在他五十几岁了；而他在国内的日子又是那么舒服！我打算，先劝他；劝不动，就帮他——帮他早日拿到绿卡。

第一站是多伦多。

出了机场乘小公车，去他表姐家。正值中午，蓝天白云，阳光明媚。一路上，领略了加拿大的广阔与荒凉。森林大片地被砍伐，裸露着干黄的土地；与秀美的德国，完全是两个天地。

到了，下车，公车离去。大房大院。我们提着箱子进了院子，PIPI 前去按铃。表姐和她先生都出来了，站在门前台阶上看着我们。

“你们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们？”她丈夫生气地用英语说道：“就这么突

然来了？我们是不接待的！”表姐用德语做了翻译。

“我们打过电话，”PIPI解释道：“但打不通。再说，你们以前一直希望我来住呀。她是我太太。我们只住三天，就去美国。”

“以前是说过，”她丈夫说：“可那都什么时候了？二十多年前了，还算数吗？”

PIPI尴尬地立在原地。看来，表姐不能做主。确实，二十多年彼此之间毫无音信，这么突然来临，谁也不会喜欢。

“好了，”我对表姐说道：“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个便宜的旅馆？我们还带了礼物给你们呢。”

她翻译给她丈夫听，她丈夫欣然道：“马上就帮你们找，现在就开车去。”

“我们想看看尼阿加拉大瀑布，希望离那儿近一些。”

“没问题。”

一路上，PIPI和表姐有着说不完的话，我也时而插两句。他们说着自家和亲戚的近况，以及两国的经济现状、对失业者的待遇……加拿大的一套福利制还是向德国学的，所以几乎是相同的。

开了好半天车，才算找到一家合适的旅馆。

多美，多壮观的大瀑布啊！

那三天，我们每天都在大瀑布四周流连忘返。大自然的雄伟和力量，给与人们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使人的心灵净化。它的喧嚣和气魄，似乎在告诉人们：没有谁能改造大自然。

那三天，表姐每天都开着车来旅馆和我们聊天，又带我们去了表哥家，并在那儿吃了顿饭。表哥表姐都失业多年了，但因为他们都有大房子，所以拿不到失业救济金。所幸他们的丈夫或太太有收入，还够生活，但是没余钱度假。好在，再过两年他们就都退休了。

最后一天，表姐夫妇开车带着我们，去尼阿加拉市流览。一路上，大林荫道的一边是尼阿加拉河，另一边是一座又一座的别墅。每座别墅建造得都不一样，隐蔽在浓密的树荫下，美妙得有如童话……

“房子可以造得这么美啊！”我感叹，幻想那些别墅里的人们，生活得该多么幸福。

比起来，德国房子那千篇一律的样式，可是太死板、差得太远啦。

尼阿加拉小城，住的都是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小店鳞次栉比，步行街的咖啡座坐满了衣着华贵的居民和旅游者……

与罗文的见面，除了那乍一相见的激动和亲切之外，很快就进入到现实状态了——他所幻想的工作，由于英语不行，都不可能实现。我和小刺猬劝他的话，他也不想听。他反而怪我说：“要是你那时候把我办出来，我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

他不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财迷心。他越这么说，我越觉得他只有在中国才容易发财。

小刺猬问我能否给他办到德国去，我说：“一是我们属于低收入，做不了经济担保；二是，德国问你为何不在美国申请，一句话就可以驳回你的

申请。因为姐弟关系不是直系亲属关系，不属于家庭团聚范围。”

小刺猬点头，罗文不语。白天小刺猬夫妇上班早出夜归，他竟与我无话可说。我事先以为的能推心置腹地聊聊天，等于幻想。二层楼的大房子里，只有我们仨。有好几天，罗文请了一些「民运」名人来吃饭，似乎想为自己找出路。我看得很清楚，除了体力劳动，什么出路也不会有。我只好买菜做饭加洗碗；幸亏 PIPi 是个安静人，否则他早烦死了。

那几位名人又回请我们——也是各有各的生存之路，活得都不易。最后没的请了，该干正事了——我帮罗文把政治庇护申请书写好，并附上一本英文本《冬天的童话》作为附件——是我特意带来的。

“附这干嘛？”他觉得没用。

“有用。批准你的，肯定是个美国人。这本书不厚，一口气儿就看完了。咱家受的罪都在里头，还有你的和全家的老照片。那批准人一感动，一盖章，就齐了。没有这本书，你的也会批下来，但时间会比较长。相信我，它只对你有益无损。”

吃午饭时，他告诉我，他想写一本书，书名都起好了，叫《百年一遇》。

“<百年一遇>？也太自我标榜了吧？”

“别人都说这书名特别好。”

“正因为咱们家姓遇，所以才不能叫这书名，何况也太俗。”

他不说话，看得出他不爱听。我没问他那书里都是什么内容。我猜，他一定是把除我之外的他自己和家人，美化得高大全。他觉得在《我家》里，美化得还不够。深受党文化之毒人人有份，但假如你从来不看世界文学名著、不受感动、不反思，你又如何去抵挡那被洗脑的毒呢？除了美化、拔高和

自塑英姿之外，你还能怎么写呢？这样的烂书还少吗？

“你为什么不把我的两袋资料带出来呢？”我问。

“我太太出来会带来。”

“她的签证且得等呵，得二三年吧？”

当初说“太珍贵”的也是他，可又不带来。假如有人出二百万美元让我搜集那些资料，我也搜集不来啊。「北京图书馆」早就把很多对外资料封闭了——中共不希望人们知道过去。

我们回到了德国。不久，罗文来信告诉我：“才三个月，我的绿卡就批下来了——可以开店，可以出国。大家都说，从没见过批准得这么快的……”

总之我为他尽了心。假如不是因为他，我不会去美国。既然他自己选择了出国的路，那就走下去吧——除了给私人的房屋搞装修，他什么也做不了。

秋末，当我又一年一次地清理阳台横梁上的小鸟窝，准备为它们过冬时，真真吓了我一跳：五个小木屋内，每一个都有两三个死雏鸟；五脏都被吃空了，都风干了。

“PiPi!”我叫起来：“快来看哪！”

他一看，也意外极了：“这是怎么回事？”

“天！谁是凶手哇？”

“是红尾巴？只有它能钻进洞去。”

候鸟红尾巴，老是为自己找不到窝而生气地叽喳叫，除了它，又是谁呢？

当鸟凶手还无头绪之际，蝈蝈来了长途电话，她说现正在伦敦开一个有关妇女工作的国际会议。她打算顺便来德国，说什么也要来看看我。我说，快来吧！对我来说，她是有恩于我——1986年我政治庇护时，她却在国内发表文章赞扬我。

她终于见到了我的生活真象，为我们虽然不富却美好宁静的日子感到高兴。

次日，PIPI 开车，我们去奥地利首都维也那，参观皇宫；流览着“美泉花园”；再去意大利水城威尼斯.....

当威尼斯水城一下子出现在眼前时，当我们第一眼见到它的全貌时，才震惊地感叹到：如果这辈子你没见过这独特奇伟的壮观景象，真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太美了，太雄伟、奇绝了——整个悠久结实的石头古城，坐落在一望无际、汹涌澎湃的海水之上！

这里没有任何车辆，唯一的车辆就是船——大船和小船。

我们仨住在旅馆里，每天在饭店吃了饭，便乘船在海上航行；参观了所有的博物馆、大教堂和艺术绘画馆.....照了多少照片啊！

然而，当我们都逛遍之后，夜里我躺在床上，遐想冥想：如果让我比较这水城和德国，如果让我选择在哪里居住才是我的最爱，我仍旧毫不迟疑地说：德国。我最爱的田野和绿色的森林，这里丝毫也没有！

回到家里，与蝈蝈临别那夜，她和我睡在客厅，每人一个单人床。深夜了，我们半躺在被里还在聊着，聊到许多同事这些年的情况；又聊到元元，我伤心地哭了。

尽管蝈蝈和别人一样，安慰我说：他过得不会太坏，说他有自己的退休金，让我不要太惦记他；又说他的自我选择，谁也帮不了、劝不动他；但我并不相信元元会象她所说的，会过得那样好。元元虽然比我大十一岁，但在生活上，却完全是个孩子——十五岁，他母亲就让他去南京上初中住校；高中、大学、他都住校，除了寒暑假他回家之外，他没体会过别的生活；直到我认识他与他结婚，他才算过上了真正的家庭生活——他需要人照顾啊！

我哭得好伤心。只有蝈蝈的到来能引起我的伤感——因为她带着国内的气息，因为她太了解我。

我哭，是因为一百个男人也换不来一个元元；不，全世界的男人也换不来一个元元！

外星人：

当我亲眼看见啄木鸟把头伸进小鸟窝里时，我才知道凶手是它。怎么办？我苦想，想出了个主意：用超市卖水果的透明塑料小盒，在小木屋的圆洞前做一个“过道”，挡住了啄木鸟——它不啄塑料。

“我可以当选绿党主席吧？”我问 PIPI。

“嗯。”

对面的树林，是越来越有名无实了——砍伐的都是又好又粗的大松树，砍伐的数量吓人。鸟儿们没了生存的环境，大鸟吃小鸟，小鸟一年年锐减。

就连小鸟下崽，也在学习国内的独生子女政策，它们不想一次孵化太多，知道多了反正也会被大鸟吃掉，孵出一二只就完事。

国内独生子女的父母都象着了魔一样，省吃俭用也得把儿女送往外国留学。

二弟罗勉的女儿小娇在上海上大学时，他就象那些有钱的父母一样，每月邮寄一千八百元让她在校外找舒服的住处。大学毕业后，又拿出几万美元的担保，让她去美国留学。小娇在大学时却深信了基督教。她学业成绩不是顶尖，所以只有美国一家神学院招收了她。

谁也不知为何，才上一年，小娇说什么也不想上了，执意要回中国。罗勉夫妇爱女心切，一同去了美国，想接女儿回来，借此机会也去美国看看。

全家三口都在美国，罗文特别希望他们全家留下来。我也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地劝他一家留在美国，并说我保证帮他们把政治庇护申请书写好，保证帮他一家拿到绿卡——也算圆了我过去没帮他们出国的梦。

结果，罗勉一家还是回国了，理由是他在美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太太在北京大剧院做会计已多年，一月净工资近六千元——但不要退休金，只想多挣现金。加上罗勉自己的钱早已过百万。他信上说：“我们孙子辈儿的不工作，都一辈子也花不完。”

自罗文去美国，那企业解散，罗勉失业，他太太更成了家中女皇。罗文在京时写信提及：比他太太更女皇的，是女儿小娇；小娇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说罗勉从她刚会说话时起，就骄傲地对人人宣称：“小孩儿的话就是比大人有道理。”罗文还说，小娇最大的特长，是和别人抬杠，说话的刻薄，让罗文夫妇头顶直冒冷气。

想想我出国前，那才六岁的不言不语的小女孩儿，竟变得这么厉害，一想心里先就发毛。

罗勉第二次去美国，是罗文想从美国西部搬到东部，让罗勉帮着搬家。罗勉坐着飞机去当这苦力。他俩各开一辆装满了家具和装修工具的汽车，由于路途遥远，太累，吃不好又睡不好，罗勉一回国就病到了，竟得了面瘫。罗文信上说：“他果然病倒了！”竟无一句自责不安之言。

罗文等着太太和儿子的签证，孤苦地过日子。我去信说：“我倒很想去帮你，给你做做家务，直到你太太来，象姥姥以前对我们那样。我会从早到晚老有事干，把家里弄得井井有条。如果你能每月给我二百美元零用钱的话，我就很知足。若大家相处得好，我愿与你们长久地一起生活。至于 PIPI，他不是问题，他乐意两国来回住。”

罗文回信：“你应该每天和我一起外出扛大活，我太太才想在家做饭。”

我叹了口气，只有继续在德国享清福。

罗勉经过针灸治疗，又吃中药和注意运动，完全恢复了健康。半年后，他和太太打算去罗文家住一个月，只为游玩，因中国的驾照可以在美国开车；那时罗文的太太和儿子刚到美国不久。

我去信说：“他们累得连晚饭也没时间做，你们却天天开车出去游玩，他们心里能舒服？连我要去做家务活他都不干，非要我扛大活不可；如果让你扛大活，你又不好意思说不，岂不是又会累成面瘫？那时你若好不了的话，鼻子和嘴可老是歪的、总流口水了。小弟弟，从小我是最喜欢你的。我会给你预备舒服的单人床，还是来德国住一个月，咱姐儿俩好好聊聊天儿吧！”

现在，出国的人只要有钱，也象台湾人那样可以给自己做保了。但罗勉说，要出国的人太多，德国大使馆的签证要等很久，一年甚至两年，谁也不准。

我试着给大使写信，说明情况；大使很快回了信，先批准了。罗勉拿着这批准信，才去办的出国期五年有效的中国护照。

没想到他才工作了两个月的女儿也要跟着来。我一再希望他们春天或夏天来，说那时风景美丽，游人也多；但父女俩专捡机票最便宜的季节——一月中旬的严冬。

我买了新被子、新枕头、新毛巾，客厅里摆了对面的两个舒服的单人床……一切预备得周周到到。

雪地封门，得早早出发；在一百九十公里远的 MO 市飞机场，我和 PIPi 等了大半夜……

第一眼，我看见了罗勉那大脑袋。隔着大玻璃，他也认出了我。我俩高兴激动得频频招手！

可一见小娇的神色，我就知道全完了。

她见了我只是冷淡地微一点头，却故意地和身边的一位中年妇女聊个没完——那显然是在飞机上认识的、象个家庭妇女或饭店老板娘。那女人一手拉着箱子，一手正从背包里掏摸什么，一心只想着要出检验口的事，根本无心思听她喋喋不休。而小娇却偏要对她喋喋不休，以此来告诉我：“我心里可没有你，我可没瞧得起你呵！”

天，果然厉害，咱还是小心为妙。

当我伸开胳膊抱住罗勉时，才发现他长高了那么多！我有几十年没抱过他？总还以为他那么小、那么弱、象个小姑娘。我和他眼里都噙着泪，PIPI 与小娇似乎都消失了……

PIPI 开着车，父女俩坐在后座。突然听到一句：

“姐姐，你可千万别回北京！”

我诧异道：“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回北京？”

“姐姐，你可千万别回北京！”他又一次地嘱咐。

由于初见时的高兴尚未过去，后来我才悟出：原来他们认为，我所以请他们来德国，是为了今后去北京时可以住在他家，不过是为了“交换”而已。这么俗气的思维方式，可太不象我小时候的弟弟了，令我从未见识过。

其实，我若真想回北京，还用住在他家？还顾及他们愿不愿意？多此

一举。

“姐姐，” 罗勉又说：“大使所以批准了我们，和你写的信没关系，和你的书也没关系，而是因为我们有钱，是因为我们去过泰国和美国。”

我不语。我倒要再试试，今后给我两个从未出过国的也不是富人的女友办办看，看能不能批准。

甚至我有个第六感觉：这些话，是他太太和女儿，在北京就预先准备好、非让罗勉说出来不可的。我虽没长后眼睛，但我却象清清楚楚地看见小娇在用手指捅他爸爸，让他别忘记在北京时两位女皇交给他的任务。

“大使馆的人对我们可客气了。”他又说：“大使批了之后，具体办事的是个中国人，他也知道你的作品，还让我问你好……”

这倒象是他自己的话。但他恰恰不明白：我早先送给大使的英文版的《冬天的童话》，以及后来受批判的《春天的童话》，才是大使很快批准的原因所在。

将近黎明时到了家。刚一进屋，大衣还没脱，箱子尚未打开，大家还没坐下，小娇便说道：“姑姑，您能不能马上送我们去荷兰？”

“马上？荷兰？”我和 PIPI 一头雾水。四个人还都站着。

“是这么回事儿……”慈爱的爸爸解释道：“小娇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荷兰青年真实——”

“真实？”

“是他的姓，他姓‘真实’。她俩在网上一见钟情有半年了，每天都是对着电脑摄象机前，互相招手聊天儿——”

“咱们能不能先坐下说？”

我和 PIPi 都脱了大衣，父女俩却不脱，因为下一分钟就能去荷兰。

原来，小娇在网上贴了自己的照片和找对象的六条标准，真实就来自动入号了。天作良缘，每一条都符合她的标准：一，长相和风度必须象电影演员；二，对小娇一见钟情，一生下来就不想离婚；三，父母很有钱，家教好；都是名牌大学毕业，起码个个是博士；四，职务是律师、医生或公司大老板，连工程师都太土；五，他家人倍爱小娇，若拌嘴，洋父母定护着小娇，批评洋真实；六，全家人都是坚定的基督教信徒，天主教或其他教的一概不要。

当罗勉诚恳温和地向我讲了爱女的六条标准之后，实在令我“倾倒”地说不出话来——两代人的差距真是天壤之别呵，中国的发展真是进步飞快呵！看来我的书叫“童话”真是叫对了！更令我佩服的是小娇和罗勉那天经地义的神情——理当如此、本当如此、家家如此、人人如此。

只有那不认为理当如此的，才是国人不爱搭理的穷臭外星人。

唉！我真地与世隔绝了！

“那咱们就走吧，”罗勉见我钦佩得无言以答，便催促道。

“一定得先打个电话，”我说。

“不用，”小娇说：“真实知道我来德国，他在家等着呢。”

当时我脑子真就跟不上趟儿，就没问一句：既然进屋连大衣都不脱就得去荷兰，既然洋真实正在家等着你，你和你爸爸怎不直接由北京飞往他家呢？

“一定得先打电话。”我坚持道：“不近哪，上千公里的路程，万一去了不在家，可就惨啦。”我把手机硬递给她。

这手机是我前天为了他们来，放进了三十五欧元的电话卡。她只好拨电话。父亲乐滋滋地等着好消息。我去厨房倒了杯热茶喝了两口，望望窗外，天阴沉沉，街上的雪还冻得硬硬的。一千公里的路，好难开车！PIPI 的车又不高级，半道儿可别抛锚呵。万一抛锚就得住旅馆……

“怎么样？”我从厨房出来：“通了吗？”

“通了，”小娇说：“他说他在上班，就撂了。”

她又拨。

四个人都在客厅里等着。我看着自己花了不少钱预备的新被新枕头新床铺，人家是一夜也不想在这里睡。

“他说他没时间……”小娇茫然地看看我们，说完又拨。

我看看罗勉那也是茫然的脸，忽然明白了这父女俩，不，还得加上他太太，三口人在北京就已合计好：你姑姑不是说，冬天不可能开车去远处游玩吗，这穷相，咱连眼夹也不夹；荷兰一大家子等着咱们哪，人家自会带着咱们四处游玩！要是举行了婚礼，也千万别叫你姑姑他们参加！别让他们出那穷洋相！

否则，她为什么不在德国找对象，偏要去荷兰找呢？

所以，在机场她才是那个骄傲无比的态度啊。

“他说他没时间……”她拨了又拨，洋真实只是一句话：“没时间。”再打，电话关死，竟不通了。小娇还不甘心，又找出以前她“抓获”的一个号码，说可能是他家的电话；又拨通了，那“上班”的洋真实竟在家中，还是一句“没时间”，直到三十五欧元的电话卡全部打光。

“姑姑，附近有卖电话卡的吗？”

“要买你自己去买,”我说:“你还打呀? 你那未婚夫是假猫假狗儿哇。”

“小娇.....”慈爱的爸爸温存体贴地说道:“别买了。不是真的.....”

娇女呜呜地哭了起来。

62 她若死了, 你会疯吗?

外星人:

罗勉那表情, 并不真地伤心。我相信他并不希望有个洋女婿, 只因太溺爱女儿, 才事事顺着她。

PIPI 对小娇一见倾心。小娇哭得好伤心, 没人劝她, 唯有 PIPI 用嗑嗑吧吧的英语耐心开导; 在他眼里, 那还没抬杠的小娇, 一定是可爱得如一只温顺的小猫儿。我和罗勉在厨房里一边聊天儿, 一边准备早点.....

“当初,” 后来我不止一次地问罗勉: “如果我真的给罗文办了来, 象我这样的日子, 他能满意吗?”

“姐姐,” 他回回诚恳地道: “他肯定不满意。”

“什么样的日子他才满意?”

“在美国他跟我说过好几次，他想的是有大别墅，游艇，骑马，钓鱼打猎，他想得可高了。”

“我在德国还没见过哪个华人这么过日子。”

我很想说，我出国的目的就是出版一本不被删改的书，一本能尽情倾诉的书。但我在这一家人面前不能说，因为他们最恨我写书。中共宣判了我那书的死刑，他们就又开始与我来往；我设想，假如我的《一个大童话》真地出版了，他们恨得就又不和我来往了——为什么你不能把家人个个美化，不写成高大全，偏偏有什么写什么？！

不仅不能和他们提我的书，也不能提那些象哥哥一样的国内外为民主奋斗的有识之士——他们会说这话是对他们的污蔑。然而，在家里他们是一字不提；和许多受过罪的人一样：他们自己不提，也绝口不对儿女提，仿佛这样做才是对自己、对儿女的爱。

他们是怎样爱儿女的，他们的儿女就怎样表现。

“大冷天，小娇出门怎么偏不穿大衣？”

“谁说也不听，从小儿就这样儿。”

“在家里只穿个单裤褂，天天靠着暖气读圣经？”

“在家里，她屋里有个热风机，开足了吹着，暖气也开到最高档哪。我们家的灯泡儿都是一百足的，她一回来，立刻开灯，各屋雪亮；不象你们这儿人走灯灭。”

“不用也开？”

“不用也开。”

“你们也信那基督教?”

“谁信哪，可你不能让她听见，否则真跟你吵。我仔仔细细地读过圣经，发现尽是矛盾，还排斥别的教，好象只有它这一教正确。”

“她那六条儿里有一条儿是：那男的一生下来就不想离婚?”

“是呵，可人家要是偏跟她离可怎么办哪。”

“嗯。”

我能想象得出：她那绝对不会离婚、只爱天天跳交谊舞的母亲，是怎样从小娇儿时起，就天天向她灌输着这些话的：你爷爷和奶奶离婚，你大爷离婚，你那姑姑尤其邪唬，竟离了三次、还想离八次婚！只有你妈妈我，绝对不离婚。你得向好样儿的学呀，乖孩子！人从一生下来，就不应该离婚！中国法律就是不健全！

我又问：“早点她只吃带来的胶皮糖?”

“从小儿就这样儿，要不怎么弱智哪。”

“也不爱吃水果青菜，光吃肉?”

“要不怎么长不高，象个小孩儿呢。”

“她会做家务活吗?”

“什么也不会，也不用她做呵。”

“你全做了?”

绝妙的是，罗勉完全用夸赞她的语气与我对话的。

我不好说，她的月经纸丢在卫生间的地上，自己也不捡起，还是我收捡的；她留在床单上的血迹，还是我洗净的；而这位公主竟一切认为理所当然。

这小城里可看的東西很多：美仑美奂的大教堂，彩色大壁画，文物古迹，博物馆，石子路小巷，各色小店.....奇怪的是，小娇一概不想看，她爸爸也就不看。她穿的是夏天的尖皮鞋，底板太硬太滑，在雪地上根本无法前行，我搀着她象搀个老太太。路过鞋店，只好给她买了一双价钱不低的她很喜欢的毛皮靴。

走着走着，突然小娇不见了。

“小娇哪儿去啦？”

我们都站在街上，四下张望。

“等等吧，”罗勉好脾气地说。

但左等右等不来：“都十五分钟啦。”

“我去找找，”罗勉进了一家化妆品店。

终于在一家店里找到了她，可她什么也没买。

“她在国内经常这样？”我问：“突然消失，也不跟别人打个招呼？”

罗勉微笑地无言以答。

走着走着，公主又不见了.....

“下次再出门儿，”我说：“我是绝对不跟着来了。”

这天早上九点，PIPI将父女俩送上去MO市的火车。他们打算去那名城玩一天，带着面包、香肠、水果和饮料，说好坐晚九点的火车回来。

傍晚七点半，天已黑。手机响起。

“我是小娇呵，我回来啦，在火车站哪，我爸爸回来了吗？”

“没有哇。”

“能接我吗?”

“这就去。”

PIPI 立即开车去本市火车站。

他俩进了家，边吃着热饭菜，她坦然自若地告之：和爸爸走丢了，她是坐快车回来的；身上没带钱，却进了一等车厢。遇见一位好心的德国女教师，为她付了三十七欧元的车票。说着，小娇把她的姓名地址条子，交给了 PIPI。PIPI 说明天就去汇款。

一等车厢？我心里一闪：她是不是想遇见个白马王子啊？若那女教师偏偏就是个白马王子的话？不是有这样的真实报道吗，一位漂亮的穷洋女人，在一等车厢里遇见一位亿万洋人大富翁，然后结婚生子有新情人，那一连串轰动世界的故事啊……

“你们看了那有名的花园和古堡了吗？”我问：“去了博物馆吗？”

“没有。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

我不语。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来德国。可我什么也不想说。由于罗文的事先介绍，平日里我只和她爸爸东扯西聊，不想和她多话，她想和我抬杠也没法儿抬。

近九点钟，手机又响。

“小娇回来没有？”罗勉焦急的声音。

“回来啦，刚吃了饭哪。”

“我就要上火车了，”说完他就撂了电话。

快夜里一点了,PIPI才把罗勉从火车站接到家。他脸色铁青、青中透着苍白;胸中憋了多大的气,进屋连句话都说不出来。

“脱了大衣吃饭吧,”我说。

“这让我找哇!”我的话他全没听见,也从未见他气成这样:“这让我找哇!急坏了我了!”

他大衣也忘脱,坐在床沿上反反复复地说这句话:“这让我找哇!急坏了我了!”

原来,小娇到了市中心,只进化妆品店和服装店,老爸爸就一次次地站在店外傻等。小娇看中了一件毛衣,向他要钱,他说你的衣服已太多,何况这毛衣也不怎么样。小娇一生气,转脸又不见了。罗勉站在店外等了半天,也不见人出来,就进一家家店去找;直找到天大黑了,公主还是没影儿。他担心女儿不测,焦急万分;又去火车站东找西找。近九点该上车了,打了电话才知,公主正安然地坐在家中吃了饭。

“这让我找哇!可给我急坏了!.....”他既不想吃、也不想喝,仍是脸色青苍,心碎地述说着当时绝望哀伤的心情,并不去数落女儿的不是。

公主坐在椅子上哭了,说她的零花钱老是不够;说她爸爸太吝啬,老舍不得给她花钱。

“小娇,你可别这么说,”我坐在罗勉身边,望着她:“你穿的带的,哪一样不是赶潮流的?前天你花五十欧元买那么一条二三米长的大围脖,那围脖质量既不好又难看,可你买了,你爸爸也没反对呵。你在大学四年,你爸爸每个月给你一千八,让你过得舒服,有几个父亲能做到呵?你去美国,你爸爸拿出好几万美元给你做担保,有多少父亲能出得起?他给自己什么

也舍不得买，全花在你一个人身上啦。”

公主不语，只是流泪。罗勉听了更加难过，仍是不断地重复着找她时那万念俱灰的心情。

她若死了，你会疯吗？小弟弟，她若死了，你会疯吗？我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他——让我好好抱住你，我的小弟弟！让我能给你一些温暖！也许这是一生中最后一次对你的拥抱。让我抱住你、抱紧你；但愿你能永远回忆起我抱住你的滋味儿！不管我的实话文学会引起你多少不快，但我是爱你的，永远爱你的……

他不知我想的什么，他只是接受这拥抱而心里舒服。

“姐姐，有的事儿都不能跟你说呵，说了都叫你恶心……”他欲言又止。是呵，我也不希望他说。我早就猜到，一个对化妆品店着了魔的女孩儿，却又不买什么，是否为此在店里出过事？或许，爱上了一个白马王子，又被别人抢跑，感情上受不了，也是她在美国突然要回国的原因？

“为什么你不多给她一些零花钱呢？”

“她自己有钱舍不得花。她有自己的存折，不少钱呢。她工作，我们一分都不要她的，是她自己舍不得。”

“在家里白吃白住？”

“是呵。”

“当初哥哥给咱们做了多好的榜样！他一工作，就主动交给父母工资，我们也交；可你们从不跟自己孩子说？”

小娇意外地看着我，也不哭了，好象从来没听过这种“神话”。

他们岂止是不提哥哥，岂止是不提文革，岂止是什么该说的都不说；

他们立意要把自己的儿女教育成只知吃喝玩乐的庸人，生怕他们与政治沾边儿.....

63 范军去世，被称赞为：“真中国人”

外星人：

分别的时候，父女俩的脸拉得长长，尽管给他们带的衣物和礼品塞了满满的两箱子、又两个手提袋；但仍象我一百八十个对不起他们一般。

PIPI 一个人开车送他们去飞机场。他一回到家，就发了一通话：

“奇奇，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如果你再邀请谁，我就跑，开车去我妈那儿，一个月都不回来。你既接不了谁也送不了谁。你就和他们一起待在家里闷死吧。”

但我还不死心，没忘记罗勉说过的：大使因为他有钱才批准他们的签证的。不久，为了证实大使是否重视钱胜过重视作家，我又给从未出过国、也不是百万富翁的两位女友办理，大使又很快批准了。然而，一位女友要帮助部长夫人写回忆录，请不下假来，那部长夫人还警告她最好别与我来往；另一位一个人不敢出国，难得的签证竟白白地浪费掉了。

许久不知元元的消息了，出于关心和好奇，我拜托蝈蝈去当回密探。

不久，她来了信：“.....我在门外按了一百多下门铃就是不走，只假设他就在家里；终于让他开了条门缝儿。一见那屋里，老天爷，连个下脚的地方也没有，又脏又有股浓浓的霉臭味儿。我就那么站在过道里，说我们都在关心他，说你也惦记他，问问他的生活近况。他支支吾吾地也说不清，好象在做着生意，好象又没什么钱。我问他每月有多少退休金，他说，他不屑于去要，说人事科应当主动给他送来；还说他根本不知道人事科在哪儿，从来没去过一次.....”

终于真相大白！我在美国问过罗文，我在德国问过罗勉和蝈蝈，我在出国的二十多年里，不知问过多少次亲朋好友：“他在做什么？他是怎样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回答：“他过得不坏。他还能没有退休金？”

毕竟我和他生活了四年，比别人更加了解他！

于是我给他去了好几封信，每一封信都掰开揉碎了说：“.....蝈蝈熟知国内的退休政策，她愿意帮你，她已经去了你大学的人事科问过，人事科的人都以为你早就死了，说你二十多年一次也没去过那里；说你只要哪怕去那儿打个照面儿，你二十五年的退休金就一定给你.....我不知你怕的是什么，那儿又没有老虎吃你。你应得的钱，为什么自己不要？还是打肿脸充胖子装阔大爷？假如你真太有钱，又何必去老干妈家蹭饭，让她儿女对你不满？元元，我不相信你有钱，假如你真有点儿钱，也只能让人吭了去。相反，你是装大爷装得让自己下不了台阶儿。在美国和西欧，一个人若想有退休金，

也得先自己申请，退休局是不会主动给任何人寄钱的，何况中国？.....假如你觉得去人事科比杀死你还难受，那你就来德国，我立即和 PIPi 道声再见，这个家都给他，帮他找个年轻些的中国女子并不难，我保证不出一周就会和你有个新家.....”

没有用，怎么说、怎么劝他也没用。我发动了三位女友一起劝他：要么去要退休金，要么来德国与我过到老、过到最后一天。

他给人人一个死闷葫芦，以至于连蝓蝓的电话他也不接，谁也见不到他。

我知道再也不会给他去信了，给他用手写了最后一封信：

给范军的墓誌铭

他的本事：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把有辙的事情没辙化；

他的能耐：把整洁象样的家变得垃圾场化，

把自己的形象弄成要饭花子化；

他的心胸，宽远无边，

他的理想，赛过神仙；

他只爱看自己订的二十二份报纸，

语言鹦鹉学舌化。

如今你升了天，天上必人人平等，

再不用穿衣吃饭，花钱看病，

也不用各种保险，

这才真正自由化。

我们也会，一个个飞上去，

与你一起笑看，

红尘的世俗化。

为你高兴！

2006年的夏天，范军去世了——是蝥蝥来信告诉我的。

他死在家里，躺在过道的水泥地上。当有人发现时，他的身体还带着余温……

一些熟人和朋友在北京给他开了追悼会，称赞他为：“真中国人”。

他们称赞他为真中国人，可又谁都不想学他。因为他们人人都得去人事科，都得要退休金。他们谁也不会象元元那样，辞了职、满脑子幻想非非地要去搞什么生意。他们平时若见到他时，也从不真正地想去了解他、去关怀他；没有人肯去按一百次门铃非要进去不可；甚至绝对不想和他结婚。

我和元元住的单元下有一邻居——一位面貌温静，令人一见便好感倍生的女人。我不知她的姓名，只知她离了婚，独自带着个小女儿。当我还没离开中国时，便感到元元喜欢她，但他从未表示过一丝一毫。那女人与我们也并无来往，不过是见面打个招呼而已。

当我在德国,知道元元再也不会来时;当我们真地离了婚后,我不止一次地鼓励他去追求她。我曾这样给他写过信:“把你追求我时的勇气拿出来!她会照顾你,让你幸福的。你需要有人照顾。她一定是个可爱温柔的人。大胆地去追求她吧!她照顾好你,我比什么都高兴!”

但无论我写什么,元元皆不理不睬,也不回答。

而今,纪念他、夸赞他的都是假中国人……

我总回想着他那最后的时光——他倒在了过道的水泥地上……他的身体还带着余温……当他弥留之际,他一定在想着我,看见了他的奇奇正推门进屋……

64 《一个大童话》的新书发布会

外星人:

在开追悼会的前夕,他妹妹从济南赶来……我不想叙说那一切了。后来他妹妹写信告诉我:台北伯父给了他的二百万美元让他买房,他都给了老干妈。房子没买成,老干妈也不认账……

和国内的人联系越来越少，和国外的人也一样。就算我偶有小文在《畅言》上发表，也并不经常。

德国比美国冷清得多。纽约那边胡平和「89 六四」的许多流亡者，搞民主运动，但民运中这些年来也是几经曲折和变化。

如果是哥哥活着，肯定不会象我这样生活。然而，我跟哥哥的性格太相反了，怎么能和他一样呢？

有时也和几个熟人通电话，得知这些年的变化很是令人感慨——

小松鼠的两个店都关掉了。他和黑天鹅离了婚，花狸与丈夫也离了婚；与小松鼠远走高飞，去了印尼定居，结了婚并有两个孩子；

汉学家哈宾教授与太太离了婚，又与一位十九岁的女大学生结了婚。他的第一夫人也不再搞民运，带着儿子，去了丹麦定居；

阿西夫妇在台湾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儿女都大学毕业了业，生活美满；大齐还在原单位教书，升为副教授；

红与德国丈夫离了婚，回中国定居；

小鳄鱼去世。大鳄鱼有六个情人，去年得了癌症；

四好还吃着九十八岁老娘的退休金，靠说谎和骗人在北京混日子；

诺拉去了上海，在「城市规划公司」上班，年年回德国，过得相当滋润；

小方从德国又去了美国，成了一家饭店的老板娘，买了一栋房子；

索亚一直在德语中心教书，升为副教授；

小刘夫妇的饭店关掉，儿子上大学，夫妇俩靠失业救济金生活；

阿玲和一位德国医生结了婚，买了房子，生了个女儿；

绿旋风的第二个女儿在瑞士结婚生子，有了家庭。绿旋风要求回国生活，

向中共写了“悔过保证书”，在北京定居；不久又因新的不满，再次离开中国，回到了瑞士；几年后因病在一家医院里去世；

莲与阿石结了婚，在德国买了单元房。小象大学毕业，在一家德国公司工作，与他初恋的德国姑娘，结婚后有了两个孩子。大象向中共写了“悔过保证书”，被批准回国定居；

马三和陆七都退出了民运圈子，转为支持法轮功；陆七换过五六种工作；马三一直没工作，做做家务，看看书，偶尔写写文章；

张老板夫妇把饭店交给了儿子，回中国定居。后来这家饭店由于没生意，只好关掉；二儿子在澳大利亚开饭店立住脚，兄弟两家都去了那里.....

2007年的圣诞节前夕，我给纽约的《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寄了一本《爱的呼唤》。那是扉页上写着“作者自存”的一本，因为这最后的两本是给自己留的。

“我会认真看你的书，”他回信道。

就是这样一句他也许是不经意的话，却给了我极大的感动。

我送出去过几十本书，可是没人说认真地看了我的书；而学富五车的胡平，本也可以象其他人那样沉默，他却说要认真地看，这就令我自责——我一直想把它好好修改和增删一遍，希望它再出版，可是二十年来，我什么也没做。

以前台北出的那两版，早就卖光了。二十年过去，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可我连电脑也没买，完全象个秦朝人。

以前总认为爱情事业双完，现在应该振作起来。一本书、一本不被删改

的书，它毕竟是我出国的目的啊！没有它，就没了我出国的灵魂。

2008 年的二月份，我动笔修改和增删，并回归了原书名《一个大童话》。同时，我不断地给胡平写信，把自己要改的地方，为什么要这么改的许多想法，连同我日常的生活，毫无保留地寄给了胡平。又一鼓作气地完成了 8 万字的传记电影剧本《遇罗克》。

2009 年二月下旬，《一个大童话 我在中国的四十年 1946—1986》由香港「晨钟书局」隆重地出版了。三月五日，是哥哥就义三十九周年，二事合一；胡平在纽约主持了新书发布会。苏晓康，李劫，陈破空，王军涛……都作了极为中肯的发言。

我未能去，胡平让我写了书面发言，全文如下：

当我收到新书《一个大童话》时，我感动得热泪直淌。感谢晨钟书局、感谢孟浪先生，他们把书的封面和扉页，设计得太美了。这本书，是我的女儿、唯一的孩子，孟浪让她如此完美地出世了。她的封面，与徐晓、徐友渔、丁东等人的《遇罗克》一书，有如姊妹篇；浅蓝色的扉里，象征着作者的心，纯净如天空。

我迫不及待地、花了整整两天时间从头看到尾，发现我的文字，没被砍掉一个字。她是一个健康的、没有被人断肢截臂的女儿。谢谢晨钟书局！

这本 42 万字的书，是对《出身论》的详细的诠释。它不仅诠释了《出身论》，也诠释了从 1946 至 1986 年，一个家庭在中国四十年的生活——哥哥，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妹妹，在道德上被判了死刑。

过去，人们喜欢《冬天的童话》，而这本书，才是真正的《冬天的童话》。它的出世，使作者以前发表过的所有的中、短篇，都不必看了。它是作者

唯一的作品、唯一的女儿、唯一的孩子。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作者在中国四十年的生活，是个典型。然而，谁又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呢？假如，一个人，在种种的政治运动、政治磨难中，变得高、大、全而又未进监狱，进了监狱又因高、大、全而未升成死刑或被长期监禁，这在中国是可能的吗？假如一个家庭，在种种的政治运动、政治磨难中，却变得更加相亲相爱，心灵全未被扭曲，这在中国是可能的吗？如果是可能的，我们就应该欢迎更多的灾难。

人们说，中国今天的道德沦落、心灵冷漠、犬儒主义，不正是这本书从1986年之后、还没有写出来的生活吗？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中共的暴政之下，有哪个人不是呢？且不说被折磨的人，就连折磨别人的人，他们也得先变成魔鬼，每天在魔鬼与人的心理上挣扎。我看了高智晟的文章——那字字是血和泪、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文字，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些用电棒折磨他的人，每天回到家里是什么样子，他是否会如实地对他太太和孩子，讲他在“工作”时都做了什么。我想象的，是他们不会哭，不知笑和开心为何物，回家之后是借酒浇愁、心理变态。就连折磨底层人民的高干们，当他们有一天身陷囹圄时，他们同样没有为自己辩解的自由。在这一党专制的暴政之下，有几个人是不属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有几个人真正是快乐的？

哥哥就义三十九周年了。到底遇罗克在监狱里受过多少酷刑？到底有多少人受过高智晟那样的折磨？到底有多少人在中共的监狱中屈服、变成了特务？甚至被中共反包装、给他们披上“反中共”的外衣？有一天，中共的黑色档案终将公之于众。遇罗克的日记、我的日记、母亲积攒的千张

照片，总有一天应归还我们。

我幻想着有一天，“遇罗克群雕纪念碑”是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外面的圆形广场上。「北京市工人体育场」——那是文革中宣判过一批又一批政治死刑犯、每一次都是十万人参加宣判的地方。那是大理石或花岗岩的石雕——遇罗克像是活在山岩中。那一刀刀削砍、挖出来的空间，象征他那狭小、昏暗的屋子；他头顶和四周的拥挤，象征着社会的压迫和黑暗。在深夜中，从工厂回来、劳累了一天的他，正坐在潮湿低矮的小屋里，在自制的小桌边、台灯下，为《中学文革报》赶写文章。他右手握笔、左手压在写满了钢笔字的纸上，偶一抬头沉思的那一瞬间——眼神中，凝聚着要为亿万受苦人伸张正义的神圣和凛然——是把命交出去、为真理献身的义无反顾；那清澈的、要穿透黑暗的目光，深信着未来中国的黎明。

他的雕像有如大半个浮雕——在他的左右上下，是文革中死去的著名的异议人士的真人塑像。

环绕纪念碑的一片片的护墙，刻满了文革中死难者的人名，那是一片人名的海洋。

纪念碑的揭幕日是在“遇罗克日”——3月5日，他英勇就义的那一天。大街上人山人海，人们久久地不肯离去……

“遇罗克群雕纪念碑”，是所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纪念碑。它不是肉体死在战场上的纪念碑，而是心灵被屈死、被扭曲于中共暴政下的纪念碑；也是肉体被中共暴政摧残至极、中国人向全世界大声疾呼人权、要言论自由、要法制、推翻暴政的纪念碑。

哥哥，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65 打字练习《奇奇的一天》

外星人：

在新书发布会这一天，我和 **PIPI** 在家里正做什么呢？不妨把我的电脑打字练习给你看吧。

奇奇的一天

早上一睁眼，瞅瞅趴在桌上那安安静静的电脑，又怵又爱。奇奇和 **PIPI** 买了两个完全相同的电脑，一人一个，一屋一个，免得打架。也为万一有一台坏了，起码还有一台能够工作。自买来后的三周，二人就是犯神经。因为各种项目要学的太多了。**PIPI** 每天都有新发现，新发明，竟能无师自通。奇奇不仅佩服，也着实为他的手舞足蹈，叨叨唠唠头晕脑涨。

奇奇从“秦朝人”进入了电脑族，六十三岁去学，三周过去，“ü”还是没找到，四种标点符号还是德文式的。

吓人的是三月八日那天。纽约在开奇奇的“新书发布会”。她的书面发言，比起胡平发表的那些文章，比起孟浪专出反中共暴政之书的业绩，有如一粟与大海之差。然而仅这一粟之书面发言，中共骇客就来访了。那天奇奇刚

打开一封莫名其妙的英文信，只听“嗡”的一声，电脑发颤，电机里似在急速旋转，强大的干扰象在烘烤着奇奇的脸。机下的Lü色信号在慢慢往前移动，象要吸去机内所有储存的东西。天！网特！她急急想去销掉，无奈所有的销标都不灵了，只感到那访客强悍无比，正给你一个黑色的，强暴的下马威——让你奇奇发言，出那王八蛋书！先给你个客气的见面礼！好的还在后头哪！

她想拔电源，又生怕电脑会因此坏掉。正焦急万分，PIPI进屋，奇奇呼道：“快快，快关机！”无奈PIPI不慌不忙，慢腾腾掏出眼镜，就要把那老长的英文广告信仔仔细细看个够。

„快快！”奇奇急叫：“你没看见Lü线正在走吗？都走完了就该炸啦！”

„怎么了，急什么……”PIPI伸着脖子，坐在电脑前，直眉瞪眼地看那老长老长的信。

„特务特务，网特呀！”奇奇急得嚷：“中共网特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啦！关呀，快关呀！”

„没特务呀，”PIPI有如泰山不倒：“让我把这信看完……”

奇奇气得踢他的鞋，没用；又踢他的腿，还没用；又照他肩膀“咚”一拳，急得索性用手挡住电屏，不让他看。Lü线已经走了一多半，在奇奇的气急败坏中，PIPI一边嘟哝着：“怎么还挨揍”，终于把电脑关了机。

于是一通辩论。PIPI说哪儿来的特务，怎么还挨揍？奇奇说你不知道白宫和德国议会的电脑都被中共骇客搅了个够？PIPI说你一个小蚂蚁可算什么，奇奇说中共管的就是一万只蚂蚁呀！PIPI越听越糊涂，认为她太小题大作；奇奇说：“把你们全关进中国监狱，让你们尝尝高智晟的第一道菜，你们就

全明白啦!”

三月八号那天，纽约开着奇奇的“新书发布会”，她全然没感觉，一整天和PIPI生气。按理，“谎话说过一千遍也得变成真理”，怎么一千遍的真话都说不服这德国洋儿子？她偏不服气，吃过午饭，继续想法要说服他，于是就给德国最有名的反共人士彭打电话。

彭肯定说，今天来访你的就是骇客。他说他的电脑已被炸过五次。他说唯一的方法就是少给别人你的信箱。他说有事最好通过电话联系。他说也千万别打开附件；国安也会冒充你信友的名字给你来信；你刚一打开，电脑就黑了.....

哇噢!

奇奇将他的话全部说给PIPI听，他半信半疑；她高兴了没一个小时，PIPI又推翻了.....

那天晚上奇奇实在累得脑袋发涨，她简直恨这机器。

如今这事已过了一周。奇奇基本会打短信了。吃过早饭，她去看信箱，是“o”。奇奇暗自高兴——三周来的神经质和说不出的乏累，今天总算可以松弛了。可又实在不对味儿——本来是希望朋友遍天下的，怎么倒盼着别人不来信呢？怎么中共把人人的心理都弄颠倒了呢？这可是在德国呀，唉，不管怎么说，宁可安静，也别让这刚买的新电脑炸黑了呀！

她正想练打字，忽然一封胡平的信，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你没见到我的字吗？”

天！什么文字呀？难道，胡平在用特务式的密码给我写信吗？她仔仔细细又仔仔细细地看来看去，也未见哪里藏着个密码。胡平可是在美国呀，

怎么我们都变成了间谍心理！她所问非所答地回了信，又一心练打字。PIPI 这时走来，非要热心指导，不知哪根手指按错，竟出现一个“spam”信箱。

“spam”？上面注明：全是电脑不欢迎的有毒的信，一看，竟有十封之多！炸弹？！竟然全以胡平、孟浪和彭的名义？天！今天刚想安静一天，没想到却得趟地雷阵？

“开不开？”每开一封信，奇奇先问 PIPI。

“嗯，开，”他颇犹豫。

“这可是你说的。”奇奇最烦他的，就是他过后的怨天尤人。

PIPI 不语。

“黑了可是你的责任。”她不得不再叮他一遍。

一封又一封的炸弹信，冒着危险，全部看完，才知虚惊一场！原来，胡平，孟浪为了让她及时知道，为了让她及时高兴，信的内容，都是关于三月八日“新书发布会的，都是好消息。

“天怎么都黑了？”PIPI 说。

“累死我了，”奇奇从没感到这么乏过。

累人的是那老怕被炸的紧张。有如一九六六年八月将被抄家时的心情，什么时候能摆脱那魔影呵！

奇奇尽管又紧张又乏，还是想知道个究竟：为什么信箱分成两类，为什么有毒的信箱没有毒，而没毒的信竟是一片乱码？

彭在电话里解释说，凡在德国买电脑的人，都是这种情况。德国的过滤器看着中国人名不顺眼，想怎么分怎么分。

原来如此！让她和 PIPI 大半天的紧张！

这一晚，奇奇九点钟就要躺下睡了，因为她太累了。

„PiPi,“ 睡前她抱住 PIPI, 亲亲他的脸蛋说: “你是我的电脑教授. 没有你, 我简直不知该怎么弄. 我第一次知道了你的天才. PiPi, 你真的是电脑教授.”

„那当然,“ PIPI 当仁不让.

奇奇钻进舒服的被里, 她希望做一个好梦.

她梦见了那没有电, 没有机器的美国中部“阿密续”农村.....

66 哥哥找到了我

外星人:

十几年前刚搬到这座小城时，经常在晚上睡觉前和 PIPI 一起出去散步，呼吸新鲜空气。

这天晚间十一点半了，我要去发一封刚写完的航空信。公用信箱就立在小街的尽头，步行几百米远。

冬天，外面的积雪白皑皑冷森森。我们都穿着暖和的大衣。走出楼时，只感到雾气濛濛。楼前的路灯有些晃眼，我无意地用手遮住额头，往天上看了一眼，只见一排三层楼房后面，一盏象足球场似的高高的大盘灯，迷雾

中似仍未关闭。我们往右一拐，朝信箱走去。

“这附近有足球场吗？”我问。

“没有哇，”PIPI 说。

我一面走一面回头向天上看，缥缈的云雾中，那发着乳白色淡光的灯，似隐似现地又不见了。

把信扔进了邮箱，我们便朝家返回。街上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声狗叫。在这静谧沉寂的冬夜，一切都正裹进鬼兮兮的浓雾中，进入睡眠状态。

我又一次用手遮住额头往天上看，当眼睛处在阴影里时，那大圆灯似隐似露地又出现了。它直径有一米大小，外圈六个圆灯泡，里圈六个小圆灯泡，光芒并不强，与大盘一起呈乳白色，在瀰濛的雾气中，高高地远远地直视地正对着我们。

“PIPI，你说没有足球场，那儿怎么有足球场的大灯呢？”

“哪儿啊？”

“你用手遮住眼睛，象我这样。看到了吗？”

“真的，看到了。”

“那不是足球场的大灯吗？”

“不可能。附近我都逛过，根本没有足球场。”PIPI 看着看着又说：“就算有足球场，这灯也没灯杆，它的正面怎能老朝着我们呢？”

是的，那大盘灯就停在上空，一动也不动。我俩站住，仰着头，双手遮在额前，发傻地盯住它，慢慢又往前走。

“呀，PIPI，它随着我们的距离，调着角度正对着我们哩！”

“真的？”

“你看，你看，它确实在变换着角度!”

“真的!”

我们改为快步走，再看看它，它的角度一点点往下倾，仍是正正地面对着我们。

“——飞碟?”

“飞碟?!”

“是飞碟!!”我俩惊慌失措地互相对看了一眼，撒脚就朝家奔跑。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即使我们拐了弯，而那神秘的乳白色的大灯，始终在变换着角度对准着我们。

我们终于跑进了楼里，心狂跳着，却没进屋。紧挨楼门站着；太好奇了，犹豫着，还想看看那飞碟是否已经消失？

“出去看看吗?”我心跳着问他。

“万一给你吸上去呢？你可就回不来了!”

“只在门外，不走远看。”

“给你吸上去，拿你做实验。快进屋快进屋吧!”

我仍犹豫着不肯进屋，他也只好站在那里。什么动静也没有，无论是楼里还是楼外。足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先是好奇地把楼门开了个小缝，继而开大些，再开大些，索性站在了门外的台阶上，用手遮住额头往天上望去——遗憾，什么也没有，雾气也不那么浓了。我站得更远些，还希望发现它；可是，什么也没有了。

真的是飞碟。外星人在观察着人类的生活。他们，是出来旅行吧？

十几年过去了。每当想起那晚的情景，一丝一毫也不会忘记。而难于解释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拔脚奔逃？我们怕的到底是什么？

人类丑化外星人，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脑髓——把狗头接到你的身子上，象我们关其它动物一样地用笼子关住我们；把人当做猴耍；拿我们做种种试验.....

某些科学家对外星人直接的接触，据说有很久了，而各国政府都是绝对保密的。长期的恶宣传之后，只是在近年，才有唯一的一部电影，是把外星人描绘成心地善良胸怀开阔的好人的——《来自 K- PAKS 星球的人》。那外星人只是一道光，你看不见的，他借了某位刚死的人的躯体里“再生”，用外星人自己的灵魂，认识和感化我们的世界。

他们按时回去时，不差一分一秒，那一道极强的闪光，从人的躯体里飞出，人类无论怎样用仪器监督着，都不起作用。

这部故事片我看过两次——一位既没身份证又没家，说话又令人奇怪的中年男人，被警察送进了精神病院。给他诊视的一位心理医生，由根本不相信他是从外星来，到渐渐深信不疑。这外星人不一般的性格，给精神病院带来的是新奇的博爱、关怀与改变。影片的可信与感人，令我极为难忘；而且认为，剧本作者一定是根据真实素材加工创作的。

其实，即使从没看过这部美国影片，我也从不相信外星人是丑陋和邪恶的。因为，假如他们的社会是先进的话，他们的博爱情怀与良知，自然会大于人类的。故，有多少人盼望着见到飞碟，盼望能把自己吸上去，见见另一星球和宇宙的真实情景，哪怕永不能回来。然而急切企盼的人们，却又难于见到飞碟降临。

可当我真地见到了，却吓跑了。我没有站在原地，双手高高地举起朝他们欢呼：“你们好！把我带走！把我带走吧！”

或许，自己想写的书还都没出版？在地球上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若回不来，谁去写这些书呢？

一生，往往就一次机遇，不会有第二次。

其实，心的深处，恰是隐隐地感到，也许哥哥就在上面，站在飞碟的窗前，他笑对别人说：“看，那是我妹妹，我终于找到她了。不管多少年，我也能一眼认出她来。” 所以它就停在那里了。

然而，他们是不肯把心怀恐惧的人吸上去的。

真的英雄，具有博爱胸怀的真诚的人，他(她)们死之前，灵魂都会化作一束光，或是化在空气里，变成风，被天外的宇宙热情地接纳的。

假如再有一次这样的机遇，我绝对不跑，恳求他们把我吸上去。我太想看看另一种宇宙，另一个星球，另一样生活！

作者个人简介：

遇罗锦简介：

1946年3月31日生于徐州，三岁时随父母迁往北京；

1958 年于「北京市东四区一中心小学」(现在名为“北京府学胡同小学”)毕业;

1961 年于「北京女十二中」初中毕业;

1965 年于「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毕业,被分配在玩具厂设计儿童玩具;

1966—1969 年,因「思想反动」(日记)被劳教三年;

1970—1979 年,先后在河北省、黑龙江省和北京,做过农民和城市临时工;

1980 年调到北京《学习与研究》杂志社任美编,同年在北京《当代》发表纪实文学《冬天的童话》;

1981 年在广州《花城》发表纪实文学《乾坤特重我头轻》和小说《春天的童话》,《春天的童话》旋即被禁;由其第二次离婚案引发的全国长达一年的讨论及各大报刊对《春天的童话》的批判,被中共舆论诬指为“堕落的女人”,至今仍是被中共排挤和压制的对象;

1986 年之前,也发表过其他中短篇小说及一些文章。《冬天的童话》与《春天的童话》被译成英、法、德、日和芬兰文等版本;

1986 年 2 月在西德申请政治庇护并定居;

1987 年 3 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自传小说《爱的呼唤》,在中共压力下,1989 年宣布不再出版;

1987 年日本东京「现代文学研究所」出版中外评论集《遇罗锦》,在中共压力下,宣布不再出版;

2008 年 2 月,将《爱的呼唤》作了大量补充和修正,回归原书名《一个大童话 我在中国的四十年 1946—1986》,42 万字,于 **2009** 年 3 月,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2010 年 3 月, 台北「允晨文化」出版《一个大童话》的续篇《童话中的一地书》;

2010 年八月底, 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 编入了遇罗锦的传记电影剧本《遇罗克》和她所收集的集体献词《献给遇罗克的花》;

2013 年 10 月, 香港「晨钟书局」出版遇罗锦编著的《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 遇罗克为之而死 被中共封闭至今的六期报纸》。

博克: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